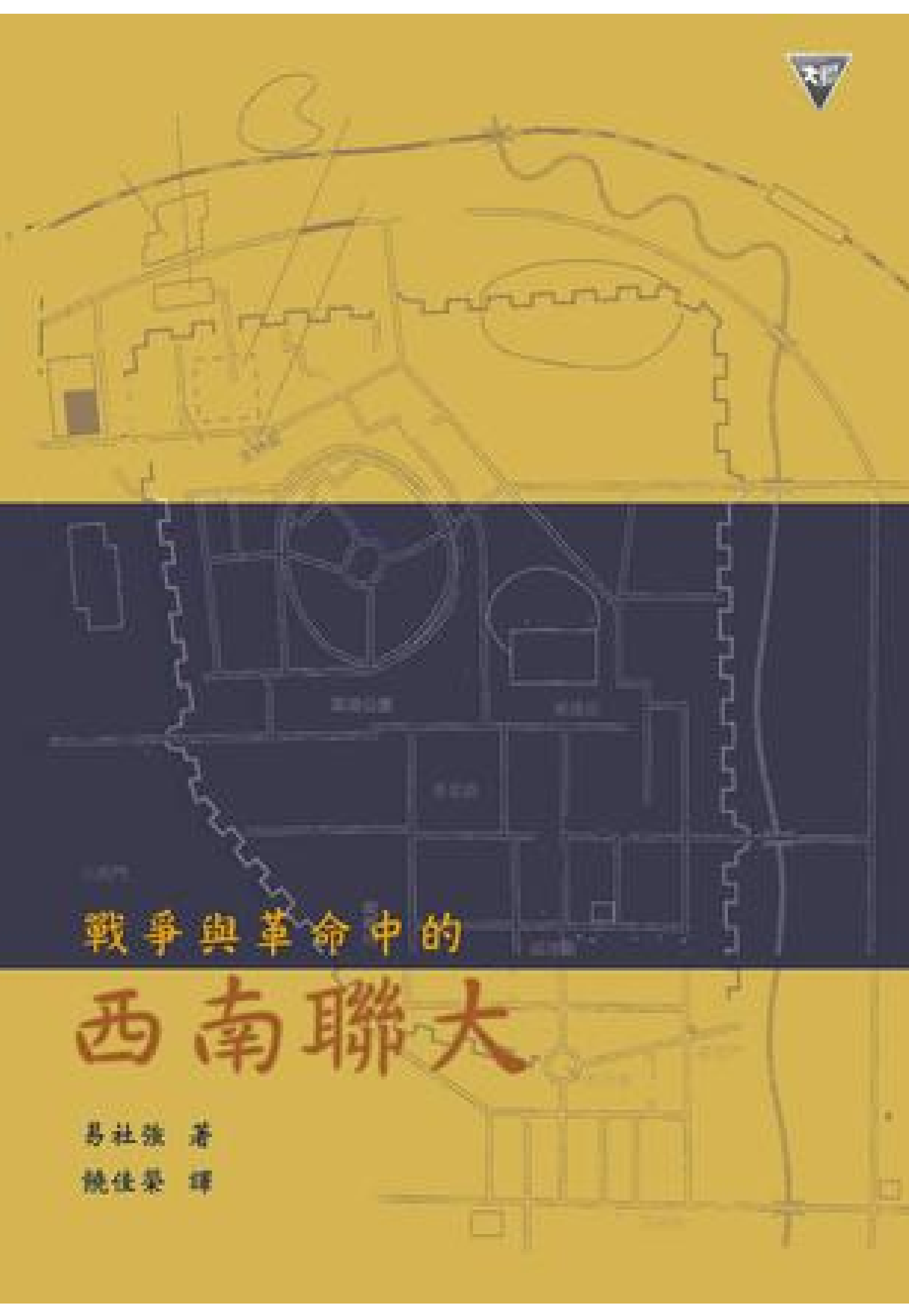


戰爭與革命中的
西南聯大
易社強 著
饒佳榮 譯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易社強 /著
饒佳榮 /譯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易社強著；饒佳榮譯.
-- 臺北縣新店市：傳記文學, 民99.04
面：公分. --（傳記學術譯叢；1）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ISBN 978-957-8506-72-5（平裝）
1. 西南聯合大學 2. 教育史 3. 中日戰爭
525.8235/101 99006074

傳記學術譯叢001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原著者：易社強
譯 者：饒佳榮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社 長：成嘉玲
特約編輯：李怡慧
封面設計：小米工作室
責任編輯：邱慶麟

地 址：231台北縣新店市復興路43號1樓
客服部電話：（02）8667-5461
編輯部電話：（02）8667-6489
傳 真：（02）8667-5476
e_mail：nice.book@msa.hinet.net；biogra-phies@umail.hinet.net
郵政劃撥：00036910・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231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4樓
電 話：（02）2917-8022
印 刷：世新大學出版中心

定 價：新台幣四百八十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ISBN 978-957-8506-72-5

目　录

序

战争、西南联大与历史遗产

——读易社强教授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吕芳上

一

如果把大学校史写成一部革命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失败；要是把充满活力的校史，写成光有组织、只有制度，看不到灵魂，看不到「人」的历史，也同样不会讨好。大学本来就是活生生的一群人，聚在一块，共同耕耘、切磋知识学问的学术乐园。战争时期或许外在环境险恶，但教师埋头著述、勤快解惑，学生好像永远有填不满的求知欲望，师生交流绵密，知识火花热闹迸放，如响斯应，此所谓「弦歌不辍」，既是浩劫，也是风云际会，更是因缘凑合。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作，天津南开——国人最早的私立大学，首遭战争摧折，接着国立北大、清华，难逃劫运。三校先约会于湖南长沙临大，继又被迫流徙云南昆明。一九三八年昆明建起了一个临时联合学府，来了一批又一批流亡的读书人。九年之后，南渡之人，各自北返，「神京复，还燕碣」，西南联大几与抗战相始终，此确属一代盛事，百世难遇。这样一所特殊人学的精彩校史，最后赖一位孜孜矻矻的洋学者，奋力以成；中文本则在英文本成书十载后方得面世，其中作者的用心与坚持，或许只有由三校流离迁移之苦的主张和历史中体会才能获得。

二

《联大》（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这本书的作者是出身哈佛，后在维吉尼亚大学执教多年的易社强（John W. Israel）教授，执着又认真的谦谦君子。他一生的研究聚焦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政治与学运的历史，他知名的主要著作，先是谈抗战

前中国「学生民族主义」（Student Nationalism 1966），十年后讨论了「一二・九运动」（1976），再二十年后的 1999 年出版这本《西南联大》，慢工细活，上乘作品，学界公认。

顾名思义，「联合大学」是「混编」而非「化合」，因此北大、清华、南开各自拥有的特色，南开活络、北大自由、清华严谨，依然保留。所谓「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虽是一部校史，却是三个学府精神所寄。昆明虽号称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常春之草，在三、四十年代仍只是个「边城」，战火引燃后没多久，突然有大批中原学者涌入。当地人（少数民族为多）与外来者有如两个世界不同世纪人的聚合，难怪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在思想上又是世界主义者的社会菁英，此时竟被视为「上海骗子」。其实，被迫漂泊者与本地人糅合过程不易，这样的历史日后也一再复制。易社强教授认为联大九年的历史是政治的、文化的又是知识的历史，得由跨文化中去理解，诚哉斯言。

西南联大极盛时有教授一百七十余人，学生二千多位，风云际会，把一批学界名人汇聚一地，顶尖学生群集一处。是抵御外侮、反抗强权的象征，是人才培养基地、是知识分子的庇护所，是民主堡垒，多年后三校师生仍以联大为傲，自有其缘由。易著《联大》这本书，自「另一个长征」——学校迁移的故事说起，从蒙自、叙永到昆明，流亡教授的苦楚与美味，在日常生活中一一呈现：陈寅恪上课要讲「没人讲过的」，靠的是功力；吴宓是外表古典主义而内心是浪漫主义者，形容贴切动人。金岳霖与殷福生（海光）的师生情谊，在校园论辩中早有呈显；吴大猷在艰困中以简陋分光仪进行拉曼效应的物理实验，战争反成为研究的动力。至于战时联大流亡学生的生活酸、甜、苦、辣尽尝，跑警报、火烧眉毛是许多人的经验，吃八宝饭、宿舍打雨伞、到茶馆嗑书论政，苦中有乐。我们熟知善于烹煮红烧鲫鱼的李定一教授，在联大学生时代还曾靠走私发过洋财，过去闻所未闻。昆明虽远离政治中心，但当国是蜩螗，师生也都曾掉入政治论辩与学潮的漩涡中。易教授对人、对事均有相当平实的看法，陈雪屏、查良钊兼理大

学党团与训导工作，虚心照顾学子，给了他们公允的评价；1941 年年底孔府洋狗事件，书中有所澄清和论断，并不人云亦云，极属难得。学生在物质条件困难下，多能「共体时艰」，打下做学问的基础。1957 年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自认他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是在昆明的岁月中形成。联大学生生活剪影则在鹿桥（吴讷孙）《未央歌》一书中有深刻的描绘。《联大》这本书引林语堂讲当时学生生活是「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十分传神。易社强教授著作的特色是不引理论，不唱高调，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的论点，有如画龙点睛般地生动，往往会引人会心微笑，教人击节称赏。

三

如果用心体会，读者还可从《联大》书中，察觉易教授紧紧掌握了联大的一个基本精神：「自由」，包括学术独立和个人自由。近代中国议政、干政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总是吃不开，但自由主义的精神则一直贯穿在整个历史发展中，西南联大可说是一个象征。尽管战时有政治权力集中、社会势力紧绷的倾向，教育当局未尝没有以思想部勒高教的打算，但在「把战时当平时」的教育策略和宽松的三民主义教育体系下，仍大有自由主义校风成长的空间。

本书没有把 1946 年发生的闻一多案立专章叙述，但在谈联大教师群相和论析联大考验岁月文字中，闻一多是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贯穿各章的校园灵魂人物之一。作者擅长以细节着手，诠释了重大史事与主要思潮发展脉络。书中引述说，闻一多是位「听鼓的诗人变成擂鼓的诗人」，言语深处毕见书写智慧与文字机锋。最近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显示，蒋生平有二事使自己陷入困境，一是 1931 年 2 月羁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汤山事件」，引发西南异动，甚至因此而有九・一八事变之作，这本是党内风潮却几乎牵动了国家命脉的大事；一是 1946 年 7 月，正当战后复元，兵疲马瘦，国共纷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部属却制造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惨案。这是威权政治不容异己的表现，其结果加速了体制的崩溃，影响殊为重大。蒋在日记中

的记载，或可引录，以了解当日拥有权力者对知识界的心态与处置的困境：

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如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做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知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其自夸所谓不怕死者，而其怕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1946 年 1 月 17 日）

约司徒（雷登）、马（歇尔）今日来山，餐后谈共党问题。马对共周（恩来）自称其已失信心。而张君励等于其在京起飞时，特属马、司为昆明暗杀案向余警告，以为彼等生命已无保障，政府谈判，自难继续云。此等投机小宵寡廉鲜耻，本不足道。唯可以证明无识者，必无胆识。是对人之心理，又一发明也。（1946 年 7 月 18 日）

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1946 年 7 月 20 日）

昆明刺杀案内容既明，彻底究办时，应注意之点：甲、反动派必以此加强其对政府暗杀反对党人之罪恶，更将诬陷为「法息斯」党矣。乙、对霍（揆彰）处置之方针。丙、公布与审判之准备。丁、宣传技术之注意。戊、政府应主动彻究此案。己、凶手之口供，及其行刺之动机。庚、被刺者咎由自取乎？辛、使投机及附共者有所警惕。壬、问霍能否自勤彻究此案？

晚课后，各见霍揆章（彰），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其动机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1946 年 7 月 25 日）

正午马（歇尔）来谈，彼以昆明案比内战消息使美影响更恶为虑。余婉却民盟共同侦察之议，……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其调查

结果公布后，认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彼以为然。……总之，此案对内外皆增政府与余俩人之地位艰难百倍，更使共匪在时局上转败为胜，霍之罪孽无穷。（1946 年 7 月 30 日）

共匪猖狂益甚，美国压力续增，艰难可云极矣。而又加上昆明暗杀案件，万目睽睽，中外注视。敌党匪部皆以此为集中攻讦诬蔑之目标。而对霍揆章之愚拙粗暴，可痛可愤，但又不能不为之恕谅，殊令人受意外之打击。可说近年以来，无论外交内政如何困苦，未有如本案之处置拮据也。

今晨六时起床朝课后，拟定处置办法，决将二凶犯枪决，而将霍革职交顾总司令看管。待李公朴案破获后，再定霍之处置。如此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1946 年 8 月 19 日）

复员中最无秩序与不守纪律者，为大学之迁还原校，风气败坏。少数自由分子，所谓民盟之流，将礼义廉耻之民族德行，扫地殆尽。尤以西南联大中之清华教授闻一多等五六人为最劣。李闻案后，共匪与民盟又藉此掀起学潮，美舆论附和，集矢于余一人，且以此为中国法西斯复活之明证。于是马歇尔亦间接提出警告，可耻盍极。最后决将此事公开审判，杀人者抵罪，负责者严惩，乃告一段落，亦云苦矣。中国之学风与士品之坏，可说大半是由美之政策及其学者怂恿而出。彼等实昧于中国教育与学界之实情，而强以美国所用之自由与民主思想，强加于中国。于是共匪与政客乃皆假此民主与自由之名，而行其卖国害民、谄外欺善败坏风气之生涯，无所不至。于是政府对教育与学术陷于轻重两难无法挽救之窘境，其惟在求己与立己而已。（1946 年 12 月 31 日，「上年反省录」）

平心言之，国民党战后一时难脱训政心态，诸多与民主、自由、宪政相违之措施，导致温和自由主义者与左派合流，致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学者，开始有了不为当权者所容的激进演出。而李闻案的制造，更使亲痛仇快，加速了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疏离。战时联大虽远离政治中心的重庆，也一直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是战时

中国自由的象征。不幸，国民党把一批原在书斋做学问的读书人，硬是赶上街头，引向政治抗争，制造第三势力。政府、学府的紧张关系，终于给政治对立者更大的机会，国民党丧失江山，几可预卜。

四

抗战时期及战后，滇省主席龙云以边疆大吏行抗日拒中央之策，联大在昆明因此可以自成格局，仍能保有较多自由宽松的学风。国共关系自 1941 年初新四军事件后愈走愈远；1944 年日军施行「一号作战」，川滇黔与大后方震动，战局悲观已非一日，政局纷扰每下愈况，知识分子包括自由主义者渐趋左倾，复以马克思主义为救时的灵丹妙药。易教授指出，1945 年「一二・一运动」正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相互取代的明显标志。1949 年「新中国」宣告建立，但原有的学术自由则消失殆尽，集体压倒个人。闻一多如果还在人间，很难说他不会步入民盟个别分子的苦难下场，历史的吊诡往往如此。

1950 年代中国政局剧变，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大陆已如惊弓之鸟，他们多半成为政治的陌生人、被改造的对象；在台湾，政治当局对他们也抱持不友好的态度。尽管如此，联大自由讲学的历史遗产仍会流播四方，不绝如缕。钱穆在香江创校讲学，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情形下，兴发「千斤担子两肩挑」的豪情，是一例；殷海光在台湾延续了联大自由议政遗风，作「一士之谔谔」，又是一例。60 年代在台中东海大学，原在联大的刘崇鋐教授自台大前来大度山创办历史系，而系内蓝文征、朱延丰诸先生师承陈寅恪、梁启超，我们这一代作学生的，大有「再传弟子」的内心悸动。文学院学生多半也体会到来自联大政治系的张佛泉、李声庭，傲骨仍存。也许联大在昆明的有形校园早已灰飞湮灭；北返的三校，50 年代历经并校、改校过程，形质上早已异化，精神上更不复当年。无形但重要的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绘出的知识地图，每能代代相传，层层扩大，一如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碑铭之词「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联大》这本书，作者勤于搜集访求史料，用讲故事的方法书写

历史，作品独具风格，是历史也是文学创作，是近代中国战争史，也是一部超越校史的大学史，是知识史又是一部自由主义史。译者以信、雅、达的笔法，忠实呈现原著的精彩内容，乃译作上品。

一本书的价值不完全只在提供新知，更重要的是能点醒世人多作思考，并提示人性与良知的走向。这部书深涵此义。

中文版序

正如饶佳荣先生在本书〈译后记〉所说，《联大》一书颇费周折的中译本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为什么英文版（1998 年）付梓 11 年以后，才有中译本问世？总的来说，原因有三：（1）西南联大并没有随着这所大学的解散（1946 年 5 月 4 日）、三所成员学校迁回平津而结束。相反，联大今犹在，而且，毫无疑问，联大的精神还将继续生存下去。（2）因为联大一直都是有争议的，翻译的过程自然也会产生争议。（3）该书的作者是个固执的怪物。

十年来，曾不止一次有人提议要与我合作，将拙著译成中文出版。对每个人，我都做了如下回复：我很乐意合作，但任何翻译必须达到三个标准：（1）译者须有比较扎实的英文根柢；（2）译者应具有较深的中文造诣；（3）译稿需完全忠实原文，不得因为政治审查而有任何删节。

遗憾的是，提议译本书的人都很容易证明他们能满足（1）和（2）两条，但当他们得知我对第（3）个条件毫无协商的余地时，我们的讨论便中止了。最后，又有一位在一家声誉卓著的大学出版社工作的朋友跟我洽谈翻译出版事宜。我重申了上述条件，并告诉她：「为了减少麻烦，您不妨先读一读该书的〈结语〉，请明确指出，哪些内容将作删改。也就是说，如果我关于 1949 年以后联大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的看法可以接受的话，那么这本书剩下的部分肯定就没问题了。」她回覆说至少下面划线的句子必须修改：

后来的历史证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暴政，的确被某种更为糟糕的东西所取代。1949 年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学术自由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压制。

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控制，铲除了个人言论自由的社会基础。展示个性的言论，必须跟现存的政治制度保持一致。

从 50 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特别是从 1957 年以后毛泽东主义者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只有不再注重自我——自尊的、独立的、批判的自我——他们才能在新社会生存，爱国与生存成为不可兼得的选择。

尽管我很不愿意让这位我很敬重的朋友失望，我还是作了如下答复：

经过慎重思考你我各自的立场，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出版中译本的时机尚未成熟。您要求删改的地方恰恰是关键的事实所在：从 1949 年直到今天（实际上该从延安整风运动算起），列宁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践踏了联大同仁所奉行的学术思想自由的准则和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如果我不能清清楚楚地把这个真相告诉读者，那么，我就背叛了数百位联大教师和校友的信任——正是他们真诚的协作，该书才得以问世。否则，我也将对不起中国现在和将来的政治与思想的领袖，因为如果他们想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开放、幸福的未来，他们必须了解近代中国的这段史实。

冒着画蛇添足之虞，我请读者痛定思痛，想想这出虎毒食子的革命悲剧——这场革命背叛了它最热诚的追随者的信仰和为之牺牲的精神，最终把他们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政府肆无忌惮地进行狭隘、无谓的政治审查，当年视死如归、慷慨陈词的闻一多们肯定会掀翻棺材板，大闹阎王殿。

对那些不甚了解当下中国对出版物如何进行审查的读者，请允许我饶舌几句：恕我孤陋寡闻，我曾认为这种哪些书可以出版、哪些书不能出版的审查是「上面」的条文。出乎意料的是，事实刚好相反：由于事先并不清楚什么书能通过审查，出版社得承担编辑、印刷图书的昂贵代价，可是只要有一个字不能通过，出版社就拿不到 ISBN，该书就不可能发行和销售。

这种迫使「下面」进行自我审查的做法，比来自「上面」的审查

更厉害。编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剔除任何可能招惹麻烦的文字。这种体制奖励投机取巧、滑头滑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编辑，惩罚光明正大、坦荡直言的编辑。这种体制使领导层和国民不可能就新思想畅所欲言，而这些新思想恰恰是政治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从那位编辑朋友对《联大·结语》部分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体制是多么不可理喻。使我难以理解的不是那些她挑出来审查的部分，而是那些她未加修改就完全接受的部分。只要我没有明确提到神圣不容质疑的中国共产党的名号，我就可以阐述中国的领导层怎样压制学术自由、扼杀个性，与国民党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腐败、无能和暴政」。我这位编辑朋友自然有理由断定审查者的懒惰、愚昧、官僚作风——或许三者兼而有之。

由于我没兴趣参与这种自我审查的游戏，《联大》中译本的最终出版真可谓意外。对此，我们应感谢饶佳荣先生。2007 年 11 月，我突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附有完整的译稿。这是饶先生的自我介绍信，他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读过他为翻译《联大》而改变他的生活的故事（见他的〈译后记〉），我禁不住赞叹他的积极、勤奋和执着。为坚持原则，在拒绝与其它译者合作之后，我感到我别无选择，只能作如下回复：

对于自我审查，我毫无妥协之余地。其一，这纯粹是我的个性。其二，我认同联大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传统。闻一多等人曾为此献身，如果为了出版这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的拙作中译本而违背他们的这种高尚品德，我将无法面对自己。我坚信 1949 年以后联大传统的遭遇对中国人民是一部极好的教材。掩盖或粉饰这段历史都是对读者最大的不忠。

不愿看到饶先生艰辛的努力付诸东流，我留了一条后路：希望他能在港、台找到出版社。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仍有问题：真正将译稿付梓要求我们两人密切合作。当时饶先生在北京，而我准备到昆明和上海待半年。此外，有关联大的素材资料藏在我出租给他人居住的、

位于维吉尼亚（Virginia）夏洛特维尔（Charlottesville）的家里，而我又总是来往于亚特兰大（Atlanta）、昆明、上海之间。

我不该低估这位年轻朋友的才智和毅力。几个月后，他找到了一家再理想不过的出版社——台北的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样一来，政治审查便不成其为问题了。这家出版社是联大校友、已故的刘绍唐先生创办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台湾做《联大》一书的调研时，刘先生曾给予极大的帮助。此外，我们待在上海时，饶先生曾访问寒舍。这次见面为我们合力修订译稿奠定了基础。返回美国后，我从夏洛茨维尔找出重要的原始数据……

易社强

2009 年 4 月 14 日于昆明

序 言

试想古巴入侵美国并已占领了东海岸。冲突期间，联邦政府首都已迁往丹佛，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斯沃斯穆尔学院（Swarthmore）的师生不得不转移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城（Albuquerque）。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通过这个设想，我意在告知好奇的朋友，我为什么对那所历时短暂、鲜为人知的中国大学如此着迷。这所大学设在中国西南部的山城，她汇集了来自华北平原高等学府的知识精英。

我所关注的目标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联大历时 9 年（1937-1946），与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在中国被称为抗日战争——的时间大体重合。

联大师生颇受英、美政治和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广义上，他们都堪称「自由主义者」。身为一名美国的自由学者，我很容易认同他们的理念：为保卫我们共同的遗产而奋斗。一般说来，历史学家的难点在于，他们需要与远离自身的人物和思想处于同一境界，以感受历史的真实性；然而，为了保证历史的客观性，我又不得不努力使自己与脑海中的战时中国的知音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要与研究对象保持这种距离并不容易。一开始，我和我的研究对象远隔重洋，相距甚远。我是逐渐接近它的。1973 年 11 月，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介绍我参加台北校友纪念联大诞辰 36 周年的聚会；随后，我便被联大这一特殊群体所深深吸引。1974 年 4 月，一些在纽约的联大校友邀请我参加他们讨论母校的一次聚餐。末了，他们举杯宣布我是「荣誉校友」，一个头衔就这样产生了，尽管它是以这种很不正式的方式授予我的。

在这项持续了二十年的研究工作的初始阶段，我走访了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数十位联大校友和荣休教授。1980 年，即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以访问学者的身分在中国大陆待了 6 个月，拜访了更多

的校友和联大的教师。1984 年 12 月，我返回台北做了 8 个月的研究，再次与当地校友、教师交流。1986 年 9 月，我在北京和昆明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深入调查研究。那时，北京和昆明都已建立了颇为完备的校友会。最后，1988 年 11 月在昆明，我和大约八百名校友庆祝联大在此地成立 50 周年纪念。

联大的校友给予我无私的信息、洞见、友谊、道义支持和宝贵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我对联大的认识日益加深，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我把所思所想写成了十来篇论文。期间，在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联大校友、教师对拙文和本书的初稿多有批评指正，我从中获益匪浅。

除了采访，我还设法参观联大的不同校区：湖南省会长沙、云南省会昆明，偏远的蒙自和叙永，以追寻当地的遗风。所到之处，我得到了当地学者、官员和联大校友的热情接待和协助。但是，本书基本上不是根据口述和游历写成的。在图书、报纸、期刊、档案和收藏品中，联大留下了卷帙浩繁，但枝蔓芜杂的纪录。我先后到过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台湾的国民党党史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和一二•一运动档案馆查阅数据。感谢这些机构的工作、管理人员和其它负责人的鼎力协助。特别感谢 1980 年昆明师范学院（其前身为联大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和 1985-1986 年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校友联络会的热情接待，为我的工作和旅行所提供的便利。

联大校友已经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字纪录。联大成员之一清华大学早有校友活动的传统。《清华校友通讯》是一个丰富的回忆库。它在战前就已出版，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仍断断续续维持着，1962 年在台湾新竹复刊，1980 年在北京复刊。自 1983 年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以来，它见证了一系列回忆录、选集、大事年表和档案文献的出版。1988 年联大庆典期间，北京和昆明涌现了一大批相关的出版物。此

外，还有以前教授的回忆录，学生创作的长篇、短篇小说和散文，在联大期间以及后来撰写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纪录。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材料出版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我消化处理的能力，但所有这些对我都很有帮助。

除了与联大有关的中国人，我还登门拜访亲历联大岁月的外国人，或拜读他们的文章。白英（Robert Payne）曾于 1943 至 1946 年在联大任教，他已出版的日记，如同已故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档案中的文件和报告一样，极有价值。费教授是我的老师、向导和朋友，曾慨允我使用这些数据。曾在昆明居住或访问过联大的美国外交、军事部门的很多人也与我分享他们的回忆。

由于直接经历联大岁月的非华裔人士相当少，而健在者更是屈指可数，又因为这些人在这所大学的历史上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我在尾注中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我在尾注中也记下了联大教师的名字，现代中国的学生对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耳熟能详。有些访谈对象请求匿名，我原很尊重他们的意愿。在他们逝世后，我冒昧将他们的尊姓大名公之于世。还有一些校友，特别是少数女校友，我通常不提她们的名字。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名字没有太大意义，我更注重的是他们毕业或离开联大的时间，他们的专业，采访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他们的性别。

考虑到曾经有上百人的理解与支持，并慷慨地奉献出他们的时间，特别挑出其中任何名字似乎都不公平。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某些人，这本书将会浅陋得多，甚至不可能完成。费正清为我引荐他三四十年代的清华－联大的朋友，与我分享他的回忆和洞见，不是鼓励就是劝诱，直到我完成书稿。我的前妻余翠屏（Mary H. Israel），十八年来与我分享联大的点点滴滴，并编校初稿，而且是一个严厉又温厚的批评者。

萧荻依托北京大学主持编撰联大校史专案，同样值得大书一笔。他的喉咙做过手术以后，声音低沉，但精神矍铄，他晚年致力于保护

联大遗产。远离家庭和家人，过着清简朴素的生活，萧荻投入巨大的精力组织后援，搜集出版文献，编撰联大校史。他在困境下的不懈努力是对母校合宜的敬意。在分享资源、探讨问题时，他慷慨而开明，是新时代中美学术合作的典范。

许芥昱和李晓亮两个人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对本书的写作尤为重要。作为联大校友，集历史学家、传记作者、作家、文艺批评家和画家等头衔于一身，许芥昱造诣高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采；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直到他 1981 年猝然离世。1980 年，我在昆明结识了我的妻子晓亮，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昆明的浪漫气息，是我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并一直支持着我。

更世俗但绝非更不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下列机构的经济支持，本书不可能完成。它们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威尔森·吉（Wilson Gee）教师暑期研究奖、维吉尼亚大学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会员项目、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学者中心、威顿（Weedon）基金会、中美科学与学术协作委员会、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台北跨大学华语研习专案。

《联大》的出版史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哈佛大学东亚出版理事会采纳了书稿，并由帕梅拉·班克斯（Pamela Banks）熟练地编辑。当我们在技术问题上陷入僵局时，理事会的执行主编凯瑟琳·基纳姆（Katherine Keenum）慷慨地允许我撤回原稿。随后，它被史丹佛大学出版社接受。感谢史丹佛的穆里尔·贝尔（Muriel Bell）、斯达西·林（Stacey Lynn）和雪莱·泰勒（Shirley Taylor）不懈的努力，本书终于付梓出版了。最后，感谢翘首期待本书问世的家人、朋友和联大人。

易社强

凡 例

在本书中，*dollar* 指的是美元，*yuan* 指的是中国国民政府的官方货币。除非特别说明，cent 和 penny 指的是「元」下面的「分」。「元」的市场价，在 1937 年 6 月 1 元相当于 30 美分，到 1940 年 9 月降至 5 美分，1943 年 12 月相当于 1 美分，1944 年 6 月 0.5 美分，1945 年 6 月 1/12 美分。1937 年，1 美元值将近 4 元；1946 年，1 美元值两千多元。

至于距离的单位，用「英里」、「公里」或「里」，视援引资料而定。大致说来，2 里相当于 1 公里，3 里相当于 1 英里。

在选择罗马拼写方案时，我抛弃了旧的不适用的威妥玛拼音，而采用了新的不适用的汉语拼音。我的选择要求不知情的读者应对前缀是 *q*（发 ch 音）、*x*（发 sh 音）、*c*（发 tse 音）和 *zh*（发 j 音）的文字。我只对汉语拼写作了一个调整：在必要时，我把 *he*（发 huh 音）改成如 *ho*，以避免混淆为英语代词。

我对「蒋介石」（Chiang Kai-shek）和「孙中山」（Sun Yat-sen）保留了传统的写法，未作更改。

导　言

传奇故事（Romantic history）早已过时。在一个讲究精确的社会科学化的时代，人们崇尚数量化的材料、整齐划一的结构，鄙弃变幻莫测的思想。但是，所有题材都不适合使用浪漫化的（romantic）处理方法吗？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为例，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这所大学竭力维护中国文化的生机。联大以壮伟的漫漫长征开始，以数年的刚毅坚卓为之继，以掺杂着悲剧的成功告终。这无疑是传奇的材料。

二十年来，这些学者克尽心力把他们年轻的大学——北大、清华和南开——提升到世界水准。突然间，日本侵袭。学校资产被掠夺，校园被侵占——其中一所，更是化为灰烬。师生在国内辗转播迁，避敌逃难。经过数月的流离迁徙，他们在中国中南部的湖南找到避难所，但敌人的炮火迫使他们离开。将近三百名学生和十几位教师，历经六十八天，徒步穿越中国最荒蛮险恶、最贫穷落后的省份。他们经过匪患频仍的贵州，那里地势崎岖不平，人们吸食鸦片成瘾，还保留着巫术的传统。他们最终抵达中国西南内陆偏远的山城昆明。八年之间，他们在泥墙教室里保持知识之灯长明。

日机跟踪逃难的学者而来，把部分新教室和新宿舍夷为平地，扰乱教学秩序，迫使教师家庭转移到偏僻的乡村。终于，空袭者被美国的飞虎队赶跑了，但新的敌人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先是十倍，继而百倍。教授变卖图书，兼职为生。为养家糊口，大学校长夫人自制糕点，在街角摆摊出售。学生一般以最粗劣的大米和一丁点青菜为食。

日本终于投降了。人人都准备回到华北的校园。学者期望，在战后和平繁荣的年代，他们能协助建立一个强大、民主的中国。事与愿违，战胜日本之后，是独裁与内战，屠戮与死亡。1945 年 12 月，蒋

介石手下的军人用手榴弹轰击校园，杀害了四名知识青年。1946 年 7 月，大部分师生离开以后，联大受人爱戴的爱国诗人、教授闻一多，遇刺身亡。在经济最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的坚强毅力，及其挺身呼吁社会正义、民主与和平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成为联大经验的象征。他的葬礼为民主和自由敲响了警钟，中国不得不在左翼或右翼的独裁中做出抉择。闻一多遇刺三年后，共产党上台执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摧毁联大的自由遗产。

1973 年，由于西南联大戏剧性的故事的吸引力，我着手研究这所大学。在这里，为了尊贵的遗产和共同的使命，中国最卓越的一大批学者一同流亡到遥远的边城及其周边地带。我对这所大学了解越深，我越意识到，联大人的思想与性情具有异乎寻常的人性魅力。因为联大本身的价值，也因为它可以丰富人们对中国制度史的认识，所以值得为之记录。

在处理这个题材时，我把它当作一个戏剧性的盛典，为此，我把个人的言行和性情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取向已是明日黄花。在中国研究方面，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为复苏这种取向贡献良多。我不敢把拙著与他的大作相提并论，但我确实赞同这个观念：一部缺乏人物、只有数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书，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的历史，不仅缺乏可读性；而且，根本上会更不准确，因为它忽略了鲜活的经历。

然而，假如联大仅仅是一段妙趣横生的传奇，那最好由小说家来承担这个任务。[1] 之所以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联大，是因为它在 20 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联大兼具传统模式和自由理念，同其它国立大学一样，它既有世界性的背景，也有地方情境。逾越中国的疆域，联大提出了普世性的重大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促使一所大学完成使命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在处境艰危之际，如何界定并阐明使命？在一个充斥着饥饿、疾病、贫困、社会不公和

暴政的世界，即使是「正常」的年代，批判性思想（critical intellect）、多元主义、宽容和思想自由的原则究竟有多重要？即便联大经验无法提供最终的答案，但它至少可以对认识这些棘手的问题中某些隐藏的面向有所启发。

有时候，朋友和同事批评我不该对一所历时不到十年的大学如此痴迷，并敦促我做「更宏伟」的研究。实际上，联大清晰的时空界限是其部分吸引力之所在：对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拥有明确的起点和明确的终点的题目更有诱惑力了。因此，当我开始这项研究时，我没有设置竣稿的时间表，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毫无疑问，如果全神贯注地研究这种时空界限非常清晰的题目，短期内即可完成！如今，我已度过三倍于联大存世的时间，但我对它仍心怀念想。我变得更加从容沉着，但兴致丝毫未减。我从经验中得知——这是任何历史学家都应了解的——作为一种常识，世界上并不存在带有明确的起点和明确的终点的事物。欲理解联大的渊源，我们至少得回溯到已逝的 19 世纪；欲理解联大的遗产，我们得穿越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未知的将来；欲理解联大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越过中国的疆界，探讨更广阔的跨文化的问题。

正如当初这项研究明确的界限吸引了我，而它多面向的、无限的开放性使我有兴趣坚持二十余年的研究和写作。我希望，读者读到这里时，能够与我分享我对联大的痴迷，并理解我作为一名荣誉校友的自豪。

第一部分

爱国者的长途跋涉

一 从北平到长沙

日本下一步要干什么？日本明天会干什么？总是担心疑惧，总是紧张不安，让人极为焦虑，极为不快……战争最终到来时，这才松了一口气。——金岳霖〈当代中国的教育〉

1937 年 7 月 8 日子夜时分，北平古城墙外，西北五英里处，秀美的清华园，和风拂面，郁振镛和几个同学正在欣赏荷塘月色。这时，从西边传来阵阵枪炮声。他们以为这是宋哲元的部队在郊外进行作战演习。宋哲元是当地军事指挥官，曾经在日本的压力下举棋不定，但是，在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刺激下，他似乎坚定了抗战的意志。这枪声即便不是演习，也令人感到宽慰。[1]

翌日清晨，吴大猷没有注意到稀稀疏疏的机关枪声，准备继续和饶毓泰、郑华炽、樊际昌三位老朋友去西山野炊。吴大猷是国立北京大学年轻的物理学教授，而当时的北大在北平城内。饶毓泰是吴在南开时的老师，时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郑华炽是比吴高一届的师兄，现在同处一系共事；樊际昌是北大的教务长。四人都是三十多岁，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正走向各自事业的巅峰。他们带着西瓜消暑，愉快地开始一天的远行。[2]

北平师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度过的这几个钟头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这并不奇怪。现在我们知道，宛平卢沟桥附近的枪声标志着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开始，但对北平市民而言，7 月 7-8 日夜里的枪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自 1901 年签订《辛丑合约》以来，日本就在该地区驻军。而在事变爆发将近半年前，有一天，日军在北平的大街上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但敌人的坦克来了又去，印有朝阳标志的战机在城市上空轰鸣，却没有扔下致命的东西。很可能是沉稳老练的北平人忽视了城外十几英里处的枪声。

断断续续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天。吴大猷的朋友试图到天津去，却发现火车停开了，这会儿吴大猷却不慌不忙，他们便催促他一有机会就马上离开。吴大猷派佣人去购买前往天津的火车票，然后收拾了几小包行李，带着老母亲去火车站。九年之后，吴大猷才回到这座文化故都。[3]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吴大猷的同事便在思虑未来的局势。7 月 8 日，五六位北大教授在胡适家会面，恭敬地听他们这位永远乐观的文学院院长分析形势。胡适称，这起事件只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并不会带来什么影响。正当他们交谈时，中国旅行社打来电话报告津浦铁路已照常运行。令人高兴的预言得到证实后，胡适便启程去庐山参加政界和学界的领袖大会。[4]

这个夏天，并非北平学术界所有人都在白天野炊，晚上荷塘赏月。在城外的清华，大约两百名刚毕业的学生中，有的在规划职业生涯，有的为应考研究所或美国庚款留学而紧张忙碌着。大一至大三的大部分男生正在西郊的西苑营房军训。在历史性的 7 月 7-8 日夜晚，有几个学生听到教官吉星文给宛县的旅长打电话。吉星文义正词严地说：「务必严守阵地，不得退后一步。如阵地失守，拿人头是问。」[5]

北大在城内，至少还可以抱有安全的幻想，而清华不同，它的校舍都在城外，易受攻击。早在战事爆发前，学校当局就已开始把图书和仪器运到南方，妥善保管。如今，在新的紧迫感之下，师生一起赶紧打装、贴标签，把宝贵的学校财产运出去。[6]

不过，此时的学术生活大体上仍一如既往。7 月 10 日，战斗更加激烈，火车再次停开。北大－清华联合招生考试委员会成员油印了一万两千份试卷，为有志青年角逐当年秋天入学的六百个名额做准备。[7]

7 月 11 日停战，随即又重开战火。日本援军通过天津涌来。14 日，好战成性的日本华北屯驻军新任司令香月清司（Katsuki Kiyoshi）

中将宣称他的部队将「严惩暴乱的中国人」。15 日，日本极端分子胁迫总司令部下达最后通牒。16 日，北大中文系举行招待会，欢迎新任助教吴晓铃和杨佩铭，系主任罗常培向他们介绍教员制度。[8]

持续不断的、自相矛盾的谣言使平民迟疑不决。有人说，「日本人并不想打战，只不过虚张声势吓唬人而已。」冲突时断时续。敌我双方轮流占领临时的防御工事。只有一件事日渐明了，那就是，局势一时很难恢复正常。宵禁时间由十点提早到七点。[9] 日复一日，物价上涨，枪声更响。

在 7 月的后半个月，北大教授的三次会议都不时被炮火打断，最终会议讨论通过了应对现状的措施。他们选定两位政治学家（张忠绂和钱端升）和一位英文教授（叶公超）组织宣传队，呼吁世界各国支持中国。[10]

7 月 25-26 日夜里，双方在平津铁路中点廊坊交火。这起冲突使日本借口发出另一个最后通牒：中国军队必须在 7 月 27 日中午之前撤离该地区。宋哲元企图拖延时间，后来在未能得到军事当局支持的情况下，虚张声势地宣布，他的部队将「竭尽所能保卫国家」。[11]

战事

7 月 27 日下午四时，在清华图书馆地下层数据室，人口学家陈达正在撰写英文著作“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南华迁民社区》)，这时他的妻子打来电话，催他「快回家吧!」当时陈教授正专心致志地撰写书稿。原来，陈太太到外面转了一圈，发现大部分邻居都搬走了。陈氏夫妇便决定也离家出走。陈教授装了两手提箱行李，携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及一个佣人钻进了汽车，他让司机把车开到北平城里的清华同学会。

凌晨三点，陈达被炮声惊醒。他刚要躺下睡觉时，校工老槐跑来报信：「听说敌人要放毒气，快，用酸醋洗洗鼻孔。」[12]

在清华气象台，李鹤龄听到炮声不断。回到宿舍，被三声巨响惊醒后，于是他急忙披起一件毛巾浴衣，就往楼下的会客室跑，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同学。不一会儿，又在门前看见日本飞机从顶上飞过——很显然，刚才就是这几架飞机在投弹。飞机过后，炮火开道。学生心乱如麻，食不下咽。晚上十点钟左右，传闻有一枚炮弹落在南院的空地上，没有人受伤，但神圣的清华园已受到炮火的侵扰。听说宿舍不如科学馆坚固，他们便倾巢而出，纷纷涌向这个新避难所，把地下室走廊挤得水泄不通。到凌晨四时，炮弹似乎就扔在隔壁。后来，爆炸声逐渐减弱，最后归于沉寂——接着又是一片机关枪声。陈福田教授打过仗有经验，他说中国军队已击退了敌人，正在收拾战场。尽管如此，李鹤龄及其朋友还是躲到生物馆地下室过夜。他们准备了几盆沙子和一桶水用来防火，把被单撕开当防毒面具。[13]

7 月 29 日，曙光初露，只有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静寂。清华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安宁是短暂的。从城里出来的人谈论着令人不安的信号：员警穿上了新制服，代表「和平维持会」张贴布告。这个消息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军队不是刚刚取得辉煌的胜利吗？谁会在高奏凯歌时投降呢？[14]

清华学生完全误解了所发生的事情。在北平周围的各个战略据点，在压倒性的陆军和空军的袭击下，日军摧毁了中国的后援。在西郊兵营军训的学生能够死里逃生，只能归功于教练撤退——而不是反抗——的决定。在南边的营房，两百多名学生志愿者在毫无希望的抵抗中死去。机枪声是消灭残敌的信号，但清剿战场的是日本人。[15]

这时，李鹤龄和朋友才意识到局势的严峻，许多同学跟随宋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向西逃去。由于没有办法追上二十九军那伙人，他们便退而求其次，坐公共汽车进城。在清华同学会会所，他们遇到了那些同学，他们试图跟在军队后面，但愿在日本机关枪下幸免于难。[16]

随着日本士兵齐步穿过清华园，没收包括猎枪在内的所有枪支，

在门口设置岗哨搜查行人，清华正常的校园生活彻底结束。这时，陈达夫妇已走出自己的家门。因日军开始禁运行李，陈氏夫妇只能双手空空返回北平城里。同学会会所混乱的秩序迫使他们搬到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在 8 月 3 日，他们吃惊地发现，日本军队已成功地进驻这座城市。[17]

铁路运输一恢复，北大、清华的教授便前往天津，希望那里有交通工具去还算太平的长江流域。学生也涌向天津，或者在夜里偷偷翻过城墙到西山参加游击队。那些留守的教师仍试图使自己的学校免遭洗劫。在清华，由张子高教授组织委员会，负责保管学校财产。但是，在 9 月 12 日，日军搜查清华办公室，抢掠图书、实验仪器及其它贵重物品，进而在校内设置岗哨。10 月 13 日，日军控制了整个清华园。[18]

当时在北平的一个美国人写道，全城「民宅突然遭到非法侵占」——搜缴民族主义的文献、国民党的徽章、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画像。无需解释，有时甚至没有任何来由，就突然实行逮捕。出于怀疑心理，书信来往遭到干预，每封信都被拆开仔细审查。[19]中国报刊只能刊登同盟通讯社（Domei News Service）的报导，教授只能靠英文的《北平时事日报》（Peiping Chronicle）获取信息。8 月 24 日，《北平时事日报》也被禁止出版，所以只能通过收听南京的无线电广播了解外界的消息。

随着越来越多教职员工的离开，北大的领导工作就落在秘书长郑天挺的肩上，他得到少数留守的老同事的协助和建议。8 月 25 日，四个日本宪兵约见郑天挺。过了两天，敌方特务在图书馆就中俄边界地图问题审讯孟心史三个小时。接着，日军在全校范围内设置岗哨。9 月 3 日，日军占领了几栋校舍；10 月 18 日，傀儡政府占据了剩下的校园。18 年前，就是在这里，年轻的爱国者举起了学生反日运动的第一面旗帜。[20]

尽管被侵占受侮辱，但北平在外表上仍完好无损。相比之下，天

津更为不幸。当地军官进行了激烈但短暂的反抗。于是，日军在天津城外三英里的飞机场轮番出动一中队又一中队的战机。轰炸目标包括政府和通讯中心，还有一所大学——南开大学。

二十多年来，日本人遭到了南开示威者的侮慢，他们就在日本卫戍区前游行，然后穿过城区。近来又有一个「挑衅」，中国军队利用附近村庄偷袭卫戍区，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当晚，黄钰生秘书长和少数留守的学生及校工决定放弃。[21]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29 日，有个愤怒的日本指挥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今天，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22]

在毁灭性的轰炸之后，日军派士兵带着稻草和煤油，焚毁了秀美的南开校园未被轰炸的残部。

大批学者的迁徙

随着北大、清华被占领，南开化为断垣残壁，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岌岌可危。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中心和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是中国最显赫的大学——她的索邦大学（Sorbonne）。清华拥有充裕的美国庚子赔款基金，是中国最重要的理工科教研机构——她的麻省理工学院。而南开是中国优秀的非教会私立大学。

这三所学校的校长都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蒋梦麟是杜威的门生，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代理北大校长，后任教育部长，从 1931 年起担任北大校长。这所大学受制于政治动乱、财政困难、学科发展不均衡，但在他的领导下，北大再度青春焕发，声誉日隆。曾在美国学习物理的梅贻琦，把清华从混乱的管理中拯救出来，并把它办成一所卓越的大学。[23]张伯苓既是南开的创办者，又是南开校长。听到一生的事业都化为废墟时，他静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24]

说豪言壮语容易，但怎样才能做到呢？幸运的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年前，拯救三校的机制就开始运转了。考虑到华北将来的局势，

清华于 1935 年着手准备，当年就在长沙设置了两个研究机构。同年，日本要求在华北建立「自治区」，清华工学院已开始把设备包装南运。1937 年春，在清华当局开始认真地寻求避难地时，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前北大教授，曾在蒋梦麟之下任教育部次长）承诺，如果有大学迁到湖南，他一定全力支持。这样，长沙就被选为设置临时大学的应急之地。

虽然不清楚北大和南开的准备工作做到哪个程度，但根据清华教授萧公权的说法，它们至少在思想意识上是一致的。[25] 其它数据表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和南开还没参加这个搬迁计划。1937 年夏天北大实际上的领导郑天挺就否认北大曾有过任何迁移计划。1933 年中日双方在长城激战后，北大曾把图书和设备运往南方，但危机缓和时，又把东西运回北平。北大面对日本侵略的威胁过早地做出了反应。蒋梦麟不愿再做这种无用功。[26] 而且，北大的机构都设在传统的地点，因为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长期以来，在名义和传统上与这座古都息息相关。蒋梦麟坦承，他是极不情愿地被拖进这个计划的。据他回忆，在 1937 年 8 月，政府准备要求北大、清华和南开「在长沙组成一所联合大学……胡适……要我落实这一计划。我并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在世界上有很多事你不想做，最后却不得不做。」[27]

行政院召开特别会议作出最后决定，教育部于 1937 年 9 月 10 日颁布命令：成立两所临时大学，一所设在长沙，由北大、清华、南开和中央研究院组成；另一所设在西安。[28]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北平，但仍在北平的北大教授的意见很难统一。10 月 8 日，其中的二十位教授联名上书蒋梦麟，表达他们继续留在北平的决心：

总期四十年辛苦经营之学校，不致成为无人顾视之堕甑；三十余年坐幽待旦之同人，不致终虚卫校存学之初愿。至于私人餔啜，当此之际，非所敢闻。[29]

这群签名者得到了胡适的鼓励，他在信中对同事表示钦佩，因为

他们选择留在这座沦陷的城市执着追求学术。[30]他们与其它同事不断交流，裘开明还亲自访问，帮助他们转变想法，而实际上他去了长沙。通过特别信使，旅费补助最终送达天津，这可能也使一些比较贫穷的北大教师改变了想法。10 月底，仍在北平的三十六名北大人中，只有七人决定留下。11 月 17 日，最后一批人，包括郑天挺和八位同事，前往天津。[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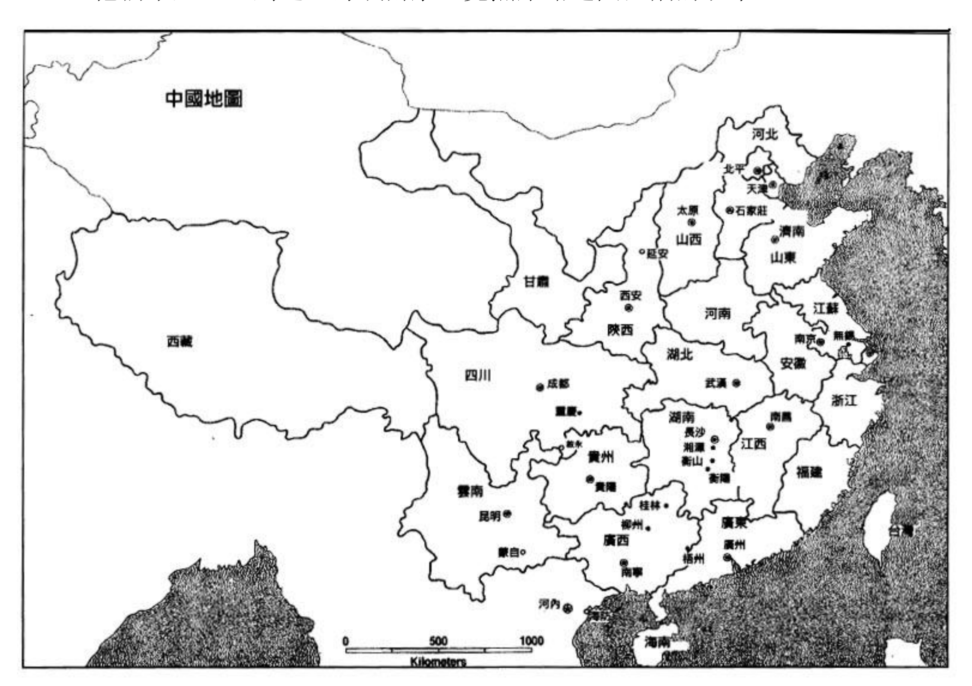
在迁徙过程中，清华学者相对要痛快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梅贻琦的领导，不像蒋梦麟和胡适，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沙。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清华与美国的联系，这几乎使得日本人必定会侵扰留在后方的任何一位清华学者。在北大，日本人勉强凑足人数办成一所傀儡大学。在清华，则不可能办到。的确有少数人选择留在清华。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不肯遗弃他患病的父亲，留学日本的钱稻孙出于对侵略者思想上的同情，他们留下了，但都是例外。大多数清华教授都是不惜任何代价地离开。[32]这不是因为他们更不愿意献身学术。陈达就把 10 月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即将出版的海外华人研究，但还能在公馆宿舍收拾行李、图书和文稿，并悄悄地预订好火车票。11 月 10 日，除了家人，他未通知任何亲友，便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33]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当时特有的现象。随着战争迅速蔓延到华北各地，一所又一所大学迁往内地。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到年底战火覆盖了整个长江下游。三年之后，到 1941 年初，战前 114 所大专院校中有 77 所迁往内陆。

对大多数北大、清华教师来说，自由的生命线从到达天津的 137 公里的铁路开始。他们的第一段旅程是最痛苦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很清楚，他们是在冒险。一路上，他们装扮成农民、商人或傀儡官员。原本平静的两个半钟头行程，却变成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十二个小时。在此期间，是频繁的检查，同时还有搜寻，被盘问旅行的终点。只要有略微的怀疑，就会立刻被抓走，生死难料。

抵达天津并非万事大吉。难民成堆的租界成了唯一的庇护所，连

那里也没有绝对的安全保障。据报导，日本特务曾一直跟踪南开学生到达上海的国际租界。[34]年纪轻轻，孤身一人，担惊受怕，有时身无分文，学生很清楚，任何时刻他们都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35]教师则为家人和财物发愁。抗战爆发后，不止一位教授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们千里迢迢到达上海或南京，竟然原路返回沦陷的北平。



第一批难民还可以通过津浦铁路从天津到达浦口，乘坐渡船横跨长江，抵达首都。但是，随着战火蔓延到铁路沿线，旅程愈益凶险，最后就不可能再前进了。逃离天津的唯一办法就是乘船。票少且贵，使旅途更加艰苦。吴大猷跟老保姆借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张二等舱船票去香港，打算从那里乘火车去长沙。[36]陈达先乘船到上海，然后换乘到达南通，在那里他勉强找到一位船主是英国人的拖船船长，这位船长愿意把他和旅伴安置在一艘驳船里，只要他们不露面，每人付十块钱。拖船沿着回流和运河曲折而行，到达口岸，陈达在那里登上一

艘去汉口的汽船。五天后，他抵达汉口，得知所有开往长沙的火车都被军方征用了。经过两天的等待，他找到一列公务员专车，站着前往长沙。经过 21 小时的煎熬，才到达目的地。正常的话，从北平到长沙坐火车只需 24 小时，他却花了 19 天。[37]

卢沟桥事变后的动荡局势，使北大历史系学生王德昭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的家在河北中部。最终，他决定先通过平汉铁路到达山西，然后去长沙。在石家庄，他遇到一位亲密的军官朋友。这个朋友要他扮作少校，充当他的秘书。受到敌人的重创后，这支部队向西撤退，进入山西。王德昭的背包里装着全部家当，紧紧地绑在背后，他跃上开往山西省省会太原的火车，在途中却遭到一架日本飞机的突然袭击。第一颗炸弹没有击中目标，飞行员在空中盘旋，寻找第二次机会。王德昭跳下火车，向深谷冲去。背包被树枝钩住，救了他一命。第二颗炸弹也没击中目标，他因此能够重新登上火车到达太原，继而到达西安。在潼关，火车开到黄河边，戛然而止。他在那里遇到了臭名昭著的川兵，他们扛着「双枪」——支步枪，一支烟枪。[38]

王德昭没有遭到这群士兵的伤害，但他得渡过湍急的河流。方法是：在下游船离岸的地方等待，让卖苦力的背到河中，扔到迅速经过的船上。王德昭顾着不要弄湿他的脚，却发现自己珍贵的背包还在卖苦力的手中。

在西安，王德昭已一无所有。他发现一些同学前往延安，那是毛泽东崇拜者的圣地，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抗日青年。由于毫无政治经验，他欣然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没有一位朋友阻止，只要他能够在边区过艰苦的生活。从一份西安的报纸上，他得知将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于是他向朋友借钱，坐火车前往汉口。在那里，教育部为落难的学生设置了招待所，提供食宿。开学前夕，他终于按时达到长沙。

长沙临时大学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西南联大校歌

学校筹备委员会在媒体上发布了将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的消息，通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北大、清华和南开所有的学生、校友和教师。最终到校的临大学生共有 1,452 人，其中清华 631 人，北大 342 人，南开 147 人，还有战时特殊情况下的 218 名借读生。除了数十名大一新生，其余的都是大二以上（包括大二）的学生，因为北大和清华当局只勉强在武汉进行了预定的联合招生考试。临大共有教师 148 人，其中清华 73 人，北大 55 人，南开 20 人。

清华在老师和学生人数上都占了将近一半，[39] 从一开始，长沙临时大学就烙上了清华的印记。1937 年，清华的两个研究所在岳麓山下成立，河对面就是长沙。经过清华当局与美国教会协商，临大筹委会可以在韭菜园圣经学校设立办公场所。〔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在一些资料中所用名称为圣经学校，但在常委会的正式纪录和行文中均写成圣经学院。」（第 11 页注脚）不过这里根据英文原著径直翻译，未作统一。——译注（除非特别说明，本书随页注脚均为译注，下同〕

临大由三校校长和教育部联系人杨振声组成的四位常务委员主持，杨振声是三校联为一体的纽带。由于种种原因，实际的领导工作落在梅贻琦身上。日本战争机器摧毁了张伯苓的南开，杀害了他的长子，他逐渐从这双重损失的悲痛中振作起来。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管理他在重庆的中学，而不是长沙临时大学。自 1931 年执掌北大以来，蒋梦麟就感到校务繁重得让他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不稳定，日本人的恐吓，再加上学生的反叛，这种种都在困扰着他，而建立宏伟的学府的理想——不受战争荣辱和政治兴衰的影响——但现实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40] 拥有一流的师资，高水平的学生，以及先进的物质设备，他使北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这种成绩更使他难以改变对北大的忠诚，转而为长沙的联合大学服务；在那里的见闻使他对进一步的领导心灰意冷。他写道：「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痛的事。在战乱年代，与教授个性不同、风格迥异的两所大学联合办学，就更加艰难。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为战区或沦陷区里的亲戚

朋友发愁，这不是我的身体能承受的。」[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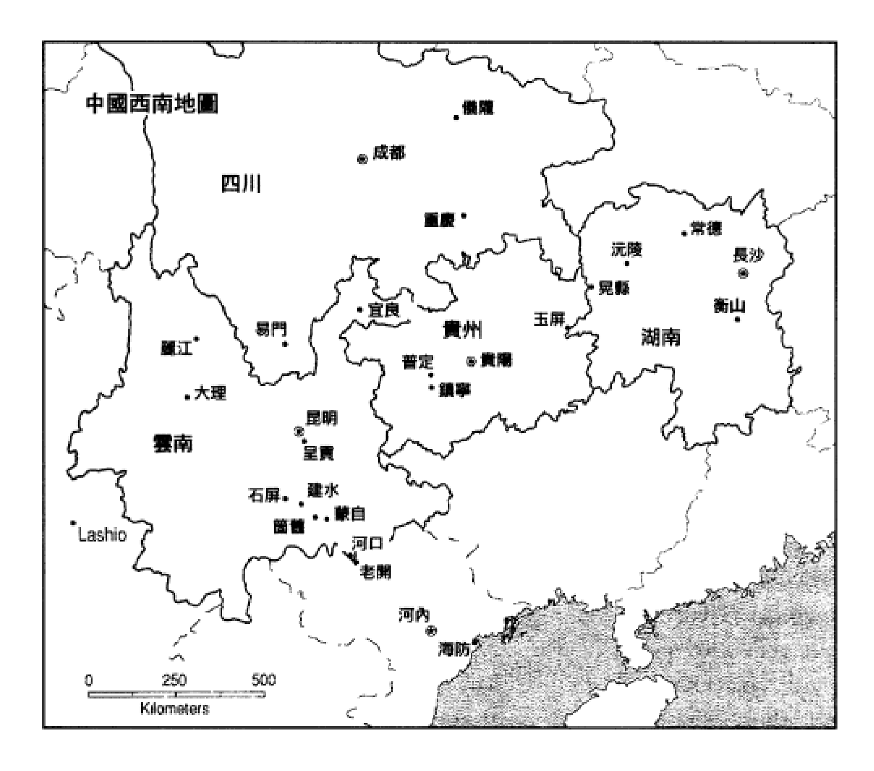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梅贻琦为清华迁移到长沙已做了两年的准备工作。而且，作为低调但高效的管理者，在对待高高在上的大学教授和桀骜不驯的学生方面，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这种危急关头，他就成了总理校务的理想人选。他主持秘书、教务和总务工作，负责校舍建设，还领导各种专门机构。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联合组成四个学院十七个系。[42] 院长职务的分配审慎而明智——北大的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是北大校友，但主要任教于清华，应算作清华人。最初由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担任该职，但未到任，后任驻美大使，乃由冯友兰接任。长沙临时大学未设训导长一职，黄钰生也未担任过训导长。这里应该是指「建设长」，黄钰生确实担任过此职。〕南开的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清华的吴有训任理学院院长。工学院为清华所独有，院长自然由清华人施嘉炀担任。[43] 高层领导职务也由三校分担。清华的潘光旦任教务长，南开的黄钰生任训导长，〔长沙临时大学未设训导长一职，黄钰生也未担任过训导长。这里应该是指「建设长」，黄钰生确实担任过此职。〕北大的樊际昌任总务长。[44] 尽管如此，三校还是保留了各自的标记和顾问制度、毕业要求及非正式的行政组织。

临大的经费相当紧张。教育部同意筹借中英庚款基金 50 万美元，〔筹借费为 50 万元，而不是「美元」。〕但马上能到位的还不足这个数目的一半。教育部的战时财政政策是每年提供以往和平时期拨款的 70%。临大有三所大学，而它们的资金只有这个比例的一半，也就是原有经费的 35%。[45]

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体并不在长沙。圣经学院只能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教学。理学院大部分是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土木系学生在城里上课，电机系和机械系则送到湖南大学，河对面就是岳麓山，与几个新成立的清华研究所相邻。化工系在四川重庆大学寄读，而机械系航空工程研究班到湖南东邻江西省省会南昌借读。虽然城里有骨干教师给少数大一学生上课，但文学院位于衡山脚下的圣经学院分部。

衡山是一座颇受尊重的圣山，在长沙南边，相距有好几个小时的路程。

学生陆续到达长沙，他们随遇而安。有些男生在圣经学院的几个大房间里过夜，睡的是狭窄的双层床。许多人被安排在四十五标更不舒适的营房里，在草席上睡觉。女生住在附近的涵德女校。有钱的学生（大多数人用的是家里的钱）在校外三四个人合租一个房间。[46]



1937 年 11 月 1 日，寒冷阴晦，临大开学，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虽然有日机「前来表达敬意」，但轰炸还不严重。大家普遍认为，铺在圣经学院草坪上的巨大的星条旗不只是保护符。〔作者记录或恐有误。「圣经学院前面校园草地上，就铺了一面英国大国旗，以避免敌机滥炸……从此大家对于铺在地上那一面英国国旗深感毫无安全作

用。」见郭铎〈西南联大片段记〉,《清华校友通讯》75:62(1981年4月29日)。〕

物质条件不尽如人意。由于缺乏足够的教室，某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实验设备同样捉襟见肘。临大和北平图书馆分别捐资 4 万元采购书刊，但新的资料得通过香港才能运到。圣经学校的礼堂变成了临时图书馆，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根本无法与北平汗牛充栋的图书馆相比。馆藏只有五千多册中文书、一千册左右西文书，所以当名人发表讲演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中间的书架移开，供学生听讲。在衡山，文学院从幸运的学生手中购买到少量的书，使馆藏略有增加。[47]

参考书如此之少，学生只能依赖上课听讲，但这些课常常达不到战前的水平。几乎所有教授在逃离时只带了几件衣服放在背包里，却把资料丢在北平了。他们不得不凭记忆重新组织讲稿，但多亏中国人强调知识的记忆，许多人能记个八九不离十。在传授知识时，有些教师将本分的工作当作行善，创造力骤然上升。而资质较差的同事措手不及，不免大发牢骚，使学生感到莫名其妙。

战时的通货膨胀还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教授们还能依靠相当于战前 70%的薪水维持生活，但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停止发放政府奖学金，失去家庭的经济支持，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临大当局只是象征性收十块钱学费，给大约 280 名特别贫困的学生发放 15 到 25 元的补助金。教务长潘光旦敦促学生救济委员会提高救济金额，安排兼职工作，发放财政补助。[48]

甚至连衣服都很有限，因为许多人逃难时只穿了夏天的衣服。为度过湖南阴冷潮湿的冬天，临大当局分发了应急衣服，男生领到几条哔叽布裤子、一件夹克、一顶帽子和一件黑色大衣，大衣在夜里还可以当作毯子。学生穿着衣领上有两个临大标记的黄铜钮扣的军装，走在长沙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撞到士兵时，也增添了几分自信。[49]

至少有一段时间，食物是充足便宜的。一星期几块钱，一个学生可以和六七个同伴在附近的餐馆撮上两顿。这些美食家很快就能对长沙的餐馆评头品足，从李和盛驰名的牛肉，到九如斋的美味果脯，如数家珍，他们还能指出哪里可以吃到嫩豆腐、肥猪肉、青菜和大角鱼。[50]连那些吃食堂的人也能吃得津津有味；至于小吃，湖南有各种新鲜水果，还有像著名的米线之类的特产。学生常以酒酿蛋消夜，价钱公道，营养丰富。[51]但有些穷得叮当响的学生，只能靠价值一毛的红薯度日。到 1938 年初，随着个人积蓄的日益窘困和生活费用的上涨，连宽裕的学生也不得不放弃餐馆，转而投靠路边摊了。[52]

对于想家的北方人而言，长沙并不容易适应。湖南的碗和汤匙特别大，而筷子特别长，据说是用来喂餐桌对面的人，而不是夹给自己吃的。更具挑战的是火辣辣的辣椒，辣得人上颚发麻。冬天的长沙寒冷刺骨。街道窄狭。稍好的是鹅卵石路，其它则用石板砌成；有些还不如小巷里的泥路。[53]湖南人的名声毁誉参半。比如，长沙的黄包车夫名声就很糟糕，拉车慢吞吞的，脾气还很坏，而北平的车夫素来谦恭有礼，腿脚很勤快。

当地最具魅力的地方不在长沙，而是河对面的岳麓山。联大工学院附近青翠的山坡上，有寺庙，有亭台，有历史名胜，是师生最爱游玩的去处。

圣山田园曲

与衡山的人间仙境相比，岳麓山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迹不免相形见绌。文学院就设在神圣的衡山上。在那里，为说明徒劳难成正果，禅宗大师怀让试图磨砖成镜。理学宗师朱熹也在那里生活过。这是设置文学院的理想之地。正如中国最伟大的新儒家冯友兰所回忆的，「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被异族驱逐到南方。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群体中，哲学家、作家和学者济济一堂。」[54]对冯友兰及其哲学系同事而言，这是他们的收获期。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完成了《论道》，冯友兰完成了《新理学》的主体部分。[55]

衡山相当偏僻，当天报纸通常在两三天后才能送到。要去衡山的文学院，得先乘汽车到湘潭，再坐渡船过湘江，然后从南岳的小市镇继续步行，这时距长沙已有四五个小时的路程，挑着不大的包裹，走一英里半山路，经过怪石嶙峋处可以俯视白龙潭，圣经学校就掩藏在一片茂林修竹之间。在那幽美的地方，相应地，学业也很宽松。由于图书数据少得可怜，学校同意毕业班学生免做论文。有时候，一周只有八小时的必修课。[56]一个最受欢迎的消遣是，沿着山路散步，俯观附近如画般的白龙潭。然而，潭上面的石头可能是湿滑而暗藏危险的。没过多久，来自广东的北大学生何与钧跌入潭中，成为这个迷人的地方第十二个有名有姓的牺牲者。[57]在圣经学校上面二十公里处，是衡山七十二峰的最高峰，远足者可在庙里过夜，到时候观看云海日出。

飒飒秋风

在秋天，我们走出家乡，
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
我们，我们是群无家的孩子，
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

——穆旦〈在秋天〉

〔这几句诗是用穆旦〈在秋天〉中的句子拼接起来的。原诗载长沙《火线下三日刊》〈1937 年 12 月 28 日〉第 15 号，第 119 页。〕

好景不长。11 月 13 日，南京陷落。蒋介石七零八落的部队试图遏制敌人的攻势，却溃不成军，被迫任由敌军在长江的心脏地带横行。运到长沙的伤员越来越多。离学校不远的火车站，就有不能行走的被抛弃的士兵躺在地上求水喝。[58]车站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杨步伟医生站在家门口与朋友聊天时，日本飞机飞得极低，她甚至能看到飞行员。不一会儿，杨医生被召集到轰炸过后的火车站。但她没有医药和工具为伤员疗伤。残杀过后，她看到一群人哀号恸哭。他们当时在附近的教堂举行婚礼。新郎幸免于难，但新娘被炸得粉身碎骨，只能找

到一条血肉模糊的腿，脚上穿着红色的绣花鞋。[59]

尽管阴沉的天空能保护长沙免遭空袭的灾难，警报还是会提醒每个人跑出去寻求庇护。老师和学生躲藏在坟堆或圣经学院的地窖里。「别让这群书呆子都藏在一个地下室！」〔这句话原文是“Don't put all your eggheads in one basement.”英语有一句谚语：“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意为别把希望寄托在一件事情上，别在一棵树上吊死。赵元任的话正有此意。〕赵元任对蒋梦麟打趣道。[60] 虽然赵教授一语双关，但南京沦陷后大家都没有丝毫心情逗乐。大家坐在闷热的房间里，煤烟和焦虑使人快要窒息。[61] 一个女孩的呜咽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女生宿舍里每个人都泪眼汪汪。[62] 有谣言称，临大男生——而不是女生——将充军服役，听到这个消息后，恼怒的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冲进校领导办公室，要求在保卫国家方面男女平等。[63]

随着战事紧逼长沙，许多教授认为他们会被调入部队。即使不被派往前线，政府也肯定会利用他们指导战时生产，或教导军队和百姓。但政府没有这种打算，教授们便很快回到熟悉的日常生活——备课、上课、阅卷。[64]

在 1935 年 12 月历史性的游行示威中，爱国学生面对消防水管和大砍刀而无所畏惧，他们发现，走例行的学术道路无济于事。这些抗日狂热分子便决定通过出版《火线下三日刊》新闻报来延续一二·九的传统。在敌军进驻南京五天后，《火线下三日刊》刊发了〈一个大学生的自白〉，作者（笔名黄恪）在文中严厉批判了周边同学不闻不问、自欺欺人的态度。[65] 该文抱怨，「在大学校里」的学生要求根据战争形势更改课程设置，但这个借口与其它不愿意离开学校的理由一样毫无说服力。学生无法预见，学校很快就会遭到破坏，家园会被敌人占领。等待战争结束，拿到毕业文凭后尽职尽责，这是新「士大夫」阶层制定的计划。「当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却忙着个人的文凭，假如国家亡了，你这张文凭也只能拿到『支那国』去做『奴隶总管』了！」

有些活跃分子对军训或战区服务感到失望以后，便回到校园，他们埋怨政府没有为大学生规划适当工作。……我以为大学生应略微降低身分刻苦耐劳，承担动员、组织、训练的工作。……百万将士流血过野，他们平日何尝得着国家的好处？而我们却是平日受国家待遇最优者，每个入学生每年国家津贴至少一千元，……今日还依恋这辉煌的校舍，能不愧对死者？

黄佫的文章还有一个令人心酸的落款：「于出征之前夕。」

黄佫并不是唯一有这种责任感的人。起初三三两两，后来成群结队，学生们开始响应号召。激进派乘火车前往武汉，进入八路军总部，碰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在招生。延安位于陕西北部，是战时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主义堡垒。途中，他们很快加入了毛的部队。更多的人相信中央政府，并踊跃支持蒋介石。对这些人来说，有大量军事单位、培训学校及辅助机构，这些团体都急需有知识的人。

最有吸引力的机会是胡宗南将军提供的，他是长江下游浴血抗战的英雄。胡氏部队的转业老兵说，当地百姓对保卫他们利益的战士漠不关心。由于缺乏足够的人抬担架，伤员死在战场上。中方指挥官在当地的条件下无法得到最起码的情报，而敌军特务在平民百姓中活动却安然无恙。在这些老兵的刺激下，学生们加入了胡氏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由五十个服务团组成的一个集团中，有三名医生、十名护士、两位漫画家、一位戏剧家，及大约三十五名临大学生。志愿者包括无党派爱国者、国民党坚定分子和中共地下党员。[66]

决定时刻

考虑到战时的要求，临大领导尽量调整教育方案。在每个宿舍，学生被编进准军事化单位。名义上，强化军事训练课由张伯苓指导，实际上由毛鸿少将负责，辅以四名毕业于中央军事学校和中央政治学校的少校。这些人引领学生进入部队，而大学指导其它志愿者参加国防组织，在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其学藉。

南京沦陷后，事实证明，大学无力容纳潮水般的爱国青年，他们争先恐后要求参军。临大如何处理大批学生同时离校的问题呢？为制定相应的措施，梅贻琦赶往武汉，向中央当局请求指示。1938 年 1 月 5 日，返回昆明后，梅贻琦在全体大会上告诉学生，政府希望他们保持镇静，坚持学习，为国家将来的复兴做准备。[67]

梅贻琦的话非但没能浇灭青春的爱国之火，反而成了火上加油。闻一多敏锐地观察到，梅贻琦主要得到了教师的支持，他们只是很愿意继续支持下去。更年轻的教授由于专业方法太死板、家庭和职业的束缚太紧，而不能堂堂正正地投入战斗。

但是，哪种教育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呢？1937 年年底，全国围绕「战时教育」问题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改革派认为，在国家危急关头延续和平时期的教育既不合时宜，也不负责任。如果高等教育完全按照老样子办下去，就必须把重点放在不远的将来，并把课程转向国防训练方面，要是生存都办不到，中国就不可能谈什么「长治久安」。对骄傲的临大教师来说，这种论断毫无意义。这些牛津、哈佛和索邦大学的博士们对「战时教育」既缺乏兴趣，又不准备上这方面的课——不论它意味着什么。曾昭抡是唯一的例外。他甚至在战前的化学课上就讲授炸药生产和毒气防护的方法。但这对学生没有丝毫影响，更别提他的同事了。

从教育部到大学，教育工作者都坚决反对课程的大变动。战时教育运动成了左派的「专利」，这里是指在延安，这种观念被付诸实践。为发展延安的平民主义模式，并为在西北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招募学生，激进派邀请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徐特立来校演讲。「为防热血青年受人煽惑起见」，国民党政府密电临大校方，禁止所有校外人员来校演讲。[68]

临大领导无意压制自由言论，但他们也不愿意牺牲学校。一些中央政府官员建议把长沙临时大学迁到重庆，而大学派出代表团去广西考察建校的可能性，但把重点放在云南。云南的字面意思是「云之南」，

是地处边远的生动象征。然而，西南边陲有滇越（昆明—河内）铁路与外界相通，这个省距日本最远，最方便与香港、上海及西方联系，是个理想之地。

对于临大迁往昆明，国民党内部又有争议。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寻求他们能够继续工作的安全之所，中央政治领袖把师生视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湖南当局迎接清华和临大到来，藉此机会增加当地的自豪感，但最终把大学当作湖南战时动员的教育资源。主要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持后一种观点。他专程访问临大，并发表演讲，「我个人有守土之责，坚决的要维持长沙。假如有人感觉生命危险，」他讽刺道，「那最好跳入湘江！」[69]

对于张治中犀利的言辞，学生并非无动于衷，他们不愿意成为「叛徒」、「懦夫」。然而，还是陈诚的口才更具说服力。陈诚告诉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的是有知识的人，而「你们是中国最后的希望」，是中国的「国宝」。[70]要是珍贵的宝贝都化为炮灰，那么国家的未来肯定会非常严峻。陈诚坚定了学生专注学业的决心。此外，这所大学的管理工作已步入正轨。蒋梦麟赴武汉请求批准把学校迁往昆明，1 月 14 日满意而归。现在，战时中国最受尊崇的蒋介石委员长批准了搬迁的要求。

但反对的声音仍很坚决。蒋梦麟回来的第二天，《火线下三日刊》发表了题为〈反对文化逃避政策〉的文章，猛烈地抨击临大的领导和学生。[71]凭借「雨兹」这个笔名，《火线下》赞扬了「英勇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学生」，称他们「勇于放弃惬意的校园生活，投身于抗战的洪流」。雨兹写道，「我们能理解临大当局保护文化的苦心」，那意味着「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保存文脉」。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战争期间还要「愚蠢的……保护政策」。他指责道，除非「我们愿意做卖国贼、当亡国奴」，不然「就没有资格躲到安全的象牙塔里」。他还发出警告，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临大知识精英的逃离将严重削弱民众的士气。把学校迁到云南不但嘲讽了国民党自己的教育领袖坚守阵地的

主张，而且背叛了学生的爱国遗产。「一二・九运动之后的英雄儿女不会退缩，也不会逃避，更不会……要求他人作出牺牲，但牺牲一旦降临到自己身上，他们便义无反顾不躲避不逃离。」

这篇文章还附有致武汉政府的请愿书和一封写给蒋介石的电报，请求他把临大留在长沙作为人们的榜样。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因为临大必定迁往昆明。官方于 1 月 19 日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五天之后举行考试，为第一个学期划上了句号。从 1 月 27 日到 2 月 10 日，共有 820 名学生填好表格，表示愿意前往云南。[72] 虽有六百多名学生或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学其它院校，或返回家乡，但整整五分之三的学生还是准备到「云之南」继续学业。

二 联大的长征

与其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中国谚语

临大师生如何去偏远的云南呢？有人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所有女生、体弱的男生和绝大多数教师及其家属乘火车和轮船去，其余身强体壮的男生和教师护卫队从内地步行去。让外界看看，这群为保存中国的文化遗产而艰难跋涉的人被称作「懦夫」和「叛徒」是否合适！

幸运的是，临大军训教官雷树滋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他经常来往于省内外。根据雷树滋的消息，临大当局于 1938 年 1 月 21 日宣布两条前往新学校的路线：一条是乘火车经广东、香港，然后乘船到海防，再从河内换乘火车到昆明；另一条是步行一千英里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1] 这次长途跋涉使爱国学生有机会领略祖国边远地区的河山，目睹农民的生活境况。徒步穿越内陆的想法吸引了渴望深入群众的民粹主义者，也吸引了准备以抗日的名义发动穷乡僻壤的群众的积极分子，还吸引了充满好奇心或热衷冒险和体能挑战的人。

许多人就像 7 世纪的僧人玄奘——他从印度把佛教典籍带入中土，中国文化由此焕发生机——他们为能够亲身经历这伟大的历史时刻而兴奋不已。其它人认为，如此艰苦卓绝的跋涉肯定会引起世人的瞩目。有些志愿者觉得，徒步穿过内地比经过香港（1842 年由中国割让给英国）和东京湾（作为中国的附属国，1885 年被法国占领）等殖民地抵达昆明更爱国。而且，在贫穷落后的乡村旅行两个月，可以使学生免受香港和其它现代都市奢侈的诱惑。此外，参加步行的学生还可以领到一笔差旅费，[2] 这一优待对那些因日本入侵而断绝家庭补助的青年尤其有吸引力。

所有学生都得参加全面的体检。考虑到女生柔弱的身体，以及内

地艰苦而危险的环境，再加上不便安排女生单独住宿，她们因此被排除在旅行团之外。

2 月 13 日早上，学生们涌向布告栏，查看成功入选旅行团的成员名单，找到自己的名字便兴奋地大声喊叫。但还有一道难关——体重不达标者将被淘汰——身体太单薄的人难以承受严酷的考验。体重较轻的学生为达到要求，便偷偷地在衣服底下塞几本书使自己的体重超过最低标准。244 名男生（占学生总数 30%被选入旅行团徒步前往云南。

有些人婉拒了忧心忡忡的亲戚的殷切请求，下面就是一例。这是清华大三学生蔡孝敏和他叔叔之间的对话。叔叔说：「我主张你走海线，不必步行。」

「检查体格，我是甲等，依照校方规定，甲等必须参加步行。」蔡孝敏不容分辩道。

「好吧。走点路难不倒你。但要记住，早睡早起……我这儿有瓶特效药，专治疟疾的。……还有，记得经常写信来。」这是蔡叔叔镇定的临别之言，但眼里闪烁的泪花掩盖不了他的真情。[3]

为领导这次行军，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选定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按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8 页）的说法，黄师岳是「中将参议」，下文提及的毛鸿是「少将」。〕。黄师岳曾在华北任指挥官，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经验丰富。他曾在「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下带兵作战，作风正派，严于律己。黄将军对旅行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在他之下有中校毛鸿，及少校邹镇华和卓超两位教官。毛鸿不苟言笑，曾负责指导临大学生军训。邹、卓各管一大队。每大队分成三中队，每中队又分三小队，中队长和小队长由学生自己选举产生。

黄师岳属下有一位行政助理、两位少校、三位教授和七八位学生代表。南开大学教育学教授兼秘书长黄钰生是旅行团实际上的主要负

责人，他掌管全团经费，承担学术指导职责。他经常与以前的同事、植物学教授李继侗协作处理事务。参加步行的教师共十一人，组成「辅导团」。还有一个三人广播小组、一个医疗组（医官徐行敏和两位男护士）和一个财务组，有两名受过训练的会计。

除了黄钰生和李继侗，教师志愿者还包括：清华著名诗人、文学研究专家闻一多；北大教授、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放荡不羁，忠心爱国，是开展战时教育的先行者；游历广泛的清华地质学家袁复礼；还有六位尚未成名的青年同事。

2 月 19 日是预定的出发日。第一段行程，乘船从长沙沿西北方向到常德。先顺湘江而下，到达洞庭湖，继续沿湖的南岸向西到沅江江口，然后逆流而上抵达常德。第二段行程，从常德开始步行，沿西南方向进发，第一周平均每天走 20 公里，第二周每天走 25 公里，第三周 30 公里，之后 35 公里。这个团队被称作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

即将出发前几天，旅行团成员得到细致的指导。每天行军之前，都要穿上干净的袜子，认真地裹上绑腿，注意饮食卫生，保证充足的睡眠。毛鸿中校讲解行军细节，发食品袋和地图。在 2 月 17 日早晨最后的集会上，每个学生都领到一枚四位数的肩章。在原计划出发的前一天，按许医官的要求，旅行团成员吃了加倍剂量的破伤风的药，并注射了伤寒疫苗，有些学生出现身体不适，要么用手抱着昏沉的脑袋，要么无力地靠在电线杆下。2 月 19 日，一位长沙本地学生在日记里写道：「煜明来，帮打被包，包妥后称之，约合新秤卅余斤，即十六七公斤左右，过重殊甚，然所搁均必携品，未便减少，不顾，仍运校过磅。果不出意料，同学行李均起码超十余公斤。」[4]

2 月 19 日下午五时，他们全体在学校集合。校领导宣布，大学搬迁是为了保护中国文化的精粹。这次跋涉并不像某些保守人士所指责的，是为了掩盖左派的搅扰。下午六时，旅行团成员宣誓忠于组织规定，接着发放杯子和碗筷，然后去码头。但是，租用船只的计划似

乎还未安排妥当，所以推迟到第二天晚上出发。「大丈夫志在天下，然余临寝亦未尝不潸然下泪。余母如何度此寂寥之三年乎？」那个长沙学生在日记里写道。[5]

望着长沙昏暗的光线渐渐隐入夜色，这些急于求成的青年思忖，三年该是一段多么漫长的时光啊。但没有人料到，战争还会持续七年多时间。

从乘船到步行

随着一排排木船顺湘江向北漂去，气氛变得浪漫起来。他们谈起湘西蛮荒之地的土匪、贵州山区神秘的苗民及其奇风异俗。在一轮满月之下，已开始从事民俗研究的闻一多聆听着船夫们的民歌对唱，不时有桨声传来。[6]

翌日，在拥挤的船舱里经过一夜时睡时醒之后，这些远行者又恢复了愉快的心情。沿岸枝繁叶茂，绿意盎然。将近中午，笑容满面的村妇站成一排，兜售鸡块。日落之后，星光满天。学生闲聊着分配伙食的详细计划。他们将从常德下船，开始长途跋涉，抵达昆明将历时 71 天。他们对预想中的冒险活动颇为兴奋，但也有人发牢骚。那位长沙学生在日记里写道：

二月廿一日：此次旅行，因辅导团之不行，致生种种困难，如第一日之无船无伙夫。今日，第二大队八九分队同学，因未吃饭，在白马寺上坡不肯走，以致耗时甚多。辅导团团长黄子坚，为人老奸巨猾，事事均推卸责任于黄团长（师岳），然黄团长是客串的，岂能多管闲事！[7]

考虑到旅途最初阶段的混乱和拖延，这种批评并不稀奇。经常远足的人几乎都不同意这位日记作者对戆直而公正的黄钰生尖刻的批评，但选择这位南开教授率领团队，确实惹恼了一些团员。对某些团员——他们习惯于更强调个性的清华文化或自由放任的北大生活方式——而言，黄钰生所代表的注重秩序、讲究卫生、遵守纪律的南开

作风太过死板了。

2 月 22 日，木船停在狭窄的河道里。黄将军宣布，前面河水太浅，螺旋桨无法推动蒸汽拖轮前进。所有重行李都被转移到一艘载有十八名团员的大驳船上。这些人抵达常德时负责卸货，并为其它团员做好安排。船队的其它成员将逆资水而上，到达益阳某地。他们从那里上岸，步行前往常德。

从益阳顺流而下，在旅行团硕大旗帜的引领下，团员像机敏的士兵一般阔步前进，脚步飞快。但他们很快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在第一个二十公里行程的终点，学生团团围住许医官，等待治疗水泡。有十来个人直接去找黄师岳将军和黄钰生教授，询问医治脚伤的方法。[8] 第一天走的是相当平坦的马路，行军非常轻松。他们要是连这个都应对不了，那剩下的七十天将会是折磨。

为追上益阳和常德之间的队伍，二三十名脚上起泡比较严重的团员，乘坐旅行团的两辆行李卡车出发。少数坚强的人选择完全步行，拒不坐船。性情古怪的化学家曾昭抡就是其中之一，他发誓从长沙到昆明全程步行。

这群刚刚上路的跋涉者的艰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欣赏到湖南中部迷人的乡村景色：层层迭迭的山丘，一望无际的稻田，路边的鲜花嫩草，挺拔的翠竹，山坡上墨绿色的茶树和松树，还有料理得整整齐齐的菜地。清澈的池塘倒映着棕榈树的影子。黄昏时分，落日余晖透过云彩照着远处的山峰，在这个背景的衬托下，金黄色的花圃更加绚烂。[9]

在第一个歇脚点——军山铺，当地百姓把这些行军者领回家，又是倒开水，又是用新鲜稻草铺床。他们专注地聆听中国抗战胜利的消息，跟学生学唱爱国歌曲，第二天一早还燃放鞭炮欢送客人。[10]

离开军山铺十英里处，学生仍沉浸在这种热情之中，这时他们遇到一个在路边呻吟的十三岁小孩。因为十六岁的哥哥抽上了鸦片，他

家服兵役的义务便落到他头上。这个男孩在数百公里以西的芷江参军入伍。由于脚伤昏倒在地，上级发现他还未成年，瘦弱得连步枪都扛不动，这才把他放了。他们给他一张通行证，任由他寻找回家的路。据太子庙一家小饭店的老板说，征兵制在当地被严重滥用。征兵官员就像欺负弱小的禽兽，对当地百姓已进行过四次突然骚扰，第五次骚扰也日益临近。当地几乎没有应征者，可是征兵官员已经积攒了一大笔受贿金。[11] 连公路上的汽车也在提醒旅行团成员，中国还存在着种种不平等。许多汽车里乘坐着富裕的军队领导和政府官员的家属。长沙有权有势者把他们的女眷带到常德躲避空袭，但这些闲散的阔妇人忍受不了避难地消费品的贫乏，所以又用公家的车把她们送回长沙购物。[12]

到达常德后，旅行团歇了一天。团员发现，难民的大量涌入刺激了商贸繁荣。对一座城市来说，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市民仍依赖外来资源满足物质需求。有个学生想找个地方修眼镜，但没有找到；其它学生早就想洗个澡，却发现城里的两个浴室人满为患。翌日，他们设法进入新人民浴室，但浴缸非常脏，以致一位化学系的学生跑出去弄了两瓶高锰酸钾来消毒。在常德，旅行团成员第二次注射伤寒疫苗。许医官用一根很钝的针给他们注射了双倍的剂量。这种注射针根本没能提高湘雅医学院这位骄傲的毕业生的名声。第二天，学生们打针后仍有反应，于是他们决定乘汽船去桃源。在空袭警报的呼啸声中，他们于早上八九点钟启航。

下午一时，他们抵达童黄州。由于那里河道太浅，汽船无法向前行驶。烈日下，他们穿过黑白相间的、种着蚕豆芽的田地，开始爬山。在桃源有些团员（包括那位记日记的长沙学生）被安排住在当地百姓家里：「余所宿庄屋，以竹杨等为篱，圈内遍植果蔬，春风微拂，碧野飘浪……若无此次旅行，何能知祖国的伟大？！」[13] 充满传奇色彩的桃花源是陶潜虚构的，这是一个著名的乡村乌托邦故事。第二天行军将路过此地，有二十公里远。他们发现去桃花源的路上种着一排排桃树，桃花盛开，旁边的洞穴刻着「秦人古洞」几个字，让人想起两

千多年前漫无目的地闯进桃花源的那个传奇人物。洞前有一方池塘和一个亭子，还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着明代哲人王阳明的话：「桃源在何许？西峰崖源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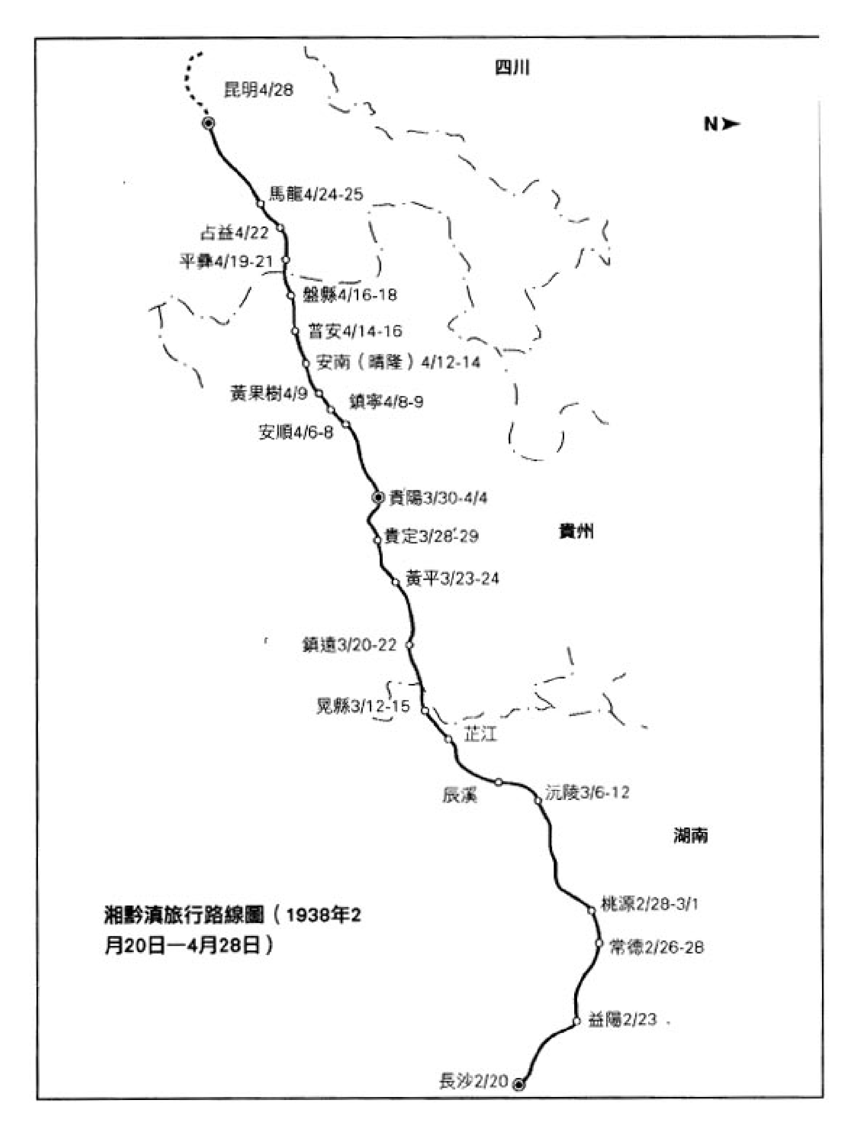
当晚，旅行团在一个叫郑家驿的小镇留宿。翌日早晨，他们继续沿西南方向往贵州边境前进。

这条国道在三年前开通，当时锣鼓喧天以示庆祝。说是国道可能不太准确，因为这只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双车道土路。最高时速大约是 20 英里。由于道路崎岖不平，坐在卡车里的学生感到有被颠簸碰撞得头破血流的危险。大多数人认为，步行是更舒适的旅行方式。蒋介石曾调集部队在这条路上追击毛泽东的长征队伍，许多混凝土碉堡及墙上的反共标语可以作证。但是，几乎没有学生意识到，修筑这条路也是为了把云南鸦片运到汉口和广州，而不必经过广西，因为那里要征收鸦片转口税，而这笔费用是用来支持蒋介石的竞争对手的。[14]

同鸦片和公路一样，枪支也是中国的一道景观。学生在途中也有所见闻。没有军事武装的知识分子无论获得怎样的尊敬，都不可能掌握权力。毛泽东曾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只是对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生动形象的表达，连黄师岳这样的老兵也不能无动于衷。在行军最初几天，无论「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如何请求帮助，当地人都充耳不闻，但当他以「黄师岳中将」的身分讲话时，他们立即就服从了。[15]

旅行团看上去非常像军阀手下的散兵游勇——他们穿着哔叽布制服和沉甸甸的黑色棉布军大衣，军大衣可作各种用途。学生还领有长沙人最喜欢的油纸伞。有些团员借助拐棍行军，也用它驱狗赶蛇。他们的腰带上系着碗筷、军用水壶和装午餐的食品袋。

他们需要适应所有这些行头，尤其是绑腿。稍有疏忽，就会双腿肿胀。打绑腿的诀窍是，务必在出发前把绑腿裹好扎紧，阻止血液流到小腿以下。每天到达目的地后，解开绑腿，用温水泡脚。[16]



湘黔滇旅行路線圖（1938年2月20日—4月28日）

一开始，有许多人穿皮鞋，但很快就蹭破了，不得不改穿草鞋。在路上一分钱可以买到三双草鞋。脚上一双，腰带上系一双备用。他

们最初赤着脚穿草鞋，但很快学着穿上粗袜保护脚趾头，以免因草绳的摩擦而受伤。他们个个成了草鞋行家。湖南草鞋质量较差，走在路上细小的石子会磨穿草绳，草鞋很快就烂了。但贵州的草鞋，即使下雨也能耐用好几天。少数依恋城里的靴子的团员发现，穿草鞋走路比穿皮鞋更有利。

每个学生每天仅靠六毛钱维持生活。其中三毛用于吃饭，一毛用于给煤油灯添煤油，剩下两毛作零花钱。在经济萧条的中国内陆，两毛钱足以支付草鞋、纪念品、小吃及每盅两三分钱的甜酒。由于有两辆卡车，学生可以轻装上阵。汽车装载重的设备、炊具、铺盖卷和煤油灯（一小队一个）。

大体上，旅行团每天以 20 到 25 英里的平均速度走三天，然后休息一天。早晨五点半，他们以稀饭、馒头、蔬菜和一丁点肉当早餐。午餐在路上吃，主要是烙饼，每人有两大块，食品袋里还有昨天晚饭吃剩的食物。这么少的午饭很难维持一整天的体力，因此学生很容易忘记许医官的禁令——不许光顾不卫生的路边摊。在这些路边摊上，花一毛钱就能吃得饱饱的，不过食物有可能是前面顾客吃剩的。

黄将军有一辆脚踏车。他每天骑车跟着这群徒步旅行者来回两三趟。这支队伍歪歪扭扭，有时还有人掉队。运载厨师和炊具的卡车，赶在旅行团之前抵达宿营地。[17] 卡车也运生病或腿脚有伤的团员及先遣队员，先遣队由每中队选出来的十二名学生轮流担任。先遣队负责寻找宿舍，购买物品和铺床的稻草，以及与休息有关的其它准备工作。把先遣队员运到目的地后，卡车返回去装运铺盖卷（每两人一铺）和其它行李。团员只管到下一站按时吃晚饭。有人记得，「吃的东西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很有滋味。说我们受了不应受的苦是个夸张的说法。」[18]

每天行军的距离和中途停留的次数不尽相同，这是根据所到之处是否足以安排三百人的食宿而定的。黄将军用详细的军用地图作参考，河流、人口数量，甚至水井，在上面都有标示。根据这些信息，

他基本上能找到合适的留宿地点。但有时旅行团也得临时安排宿营地。任何时候，他们都尽可能寻找学校、旧寺庙或其它公共场所作为宿营地。花一点小钱，和尚、道士都会欣喜地出租其充裕的场地。有一次，第一大队就在寺庙的内殿过夜，周围是狰狞的阿修罗的雕像，还有一具装在棺材里的尸体，这令人难以忘记。陈放的棺材经常被学生当作床铺——有些人睡在粗糙的木棺上，有些人则睡在它下面。有一晚上，他们在一间乡村茶馆打地铺，与店主的狗、牛、猪和羊为伴。他们累得没有力气计较。离长沙越远，城镇就越小，住宿就越难找。有时候只能睡在农民的茅棚里。

湘西的蛮荒之地

客路湘西界，傍山伴水行。山山鸣翠鸟，涧涧响泉声。

——王玉哲〈三千里路云和月〉

学生们爬上崎岖的湘西山地时，变幻不定的景象就呈现在他们眼前。常德周边的油菜田、蚕豆田、红艳艳的李树林及春天的垂柳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陡峭的梯田，以及用湍急的山流发电的造纸厂，这一切在雨中隐约可见。局地的小山坡上到处是郁郁葱葱的茶树和松树，一直延伸到更高的村庄。道路弯弯曲曲，经过煤矿、银矿和铁矿，俊俏的村姑穿着低地消失已久的服饰，慢悠悠地走着。

景色越来越荒凉，大家变得警惕起来，因为湘西边界是臭名昭著的地痞流氓的天下。旅行团领导对穿越这块是非之地早有准备。他们事先就跟黑社会组织头目打招呼，并分别写介绍信给这些头目以保证通行安全。凭借这种方式，沿途所有秘密会社的人都警觉起来，并且像所希望的那样让旅行团安全通过。从远处看，这群穿哔叽布制服的行军者会被误认为一队队携有武器的士兵，预料到这一危险后，这群「绿林兄弟」不辞辛苦，确保这些「国宝」经过时不发生意外。有个农夫举着一只活公鸡在前面带路。路两旁高山耸立，学生突然发现有极少数哨兵扛着枪，大概是保护，而不是威胁，但没有人敢肯定。[19]

为进一步防范危险，随着旅行团越来越深入山地，他们开始分组，每小组间隔几公里分散前进。

3 月 3 日上午，居住在毛家溪丘陵地带的父老乡亲提醒他们，「前面有许多歹徒」。其中有个出名的学生头目，这家伙极为残忍。他被某个军官学校开除后，便投身山林。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会放过学生。道路也变得更加艰险了。旅行团成员钱能欣写道，「公路愈来愈曲折，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缩小了，概见上面是天，下面是道，左右前后都是山，丛丛密密的树林，绿荫深处，曲径岖崎。」[20]

抵达预期地官庄之前，旅行团得知这个地方已被中央军事学院的一千多名学生占据了，他们前往西部的新学校。旅行团只好去极小的村庄借宿，住宿条件极其简陋。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焦躁不安。

经过一夜辗转反侧之后，他们于次日黎明出发，沿着蜿蜒的道路穿过高低不平的、埋有矿藏的乡村，进入山林。这天的行程将近三十英里，其中的一大半必须在大休息地之前走完。然而，大部分团员在傍晚才到达五里山，天色越来越暗，其它人干脆露天安营住宿：

前面山林深邃，且天色已晚，不便前进。于是在此草草投宿。……傍晚，我们在溪中涉水，一钩新月，从林间升起，大自然的美丽把旅行者一日的疲劳顿时消解了。渐渐暮色布满了山谷，我们把铺盖扛到一间小屋子里。老主妇引我们到内房。……满积着尘土，显系是长久没住人了……从邻居家打听到她儿媳妇儿……吊死在卧房里，所以时常闹鬼。

一位中队长回忆：

就寝之际，大队长忽召开分中队长会议，言团长转接军校情报，有匪百余人，今晨渡过沅江，正向此间窥进，似有意于吾人（余等及军校）。团长意欲余等轮流警戒，同时指定一集合所，以备必要时集合，然大队长意思，余等赤手空拳，而欲抵抗或警戒，均等于白送死。……如匪意在我们，也只有与之婉言相商，要什么拿什么好

了。……吾人仔细考虑，觉得还是如大队长说的，做一次羔羊，避免无谓牺牲为上策。

黄将军显然有对付土匪的计划——有人说是贿赂他们——不要卷入他们与军校学员的冲突。[23] 因此，黄将军让全副武装的军校学员先走。

早晨八时，在担心忧虑中，学生们晃晃悠悠地上路了。他们不顾不要离开公路的命令，纷纷走上了以前通信员走的路线和山路，这样可以少走数英里。在文昌坪镇，大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中午过后，他们穿过茂密的山林，没人敢逗留欣赏风景。当一队学生沿着小路走上堤坝时，他们听到一声枪响。

直到夜里九时，他们才抵达计划宿营的凉水井镇。但是，那些军校学员再次捷足先登，所以旅行团只得再走一英里羊肠小径，到一个村落寻找留宿地。直到晚上十点才开饭，十一点才上床睡觉，他们仍惦记着那帮土匪。半夜时分，一阵寒流袭来，大风开始呼啸。突然间响起清脆的枪声——最初是一声枪响，然后是零星的枪声，继而是接二连三的响声。机关枪开火了。大家仍躺在床上，度过这漫长而焦虑的一夜。

拂晓，所有人都很平静。学生查明了事情的经过。在凉水井过夜的军校学员安排了哨兵站岗。黑暗中有几个农民向他们走去，但因为呼啸的风声，这几个农民没听到警告，于是哨兵开枪射击。幸好他们看不到目标，没有人受伤。[24]

当天，在一场暴雨中，旅行团向沅陵进发。已经是 3 月 6 日了，而他们还没有走完三分之一的路。由于刮风下雨及随后的冰雹和大雪，他们在沅陵耽搁了六天。他们住在几家破败的旅店里，与这座城市隔河相对。他们在夜里烧炭取暖，撑开雨伞遮雨。

沅陵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诚恳率直的老百姓，勤劳的天足妇女，还有新鲜的橘子和柚子——管这里工业品的价格是长沙的三

倍。一个学生问：「被雪困住的时候，除了糊弄小学生，对他们讲讲现实世界的事情，还能做什么呢？」[25]有一组人在周围的村庄调查社会问题。在接受采访的数百人当中，几乎没有人为地方官说一句好话。他们说，他们完全明白，日本是他们唯一的敌人，他们应该像城里人一样尽职尽责抵抗日寇，但他们指责区长、里长和保甲长，这伙人以国难为借口，趁机横征暴敛，假公济私。[26]

旅行团成员也有机会亲近其它逃难的学生。有一名团员听到庄严抑扬的歌声……原来是住在临近房间里的艺专学生的二部合唱。自从故都和西子湖——我们的两个南北大艺术城——沦陷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从火线下挣扎了出来，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27]

其它团员在破旧的旅店里发现了苟且之事。墙壁薄如纸，他们可以听到隔壁有人正沉湎于男女之事，这显然不是学生清教徒般的生活所拥有的。[28]

旅行团大部分成员被雪困在沅陵时，用驳船护送行李的小分队从常德到沅江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危险。刚走出沅陵县，他们就听见几个船夫在谈论上游的土匪抢走了他们的船只，这时距土匪还不到十里（三英里）。学生请求船主掉转船头，找个地方藏起来，但他拒绝这样做，除非额外付费。最后他把船驶向一条小溪，他们在那里躲了三天，食物都快吃完了，那时土匪已返回山里的窝巢。[29]

在沅陵，被雪围困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最后他们决定先乘汽车前往湘黔交界处的晃县。要找到容纳将近三百人的汽车队并不容易。起初，他们跟公路局商讨未果。3 月 11 日晚上，公路局代表通知旅行团领导，只要预先付款，他们就派八辆汽车来接运。于是，旅行团分成两组，第一组在次日清晨离开沅陵，第二组稍晚出发。[30]出发之际就拖了很长时间。旅行团原本希望在下一场大雪降临之前开始 231 公里的行程，于是在清晨五点就起床，可是只有五辆汽车和两辆运行李的卡车停在车站。直到上午九点半，有些司机才姗姗来迟，这时已开

始飘雪。

原以为坐车可以躲开土匪，比走路更安全，但事后证明却更不可靠。有一辆汽车出了故障，直到中午才抵达辰溪，这时距晃县还有三分之二的路。下午三时，汽车才修好，这意味着学生只得在芷江的汽车终点站吃晚饭，并在那里过夜。这时离目的地尚有一百余公里。翌日下午，他们才抵达晃县。第二组的行程更加惊险。轮胎轧过雪地时，有一辆汽车猛地一震。汉口版《大公报》记者戚长诚记下了他的印象：「愈往前走，雪飞愈狂……车厢里同伴们——临大同学——的谈话，也与雪花一般的纯洁。他们谈论着国事，他们敬仰领袖的神武，崇信领袖的忠贞。但，有时谈到几个官吏的贪污，也会燃起他们胸中的怒焰。」戚的思绪被不祥的「砰」的一声打断了。一只后轮滚了出来，汽车向公路边沿冲去。离深涧数英尺处，司机终于煞住车子。他告诉其它人这个地方叫做火烧坳，离辰溪还有二十多里（六英里）。其它司机也把车停下来，但眼看没有办法修理这辆严重受损的车子，便继续前往辰溪求援，留下二十名学生、地质学教授袁复礼和那位记者等候援车。

四个小时后，眼看没有援助的可能，他们又冷又饿，便收拾行李，步行去辰溪。下午五点，他们才看到地标——辰溪煤矿的烟囱。戚长诚和袁复礼利用始料未及的闲暇时间探访煤矿。在他们面前，一群十一二岁骨瘦如柴的男孩，打着赤膊，把装着手工凿出来的煤块的大筐运到灯光昏暗的坑道里秤重，但这些男孩无法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看到这一场景，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目光短浅的地方官对运出本地的优质矿产课以重税，这样便剥夺了贫穷地区仅有的出口利润。

翌日阳光灿烂，这是一周来遇到的第一个大晴天。被围困的小分队在早上八点离开辰溪，当天晚上六点到达晃县。[31] 晃县是座古城，但一帮地痞恶霸在数年前把它焚为平地，新城建在河对岸。即便如此，这座城市看上去仍是中国过去的一处遗迹。这座城市的两个旅馆既是匪巢，又是妓院。当地百姓异常迷信。小学生仍在学习四书五经等儒

家经典，刻有「皇帝万岁」的牌位仍然矗立在那里，而帝制早在二十七年前就已被推翻。

在晃县，旅行团陷入了长时间的争论。重行李还没有运到，那里面有他们唯一干净的衣服。有些人认为行李没有运到就不应继续前进。更糟糕的是，戚长诚在旅行团会议上透露，由于经费拮据，加上植物学家李继侗坚决反对机动车运输，学校当局放弃了租用贵州公路局汽车队的计划。第一大队有些顽固分子提出：只要黄将军承诺，三天后他们可以在巴宫镇等待行李到来，他们就同意参加第二天早上开始的步行。[32]

神秘的贵州

从晃县到贵阳走了两个星期。一路上景色十分单调，全是贫瘠的田地和裸露的山丘。几乎每天都在下雨。路越来越陡。当地人患有疟疾。学生比以前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正走进中国诡秘的腹地。北大中文系学生向常清写道：「自从进了贵州，我又像到了另一个国度。蒙蒙的雨，濯濯的岩山，红白的罂粟花，瘦弱的灵魂……谁知道什么年代起这地方的人就变成了这样苍白、孱弱和瘦削？我不信这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我彷佛觉得有一条蛇或者一只猛虎扼住了一个人的咽喉……。」[33] 贵州人对旅行团避之唯恐不及，好像这群人就是一支侵略军。乘坐卡车的先行者对村干部很友善，试图消除他们的疑虑，一些干部也告诉当地百姓，他们不必害怕这伙人。但有些干部仍顾虑重重，全体村民都逃到山里去了，直到这支队伍离开才回来。鸦片在市场上公开售卖，吸食鸦片的现象司空见惯，因为在家里天天呼吸这种空气，连小孩子都上了瘾。

红的、白的、淡紫的、粉红的，罂粟没有种在路边，而是种在离马路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有个当地人说，他这辈子就是跟毒品打交道的命，因为一出生就受到父亲鸦片烟的「熏陶」。[34] 在这个村子里，另一个俏皮的说法是，只有娘胎里的人还不会抽鸦片。

不过，这个县的领导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 年南京政府追击共产党到这里时，这些年轻人曾被任命为这条路的主管。他们看起来精力充沛，充满理想，乐于接受新观念。贵阳西部的一位县长特别引人注目，他毕业于中央军事学院，严禁种植鸦片。他带着毛瑟枪走进乡村，搜查横行乡里的恶霸和贪污腐败的乡绅，惩治其不法行为。他把这些学生当作贵宾，并派卫兵护送旅行团走了大约三十英里。六个月后，学生们在昆明得知这个年轻的改革勇士被枪杀了，他的寓所被当地一帮匪徒霸占。

在黄平（3 月 23-24 日），旅行团被邀请到一个村庄与苗民一起歌舞。黄将军献出了几桶白酒和许多饺子。李继侗教授和许医官参加了舞蹈，从来都很风趣的曾昭抡稍微喝过了头，跌跌撞撞，活像一个滑稽的醉汉。

尽管如此，汉人和苗民的关系还是相当微妙，仍然相互猜疑。一方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者，一方处在闭塞的内陆，在学生看来，当地百姓都很落后，而苗族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只掌握最基本的读写能力，只接受了汉族的部分价值观。奇装异俗使他们绚丽多姿，也使他们被认为是危险的。不管是不是真正的苗民，湘西和贵州的不法之徒通常都被称作「苗匪」。四十年后，一个在美国定居的老旅行团成员说：「他们就像印第安人，而我们就是白人，我们就像白人过去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对待他们。」[35]

贵州的自然奇观和历史遗迹让人赞叹不已。飞流百尺的瀑布，引人入胜的洞穴，还有 17 世纪赫赫有名的吴三桂的王国和 19 世纪 60 年代苗族大暴动的遗址。三位学生（一校一人）担任官方的史学工作者。他们搜集文字数据，到著名的地方现场调查，举凡风土人情、教育状况、行政沿革及其它任何能引起知识上好奇的东西，统统包括在内。[36]其它学生在教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社会学系学生调查农村状况，初出茅庐的政治学者采访县领导，年轻的经济学家根据当地生产状况和生活编写资料。黄钰生基本上是

「断后」，他常常跟着刘兆吉，围着一群老老少少，搜集地方民谣，六十八天行军结束之时，他已收集了两千多首民歌。[37] 昆虫学家毛应斗总是用捕蝴蝶的网追捕各种昆虫。植物学家吴征镒则收集当地植物标本。地质系学生展开田野调查，那里有丰富的化石、岩层和矿藏。地质学爱好者常常围着袁复礼教授讨论最新的发现。

几乎每个人都坚持写日记。其中最有条理的是曾昭抡，每天步行结束后，不管走得多远多累，他都会在烛光下记日记。只有清华大三学生查良铮的毅力与他不相伯仲，他带着一本小型的英汉词典上路，一旦记住了某页的内容就把这页撕下来。抵达昆明时，词典已经没有了，而他记住了大量词汇，赢得同伴的钦佩。[38]

一些学生抽空宣传爱国思想。工学院一小部分学生借助广播收集消息，尤其是抗战方面的信息，他们还向旅行团成员和沿途百姓宣传战况。在长沙时期成立的一个话剧团，通过演出唤起群众对丧尽天良的日本人的公愤。演出在每个大城镇举行，场场爆满。[39]

抵达贵州省会贵阳时，旅行团成员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了。白天背的背包早已从料想中的必需品减为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杯子、牙刷、牙膏、毛巾、备用的草鞋和毛衣。脚上起泡已成为往事。艰难的行程磨练了他们的身体，而贵州恶劣的天气使他们变得更加强壮。患病的学生几乎不再乘坐卡车——只有一次例外——几个病得很厉害的学生坐过轿子。粗略一看，他们成了一群吃苦耐劳的人。旅行团从贵阳的南门进城，当地市民惊讶地注视着这群年轻的小伙子——被太阳晒黑的面庞，被风吹乱的头发，衣冠不整，绑腿和草鞋上沾满污泥。实在难以想象，这些人曾经是年轻的书生，曾经衣冠楚楚，曾经娇生惯养，曾经盛装华服漫步在平津的街头巷尾。

贵阳与北平相距甚远。在那座文化古都，落后的贵阳简直不值一提。只有极少数贵阳青年的名字出现在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新生注册簿上。但是，经过 38 天的跋涉，在长沙以西 1,007.5 公里处，拥有 127,220 人的贵阳俨然是一座大都市。这座城市实际上有两条大道

——中华路，东西向，长 1.5 公里；中山路，南北向，长 2 公里。这两条街道在「大十字」交汇，那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大街上是一片坑坑洼洼的黄泥，嵌着光滑的石头。街道两旁排列着柱廊整齐、墙壁雪白的三层楼房，其中很多幢都是前不久为迎接蒋介石而仓促建立的。[40]

商场物品琳琅满目，价格高得离谱，学生不失时机地发现了当地的美味。他们在街边的摊位上贪婪地吃着肠旺面——伴有鸡肠鸡血的面条，还有整碗辣椒酱，吃得大汗淋漓。在饭馆，他们品尝了贵阳特产娃娃鱼（因哭声像娃娃，故得此名）和茅台酒。有些人出席了周六晚上的古典音乐会。不妙的是，有人评价道：「五音失调，非常恼人，只适合笨蛋听。」[41] 教师护送团得到了较好的招待。到达贵阳的当天晚上，周诒春设宴招待了他们。周氏曾于 1913 至 1918 年担任清华学校校长，时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第二天晚上，他们受到大夏大学的宴请，该校新近从战火纷飞的上海迁移到贵阳。

贵阳年轻的姑娘最为引人注目。行军途中，学生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想这些事情，但在贵州，他们突然意识到身边有女孩可以打量、可以交流，这是多么重要。突然间，他们周围彷佛都是妩媚的都市女孩——她们头发卷曲，精心打扮，可爱动人。有时候，学生和老师都会站在商店里一动不动地盯着女售货员。在这座城市的三天时间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平时更渴望满足性的需要，其实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男女之间表达感情顶多就是牵牵手罢了。对于学院中的绅士来说，逛妓院更是匪夷所思。在旅行团成员当中，我们只知道有一名厨师得了性病，而他是庆祝行军结束后在昆明的一家妓院感染淋病的。[42]

贵阳以西，这个国家空旷而荒凉。在无限延伸的荒寂的道路上，只能听到鸟鸣和潺潺的流水声。旅行团偶尔会遇到几个当地苗民，通过独特的头巾可以辨认出他们所属的支系。有些地名蕴含了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斗争的历史，如安东（安抚东部）、安南（安抚南部）、安

平（安抚平靖）和普安（普遍安定）。有些表意文字已发生了变化，比如原来的「平夷」（意谓「平定夷族」），已改为「平彝」（意谓「和平安定持久不变」），以免得罪当地少数民族。在安顺（平安顺从），有一群人参观了火牛洞，回来后异常兴奋地谈论溶洞景观，以至于包括厨师在内的所有人都去一睹奇观。参观过程中，从洞里传来在美国风行一时的〈胡安妮塔〉（Juanita）和人们始终喜爱的〈桑塔・露西亚〉（Santa Lucia）的回音，两首歌都是一个男低音用英语唱的。唱歌的是闻一多，他用歌声赞美大自然的奇观。他大声说，「到了镇宁县，不去火牛洞，等于没到此一游。」[43]

第二天，即 4 月 9 日，星期六，是越过险峻的关索岭的日子。作为颇有经验的惯于翻山越岭的跋涉者，他们决定不走十公里曲折的公路，宁愿走四公里陡峭的小路，这条路似乎是垂直伸向山腰的。仅仅走了二十米，他们就感到精疲力竭；爬上三百米时，他们已口干舌燥；此后每爬十到十五步，他们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半路有座关帝庙。他们欣喜地发现，先遣队已经乘车经过，并在那里准备了充足的开水。有个学生还记得，喝水就像喝山泉那样甘甜，就又猛喝了五碗，这时才发现那水又脏又黄。[44] 在庙里休息过后，他们继续前进，爬到关口，石头上刻着四个大字：「滇黔锁钥」。这一刻值得铭记在心。一位团员写道：「仰登飞鸟道，俯视万峰低。」[45]

尽管攀登关索岭十分费力，但 4 月 9 日的艰苦与 11 日的磨难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夜里在永宁临时宿营，他们走上了泥泞湿滑的道路，穿过与人齐高的草地，到达湍急的盘江渡口。令人失望的是，康熙年间（1662-1723）著名的铁索桥已破烂不堪，因此不得不坐仅容五六个人的小船过江。到达对岸，爬过数十公里陡峭的山路后，他们发现预计过夜的哈马庄只是一个衰败的小村庄，坐落在山顶上，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虽然太阳已经西斜，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再走九公里到达安南。在路上，一些幸运的团员发现有个小摊出售开水和一种由糙米和糖水做成的糍粑。走得最快的人日落时抵达安南，走在后头的人天黑以后才赶到。这一天走了三十四英里，他们

期盼吃顿热饭，睡个囫囵觉。不巧的是，铺盖和炊具都在盘江东岸，等待从昆明出发的三辆卡车前去装运，可卡车还在西岸。

厨师迟迟不到，安南的饭店却已早早打烊。这就是觅食者的处境。有一伙人找到一家面馆，老板看到很快又来了两位顾客，便把原先四个人吃的面分成六份，价钱却分文未减。学生无力抗辩。但是，当这群外表粗犷的青年告诉老板，他们有二十多个人晚上要在他的客栈餐桌上过夜，他也没有吭声。[46]

对于大部分学生，尤其是那些夜里十到十一点钟才踉跄着赶到安南的团员，情况更加糟糕。这群人又冷又饿，心烦意乱，他们聚在县办公楼狭小的寓所。县长单独请教师辅导团的先行者吃饭，几乎引起一场骚乱。批评的矛头直指「两位姓黄的」——黄师岳将军和黄钰生教授。黄教授纪律严苛，脾气暴躁，说话尖刻，常常羞辱敢于顶撞他的人。他坚持步行，从不坐卡车，也不曾干过其它以权谋私的勾当，起初给大家留下良好的印象，但他带着两个不守纪律的侄子。这两人当中，那个情绪易于激动、横行霸道的航空学院退学学生更是令人难以容忍。在长沙，他和他伯父住在一起。一天晚上，他不停地拳打一个批评他伯父的北大学生。焦躁不安、疲惫不堪的学生便拒绝前行，直到黄将军发了一封电报给学校当局，建议撤销黄教授的领导职务。

闻一多、李继侗和曾昭抡这几位教授也跟学生一样，备受煎熬，整夜没吃没睡。那个县长勉强平息了学生的怒气。第二天早上，黄教授用车把两个侄子送走，并对旅行团全体成员道歉。这时，装备运到，休息两天，这两件事大大鼓舞了士气。在此期间，学生组织了一次游行，庆祝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

从这段旅行一开始，团员与黄教授之间的摩擦就慢慢产生出来，终于达到非作出决定不可的地步。旅行团成员已忍受了崎岖的道路、恶劣的天气和土匪的谣言，他们的情绪难免会受到私人冲突的影响。第二大队的队长卓超少校以长有痔疮为由，总是和厨师一同乘车。「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毫无疑问，所有军训教官都是懦夫。」一位

团员回忆道。学生认为，这些教官骗取了这份工作，因此可以不上前线打仗。学生鄙视教官，不听他们的指挥，中队长和小队长也很少传达命令。[47]

身为老派军人，黄将军及其部下有时很难与青年书生建立融洽的关系。打桥牌的问题就是双方误解的一个象征。玩桥牌是学生很喜欢的一种消遣。在教官眼里，所有的纸牌游戏都是赌博，沉湎于桥牌仿佛就是青年的道德缺陷，所以他不许他们打牌。学生对此不予理会。更狂热的打牌者会匆匆赶完他人花两倍时间才能走完的行程，找一方便之所打牌，直到最后的人都经过了，他们便收好牌，快速出发，赶超最前面的团员，然后故伎重演。[48]黄将军得知这个把戏后，便召开大会宣布这种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学生嘘声四起，黄将军遂沉默不语。

旅行团继续前进。日复一日，他们在贵州的深山老林中穿梭，脾气不禁暴躁起来。有个学生在日记里埋怨，「铺伴」不是理想的共享被褥之人：「打行李、背行李都不能做，概由余『任劳』，『任劳』太久，不免生『厌』。余有拆伙之意，然又不好意思启齿。」九天之后，他们抵达贵阳，那个记日记的学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了：

今天他借口脚痛，乘汽车先到贵阳市，行李也不管，床位也不问，就进城玩去了。我来后，好半天才找着行李，因无床位，不能打开铺盖卷儿，衣袜鞋均湿了，也不能换。老等他，真气死人！这种人什么都不行，也是国宝么？[49]

连毛鸿中校的德国牧羊犬都成了出气筒。毛鸿强制执行军事纪律惹人厌烦，有个中队长终于爆发了：「你该死的狗吃了那么多东西！如果想教训学生，为何不先教训你的狗！」[50]

如何处理旅行团剩余的资金，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由于黄钰生过分节约，旅行团两个月的开支还不到一万块钱，所以留有余款。一些学生想平分这笔钱，另一些人想把钱捐给战士，还有一部分人想为旅行团留下照片，并出版纪念册。旅行团到达昆明时，这个问

题仍悬而未决。[51]

阳光灿烂的云南

4 月 19 日，距旅行团第一次在长沙码头集合恰好两个月，他们抵达通往云南的关口。跨过这二十码，土地的颜色将由深灰色变成红色。前方，他们可以看到云南蔚蓝的天空和起伏的白云；身后，则是贵州云遮雾罩、阴雨迷蒙的层峦迭嶂。几分钟之内，耀眼的阳光洒在旅行团成员身上，就像它普照云南高原洒向昆明一样。在云南，连植被都和别处不一样。贵州是成片令人眼花撩乱的罂粟地，云南则是明艳的麦田。青山上种着芳香四溢的尤加利树。云南不仅土地更肥沃，公路也比贵州修得好，而且几乎看不到土匪的踪影。

然而，短时间即可发现云南黯淡的一面。虽然路边看不到鸦片，但不远处就种有大量的罂粟。云南的一贫如洗、营养不良和贵州一样明显。大脖子病几乎随处可见。土匪虽然没有湘西那么猖獗，但仍是一大隐患。还有，与贵州年轻英俊的地方干部相比，云南的地方官看上去多半都是瘾君子。他们虽然也很热情，但总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在云南第一个留宿地——平彝县，顾（音）县长派人宰了几头猪，举办盛宴款待旅行团。第二天晚上，旅行团厨师利用主人提供的原料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但是，这位县长的慷慨是以牺牲当地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他派员警向每家每户征收一块钱——得知这个消息后，学生异常愤怒。顾县长的热情招待是为了响应龙云的指示，他要求款待旅行团，但没有交代由谁承担费用。[52]黄将军有理由勃然大怒，但他不敢对龙主席的部下发火。鉴于龙云的重要地位，流亡知识分子还得仰赖于他，所以他付给顾县长三百块钱，并客气地恳求他把钱退还给当地百姓。

旅行团很快重新踏上旅途，这时离昆明还有一百多公里：

……公路两旁有水有田，山间松林翠绿，池畔野草清香，农夫们在田间漫步，哼着轻快的小音调，极眼是和平的世界。忽然，从山间

飞来了乌云，一片片如龙如虎，接着狂风也来了，老鹰在灰色的空中盘旋，巨树伸着掌向山间探索，似乎在搜查什么罪恶，路旁的电杆也嗡嗡乱鸣了，于是，一声霹雳接着一阵大雨。人们投到了巨树的掌握中，世界顿时变成了残酷凶狞的地狱。

一会儿风停了雨也停了。远远的山头上显露了一片阳光，渐渐展大了，金黄色向我们这边延长……默念着这一曲自然的「田园交响乐」，忘却了全身淋漓。[53]

他们意识到旅程即将结束，不禁生起一种成就感和怀旧之情。旅行团的一名老队员还记得他的旅伴：蓄须的闻一多蹲在路边抽着长烟斗；曾昭抡从不抄近路，却宁愿绕行著名的「二十四盘」，要么带着防毒面具，这是他为即席的「战时教育」讲解防毒防空准备的；南开学生彭克诚不善辞令，深沉的男低音掩饰了他的绰号——「大哑巴」；第二队中队长全广辉，清华颇受欢迎的跳高选手和篮球队队长，步伐阔大而稳健，登山如履平地；十九岁的何广慈，擅长中西音乐鉴赏和表演，有人叫他的外号「小孩」时，他总是咧嘴一笑；范中廉，低音长笛和短号的演奏者；微胖的刘维勤，被戏称为「刘得屁」，因为他总是拉在队伍最后面。[54]

4 月 28 日，一位旅行团成员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天是这次徒步旅行的最末日——当我写下这几个字，心里实在黯然的感到难过！……这与我共同生活两个多月的团体，今天要走上解散的悲运了！……我不能忘记关岭，那崇高的山；我不能忘记盘江，那急流的水！……它们已经在我心里，镌刻了永不能磨灭的影子！……然而，在前面，却又有一个静待我去奋力开发的伟大的将来在向我招手！

在开始最后一段行程之前，旅行团于早上八时集会。黄师岳团长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黄钰生教授报告了学校的最新消息：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大」。为了给可能迎接他们的

年长的老师、同学及昆明市民一个良好的印象，他们穿上了干净整齐的衣服，并宣誓抛弃他们在公路上的粗鲁举动——色瞇瞇地盯着女孩，大喊大叫，以及诅咒。随后，他们戴上军章，阔步向昆明迈进。

昆明

走到城中心区，抬头一看，金碧辉煌的立着「碧鸡」、「金马」两座大牌，不禁使我忆及那已沦陷的可爱的古城——北平！太太小姐公子哥儿们，大家也想想北平是怎样丢的呵！……现在，梅、蒋两校长和好些教授及同学，举着欢迎的大旗，来加入行列，引导我们去「欢迎地点」了……[57]

接着，丝绸横幅展开，上面写着「欢迎湘黔滇旅行团」，从其它路线来到昆明的老师和学生，唱起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谱写的歌曲。第一段是用英语写的，用的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的曲子：

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
It's a 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
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
Goodbye Shengjing Xueyuan,
Farewell Jiucai Square,
It's a Long Long Way to Kunming City
But my heart't right there![58]

〔「联合大学（Lianhe Daxue）」即西南联大，「圣经学院（Shengjing Xueyuan）」是长沙临时大学本部所在地，「韭菜园（Jiucai Square）」是圣经学院所在地。——原注〕

戴上花环后，队伍穿过昆明城到达北端的圆通公园。黄将军对梅贻琦说：「我在长沙从你手里带走了两百多人。现在我把他们还给你。根据名单，所有人都在这里。」然后，点到名字的学生就敏捷地应一

声「有」。梅贻琦答话。清华体育部主任马约翰带头欢呼，「伟大的中华民国万岁！」然后是照相、聚餐，欢迎仪式就结束了。

长征的意义

联大学生的长征并非独一无二。数月前，联大未来的训导长查良钊带领一支相似的知识青年队伍去西北联合大学。此外，如浙江大学长途跋涉抵达贵州。[59] 但联大的成就的确令人瞩目。根据官方的资料，从长沙到昆明的陆路距离是 1,033.7 英里（1,663.6 公里），其中 800 多英里是走下来的，平均每天步行二十余英里，共走了四十天。长途跋涉的行程多为崎岖地带，且天气恶劣。对未曾准备接受这种艰苦的身体考验的城市青年来说，这是一个非凡的成绩。

这次长征是教育上的探险。这群青年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在这六十八天里，他们经过了中国二十八个省中的三个省，深刻地认识到祖国幅员之辽阔，并意识到中国现代的沿海城市与落后的内陆地区在时间、空间和思想观念上存在着惊人的差距。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百姓——这些人赤着脚，不识字，抽鸦片，住在简陋昏暗的茅棚里，以谷物和蔬菜勉强度日。直接遭遇贫穷的农民、瘾君子、部落民和秘密会社的成员，对于少数「天之骄子」来说，这是一次大开眼界的体验。在湘西茶馆休息时，有些团员问老人，为什么这个地区会有那么多土匪。答案令人不安：「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里就抓过好几次壮丁。五个壮丁当中有四个被抓走了。他们被迫当兵。那些不想当兵的人就逃到山里去了。」[60]

然而，路边的邂逅只是消除中国学生与平民大众在社会、经济、思想上的隔阂的开始。经过军队数十年的剥削、压榨和劫掠之后，当地百姓对任何外来群体都小心翼翼。如某人所说，「当土匪来时，他们会砍掉我们的头；当蒋介石的部队来时，他们会剃掉我们的脑袋。」有什么理由让他们期望这群新来的侵入者比以前更好呢？即便他们认识到这些人是学生，不是士兵，但他们对有钱人的愤恨使学生无法

获得友善的对待。有些敌意完全是由于对农村风俗习惯的无知或疏忽所致。学生没注意到旁边有农村妇女，就赤裸着身子在河里洗澡，或无视当地人的规定——不许在唯一的饮用水水域使用肥皂。[61] 在主人家里，旅行团成员往往连「你好」或「再见」之类的话没说就离开了。

必须指出的是，旅行团成员学到了许多知识。比如，黄钰生就琢磨，为什么刘兆吉所搜集的民歌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情歌呢：

有一次，我和几个挑棉纱的人同行。他们的担子，都在百斤以上。我跟他们走了一天，他们整整唱了一天……他们所唱的，是……情歌。又记得，在将近盘江的荒山中，遇到一群……驮铁锅……的人。山路难行，一步一喘，但是喘嘘之中，还断断续续；地唱些……情歌。这些人是在调情么？是在讴歌恋爱么？是在宣泄男女之情么？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唱一唱，似乎可以减轻筋骨的痛苦。再听人一唱，也觉得绵绵长途上，还有同伴，还有一样辛苦的人。他们所唱的歌，与其说是情歌，毋宁说是劳苦的呼声。

有个名叫高廷章的学生曾经历过贫穷，但即便如此，他仍是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从缄默的贫民当中发现一种预警：除非蒋介石政府为他们办实事，否则共产党会取得胜利。[63] 但没有证据表明，高廷章的许多同伴意识到，在他们徒步穿过内陆之时，中国社会正开始发生剧变。实际上，他们的大部分见闻都在证明国民党统治的可行性及其光辉前景。中央政府新任命的贵州青年干部精力充沛、效率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何键在湖南、龙云在云南的委任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学生经过的贯通湘西和贵州崎岖地带的公路，就是由南京政府精心设计建造的。蒋介石本人被拥戴为神武的抗日领袖，在爱国的群众当中仍享有崇高的威望。

但是，假如有学生看穿所见所闻的政治内涵，许多人可能就不会发出这种疑问，更别提它所暗示的答案了。他们虽然像旅行者一样生活过，但只是以游客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正如闻一多所注意的，他们印象最深的，不是每天都看到的普通百姓，而是壮美的奇观、历史

名胜以及苗人奇异的服饰、风俗和方言。[64]

历史总是推陈出新。现在，半个世纪过后，已很难估计这场长征对参加者的影响。在中国和美国采访那些日益年迈的旅行团成员时，他们会带着今天的视角看待过去。那些在中国生活的人倾向于把这件事当作一次经历，它使他们认识到平民百姓的苦难，从而决心走向革命的道路。在美国过着舒适生活的人，则倾向于贬低这一经历的影响。

从声名最著、文献最丰富的旅行团成员闻一多身上，就显示出准确评价这次长征的困难。六十八天的行军生活更加深了他与劳苦大众在一起的亲切感，可是，他一抵达昆明就回到了学术象牙塔。直至 1943 年，他才开始转向政治活动。虽然这位中年教授看到国民党的碉堡，被蒋介石的部队夷为平地的村庄，墙上的革命口号，及血洒战场的红军战士之墓；但是，闻一多以前的学生、为他立传的王康说：「闻一多那时的确不了解革命斗争，很难理解革命战士们的英雄气概……共产党的队伍究竟是为了什么忍受那样的千辛万苦呢？暂时是回答不了的。」[65] 在王康看来，闻一多的理解不是源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分析，而是出于诗人的悲悯情怀：

他同情、怜悯这些苦难同胞，他见到在饥饿死亡在线挣扎的惨状，但还不能为这些人找到什么出路。……这都是由于抗战，有了这样步行的机会，才会见到从来不曾见过的苦难的事实，才会引起这些从未有过的疑惑。[66]

这次经历虽然没有使闻一多立即投身政治行动，或利用武力反抗现实，但这次行军为他向这条道路发展创造了条件。回首往昔，我们可以看到，从长沙到昆明长途跋涉的第一步，使他走向了殉道之路。

在学生团员当中，又有多少青年闻一多呢？他们都看到了他所看到的。许多人感到震惊，少数人投身于或再次投身于反抗现状的斗争。但是，就在选择徒步前往昆明时，他们拒绝了更加激进的选择。大部分坚定的积极分子投奔延安加入共产党，或参加国民党的军队，或留

在长沙发动群众。旅行团成员宁愿独处书斋，也不愿投笔从戎，啸傲疆场。他们的目光停留在所经过的路途，可是并没有深入一贫如洗的农村。他们的使命是完成学业，为民族复兴这个长远目标锻炼才智。战后，他们将建立一个贫穷、饥馑、苦难无处存身的新中国。

从长沙到昆明的长途跋涉，它最深刻的影响，可能不是近三百名团员后来的工作，而是这所大学的校风。通过已出版的文献和口述资料，长征的现实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旅行团老成员传播他们的日记，写成散文和诗歌，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于 193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旅行团成员搜集的民歌、民间传说及岩石、植物和昆虫标本，丰富了昆明有限的学术资源。在云南的前几年，由于高年级同学自豪地穿着印有「湘黔滇旅行团」字样的衬衫在校园出没，联大学生会经常想起那次坚苦卓绝的跋涉。联大在昆明八年，无数学生用自己的长征加入这所著名的大学。

毛泽东从江西开始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与此相同，从长沙出发的长征对联大精神至关重要。这次长征是一次坚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

三 蒙自的魅力

与其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中国谚语

四月底，包括少数教授在内的旅行团抵达昆明。有些教师及其家属乘坐包车穿过内陆，可以欣赏广西乡村壮丽的溶洞，经过桂林、柳州和南宁到达河内，然后乘火车到昆明。由二十八人组成的队伍，其成员大都与中央研究院有关，他们于 1 月 12 日离开长沙，随后是两批临大教师。其中第一批由衡山文学院教师组成，出发时有十七人，十四人同时抵达昆明——冯友兰在一个大热天不小心把手伸出车窗外，汽车穿过拱门时与之相撞，幸亏只是挫伤，两位同事便暂时留在河内的医院照料他。[1]

大约有八百名师生走铁路——海路路线——先乘火车到广州，接着到香港，然后从香港乘船到海防，继而又乘坐火车经河内到达昆明。除了女生一律不参加步行外，许多年轻的男生和大部分教师也选择这条更安全的路线。在第一学期结束后，一群群学生自行乘火车抵达广州市郊的岭南大学，等候由四名广东人组成的小组安排护照和通行证，负责人包括北大西语系系主任叶公超和生于夏威夷的清华英语系教授陈福田。在学生当中，除了在香港有亲朋好友的人和手头宽裕的人，其它人在繁华的、高消费的香港只过了一夜。[2]

由美国传教士基金建立的岭南大学以满足海外华人的需要为宗旨，宿舍便宜舒适，环境优美宜人。北方来的大学生侵入华南这块「飞地」时，他们并不很受欢迎。有些北方人喜欢在房间里唱京剧自娱，还有胡琴伴奏，而许多岭大学生对这种奇怪的噪音颇为讨厌和愤怒。但离别之前，这些外来者粉墨登场演了一场京剧，赢得当地学生的欢心。[3]

三月底，通行已安排妥当，计划在两周内让所有人从香港乘船到

海防。最后一批在四月中旬启航。[4] 在海防下船后，当地接待委员会在越南籍清华大三学生陈文辉的协助下，加快了安置学生的步伐。通过清华老同学的关系，中华理事会（China Council）会长罗维奇（音）同中国领事与当地政府、海关、铁路部门的官员协商联系，数百名教师以惊人的效率在海防来回。[5] 中华理事会把停留在河内的学生安排在包济医院（音）打地铺——他们很乐意离开那个炎热、潮湿、阴暗的地方。[6] 在那里学生听说云南流行甲状腺肿，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使得他们冒着酷暑到商店购买海盐，直到把行李塞满为止。[7]

火车从海防、河内攀上红河谷的速度慢得令人心焦。列车缓慢地经过平坦的稻田，似乎沿途每个淡黄色的法式小站都要停靠——当天停了三十多次——而且每个车站都酷热难耐，近视的旅客看见彷佛跟他们一样瘦弱的男孩——这些小贩叫卖茶水和香烟，吃力地拖着硕大的水壶和竹烟斗。列车不提供任何餐饮。在河内北部行走了数小时后，火车开始爬坡，最后看见铁路两边都是雨林里茂密的灌木丛和无数的硬木。空气潮湿而闷热，所谓车站，只不过是丛林中的一片空地。旅客看见成片的棕榈树和香蕉林，间或有小木屋，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上结满了奇形怪状的橘子和黄色的热带水果。[8]

晚上，火车到达滇越边境老开（Laokay）。美国作家格雷哈姆 • 帕克（Graham Peck）这样形容当地的景色：「碧绿的河床上矗立着几幢刷得雪白的建筑，颇有欧亚风情。」[9] 每天夜里，火车在毛姆笔下的这条铁路上停下来，所有旅客收拾行李下车。

老开实际上只是半个边城，另一半是对面的河口，它们共用一条大街，有桥相连。在河口由雷树滋（对云南非常了解的一位联大教师）及其助手、清华大四学生张起钧组成接待处。每晚火车进站，他们就过桥迎接任何一位可能还逗留在车上的临大教师或学生，并安顿他们过夜。翌日早晨，他们又去护送师生过桥，帮助办理所有入境手续，把他们送上火车继续前|进。雷、张有时会邀请亲密的朋友多住一两天。作为当地知识分子——小学校长——的客人，他们可以免费住宿。[10]

火车从河口蜿蜒进入云南山区，爬上陡峭的山坡，经过哗哗作响的瀑布，穿过桥梁，出入隧道（从河内到昆明共有 177 座），最后出现在云贵高原上。夜里，火车停在开远站。开远是铁路沿线的一个小镇，有大量法籍越南人，富裕的游客可以住别墅（de Compagnie Bungalow），享受精心烹制的法国菜肴，只要他们愿意支付越南币。[11] 大多数学生都寄宿在比较便宜的住所。第二天一早他们再次踏上旅途，当晚火车终于气喘吁吁地抵达昆明，行程五百余公里，这时离开河内已整整三天。

许多通过海路和铁路到达昆明的学生去迎接走陆路的旅行团。自然，免不了彼此问长问短，还有催人泪下的重逢。但有时候，关于胆小的同学的「磨难」听得越多，骄傲的跋涉者就越瞧不起他们。与老朋友相遇之后，旅行团一位队员（长沙记日记者）坐下来，认真地写日记严厉地批判走海路者，言词尖刻。他们在广州和香港的日子或更多的空闲时间都在做些什么？在「五四」和「一二・九」的精神下，他们趁机开展抗日爱国宣传运动了吗？根本没有！相反，他们每天出入于豪华宾馆和剧院。连唱歌也蔑视救国歌，唱的竟然是英文爱情歌曲！在香港和印度支那，他们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收购日本便宜货，昆明朋友看得眼花撩乱，受到当地华侨的指责。没有比辱骂他们是「高等难民」更刻薄的话了：「这些无耻的东西，无赖，上个世纪的渣滓！你们受过高等教育吗？你们是『国宝』吗？」[12]

对文法学院数百名师生而言，旅途的终点不是昆明，而是蒙自。蒙自位于昆明南部距安南（今越南）边界的路途 3/4 处。滇越铁路以西，开远站南边的碧色寨岔出一条窄轨支线——个碧石铁路，其终点是个旧和石屏。通过这条支线可以到达蒙自。

决定把这两个学院临时设在蒙自，跟当时把文学院设在衡山一样，都是因为校舍不敷使用。像长沙和昆明这样难民遍地的省会城市，根本不可能一接到通知就能安置一所超过千名教师、职员和学生的大学。选择蒙自安置部分人员似乎是个巧合。根据蒋梦麟的说法，这是

他在昆明街头邂逅的一位联大教授的朋友的建议。这个人是碧石铁路的一名雇员。他告诉蒋梦麟蒙自有许多闲置的房子，并催促他去看看。

蒋梦麟在蒙自找到的住处，是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1889 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败北，被迫签订条约，同意开放蒙自为通商口岸，与列强贸易。海关大楼和法国领事馆耸立在城墙外。然而，1910 年开通滇越铁路并建成通往蒙自的支线以后，这两个机构都搬到小城的另一边，也就是火车站附化近（后来移往昆明），这样原先的房子就空下来了。这些闲置不用的房子条件很好，这正是蒋梦麟所寻找的。

蒙自有铁路连接，交通便利，城镇很小，万一发生空袭撤离也很容易。蒋梦麟最初打算把蒙自让给工学院使用，但院长施嘉炀看过之后，认为当地不便安置科学研究必需的仪器和设备，这样蒙自就被用来设置文学院和法商学院。[13] 原计划这两个学院在那里待十五个月——到 1939 年秋昆明城北新校舍竣工为止。[14] 实际上，海关大楼后来被空军学校征用，联大可以在昆明租借临时校舍，这样一来在蒙自逗留的时间便缩短为四个月：1938 年 5 月到 8 月。

穷乡僻壤中的先锋队

尽管有铁路相通，但蒙自仍是一座沉睡的小城。它的人口自 20 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大约有一万人，与周边的乡村大体相当。在城里，一条没有铺地砖的街道成为公共生活的中心，那条街上有一家银行、一个邮局和几家商店，这些房子是用黏土或木头盖的。许多房屋都是传统的官府式大门，漆成朱红色，饰以圆铜门环。只有一月两次的集市到来时，蒙自才从梦境中苏醒过来。届时，农民、工匠和商人会把各自的货物铺在路边，苗人和彝人用手势与汉人讨价还价，街上熙熙攘攘。此后，买家和卖家可能聚在城里的小饭馆吃一顿便饭。夜幕降临，恢复宁静，继续平淡无奇的日子，直到两周后集市再次来临。[15]

城外有个南湖，更确切地说，是南湖的湖床，因为联大师生到来时已是干季的后期，湖里没有一滴水。在城墙和湖的一角之间有座海关大楼，联大教室就在那里。在海关大楼区，联大象征性地每年缴纳一美元租金，就可租用银行大楼。与法国驻上海大使馆通过一连串电报后，法国允许联大无偿使用领事馆大楼，但只能用作公共活动场所，不能当作教室或宿舍。为安排男生住宿，联大当局在附近租借了几栋小楼，后来获准翻修破旧的法国医院作为宿舍。在城墙外面，海关区不远处，有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阳台全部用熟铁铸成。这栋楼属于一位犹太希腊商人，他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歌胪士」。联大便租用歌胪士洋行作为教师宿舍。一栋带有围墙的大公馆是周柏斋一家的。周氏是个富有的锡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馆的一面租给联大，用作女生宿舍。[16]

联大的校舍集中在小城东边，来往很方便。从女生宿舍穿过东门到歌胪士洋行步行只需五分钟，从洋行到海关大楼也是五分钟。海关区围有一个宜人的公园，公园里有一块开阔的草坪，种着尤加利树、芒果和木瓜。园里还有一条灌溉渠。月光透过丛林洒在园子里，夜色尤其美丽。扫兴的是，在白天由于数百只白鹭就栖息在公园门内的尤加利树上，有时会有煞风景的东西落下来。女生用书遮着头经过。当可爱的白鸟落下「不可爱」的白「炸弹」时，她们发出尖叫，引来驻足旁观的男生的嬉笑。[17]

隔着周家公馆坚实的围墙，四五十个住宿者在一楼宽敞的房间用餐。晚饭过后，有人会点燃两盏硕大的煤油灯，食堂就成了自习室。上面两层楼各有一间大寝室，里面摆放着十数张上下铺双层床。每个女生配有两只木箱，可以用来装书和个人用品；所谓桌子，其实就是把木板水平固定在床架末端；还有一根天黑以后用来照明看书的蜡烛。夜晚令人心惊胆战。透过烛光，女生可以观察到爬过窗户的蜥蜴肥白的腹部。春风从黄昏一直吹到天亮。担心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思乡的女孩听着呼啸的风声直到远山外晨曦初露，她们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因此，她们管它叫「听风楼」。[18]

对于在现代沿海都市长大的年轻女孩来说，夜风不是唯一使她们内心难以平静的因素。她们每次出入周宅，都会遭遇看客好奇的目光，这些人住在方圆几英里之内，他们前来探察初来乍到的陌生人。当地的女性得撑着雨伞遮着面孔才敢出门，赤脚的苗民穿着打满补丁的裤子，她们驻足观看，指指点点。要是联大女生敢冒风险，穿着高叉旗袍和肉色丝袜走进拥挤的商店或餐厅，她很可能发现有一只手悄悄地伸到她的大腿下——不是下流的老男人猥亵的手，而是妇人或孩童的小手——她们只想看看，这些极有教养的女知识青年在充满诱惑的外套下面是否穿了什么东西。

女大学生的穿著和举止成了小城居民与大学师生关系的焦点。蒙自还没能准备接受现代女性。当地几乎没有女孩小学毕业，中学是为男孩专门设立的，几乎没有人上过大学。未经媒婆的介绍，青年男女不敢相互交谈；而做媒是订婚、结婚的前奏。在当地百姓看来，联大男女学生并肩行走是大逆不道之举。不止一对无辜的情侣外出散步时被暴怒的警察拉到路边拳打脚踢。如果一对男女在田野徘徊，表达爱意，他们可能发现怒气冲冲的农民正拿着老式火枪对准他们。

由于边远地区大都有小偷强盗，当地人差不多都备有武器，因此，即便是白天，走在乡间也颇为危险。在外文系任教的英国青年诗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在乡村散步时就被洗劫过好几次。海关区的图书馆在天黑以后开放，但每个钟点都会敲钟提醒完成功课的学生，持有武器的护送者已做好准备陪同他们返回宿舍。

北大心理学教授樊际昌是蒙自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处理与周边群体关系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然而，在一次访问期间，梅贻琦亲自解决问题。在学生大会上，梅贻琦提醒大家注意，如果联大女生的衣着冒犯了当地人的感受，男女学生违反传统习俗牵着手散步，很可能会引发摩擦。他宣布，从此以后女生该穿朴素的蓝布大褂，男生该穿哔叽布制服。他的努力得到了「正风团」的支持，这群学生保证限制同学间的亲密举动。[19]

生活和学习

除了没有日军的空袭，蒙自的学术环境比他们在长沙时期更加糟糕。由于图书馆少量藏书大部分还在从湖南运往昆明的途中，因此教材和参考数据都少得可怜。图书馆本身的空间极小，仅有十七个座位。开馆前半小时，学生就站在门外等待，开门后立即抢阅书刊、抢占座位。[20] 师资力量也受到限制。许多原先在长沙任教的老师转到其它大学，或进入政府部门，或回到家乡。有些教师因战时运输困难而延期抵达，或滞留在外。法律系只有蔡维藩一位教授按时到达蒙自。他时年三十三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在北大任教八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蔡氏工作一丝不苟，但他很快发现无法承担所有重任，于是革新教学方法。他以学生自学取代讲授，以报告和论文代替考试。在一个长期以来注重死记硬背的国家，这种教学是大胆的尝试。结果，他成功了。与那些通过传统的课堂学习的毕业生相比，他的学生更胜一筹。[21]

其它系的教师阵容更为强大。例如，历史系有陈寅恪、姚从吾、毛子水、刘崇鋐和钱穆；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和刘文典；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和李卓敏；政治学系有张佛泉、崔书琴和王化成。在冯友兰和罗庸等学者的主持下，在衡山建立的哲学研究会恢复活动。[22] 学生簇拥着去听优生学家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红学大家」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的专题讲座。钱穆的「中国通史」即使在早晨六点到七点上课，仍然很受欢迎。身穿传统的蓝布大褂，脚穿布鞋，戴着黑边眼镜，这位年青结实的教授不带讲稿踏上讲台，娓娓地讲述中国的历史。浓重的无锡口音，加上手势和肢体语言，他使繁复的历史场景变得栩栩如生，巧妙地把入迷的听众引进另一个时代。[23]

教授们住在不同的宿舍。少数教授带着眷属来到蒙自，他们对「服务问题」颇有微词——当地女工又懒又笨，指挥不灵。[24] 单身教授或者几个人同住在小镇附近，或者在富户人家租房，那些富人为能够与著名学者同处一屋而骄傲。有些人与系里的同事共居一室——哲学家

郑昕与贺麟，政治学家张佛泉与崔书琴。在一个雅致的公馆里，院内有石狮，石狮顶着红漆廊柱，当潘光旦一瘸一拐地走下狭窄的楼梯时，邻居可以听见联大著名的木腿敲击声。[25] 陈达和政治学家王化成同居，他们一块负责小型伙食团。[26] 有些教授住在歌胪士洋行，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住在二楼，一心钻研学问，极少离开避难的|书斋，为此赢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27]

并非所有教授都那样深居简出。海关大楼隔壁地面坚硬的网球场，是留学哈佛的经济学家陈岱孙清晨经常出入的地方。学生在教室里可以听到球拍击球的声音，还有陈氏低沉的喊声，「Out！」或「Good shot！」李卓敏是陈岱孙的老搭档，他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刚从柏克莱学成回国。网球协会很快就成立了，有十来位会员。在决赛中，陈达战胜了崔书琴，奖品是一只鸡，他慷慨地与同事分享。[28]

在蒙自这样的小地方，只有临时拼凑，才能创造性地利用休闲时间。吴宓是个浪漫的文人。他与汤用彤等三四位同事共居一室，设备很简陋。他发现，当地市场连围棋的影子也找不到，而下围棋是他最喜欢的消遣。他便自制木板作棋盘，买来四百粒钮扣——黑白各二百粒——当作棋子，这样就可以对弈了。[29] 吴宓是雷少卿经营的稀饭店一位有名的顾客。雷氏是和蔼的四川人，爱好古玩，有时候会把家里的宝贝拿出来与感兴趣的客人赏玩一番。他深受蒙自联大师生的喜爱。他们管这个店铺叫「雷稀饭」，管这位掌柜叫「稀饭雷」。雷老板白发苍苍，总是笑容满面。吴宓很喜欢又甜又热的稀饭，也很喜欢这位老板。作为对这份友情的回报，每逢下雨天，雷老板会派儿子把热腾腾的稀饭送到吴家。吴宓曾送给他一副对联，使这家店铺更加有名。[30]

联大教师所遇到的当地百姓并不都像吴宓遇到的那样友好和善。吴宓的朋友、性情古怪的同事刘文典看到一个农民正在揍一位妇人，便斗胆走到那个男人面前，质问他在干什么。那人脱口而出，「打婆娘么。」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个外人粗鲁的干扰令他懊恼

不已。刘文典十分愤怒，狠狠地掮了那个男人一记耳光。[31]

其它消遣

咖啡屋是师生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从东门到海关大楼的鹅卵石街上就有数家破旧的咖啡屋。除了咖啡和其它饮料，还可以点奶油蛋糕、西红柿鸡蛋饼和什锦点心。越南老板很乐意怀着同情心倾听与他一样移居于此的师生的心声。在电灯暖和暗淡的光线下，寂寞的学生可以一边小心翼翼地捧着咖啡，一边谈论他的家庭、战争及时事，或谛听陈年往事，并一同歌唱，有时会有吉他伴奏。[32] 蒙自没有山珍海味，但学生一旦学会对当地稻米是红棕色而不是白色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便毫无怨言了。他们尝过蒙自有名的小吃——过桥米线和又香又甜的年糕。在大西门外的货摊上，这两样东西被当作早餐卖给顾客，学生坐在低矮的木板长凳上吃这些美味。[33] 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可以远足去周边山区和部落村寨欣赏优美的风景。农历六月底，蒙自会举行火把节，它成功地启发了联大最著名的文人的想象力。在炽热的火光中，朱自清看到象征着打破沮丧沉郁的战时气氛的「光、热、力量和青年」。[34]

1938 年夏，蒙自最激动人心的事情莫过于航空时代的来临。某日午后，一架中国空军飞机因缺油紧急降落在海关大楼附近还未竣工的军用机场上。飞行员原来是南开 1936-1937 年篮球队著名的「五虎将」之一，他受到南开人的热情招待。翌日早上，当地大约有四五千人挤到机场争相目睹这神奇的飞行物。不一会儿，又有两架飞机降落，它们为滞留的同伴带来燃料。三架飞机消失在空中，地上的围观者赞叹不已。[35]

南湖风采

六月初短暂雨季的到来，改变了蒙自的景色。干涸的湖床曾是农民前往市场的快捷方式，也是学生骑租来的马和驴的广场。某日早晨，一场特大暴雨过后，人们突然发现曾经骑马骑驴的地方成为一个美丽

的湖泊。岸边，尤加利树成荫，柳姿婆娑，为湖景增色不少。四周的矮山也从早到晚变换容颜。向晚时分，湖水倒映着落日粉红橘黄的霞光。湖边漫步是件惬意的事。南湖成了联大师生格外喜欢的聚会之地。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他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手杖，步伐却很矫捷。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湖畔，真使人有「只羡鸳鸯不羡仙」之感。那边，有个人身着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那位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过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就能懂得了『仁』吗？」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36]

人间乐园与爱国心

在某种程度上，蒙自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宁静的小岛，但联大知识分子十分清楚，他们来到这个秀丽的地方不是自主的选择，而是残忍的侵略者入侵的结果。有深切历史感的人对现实的历史意义极为敏感。他们想起南宋（1127-1179）〔原文有误，南宋灭于 1279 年。〕，文人学士为躲避野蛮人的侵扰由北而南，在长江下游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这两个时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只是救亡图存，还要保护华夏遗产。北大历史学家姚从吾专研宋史，更感责任深重。某日晚上与同事共餐时，姚从吾宣布，生活在这种乱世，知识分子有责任留下历史纪录。他发誓要作一部抗战编年史，供将来的历史学家参考，就像李心传的记载使后来人能够重修宋史一样。[37]

历史系同事都热情支持姚的建议，然而，他的评论引来忧伤的气氛。因为，现今这些流亡者完全明白，南宋最终还是屈服于蒙古侵略者，中国被野蛮人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那悲凄的思绪仍萦绕在内陆偏远小城的知识分子的脑际，由宋朝列祖列宗奠定的伟大的长江文化中心，眼下却被异国军队占领。「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寅恪悲叹道。[38]

陈氏时年四十八岁，可能写下带有宿命色彩的诗篇，但他二十来岁的学生决不会听天由命——在流亡中度过余生。他们记得，差不多三年前，北平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唤醒了整个民族，协助建立统一战线反抗侵略。在这些活跃的青年当中，许多人还是长沙爱国运动的骨干。他们相信，奋起反抗的百姓有五万万人之众，定能战胜日本强大的机械化力量。有一位以前攻读经济学的学生声称，「经济学家一无是处，而文科学生能做宣传工作，十分重要。」[39]

对语言文字的力量充满信心的学生发表演讲，张贴海报，唱爱国歌曲，他们的声音在七月七日这样的纪念日到达顶点。这年的七月七日正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其要旨简单明了：竭尽全力反抗日本侵略。在这座小城，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门上张贴的传统对联都以抗日为主题，流露出一种更普遍的情绪，引起爱国青年的共鸣。国民党党部和蒙自教育局推波助澜，前者散发抗日宣传画，后者把旧式的戏台装修成讲台，用于战时宣传，并协助学生办夜校。[40]

学生在当地的改良运动，不仅是政治和教育活动，他们还进入公共卫生领域。对于接受过城市文明的初来者而言，公众幸福最大的威胁不是黄种日本「倭奴」，而是当地饭馆里黑压压的苍蝇。当地餐馆里盛鱼、肉、家禽和大米的盘子似乎都有一层污垢。听到挑剔的外人抱怨时，老板会大口大口地吃饭，以此表明饭菜均无问题。[41]面对这种无知和冷漠，学生发起了「灭蝇运动」。通过口头、海报和漫画宣传，他们指出这些带有细菌的小动物像携有炸弹的大飞机一样危险。尽管普通百姓仍无动于衷（城里人使用苍蝇拍尚在十多年之后），但

学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餐馆老阁开始用薄纱遮盖食物了。[42]

蒙自的意义

我该如何总结本章的内容呢？结论一：1938 年 8 月，联大文法学院迁往昆明，蒙自回到原来安谧的状态。结论二：1938 年 8 月，联大文法学院迁往昆明，但是，蒙自跟从前绝不一样。

四十年后，在 1980 年 6 月 25 日，为了观察蒙自的变化，我和昆明师范学院的两位同事跳上一辆吉普车，前往蒙自。车子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向南行，一直走了三百公里。整个白天的汽车旅程比坐火车更合宜，因为乘火车还是走窄轨铁路，需要熬夜。我们所见到的蒙自，与联大师生 1938 年 8 月离开时的那个地方明显不同。南湖周围不再是成片的农田，而是挤在一块的军事、教育等公共机关。有些水过去可能是流入南湖的，如今则被一座水坝拦截，用来灌溉农田，但长达八个月的旱情使湖泊干涸，庄稼枯萎。湖床周围砌有一堵石墙，有台阶方便路人或游泳者行走，能否游泳视季节而定。城里有两所中学，一所师范学校，还有一个县档案馆。老街之外的一侧是新开发的混凝土建筑区。

蒙自人仍很守旧。一位老人拒绝我为他拍照，显然是害怕摄影会俘获他的魂灵。一位官员提醒我，在内地这种情况是「不确定的」。他没有具体解释，但蒙自地区似乎还没有完全走出暴烈的历史的阴影。街上有很多小孩跟着我，显然是充满好奇，而不是敌意，尽管耳畔充斥着「洋人的大鼻子」的议论，这是我在中国唯一听到这种议论的地方。

外地的陌生人仍被小镇百姓当作最好的观察对象。三十年来，我是第一个走进蒙自的美国白人。一天清早，湖边传来响亮刺耳的、有名的「广播体操」乐曲，我随着乐声做健身操。突然，我注意到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个老妪趴倒在地上，她是被一根竹杖绊倒的，两边的篮子里滚出许多茄子和辣椒。看到腿脚多毛的洋鬼子大清早在湖边做健

身操，她显然没办法不分心。我把这个慌张的老妇搀扶起来，恍然体会到四十年前联大女生的感受。幸好这个老妪离我还不够近，没有把手伸向我的大腿！

虽然仍很偏僻，但蒙自在政治和市容上颇有变迁。我被安排到县革命委员会住宿，那是当地最好的旅馆。联大女生曾经听风的周家公馆已变成一所党校，歌胪士洋行成了军事基地，潘光旦住过的地方成了革命委员会招待所，海关大楼已成为军事机关，不允许参观和摄影。

当然，这一切都反映了 1949 年以后的发展状况。1938 年 8 月，文法学院迁到昆明扩建的校舍时，联大大部分人还不曾有共产党闹革命的概念，蒙自人也一无所知。闻一多还没有走出他的书斋，仍然从事文学和艺术研究。尽管如此，领事馆、海关大楼和铁路等法国遗产，都被有权变革的人重新装修、加固、利用，象征着权力的变迁。他们之所以更具影响力，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联大师生收拾行李离开时，蒙自的苍蝇一点也没有明显减少，但教育和社会方面的重要变化业已开始。在联大两性平等模式的影响下，当地男女关系逐渐走向开放。1939 年 5 月的一份报告指出，蒙自的姑娘已不再打着雨伞出门了。[43]男女同校的中学已建立，少数年轻人开始报考像联大这样的大学。更重要的是，联大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进入蒙自，不仅提高了当地学校的教学水平，还带去了进步的社会和政治观念。（1980 年两位联大校友仍在那里执教。）在联大左派的动员下，蒙自ー建水地区的一些青年参加了云南游击运动，最终帮助共产党掐灭了蒋介石在大陆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44]我所看到的许多变化显然都是联大在蒙自时期奠定的。

蒙自对联大又有什么影响呢？同此前的长沙和衡山一样，蒙自是一段插曲。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表面上远离战争的纷扰，实际上弥漫着流亡的苦楚。那里没有书，没有图书馆，没有博物馆，也没有电影院，避难者找到一种不同的思想和精神食粮。在蒙自古城内，文法学院学生担负着传播现代文明的责任；城外，他们在南湖道家式的宁

静中得到解脱。四月，都市知识分子对蒙自这个流亡之地尚怀惴惴不安之感，到了八月却变得难以割舍。

他们的前方是昆明，那是一座可能最终奠定他们命运的城市。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呢？是推进抗战事业，还是提高战后建设技能？是团结群众参加平民运动，还是躲在象牙塔寻找安全之所？是用现代西方文化取代腐朽堕落、声名扫地的传统，还是在日本的无知之徒和中国反传统者的威胁下保护和发展宝贵的民族遗产？对这些问题，蒙自无法回答，或许昆明能够提供答案。



1938 年 8 月，蒙自，北京大学同学会主办的民众夜校师生合影

第二部分

交 互 影 响

四 联大与云南人

联大选择昆明，可算是英明之举。云南省会就在北回归线北边，那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位于云贵高原，海拔 1,900 米，气候宜人，用「四季如春」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在 5 月到 12 月的雨季，原本阳光灿烂的天气，午后常常会有阵雨，不过气温很少超过华氏 80 度。从 10 月到来年 5 月，天气干燥，碧空如洗。在花园、公园和窗台上，鲜花常年盛开。这座城市西南数英里处，西山脚下，有个大湖——滇池；昆明盆地，群山环绕。这山这水，为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增色不少。

抗战爆发后，拥有 15 万市民的昆明，便成为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枢纽。往南，顺着滇越铁路，经过河内和海防，可与大海相连，可与西方及外界联系。沿着联大旅行团曾经跋涉的路，向东可到贵州，向北可达战时首都重庆。西南方向，有滇缅公路通往更广阔的世界，这是第二条生命线，它向西蜿蜒伸到腊戍，向南曲折可达仰光。

如今的昆明可追溯到十四世纪晚期。城墙环绕着城中心最古老的部分。从城东北部的两处名胜——圆通山和五华山起，地势逐渐向西南部倾斜。五华山南边的正义路，一直延伸到近日楼大门。近日楼的名称有个历史典故，据说这里到太阳的距离，比到唐朝首府长安更近，反映出云南边疆远离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这偏远的荒凉之地就常常成了失宠的侍从和官员的流放地。

正义路北区是昆明市的商业中心。与城墙平行，在近日楼南边，一个新的商业区在金碧路一带开始崛起。金碧路与正义路交会于金马牌坊和碧鸡牌坊，这两座华丽的牌坊，耸立在守护神的旁边，金碧路之名即源于此。这条路也是在昆明的广东人和越南人的居住区和贸易区。再往南，在火车站和邮局附近，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在那里可以找到商贸宾馆、印度支那银行（Banque d'Indochina）、环形体育场

（Cercle Sportif）和法国医院。

城外，环绕城墙并大体与之同心的是环城路，其北端是一片山地，用作墓园，还有被称为英国花园的荒野之地。离城西南边大约三英里处，滇池北角有座大观楼，那是诗人和野餐者最爱光顾的地方。城墙里边有个圆通山公园，那里是联大长征的终点。在城市中北部，还有秀丽的翠湖公园。

昆明笑迎天下客。这里的两层木式建筑，饰以精雕细琢的斗拱、栏杆和大门。宏伟的围墙触目皆是，显示出主人家境殷实。有些邻近的房子用黏土筑成，墙被刷成浅紫色、黄色、奶油色、泥土色。屋顶上盖着微微拱起的蓝灰色瓦片，雨季来临时，上面长满了青苔或绿草。色彩华丽的木雕，给商店和住所带来巴伐利亚式的风格；法国式的花团锦簇的阳台，让人联想起地中海；在青山环绕的高原、湛蓝天空的映衬下，黄墙碧瓦的景观，让人彷佛置身圣达菲。

如同新墨西哥城，昆明位于偏远的西南边疆内陆高原，聚居着众多少数民族。在昆明市中心大街上，战时的初来者看到彝人、苗人成群结队，他们或做生意，或购物，或观光旅游。他们华美的头巾、短衣和银饰，与汉人素朴的蓝色棉服形成鲜明的对照。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穆斯林，他们的清真寺将中国的建筑风格和中东的装饰风格融为一体。

昆明的街名极具特色，有些反映了云南处于内陆边疆的地位。威远路、绥靖路、拓东路是指中央权力延伸到边远地区，即「平靖」「蛮夷」之地，及城市东部的发展。正义路、节孝巷是弘扬传统美德。文林街是赞美博学君子，青莲街则具有佛道意味。青云街、螺峰街、龙翔街、凤翥街、景星街暗示其高度甚至超过巍峨的云贵高原。

雨天在这些街上行走可能会跌倒。主干大街铺着长方形石板或砖块。环城路是石子路。小路很脏，春天早上九、十点钟光景起风时会扬起一阵阵灰尘，雨季则变得泥泞不堪。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和

黄包车。汽车非常罕见，自行车也不常见。昆明的公共交通相当落后。大多数人都是步行。除了以木炭为燃料的公共汽车，还有马车。这些马车安装着二手卡车的轮胎，架在瘦弱的马上。公交车沿着公路一直跑到乡村。

1938 年，前往昆明的外地人发现「这是一个沉睡的、偏僻的东方城镇，且带有些许法国风情」。这是美国空军指挥官陈纳德的话，而他的印象与联大难民的印象非常相似：

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变化不多。皮肤黝黑、身材矮胖的部落民，戴着褪色的蓝布头巾，一如既往地做着省内的生意。他们赶着骡子，驾着大篷车，载着盐巴、锡和鸦片，穿过狭窄的山路而来。嘎吱嘎吱的、未上润滑油的马车，轧过昆明的鹅卵石路，车子发出喀哒声，马儿发出哼哼声。在大街两侧胡椒丛中，水牛、家畜和成群的肥猪随处可见。一排排法国别墅，不时赫然出现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黑瓦屋和橄榄绿的尤加利树林中，景色极不协调。法国微型火车头发出尖细的汽笛声，与中国街头小贩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黄包车丁丁当当的铃声混合在一起。[1]

无论是从西方还是从中国的角度看，就像它的名字「云之南」所暗示的，云南都处在文化边远地带。与毗邻的农业大省四川不同，云南崎岖的红土地培养不出士绅阶层。有清一代，只有一个云南人中了人人向往的状元，而这还不是通过正常管道取得的。[2]迟至 1937 年，这座城市只有三所高中和一所大学，到 1939 年才有第一座电影院。滇越铁路未能给法国带来预期的帝国和商贸利益，与此相同，它也几乎没给昆明带来经济和文化价值。从河内沿着这条铁路只能找到殖民文化的零星影响。为了躲避印度支那的酷暑，少数法国人在市郊和滇池边建了一些房子，昆明半西化的绅士，因此能喝上几口科尼亚克白兰地，能在这些往日的度假胜地打几场网球。越南移民比他们的殖民宗主国人数更多，他们聚居在金碧路周围，在那里甚至今天还能买到硬皮面包和法式咖啡。云南大学是法国文化中心。校长熊庆来与一些

教授拥有法国学位。这群学者和少数物理学家及其它专家，组成一个留学法国的、说法语的云南人小圈子，成为昆明的「高卢风情」（Gallic patine）。

如同它的省会，云南只有一丁点儿现代气息。省主席龙云是个利用新式武器夺得权力的旧军阀，不过他的几位部下和顾问颇具现代眼光。他 1927 年掌权后，这个省一直动荡不安，因为它的军权乃是建立在未统一的个别部队的领导阶层。经济上却依赖鸦片生产及其税收。龙主席废除了卫戍制，寻找代替鸦片的经济作物。在留美顾问缪云台的建议下，他开发云南锡矿资源，朝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化迈出了第一步。因此，认为龙云是个无知的军阀的观念——这是联大大部分现代派对龙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合时宜。他的确是握有军权的少数改革者之一；另外几位是掌管邻省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及山西的阎锡山，他们认识到手中的权力与本王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3]

初次得知联大希望从长沙迁往昆明时，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欣喜若狂。龙云是怀有戒心的。为保护其权力，他得保持对内部的控制，而保持控制最好的办法，就是排除外来势力的影响。他的顾问提醒他注意这群人潜在的令人不安的影响力，他们是声誉卓著、坦诚直率、忠于国家的大学教授。甚至在中央政府批准蒋梦麟搬迁大学之前，南开政治学家王赣愚就受命从长沙到昆明寻找场地。龙云告诉王赣愚，当地百姓讨厌难民，这群难民的数量之多，对他们与世隔绝的世界来说，已然是一种冲击，而一所重要大学的到来，只会使原本就很脆弱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4] 然而，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和其它人却敦促龙云欢迎联大来昆明，因为这所大学的教师可以提高本地文化和教育水平，还可以增强龙氏本人的威望。而且，一旦迁移得到中央的批准，抵制它就意味着与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这正是龙云坚决避免的。最终，龙同意欢迎这所大学。

龙云的许可为长沙避难高校师生的到来清除了障碍，中央政府为

地方当局安置新校舍提供财政补助。然而，寻找教室、图书馆和宿舍的重任，主要落在昆明市长裴存藩身上，他必须在大学队伍抵达昆明之前的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在蒋梦麟、梅贻琦及其委任的副手的配合下，裴存藩四处探寻房地产，购买、租借可利用的房子。经济系秦瓒教授为他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秦的父亲长期在云南政府做官，建立了牢靠的关系。通过秦父的朋友及其仰慕者的关系，再加上龚自知的热情支持，秦瓒得到昆明上流社会人士的配合。[5]

联大群体抵达时所能找到的大而坚固的场所，只有全蜀会馆和迤西会馆，这是位于城郊东南部拓东路的旧庙。这两个会馆被用作宿舍和办公室，但到 5 月初，春季学期开学时，文法学院迁往蒙自，会馆就改为工学院专用。理学院沿对角线穿过昆明城，搬到西北角顶点零散的住房，其中心是西门外的昆华农业学校。[6]

8 月，蒙自师生返回昆明，校舍仍不敷使用，所以男生被安排到军事训练营，直到 11 月，学校当局焦急地安置二千一百多名新生和返校生。1938 年 12 月 1 日，联大终于开学，并于 8 日开始上课，在昆明的第一个学年拉开帷幕。[7]

乡下人当中的世界主义者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世界与中国西南内陆的生活相距异常遥远。在中国，受教育者与普通百姓的隔阂，在学习西方的一个世纪里变得更加深广。在中国东部沿海接受教育的新阶层，对纽约、伦敦的知识分子风尚的了解，甚于对本国的农村生活的了解。他们能欣赏美国电影、法国诗歌、德国形而上学，却不能与五六英里之外的农民谈论农事。他们在社会上是精英，在思想上是世界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

在云南，文化崇尚本土，信奉个人效忠，视野狭隘。与其说云南属于全国和国际的未来，倒不如说属于中国封建军阀的过去。这一背景与外界迥然有别。有位学生写道：

云南人相当真诚淳朴，但他们的仇外心理十分强……他们从未愉快地帮助过我们，却似乎存心和我们过不去。表面上，当地政府看上去对中央政府十分忠诚，但在骨子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保留着顽固的地方自大意识。任何军事和政治组织或制度都成为独立实体，或简单地说，成为自治政府。[8]

初来乍到的老师和学生，对云南及其生活方式都极不理解，也不欣赏。在北平和天津，教授属于上流阶层。他们的月薪在三百元以上，而管理员只有八元，女仆只有三元。即使在这个新地方，通货膨胀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但他们仍瞧不起文盲大众和云南的「封建」统治阶级。1936 年，由于当地货币——滇票——的价值只相当于百分之十的法币，「滇票」就像美国内战后「联邦美元」一样被用来形容低贱的价值，于是「老滇票」便成为辱骂当地人的词语。

失去家庭资助的联大学生比他们的教授要穷很多。不久，赤贫成为学生难民群体「荣耀」的象征。有一部分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刚从香港来，他们在衣着朴素的平民百姓面前炫耀其时髦的装束。「这种同时表现着二个不同的世纪，尤其当一个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一刚由山上下来的半开化的倮族土人，用头顶着他的商品，在一条路上行进的时候，这也是由于抗战而形成的奇观吧！」[9]

联大对昆明的影响只是沧海一粟——下游受过教育的群体纷纷涌入内地城市。除了大学人口，还有在政府机关、新办工厂和企业、铁路局、公路局及邮电局工作的数千名男女知识青年。旅馆和饭店里挤满了二十到四十岁的初来者。[10]联大迁入昆明还不到一年，有位作家注意到这座城市已成为「外省人的世界。银行一天一天的增多，文化界到处呈现着活跃的现象，大小书店里整天挤满着翻杂志、看画报的学生。」[11]五个月后，据圣公会传教士吉尔伯特 •贝克（Gilbert Baker）报告，为把它从「边远省会」发展成「中国最重要的大学中心之一」，联大「几乎把昆明变成一座非云南人的城市」。当地富户已转移到乡村躲避空袭，贫穷但受过良好教育的难民却进入这座城市。贝克认为，

这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摩擦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这些移居者常常把云南当作异邦，对当地百姓及其生活习俗困惑不解，这表明他们自身也同样褊狭。」[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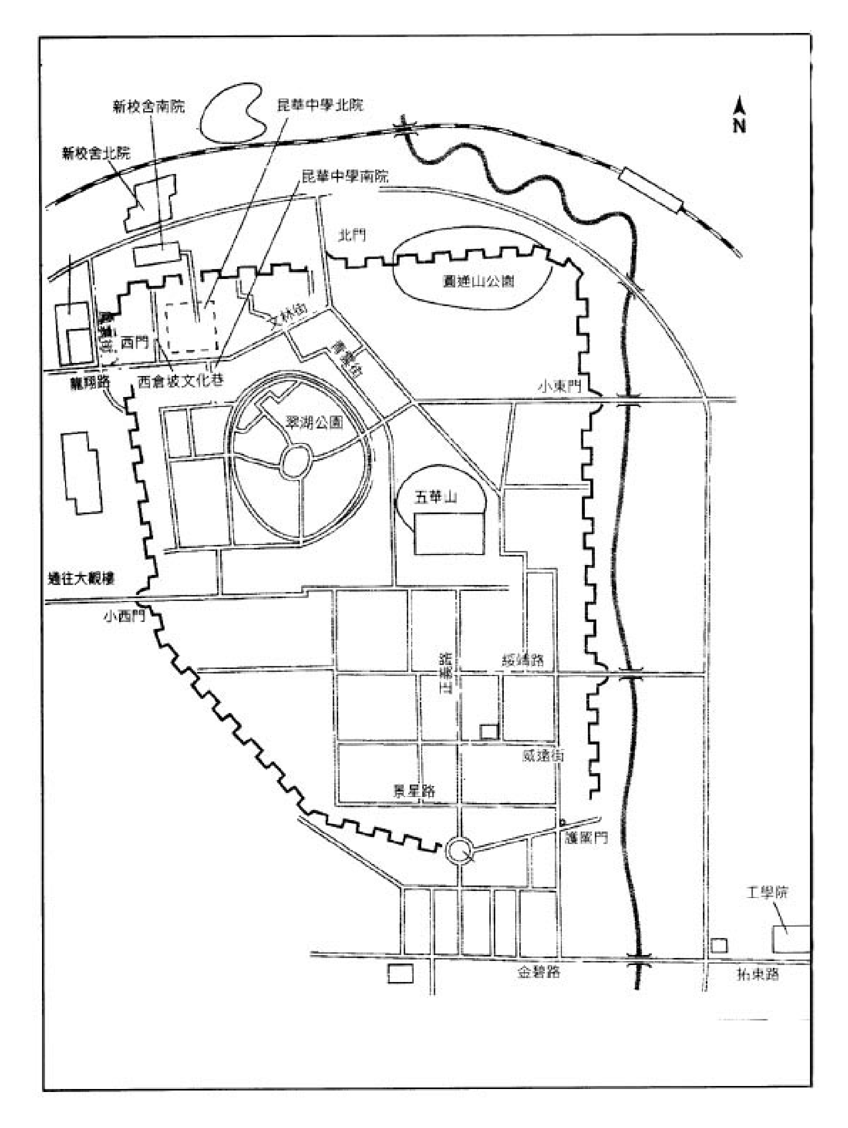
云南的自卑情结

联大师生对云南人的轻视使得云南人更加自卑？在联大抵达昆明前夕，一位云南学生自嘲家乡是「山中王国」，并说它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很落后的省份，凡事看来都枯燥单调，发展缓慢」。[13] 各阶层的人都证实，云南人普遍存在「自卑情结」，从任教于云南大学的杰出的人类学家许烺光，到云南省主席之子龙绳文，都持这种观点。

夸大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摩擦程度是不正确的：许多联大学生发觉当地人很友好，有一人甚至说他们「顶老实的」。[14] 不过，在刚开始的一两年，云南人与外省人彼此还不了解，关系的确相当紧张。在昆明的街头，这些刻板印象就可找到真凭实据。学生发现，几乎没有商店在中午之前营业，因此他们认为当地人很懒。当地百姓把鸦片当作礼物送给客人，而且并不拿它当一回事，即便在政府机关也是如此，这让初来者深感惊诧。看到吃槟榔吃得牙齿发黑的云南老人咳出黑中带红的浓痰，他们觉得很恶心。市场是发生摩擦的集中地。外地口音会招来店主粗鲁的对待，他们几乎肯定会把物价抬高到不合情理的地步。根据 1940 年的一份报告，云南人「认为外来移民比自己更有钱，并认为由于他们支付高得离谱的租金，或由于他们以某种含糊的方式，对更高的物价标准已熟视无睹，他们得对高昂的生活开支负主要责任」。[15]

在云南人看来，除了导致通货膨胀、造成住房紧张外，外地人在服饰和礼节方面连最基本的意识都不具备。外地人热衷于稀奇古怪的开衩裙、高跟鞋、怪异的发型，当地百姓对此很难理解，便一笑置之；但天黑以后，年轻恋人手牵手走在翠湖湖边，有时还在公园长凳上拥吻爱抚，这种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有失体统了。亲热的恋人一旦被当地警察逮住，就有可能被他们用皮带鞭打，或者被迫到当地警察队接受

有关道德准则的羞辱性的训话。



昆明城区地图

联大人难以适应他们看来是极端暴力的行为。一位湖南校友注意到，在他的家乡，强盗只劫财不夺命，在云南则是先杀人后搜查贵重物品。[16]因为租金纠纷，房东就殴打过张奚若教授。他的房东是个腰缠万贯的云南人。从这件事可看出当地人对初来者的敌意。当地有句冒犯外人的话，叫做「揍上海人」（beating Shanghaiese），这对外来者是通用的，不管他们是不是真正的上海人。「上海人」成为贬损的对象，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迁移到中国西南的「上海骗子」（Shanghai sharpie）与当地精英竞争，他们能干财务，会做生意，还当了官。当地百姓一旦学会辨别长江下游富商和贫穷的联大知识分子的不同，便改善了与联大人的关系。

在明显的敌意之外，当地有些人士意识到，联大的到来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例如，1938 年夏，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就动员联大所有毕业生到云南高中教书，继续读研究生者除外。随后，他要求联大教员为云南省中学教师提供在职培训。[17]

与联大发生密切关系的当地群体，本该是受过教育的云南精英，但事实上该省教育极为落后，只有极少数中学毕业生认真报考联大，能考上者寥寥无几。这些人通常都是进师范学院——这是 1939 年为满足主人的需要而增设的，录取要求比联大其它学院低。[18]云南人集中于师范学院这个事实，为下面的看法又增加了一条证据：云南人如果不是智力低下，就是缺乏足够的学术能力。大多数努力进入联大的云南人，得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奋斗，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他们不少同学嘲笑说，假如在高中阶段没有得到联大学生额外的指导，他们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理想；还有，他们均出身于住在附近、为他们提供必需品的富庶的上流家庭。

有志于上大学的云南人，大都满足于报考联大的邻居——云南大学。这是一所相对说来较新的大学，其前身是唐继尧于 1912 年创办的东陆大学。1930 年成为省立大学，1934 年更名为云南大学。此后，其办学质量稳步上升，学生人数迅速增加，由 1930 年的 125 人增至

1934 年的大约三百人，到 1937 年，学生人数已超过六百人（大约是那个时代省立大学的平均水平）。1938 年 7 月，它成为国立大学。其师资力量虽远远不如联大，但它有几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其一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才华横溢的青年弟子费孝通，另一位就是校长熊庆来，他曾任清华数学研究所所长，发现了联大数学天才华罗庚。

服务于本地的「云大」常常把联大视为建立在本地的外来者——与他们或他们孩子的志向毫不相干，不过由于熊庆来与清华的关系，两校教师关系颇为融洽。费孝通等人开始在联大上课，联大偶尔会有学者如政治学家王赣愚到云大兼课。随着云大教师的扩充，它增加了一批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这群人具有全国性视野——与原先和地方有着密切联系的那些老人大不相同。

云南人和外来者中都不乏饱学之士，他们能够在具体情况下分析文化冲突问题，有助于减少两个群体间的分歧。1938 年春，联大的长征旅行团进驻昆明。不久，云南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楚图南注意到，云南直到明代才真正融入汉文化。第一批外来者涌入时，这个省只是在表面上出现了现代性。随着新一波外来者积极地投入抗战，楚图南认为，如果双方能够摒弃成见，云南将大有希望。初来者得停止对当地人居高临下的批评，当地人得克服对外人要么崇拜要么诋毁的习性。[19]1939 年春，冯友兰作了题为「云南人与外地人」的讲演，后来发表在当地报纸上。他机敏地分析偏见的本质，指出根据随意的、不具代表性的经历概括整个群体的特性是不合情理的。后来，许多学生都称赞他单枪匹马就解决了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问题。[20]

联大和龙云

获悉联大将来昆明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告诉他的孩子，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相互适应，「现在全国最出色的人才将在我们的城市生活。」[21] 龙云是彝族人，但他超越了民族身分，成为中国动荡的西南政治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他的世界仍只是本省，而

不是全国，至少在他由于以下两个因素被迫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之后是如此：中央政府进驻邻省四川，日本人占领与该省南部和西部边界接壤的印度支那和缅甸。

即便不是服从命令，蒋介石也需要龙云的配合，因为云南有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与外界相通。战初，龙云转而支持对侵略者采取顽强抵抗的策略。汪精卫飞往河内，途中停留昆明期间寻求龙云的支持，但龙云严厉抨击他做为一名高官的投降行径。汪精卫最后在南京成了傀儡。龙云此举获得钱端升的赞扬，钱是联大受人尊敬的政治学家、赫赫有名的《今日评论》周刊的主编。[22]在整个冲突过程中，龙云一方面控诉战争，与中央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反抗重庆当局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对云南的逐步渗透，以维护其自治。

除了把自己树立成一位爱国者，龙云还大胆地与冷淡的联大教师发展关系，后者把他的朱门住宅区视为颓废堕落的贵族生活的回归，就像《红楼梦》里所描写的。龙把附近的一栋房子改造为生活区，以象征性的租金出租给联大教授。曾是禁烟局的整个厢房成了蒋梦麟的家。龙云还把他的孩子送到学校，与联大教师一起生活。

在具有现代思想的顾问缪云台的协助下，龙云与蒋梦麟、梅贻琦等联大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邀请教授到部队讲演，关心师生生活。得知联大教授无米下锅，他送来大米；听说他们缺衣少穿，他捐献棉服。1940 年春，他为联大和云南其它高校五百名学生设立奖学金。此外，他的审查机关比蒋介石的更宽松。他不允许戴笠的秘密警察在昆明抓人。在批评重庆政府方面，没有人比云南省主席更坚决拥护言论自由。

龙云对联大自由主义者关怀的姿态惹恼了蒋介石。不过，龙云尽其所能避免与强大的重庆上级发生不必要的对抗。他在联大校园所作的唯一一次公开演讲是致欢迎辞，那次壮举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他后来基本上都是在别的学校对学术群体作演讲。[23]他从联大教授的专长中获益时，总是对其表示尊敬。省市机关和顾问委员会很快都挂满著

名学者的名字，社会学系师生还协助当地管理者展开社会调查。[24]

龙云变成联大群体的支持者和保护者的动机无疑是很复杂的。在这之前，没有记录表明他是自由信条可信赖的维护者。1928 年，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时，他处决了大约四百名左翼分子。[25]但是，接下来的十年他巩固了权力，现在在云南省内没有什么力量使他担心，能颠覆他的统治。在他的控制下，他完全有能力给予学者一定的自由。而且，与著名学者交往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并可能补偿他作为功勋卓著的部落男孩残留的自卑心理。此外，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与中央政府论辩时这些态度鲜明的、大名鼎鼎的支持者的作用。他是一座堡垒，而堡垒背后是教授和学生对蒋介石的抨击，这同时提升了他自己的形象——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理解这所伟大的大学所展示的文化氛围。这样一来，他便成了文人的庇护者，这种儒家式的角色具有悠久的历史。

在这种处境下，一个地方统治者的做法，兴许无法像他那样富有想象力。我们应注意龙云的支持者的看法，即他的品性并不是所有军阀都具有的——他真心实意地包容各种观念，也许还隐约感觉到自由对大学的重要性。他的亲信称，他之所以喜欢与联大学者交谈，是因为他喜欢他们的坦率和思想批评甚于周围阿谀奉承者的讨好之辞。[26]

但是，如果说龙云愿意对煽动反蒋的行为视而不见，那么他对联大知识分子对他及其属下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就不那么赞同了。邮局审查官对寄往外埠的邮件检查得十分仔细，以防犯对云南人的偏见和对统治者（lèse majesté）的流言传到外界。据说，梅贻琦曾被迫公开批评一个学生，因为他骂当地市民是「老滇票」。[27] 然而，审查员不断发现对省主席个人的毁谤，说他是一味搞破坏的军阀，是中国头号鸦片出口商，说他勾结汪精卫，说日本不侵犯云南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秘密协议。

据他儿子龙绳文说，龙云最终不耐烦了，便召开高层委员会讨论这些指控。[28]一致的意见是逮捕这些捣乱的学生。但省主席有更巧妙

的办法。大约有四十名学生（全是男生）写了最极端的信，独自收到了「邀请函」去龙云的办公室，在警察的带领下，他们到了龙的住宅。看见龙云、蒋梦麟及梅贻琦都坐在灰色沙发上，他们个个胆战心惊。他们听说，引诱敌人共赴盛宴的军阀会在吃完最后一道菜时把他们杀了。龙云拿出那些告状信，把它们发还给原作者，然后缓缓地说，「你们这些孩子相信民主。联大被誉为『民主堡垒』。民主的一部分就是保护他人的权利和名誉。恕我直言，谁愿意读读他的控告信？」

有几个人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就勇敢地遵从了。他们当中最严重的指控是，龙云与蒋梦麟有一笔秘密交易。龙云说：「你们指控我有叛国罪，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学生回答，是听来的。龙云问：「道听涂说就是证据？」「你们太鲁莽了。年轻人应该在批评中锻炼民主，」当然，龙云承认，「我们这里是比较落后，这部分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我们的学校也没有别处发达。我们并不像你们学校那样幸运，拥有大量政府的教育者。现在我们应该齐心协力相互学习。把信拿回去，随你们自己处置，但以后一定要核查消息。」

会见到此结束，学生们仍然活着。他们感到如释重负，大声哭起来，并跑上去握着龙云的手向他道歉。在一片混乱中，有几位也握着蒋梦麟和梅贻琦的手，他们看起来一样吃惊，继而放下心来。

即使通过这些机智的手段尝试与联大建立热情友好的关系，但龙云仍不被信任。大多数联大学生都只是把他看做一个相对开明的军阀。许多人认为他和解的姿态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坚决认定他是个封建暴君。龙云拉拢公共关系的举措也被一些家庭成员的举动破坏了。战初，他的大儿媳进入联大学习，第一天上课就让司机开着高级轿车送她去。一贫如洗的学生早已十分憎恶当地的富豪了。他们就是不给汽车让路，以此进行消极的反抗。（其中有一人回忆，「我们生平走路从没有那么慢过。」）[29] 最后，司机好不容易停下车，可是当他去买香烟时，学生把轮胎划破了。龙云听说这件事后，立即禁止他儿媳这种帝王般的交通方式。她有炫耀自己时髦的习惯，常常把美国电影杂志

放在书本上面，这引来负面的评价，但学生渐渐明白，这位年轻的龙氏儿媳毕竟还是很友善的。[30]

龙云的儿子龙绳曾通常被称为「龙三」，是个更让人头痛的角色。他是个走私犯，持有枪支，无法无天，而龙云似乎无力控制他。一天夜里，龙三翻过昆华女子中学围墙闯入宿舍，愤怒的女校长把他赶了出去，最后说，「这是女子中学，不是妓院！」[31]

在经历了最初的文化冲突之后，尽管有龙三之流，但相互了解还在继续深入。战时通货膨胀迫使师生寻找增加收入的方式，联大人走出校园，与当地百姓打交道。他们到学校当老师，做家教，也做白领。当地富人的女儿与贫穷的联大男生结婚，这在当时变得司空见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初来的大一学生一般都有过内地生活的经历，而 1938、1939、1940 年毕业的学生不同，他们直接从光明的北京、上海和香港进入漆黑一片的云南。考入联大的云南人仍寥寥无几，但人数逐渐增多。一两年的工夫，「老滇票」这句骂人的话被拿来开玩笑了。

五 重庆与昆明

一方是具有经济后盾和权势的国民党和教育部，另一方是决心维护作为美国传统的学术自由的教授们，双方相互对抗。

——费正清〈清华教授〉

外在的威胁迫使联大同仁团结一致，重庆中央政府的控制就是这种胁迫势力之一。

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在旧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发展毫无规划可言。大学有国立、省立、市立的，有私人团体建立的，有西方教会设立的。中国的大学通常照搬外国教育模式，很少根据国情予以调整。自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中央政府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目睹这个异质力量一步步发展壮大，而这个舶来的制度在国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整个民国时期，尤其是 1928 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部长千方百计制定标准，实行政治控制，推行某种程度的统一。其中的各种措施始终遭到奉行自由主义的教育者的抵抗，尤其是北大和清华这样高贵显赫的学府。北平学界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可以追溯到 1928 年南京政府成立之时。在留法学者李书华的领导下，教育部试图把北大置于「北平大学」的麾下，立即激起这所高傲的大学的忌恨。国民党还推行「党化教育」，虽然实施过程中从未超过强制召开「总理纪念周」的程度，但执政党还是把美国模式的大学制度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

1931 年，继而在 1935 年，大学成为学潮的策源地，学生反对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屈膝妥协的政策，因此官方的忧惧几乎没有缓解过。黄埔系和 CC 系是追求自由的大学的死对头——黄埔系是国民党的法西斯军事派，它的「蓝衣社」企图在军事教育院校安插亲信；CC

系由保守的国民党人陈果夫和陈立夫建立，他们是国民党官僚系统的头目。1932 年，陈果夫以中国需要人力为借口，建议停办所有文学院和法学院，把学生引向「更实用」的学科。无论这个理由多么堂皇，但事实很清楚，文、法学院正是鼓吹自由主义最力的教授和最激进的学生的藏身之地。

陈果夫的计划遭到意志坚定的教育者顽强的抵抗。他们认为，学术独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战前统一课程设置的企图「基本上无果而终」。[1] 学术独立的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可以任凭己意挑选校长，教育部别无选择，只能盖章批准。实际上，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教授对教育部长的任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陈立夫是个重大的例外。1938 年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是对独立院校的一个打击。[2] 陈把战时紧急状况和大学对中央资助的日益依赖看作加强控制全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时机。[3] 遵奉新儒学的政党组建者坚决认为，中国的大学缺乏最低程度的统一标准，于是强制推行统一的教师资格、统一的毕业考试、统一的课程设置及统一的教材。

教育部的动机颇为复杂。除了对桀骜不驯的高校加强控制外，重庆的教育工作者也是真心希望提高教育水平。何况，连西化派在采用多元的美国模式和统一的欧陆模式之间仍存有争议，这个问题悬而未决。教育部便依据这种争论，假教育之名，行政治之实。[4]

在教育部看来，大学课程杂乱无章，亟需制定规范。首先是强制统一基础课，这种课使学生对所学科目有整体的认识。狭隘的、高度专业化的课程将被淘汰。不过，官方利用紧急形势改变大学课程设置并不是以战争为导向。执政党宣称，「我们所说的战时教育，不是指战时教育各个方面都与平时不同，而是指国难时期改进教育制度中的根本缺陷。」[5]

国民党的教育方针与周朝的「六艺」颇有相似之处，那时认为体育、德育与智育同等重要。相反，「新教育」颇受诟病，它被指责为过分依赖教材，轻视人格培养，以体育竞赛取代国防训练是浪费课时

之举，忽视对中国文史遗产的学习，无力研究当地社会状况。国民党在教育方针中指责学校脱离周边社会，并认为课程设置「与国家经济机构毫无关联」。[6]

教育部试图把明显外国化的课程中国化。陈立夫自创「文化租界」一词，用来概括中国大学出卖丰富的民族遗产，换来的却是西学的糟粕。[7] 因此，教材要「注重中国传统与现实」。[8] 国文和中国通史成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文科学生还得选修适量的、以中国为导向的课程作为专业课。[9]

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后来把留洋教授的抵制归结为心理上的「阻力」，以及「崇西轻中的心态」。[10] 这一观点不仅遭到联大西化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和钱端升的驳斥，还遭到新儒家冯友兰的反对。[11]

统一标准

如果说中国化是课程改革的关键，标准化则同样重要。从 1938 年春天开始，官方着手收集各校的课程信息。根据所收集的资料，教育部拟定了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课程表，递交给 1938 年 9 月召开的大学课程会议。与会代表正式批准了统一的院校课程表。教育部随后颁布基础课课程表，规定所有大学必须照此执行。

下一步是设置院系一级的必修课。1939 年 6 月，教育部就文、理、法、商四个学院召开课程会议，由教育部次长张道藩和顾毓琇主持，有六十多位代表出席。结果削减了大批课程。1935 年对重点大学的调查显示，各所大学的课程数从 70 门到 390 多门不等。1939 年 8 月，在综合各系资料的基础上，教育部宣布其制定的官方课表，裁减了那些被认为是多余的、繁琐的、深奥的课程。[12] 历史系、物理系、化学系、经济系课程分别由 139、171、182、340 门削减到 21、26、34、33 门。[13] 然而，新课程的基本结构仍仿照美国模式。修完 132 学分方可毕业。大一学习基础课，大二为专业课打基础，大三、大四完成专业课，并为求职作准备。在教育部的框架内，各校可以酌情调

整。

对于教育部的措施，联大教师起初未发表意见。教育部声称，大学应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14]其目标是培养既有广博知识又能独立生活的毕业生。联大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如梅贻琦所明确阐述的：通才教育比专才教育更重要，不过两者的区别仅在于以何者为重。[15]

论战与其说是由于教育原则所引起，不如说是因为教育部的政策，因为它支持通才教育而偏向职业化。教育部认为，在战时紧急局势下，经济上不允许开展研究生教育，因此在本科阶段中实行大量专业训练实属必要之举。其结果导致课程的职业化，使专业必修课多达八十个学时。大学前两年共同必修课的沉重负担，加上体育、军训和三民主义（经国民党删削裁汰，孙中山的信念已成为僵化的教条）这三门必修课，使得每星期都不得不增加课时。[16]

教育部政策的方法和动机都遭到反对者的质疑，使得它疲于应付。燕京大学的教师认为这些规章「利用每周三十多个钟头的课时把学生束缚在教室里，使他们无法在国统区开展政治活动」。[17] 联大教师则没有抱怨，因为教育部制定的共同必修科目表与战前清华实行的大一课程设置相差无几，只增加了三民主义和伦理学，但这两门课要用两个学年修完。[18]然而，教育部再次强调课程设置的极端专业化和职业化激起了反对的浪潮。朱自清认为，即使没有教育部的新规定，这个方向的努力就已足够多，因此他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19] 潘光旦指出，即使是工学院也应该实行通才教育，以便他们将来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不是只有一艺之专的匠人。[20]钱端升提醒陈立夫及其同僚，大学是学习和研究学问的地方，一般不讲授实用知识。[21]金岳霖总结了许多同事的观点：「如果我们回到教育本身的目的——比如，探索知识，培养人格……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过分注重一两个公认的非常实用的方向或使青年转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某些人想要的国民。」[22]

梅贻琦直言不讳，大学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23] 与联大其它领导一道，他敬告蒋介石和陈立夫，教育部为了实用牺牲人文学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要求政府允许学校执行这些规章时有「回旋之自由」。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24]最终，经过变通之后，联大确实执行了教育部的课程指示。[25]实际上，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他途，因为毕业证书由教育部授权发放。1942 年夏，按新规定学习的第一届毕业生水平下降，至此联大才明白其中的缘由。与其它院系一样，在社会学系，毕业审查委员会要检查学生成绩。在十三名大四学生中，查出五人不合格，不过最后都准予毕业。[26]

教育部于 1938 和 1939 年大张旗鼓颁布的新规定和课程表，事后证明是可以进行协商的，于是联大开始与教育部讨价还价。1940 年，教育部命令联大在学生检测的基础上，采用官方制定的课表。6 月 10 日，联大常务委员会对此提出反驳，认为因循守旧的强制性统一会扼杀创新才能和原创性。在联大愤慨的回复中，字里行间透着冷嘲热讽：「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27]

论战一直持续到 1944 年 7 月，期间吴俊升访问昆明，与联大、云大和中法大学校方高层及系主任讨论课程问题。云南高校教师认为，必修课应减少，选修课须增加。很可能是根据这个观点，教育部于 1944 年 9 月 11 日颁布了文、理、法和教育学院的课程修订稿。[28]

为使课程进一步中国化、标准化，教育部准备制定标准教学大纲。为协助实施这一计划，教育部要求教授提交课程纲要，联大教师认为这是对学术独立的进一步侵犯，只是象征性地表示感谢或者敷衍了事。到 1943 年，教育部推荐了 42 门必修课的教学大纲。没有证据表明其中任何一个是联大的。教育部还批准了官方认可的 163 种教科书。尽管每位教授对是否采用这些著作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种干预学术自由的官僚行径还是饱受谴责。[29]

最受学生反对的措施是实行毕业总考制。这场考试包括对四门专

业课的普查，并强调考核主修专业的基础知识。像其它许多统一执行的措施一样，毕业考试是根据欧洲制度按照中国需要所作的改革。虽然其它学校有人发牢骚，并有零星的反对，但只有联大全校一致抵抗。在这项规定实施的最初两年（1939 和 1940 年），联大是唯一一所学生拒绝参加考试的学校。虽然这个问题与教授本人无涉，但他们对学生给予道义支持。对此，教育部以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相要挟，联大便自行其是。最后教育部做出让步：联大学生需参加考试，但全部自动通过。联大不必把分数上报给教育部。这场论战以这种保全脸面的妥协告终。从 1941 年起，联大连这种过场都不走了。[30]

教授更为关注教育部对教师聘用和等级的控制。教育部声称，鉴于极度缺乏规范的学术标准，因此有必要为所有高校教师设定统一的等级标准，而且任何教师都得向教育部登记备案，以确定恰当的等级。教育部还援引国联的调查报告支持其措施的合理性。正如吴俊升所承认的，是私立学校，而不是公立大学，普遍存在教师水平问题，但官方的规定却仔细分辨。经过八个月的调查——这个措施几乎遭到北大、清华和南开所有高傲的教授的抵制——官方公布了一份合格教授的名单。联大大约有 170 名正、副教授，但只有 31 人榜上有名。对于联大的桀骜不驯，教育部官员极为恼火，据说准备停发薪水，但龙云宣称，那样的话，他将会照工资单支付。蒋梦麟访问重庆之后，工资问题才告解决。[31]

休假制度的建立，及部聘教授的设置（大约有三十个席位），促进了教员登记。只有登记过后的教员才有资格获得那些高薪职位。但是，这并不足以使倔强的联大人改变主意，最后学校决定代教师登记——又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法。在 1942 年 11 月到 1944 年 3 月间，第二轮登记得到 122 人支持，超过联大资深教授人数的三分之二。[32] 在吴俊升看来，新规定不仅保障了最低标准，成绩通用的原则还有利于学者流动。然而，有位批评家指责道，在中央政府决定雇用的条件下，教授沦为政府雇员，不再是自由职业者。[33] 毕业生和教师对一系列控制留学的举措更感惊诧。1938 年 6 月，教育部宣布，「派遣学生出国

留学限制在准备研究军事科学、纯科学、工学、医学、与抗战和国防密切相关或有直接用途的学科。」[34]

1943年，政府利用职权进行思想控制，强制实行更严厉的措施，规定学生和功成名就的学者都得参加带有三民主义问题的考试。即使过了这道关卡，他们还得到中央培训团主管的训练营参加一定时期的「道德培训」。这引起了中美两国自由主义教授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这些规定将导致粗暴蛮横的思想控制；结果，道德培训的要求被降低。[35]抗战即将结束时，教育部下令只有未曾出国的教师才能获得官方资助出国留学。其它学校基本上都遵从了这一命令，只有联大严格按照学术成绩选拔被提名者。结果，四名联大学者中只有一人被选中，因为他此前从未出国。[36]教育部甚至限制国际学术交流，抵制美国经济援助，并要求联大报告且撤销任何有外国人参与的文化项目。[37]

训育

在教育部令人厌烦的必修课中，有一门强制开设的新课，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其它规定不同，推崇欧洲的惯例的现代派高校教师认为，那些课是可以接受的，而这门课纯粹是宣传——明目张胆地尝试实行「党化」教育。这项措施是为了贯彻蒋介石的宣言，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是「教育的最局准则」。实际上，这门新开设的必修课是战前「党义课」的继续，大概是以为换个名字学生就不会那么讨厌它。最初，这是一门不计学分的基础课，但1941年教育部规定，这门课四学分，一学年修完。[38]

官方通过篡改课程影响青年思想的企图遭到联大教师的强烈抗议，其中最强有力的反驳意见是由国民党党员、政治学家钱端升提出的。作为一名忠诚的批评者，他运用高明的策略发挥了惯有的作用。他承认，道德进步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就像蒋介石的模范行为会对其他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样，以个人为榜样不是可以实现这个令人称道的目标吗？凭借现有的课程，学生也可以在无形中树立自

己的价值观，专门开设这样一门课实在是多此一举。[39]

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官方宣传灌输的教育观大相径庭，二者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潘公展和潘光旦身上，他们相互辩论了好几个回合。潘公展是陈立夫领导的 CC 系的重要成员，潘光旦是联大腹笥渊深的社会学家。针对那些把宣传灌输同教育混为一谈的人，潘光旦明确指出，教育者的工作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潘公展反驳说，只有拥护「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才会有这种观念，他们使我们相信，教授对自己的思想是不负责任的。危机深重的中国承受不起混乱无序优柔寡断，而这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自由造成的。[40]关于教育与宣传的辩论被联大经济系学生马灿华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今日评论》上撰文主张，所有真正的思想都是从怀疑中产生的，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41]

对极其谨慎的《今日评论》主编钱端升而言，马灿华公开重申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超出底线的。他罕见地动用了主编的特权，对该文作了附加说明：「我们对思想问题向来主张自由，向来主张容人怀疑；但对于三民主义探求应是第一着，怀疑应是第二着。」[42] 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同时，钱端升抨击意识形态多元主义，至少他把执政党排除在批评调查的范围之外。他承认，「无论如何，怀疑总应在许可之列的。」

最终，联大不得不同意开设三民主义课，但它对这一规定执行得很巧妙。负责这门课的责任落在陈雪屏身上，他是教育心理学教授，领导联大三民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主席。陈雪屏洞悉人情世故，深知联大师生不会容忍在「正课」讲授党义的行为。他的办法是把这门必修课变成夜间的系列讲座，邀请著名教授演讲以增加课程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例如，冯友兰探讨作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伍启元则谈论孙中山思想的经济后果。1943 年初，教学大纲须围绕蒋介石的新书《中国之命运》的主题展开。[43]

激发学生对三民主义课的兴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根据在北京出

版的清华大学校史，除了三青团成员外，几乎没有学生上这门课。一位现居美国的 1943 级毕业生回忆说，甚至忠诚的三青团成员也不把它放在心上。[44] 虽然教育部规定只有通过这门课才能毕业，但联大从没有遵守过，而是自行授予学分。[45] 有些老师只得要求学生定期上交读书报告，但只不过摘抄几段话，应付检查了事。许多校友根本不记得有过这样一门课，更别说是一门基础必修课，也就不奇怪了。

从 1942 年秋天开始，除了三民主义，学生须再修一门伦理课。全国高校增加的这门必修课是应蒋介石个人要求开设的，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讽刺的，其目的是「注意阐述先哲人嘉言懿行，暨伦理道德方面多种基本概念，用以砥砺学生德行，转移风气」。这门课有两个学分，由冯友兰讲授。他从自己的《新世论》、《新原人》等著作中抽取部分内容讲解。他在室外演讲，一度还有些听众。但是，像三民主义课一样，这门课也没有得到尊重，上课人数逐渐减少。1945 年秋，它不知不觉地从学校课程表上消失了。[46]

然而，执政党并未就此干休。针对联大学生对思想灌输的「免疫力」，一个常见的措施就是增加灌输量。训导长查良钊每月主持召开「精神动员大会」，邀请党政要人训话。训导处领导下的军事管理组用来监管军训必修课，使学生生活充满军事作风。[47]1944 年春，联大被迫举行总理纪念周，但它自有办法对付官方规定。纪念会安排在上午 11：30 开始，这正是学生午餐的时间，所以校方允许只有少数学生参加。[48]

军训

军训是教育改革者的又一个难题。毋庸讳言，中国当时仍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因此把大学生发展成训练有素的教官后备力量的设想颇为诱人，然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仍对军人抱有敌意，而军阀时期军人的可耻形象（甚至在国民政府时期改头换面继续存在）更刺激了这种情绪。虽然蒋介石努力打造一支现代的国民军，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士兵基本上不是自愿承担爱国义务的英勇的国民，而

是大批一贫如洗的文盲，他们成为反复无常的征兵制的牺牲品。

学生竭力要求制定抗日政策，无意反对军训，因为自 1928 年起，大学一直设有这门课。然而，从一开始，这门课就受到许多困扰。在学校开设军训课的同时，政府却采取姑息妥协的政策，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使这门课的威信大打折扣。此外，军训教官的文化水平无一例外都比学生低，这使得学生更加鄙视军人。何况，这些教官大都是黄埔系蓝衣社成员，这伙人把中国的大学视为自由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温床。

从 1935 年起，大学增设军训夏令营。这个做法在昆明继续实行，1938-1939 学年开学前，学生被派去参加两个多月的训练。第一次女生也参加了。她们不服从命令，拒绝剪齐耳短发，还哄骗教官允许她们擅自请假，这使她们颇为出众。[49]有些男生对军训显露出鄙夷之意，沈从文教授为此写了一篇〈给青年朋友〉。他在文中提醒受训的学生，当今的国难和以前的军阀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宣称，参加军训是光荣之举，而不是耻辱。[50]

在统一的大学课程制度下，军训成为所有男生的必修课。大一学生每周都得上半天不计学分的课。由于政府实行学生免服兵役的政策，学生便认为军训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常常同教官发生摩擦。一位校友回忆，「那些少爷兵着实不好对付。教官对不迭被子之类的小错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于学生公然藐视纪律、无视命令的行为决不轻易放过。[51]

至少有两个任性的青年为违抗命令付出了代价。1939 年，陈志让因未能起床参加升旗仪式和军训而失去教育部奖学金。[52]1938 年春，历史系一位优秀的学生徐高阮离毕业只有两个月时被开除。他拒不服从在他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命令：教官要他立即腾出宿舍书房，因为书房有其它用途。[53]学生反对军训，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这门课呆板乏味，毋宁说它就是个笑料——除了「立正」、「稍息」、「向后转」，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武器的训练，更别提战术和战略了。1942

年 12 月，当局突然宣布要视察昆明所有学生的军训，这使得学生对这门课的敬意大打折扣。教官担心散漫的联大代表团太「特立独行」，便借来皮带、绑腿和棉布制服，这样一来，乔装打扮之后的青年就不得不卖力地表演这种闹剧了。[54]

几乎没有人不同意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对联大军训的概括——「一个笑柄」。[55] 即便如此，迟至 1944 年 12 月，仍有 130 名教授开会，想方设法扩大并强化联大的军训课。他们建议削减或压缩无关紧要的课程，增设实用科学，师生一同训练，当局提供必要的设备。其言外之意甚为明显：此前的军训计划不周，管理不善，装备不足。

尽管反复改革，但从军事观点和理性的角度看，这门课越来越站不住脚。1945 年，它终于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的新政策，即直接选拔学生参军，到正规的军营中接受训练。

训导与控制

在黄坚立看来，战时军事教育的目标是「灌输纪律，塑造健康向上的国民」。[56] 训导处是联大三个主要行政机构之一（另两个是教务处和总务处）。其主要职责是控制学生思想和行动。训导处配合党和政府组织开展工作。国民党联大区党部负责「协助学校行政」，三青团分团部「协助学校训育」，训导处则执行「党部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委托事项」。[57] 联大当局赋予训导处较少政治化的职能，使其支持学校开展学术工作，发扬三所成员学校的优良传统。1988 年昆明出版的一本书总结道，联大的训导处与其它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58]

训导处的任务是「学生思想之训导」，「社会服务之策划」，「学生团体登记与指导」，及「军事管理之监督」。在发放贷金和奖学金方面，训导处握有重大的权力，它还负责登记、审核所有学生社团及其活动。有少量例子表明，它曾以经济手段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这对其他人或许有警戒作用，但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它是有系统地运用经济权的。

同样，训导处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在原则上是毫不放松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很有分寸的。[59]

训导长同时也是导师制的主要负责人。导师制是教育部于 1938 年试图在中国所有院校实行的制度。在官方看来，它的使命就是把教育制度从「放任主义、个人主义之浪潮」中拯救出来。[60]教育部认为，中国现代大学过分注意知识传播，却严重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导致师生关系「疏远」、「商业化」。[61] 其计划是，每个学生联系一位深谙世事的老师，这位老师不仅是学业上的导师，而且是精神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引导者。在以一年为期中，规定教师要对学生思想和活动进行「道德教化」，并为训导处坚持做好「详细记录」。[62]历史学家罗滋（Jessie Lutz）写道，「导师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负责，学生的毕业证书上应有导师对其学术立场、思想和行为的评价」。[63] 学生的成绩会给导师带来荣耀，而偏离常轨的思想和行为将归咎于他们。

教育部声称，新制度综合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点与声名显赫的「牛津剑桥」制度的长处，但它与传统道德家长作风有牵连，现代极权主义技能使得这种作风变本加厉，导致这个建议在整个高等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有位批评者指责道，实际上「监视和压迫比规劝和对话更显著。」[64]

重庆当局实行导师制的建议激怒了联大教师。他们注意到，在道德说教和乞灵于牛津ー剑桥模式的背后，隐藏着迫使教授负责宣传官方制定的政治和道德规范的阴险动机。然而，质疑正统价值观的重要性是不明智的，否认教育有道德的一面也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大部分批评者把矛头指向建议的可行性。对移植牛津、剑桥的导师制最尖锐的反驳来自于国民党的忠诚拥护者、新儒家冯友兰，他指出教授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学生施加道德和政治影响。[65]面对联大教授铺天盖地的反对，这项倡议一开始就沦为一纸空文。

为改变局面，教育部指望查良钊给导师制带来活力。查氏时年四十二岁，是来自河南的教育家和学术负责人，曾担任河南大学校长、

教育部特别顾问，与南开和清华都有密切的联系。他毕业于南开中学，留美之前在清华进修过一年。1938 年 12 月，他以教育学教授和师范学院首席导师的身分调入联大，很快被任命为全校的训导长。本校的人被精心安排担任这个职位（很可能是老友黄子坚的推荐），象征着联大反抗 CC 系的胜利，因为后者企图在这个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人。[66]

就查良钊的性格而言，他似乎不适合扮演儒家式的严父或苛刻的国民党「训导长」的角色。事实上，他几乎与仁慈的美国大学院长没什么两样。他无意否认其政治职责（经常当中间人以保持与省市当局的友好关系，偶尔扮演意识形态压制者的角色），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充当联大的「菩萨」——教务长潘光旦为他起的绰号——对学生而言，他是个热心人、施主、倾听告解的神父及道德规劝者。他花费最多时间照顾学生的需求：吃、住、穿。缺少大米时，他到市里和周边地区仔细搜寻。通过国民党秘密管道从沦陷的北平来的学生，一到达昆明就能获得他主管的青年救济会的关照。学生想获得政府的补助就应该去找查良钊。因为他早起早离家是出了名的（即使七十多岁了，早上八点之后他仍然从不在家），要找他办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凌晨赶到他家门口，门一开你就扑上去。如果这个方法第一次没有奏效，那就接着拜访，因为他很喜欢考验年轻人的毅力。

联大在昆明安置妥当后，查良钊加入了这个群体，而他曾亲身经历具有同样重大影响的历史——背井离乡，长途迁徙，历尽艰辛——率领一千七百名中学生和老师从西安跋涉到甘肃天水，与此同时他的同事黄子坚正带领旅行团从长沙走向昆明。在跋涉途中，为弄清学生每天靠两毛钱生活是否够用，查良钊也用同样多的钱。他曾说，在中国最近的历史上，曾有三次「长征」：毛的，联大的，还有他的。在许多方面，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并且对人类精神信心十足。他为联大带来了直率豪爽、亲切友好、乐观实干的作风。他说，「没有办法」这句口头禅应该从年轻人的词汇表里消失。有时候他把这个世界看成他渴望的样子，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数年后，他在台湾流

亡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是极少数仍然坚信旧口号「反攻大陆」者之一。作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他不但口头上如此，而且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热诚工作。

查良钊对「现实原则」的漠视为他赢得了一部分联大学生的爱戴，却也遭到另一些人的蔑视。（负面意见有多深，蔑视就有多深，但是连极左的批评者也不恨他。）他被普遍认为是个「老好人」，这个词既有尊敬的意思也有贬损的意味，是指一个人心地善良，充满同情心，但在智力上却是个平庸之辈。[67]然而，他在联大的使命要求他具有高尚的品德，而不是敏锐的学术能力。虽然有时候在中国大陆等地的校友回忆起他时，有人会说他是一位政客，但是他对联大学生的同情和深切关怀使他拥有一大批钦慕者，尤其是在台湾的校友。在西南边疆看似永无终日的艰难的流亡岁月，查不仅为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还为他们点燃了一盏乐观的希望之灯，所以一定得赞扬他。[68]

联大与执政党

与共产党相反，国民党强调党员的职责，而不是荣誉。国民党一直逼迫他人加入本党；个人地位越高，这种压力就越大。1939 年夏天，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前教育部长，在国民党学者圈中拥有大批追随者）派蒋梦麟去昆明改组并加强联大区党部。在联大领导的茶会上，蒋梦麟宣布，凡联大领导和各学院院长，还未加入国民党者，都应赶紧加入。当场有十人报名，但张奚若（政治学系系主任）等人拒绝加入。[69]

联大高层领导几乎全是国民党员，因此这样下结论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学术政策都是由学校党政机关制定的。然而，据冯友兰观察，事实远非如此：「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70]而且，因为国民党强制他人入党的手段，导致它在争取友情的同时常常使朋友变成敌人。在一次私人聚会中，梅贻琦正在招待教师，军统局的人员却在分发入党申请表。[71] 据说

查良钊曾写信要求同事入党，这是他使其它人疏远潘光旦的一种手段。[72]

在 1939-1940 学年期间，国民党派出一批官员三番五次发动二十名大名鼎鼎的教授入党。最后，不管这些教授是否同意入党，他们的薪资中有一部分会被当作党费扣除。这种手段使一部分人屈服了，但另一些人顽抗到底。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宣布，他宁愿辞职也不入党。[73]

联大的高层领导者不得不屈服于意识形态宣传。在冯友兰看来，这种宣传灌输是「培养他们对于蒋介石的个人崇拜」。[74] 除了像梅贻琦这样的召集人要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国民党每月还在室外开会，邀请头面人物演讲以转变昆明学者怀疑的态度。最初几次，大家怀着好奇心前去一探究竟，此后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开会前退场。因到场者寥寥无几造成的尷尬还不是个大问题，然而，要是演讲者是个位高权重的超级大人物，则不免尴尬之极。1939 年 12 月陈立夫访问昆明时便出现这种状况。陈氏造访的官方理由是出席工程大会，考察云南教育。在吴俊升和其它达官要人的陪同下，陈立夫趁机承诺提高战区学生的政府补助。在他访问的同时，当地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对陈氏喜好的某些政策作了一次温和的宣传——统一课程设置、学分的再教育、教学大纲中国化、统一编撰出版教材，及加强对德育和体育的重视。[75]

在云南的十二天，陈立夫大约作了三十五次演讲，其中一次是在联大。那天，学校关闭校门，使得无法逃离的听众不得不听陈氏演讲。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但据一位校友回忆，有几位教授借机提出他们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学术自由。陈立夫告诉联大学生，他们是为党为国为将来而学习。最后，就在这时候，全体学生握紧拳头高喊，「抗战到底！」「民族第一！」「国家至上！」年轻的知识分子认为整个演讲令人作呕。[76]

由于在云南的经历，陈立夫大为不悦。离开云南之前，他对导师制、学校军训和教育部其它政策的贯彻不力表示失望。离别之际，他

缓慢地申述官方的儒家「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并认为这是中国将来复兴在于教育之证明。[77]

然而,陈立夫在访问期间再三强调「八德」,却未能解决国民党理论家与自由主义教育者的严重分歧。联大同教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牵涉到政治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校训问题就是这一冲突的象征。1938 年 11 月,联大选定「刚毅坚卓」为校训。但蒋介石坚决要求所有学校都得采用「国魂」,也就是他宠爱的儒家伦理——「礼义廉耻」——作为校训。联大也把「八德」定为道德训育的重点,把国民党的道德准则当作衡量青年的标准。[78]

在陈立夫露面以后,他的手下继续为党的政策而奔走。陈氏离开昆明四个月后,国民党坚定分子潘公展在昆明《中央日报》上撰文抨击持不同政见者。他宣布,三民主义是唯一正统的思想,必须绝对遵奉,并称有些学生还「迷惑憧憬于不合国情的幻想」。他接着指出,「须知今日的青年思想的歧误,与其说是青年思想问题,不如说是教师思想问题。」许多老师游离于三民主义之外,有人认为教授入党是不正确的,对此潘氏极为恼火。他敦促教师成为「三民主义革命斗士」。[79]

在第三篇文章,潘公展力劝教师把孙中山思想当作「性命攸关」的准则,竭尽全力发展党在学校的事业,并吸收教师入党。他主张进行全面清洗各个机构,尤其是学校图书馆,以肃清「曲解三民主义或违反党规」的书刊。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拯救「被毒害的无辜青年」。[80]

潘公展认为,只有绝对服从,实行彻底的官方审查,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出路。这个观点表明国民党教条主义者与联大主流思想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大概十分赞同这个观点:道德训育、军训、导师制、总理纪念会及党义课的开设可能有利于通才教育体制。[81] 但是,对大多数联大教授而言,国民党对神圣的学术殿堂加强控制是极其可恶的。

国民党的软肋

内部的涣散使得国民党和中央政府无力杜绝拖拉、甚至公然对抗等问题。国民党在原则上是个列宁式的组织，实际上却是山头林立派系混杂。蒋介石能在这个尾大不掉的政党中稳居首位，与其说是因为他有权对他们发号施令，毋宁说是他能巧妙地平衡个人和派系之间的内讧。

作为教育部的决策者，陈立夫的命令在昆明无法发生效力，除非他获得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的配合。因此，他不得不依赖梅贻琦和蒋梦麟这两位教育界经验丰富的政坛老手，他们深知该如何办事才会使教育部的声明不招人反感。在王世杰任职末期，北大政治学家周炳琳曾被任命为常务次长，一听说陈立夫将取代王氏担任部长就辞职了，陈由此失去与北大－清华教授潜在的纽带关系。[82]陈立夫后来只得依靠他精挑细选的僚属——顾毓琇和吴俊升。顾任政务次长，吴任高等教育司司长，两人分别担任过清华和北大的院长。

每个人都明白这些任命的重要性。顾、吴深知他们所处的位置是用来保护中国学术机构的利益的，而这些机构对一个以政党组织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身分著称的人持反对态度。陈立夫对此也心知肚明，而他更清楚的是，只有多委任著名学者，他所在的教育部才可能有权力控制中国的大学。没有这些人，他很可能会与北大－清华－南开集团陷入敌对关系；有了他们，他才可能与他们有一点点合作。顾、吴的同事从这些任命中看到希望，承诺在关乎他们个人和事业的决定上会给予合作。实际上，顾毓琇是在蒋梦麟和梅贻琦的支持下接受这个职务的，而且很可能是蒋在幕后安排了这一任命。[83]陈立夫对这两位下属也有一定的好感。他们三人都不到四十岁，都成长于长江下游（陈立夫，浙江人，1900 年生；吴俊升，江苏人，1901 年生；顾毓琇，江苏人，1902 年生）。三人都至少受过传统的基础教育，都曾负笈海外。但他们共同的人生轨迹到此为止。陈立夫以政治为职业，而顾毓琇、吴俊升的方向与陈氏截然不同，他们俩都是学者兼任学术

领袖。

顾毓琇、吴俊升也并不总是合穿一条裤子。顾毓琇在清华读了八年书（1923 年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了五年（1928 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是个不折不扣的清华人。在浙江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短暂执教三年后，他回到母校担任工学院院长。吴俊升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任职，这两所学校都是南方文化保守主义的堡垒，随后转入北平教育界。念本科时，他汲取中国文化遗产和现代国家主义以调和早期受到的杜威派自由价值观的影响。在巴黎大学读研究生时（1931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他颇受欧洲教育思想[尤其是涂尔干（Durkheim）的社会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仍属于杜威派，但已经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杜威派成员。他排斥杜威著作中以个人为中心的放任散漫的思想，更倾向于强调纪律的、以社会为基础的教育方法。在以美国为向导的中国教育学者中，吴俊升发现似乎只有他一人支持国际联盟赴华教育调查团报告，该报告鼓吹欧陆模式，使课程设置中国化、行政一体化。[84]

作为政务次长，顾毓琇在教育部中屈居第二，显然得到了部长的信任，陈立夫不在重庆时就由他主管部里的事务。还有，这两人都是工程师，似乎很可能在运用实用学科培训学生方面达成共识。然而，顾毓琇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还创作小说、诗歌、戏剧和音乐作品——根本不会赞成狭隘专门化，也不会支持取消文科。而且，作为忠诚的清华人，他不可能同意集中权力肆意侵犯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的原则。顾毓琇与清华老友似乎仍保持着良好的交情，他经常访问昆明，与他们讨论教育问题。

在教育理念上，吴俊升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思想和个人主义转而更加强调传统和集体精神的重要性，而这恰恰适合陈立夫的口味。吴俊升主要负责向大学传达教育部的政策并敦促其贯彻执行，因此他所处的位置比顾毓琇更敏感，也更容易遭致批评；顾毓琇担任教育部次长，地位更高，职责更隐蔽。难怪有些以前的同事认为吴俊升成了「北

大叛徒」，把北大出卖给了陈立夫。[85]顾毓琇则没有受到这种指责。

金钱与权力

重庆方面的种种举措，对昆明的影响常常是微不足道的，有时甚至是负面的。教育部众多计划在联大是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是大可怀疑的。虽然联大被迫做做姿态，但事实上很多规定形同虚设。一位联大教授在追忆这些事情时，却不记得曾要求毕业统考，也不记得实行过课程中国化的措施，尽管他的确记得曾要求参加军训、学习党义。[86]联大所执行的规定要么是自愿实行的，要么是此前已经实行的，这种可能性极大。

对教育部的规定如此敷衍了事，联大是怎么做到的呢？即便粗略扫一眼这所大学的经济状况，就会发现它对政府资助的依赖到了何等程度，其经济负担沉重到了何等地步。教育部平均每年总共拨给联大一百二十万元，仅仅相当于战前清华一校的经费。因师生员工人数增加，拨款延期，以及因通货膨胀而贬值，这笔经费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真可谓杯水车薪。清华的经费由美英庚款提供，但随着全世界卷入战争，赔款基金时断时续，其数额也在减少。联大及其三所成员学校都被迫举债度日。从 1939 年 1 月直到 1946 年，清华透支额超过一千八百二十万元，而 1940 年到 1945 年联大借款的利息就累计一千四百万元。[87]

这些资料表明，假如政府拒绝拨款，联大尚不至于屈膝投降；但要是银行拒绝贷款，则肯定会出现上述局面。重庆方面即便没有威胁解散联大，也可能曾经以经济手段压制联大。但是，要摧毁联大是绝无可能的。且不说研究机构之威望、师资力量之雄厚，单单这三座学府的地位，就足以让这个举措变得匪夷所思。任何对联大公开的攻击都会激起中国知识界一致的反抗，他们就会揭穿国民党政府自诩为中国文化保卫者的谎言。

官方是否对联大动用了更加隐蔽的手段迫使其就范，这是一个有

待论证的问题。1943 年 8 月，费正清报导了他刚刚访问张奚若的情况：

作为一名资深教授，他决不妥协，要求中央政府在权利问题上支持国立大学教授，并允许他们享有教学自由。教育部持不同的意见，结果我的朋友及其同事只得每月继续领三千元国币，而（这个月）就得花一万元才能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88]

一年前，费正清已报告过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未能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逐渐走向绝境」。[89] 没有证据表明，重庆官员企图致昆明的教授于死地，但不考虑昆明极其高昂的生活费，吝啬地分配匮乏的资源，根据这种方案，肯定会削弱大学的实力。[90] 联大教师仍然支撑着，但日子过得更加艰辛，这所大学作为独立思想的堡垒仍屹立不倒，并最终成为顽强反对重庆政府的壁垒。

六 联大的学风

三校联合为联大……溶合成一种既同于北大、清华、南开，而又不完全同于任何一校的新特点和新风格。——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

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三校各具特色，各有其历史、传统和风格。在这方面，联大与战时由华北另几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不无相似之处。不久，西北联大沦为私人和机构争斗的牺牲品；然而，西南联大在合作、和谐和宽容的精神下坚持了八年。

联大三校

要理解联大成功的经验，我们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北大、清华和南开。[1]

北大

国立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 1898 年，是维新运动的产物。辛亥革命后，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简称「北大」。京师大学堂位于一国之都，享有官方优待，很快被誉为中国的最高学府。由于学生都已成人，且是有所建树的学者，师生关系就成为一种为追求真理而相互协作的师徒关系。这一理念成为北大的传统。[2] 因为热衷于猎取功名，政治和国事便成了北大学生经常谈论的话题。而且，在 20 世纪中国政治转型的每个阶段，北大学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 创办伊始，大学堂的课程设置就以中学西学并重。1905 年科举制废除后，西学开始占据上风，但是北大仍然以中国传统的史学、哲学、文学和语言学研究著称。

北大在蔡元培长校时期形成自己的传统。蔡氏受过传统教育，颇

有革新思想。1907 年，蔡元培三十九岁，赴欧学习，四年后回国。在此期间，他深悉世界教育潮流，1916 年 12 月成为北大校长后将其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他把北大视作古今东西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广阔的相互交流的平台，可以客观地研究、自由地辩论、有分别地进行选择。

为贯彻这一理念，蔡为北大延揽了一大批独具个性和思想的学术明星：反传统的自由思想家陈独秀、千禧年玄学家李大钊、师从杜威的实用主义者胡适、疑古派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蔡元培学术自由原则的指引下，这些教授及其学生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传统遭到批判，而西方思想被引进、检验和倡导。在激烈的反传统高潮时期，蔡元培仍然为辜鸿铭这样的学者保留了荣誉席位。辜鸿铭时任北大英国文学系教授。他曾在牛津学习，但留着长辫，赞成缠足，支持纳妾，拥护儒家君权，在他看来这之间并没有冲突。对古怪的饱学之士的宽容也成为北大学术自由传统的一部分。

北大也是激进民族主义的发源地。1919 年 5 月 4 日，北大率先发动反帝反军阀的游行示威，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这次示威游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使得胡适等实用主义改革者和陈独秀、李大钊等政治激进主义者从此分道扬镳，这也成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裂点。陈、李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20 世纪 20 年代，北大仍是激进民族主义大本营，也是学生反对军阀运动的中心。1931 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三年后，北大迎来蒋梦麟长校时期。蒋竭尽全力把北大打造成世界级的大学。为此，他压制激进的学生运动，设法使北大成为中国政治风暴的「台风眼」。

北大通过合并、扩充、增长而发展壮大，因此它的校园由不同时期获得的不同楼房组成。北大在校园布局上缺乏中心，又位于北平中部，这使得其校园生活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北大学生总共不到一千人，却无法为所有人安排宿舍，因此有许多学生住在校外。杂乱无序的斑驳的红楼，也无法为课外活动提供具有吸引人的聚会场所。没有每日举行的升旗仪式，没有早操锻炼，没有学年大会，也没有毕业典

礼——在这种环境下，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庆典活动，北大自然难以营造集体生活的气氛。[4]

个性张扬、自由放任的北大精神，体现在灵活的入学标准、宽松的课程要求及宽容的态度上。北大使学生孤立；室友经常在宿舍中间挂一张床单，四年时间没说过一句话。[5] 最初的学生多为旧日的官绅子弟，留给北大永难消褪的贵族作风。北大学生可能是怪异的天才，凭兴趣选择科目，随便旷课，通宵达旦唱京剧也不当一回事。他们几乎不用概论性课本，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他们穿褪色的长袍，上面打满补丁。与正餐相比，他们更喜欢光顾小吃店，以此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除了在抗议运动中表现出正面的组织政治活动的才能外，北大的学生天马行空，放荡不羁，特立独行。

清华

清华学堂成立于 1911 年，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8 年改为国立大学。在办学缘起、发展历程和校风建设上，清华与北大迥然有别。秀丽的清华园位于北京城外，其前身是一座皇家园林。在这迷人的自然环境下，清华园里竖立起坚实的现代建筑，并配有便利的设施。与之相比，北大学生依赖校工送水到宿舍，清华学生则可以在宿舍享用自来水，在体育馆享用热水淋浴。

在这充满魅力、实行自制的环境里，清华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不仅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体育活动，也有许多文学、音乐和戏剧社团，还有一大批研究团体、班级社团及形形色色的集会。冬天，学生还组织滑冰协会，他们在大礼堂前的湖面上翩翩起舞。因为总有各种活动，学生几乎没有理由要离开学校。除非在周末，他们才乘坐每小时一趟的公共汽车到城里聚餐，或拜访朋友。[6]

与北大学生的自由散漫不同，清华学生过着秩序井然、按部就班的集体生活。在以西方议会为模仿对象的大会上，一位观察者这样写道：「庄严的发言，庄严的听着，庄严的举手表决。」[7] 无论什么季节，

男女学生都要到室外上体育课，都穿着短裤做健身操。每日下午五时，他们成群结队来到田径场、篮球场或游泳池参加更多的体育活动。清华人对竞技体育的热情体现在学校的英语口号上：“Fight to the finish and never say die. ”与课外活动一样，清华的学术生活谨严而又条理。北大可能允许学生偏科，清华则只录取在入学考试中全优的考生。至少，清华要求大一学生通过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课以拓宽知识面。教授上课一般都会点名，不时进行大考小考，而后根据讲义授课，这是典型的清华作风。正如萧公权教授所观察到的，清华学生「阅读和思想的能力都不弱」，并且「对学术发生了兴趣」。[8]

清华学生热爱传统的蓝布长衫胜过西服，他们在课外几乎不说英语。尽管如此，与包括北大在内的其它国立大学相比，清华明显带有美国的印迹。每个清华学生都能说几句英语，许多人说得相当流利，而北大几乎没有学生能娴熟地用英语交流，甚至包括外语专业的学生。留洋深造的北大学生的确是屈指可数，而清华的传统则意味着几乎所有学生都能负笈海外。[9] 在教师当中，由于广泛使用英语，某位外国教授夫人在清华生活了二十年仍可以对汉语一无所知。[10] 如果把体育竞赛、捉弄新生、校友会及大学作风等源于美国的传统考虑在内，北大和清华校风的对立就更加显著了。

南开

跟清华一样，天津城外的南开校园风景优美，到处都是坚实的现代建筑。作为华北重要的通商口岸，天津不可避免地给临近的南开带来某种布尔乔亚的商业气氛。虽然中国所有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城市资产阶级儿女，但南开在这方面上更加明显，这部分是因为，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南开的学费比国家资助的北大和清华高。南开最杰出的教授集中在商学院和闻名遐迩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商学院是南开独有的学术机构，北大和清华都没有。

但是，南开的校风并不仅仅得到市场道德的激励，还应归功于它的创办人、校长和精神导师张伯苓。作为年轻的海军学校毕业生，张

目睹了列强对中国的欺侮，用他自己的话说，「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他因此「立志终身从事教育救国事业」。[11]1904 年，他与严修一道创办南开中学。（梅贻琦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周恩来毕业于 1917 年。）最初，南开中学仿照日本模式，但不几年，从美国归来后，张伯苓采取了麻省 Andover 的菲利浦学院（Phillips Academy）的学制。[12]〔此注放在前一句话后似更恰当。〕张伯苓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热心的会员，因此南开中学很重视宗教和道德的修养及体育锻炼。

南开大学创办于 1919 年，继承了南开中学的理念。张伯苓的爱国情操和求实作风体现在南开校训上：「允公允能」。[13]南开学生在学业上合乎规格，偶有特别优秀的（如数学天才陈省身），但他们既不像清华学生那样多才多艺，也不像北大学生那样善于独力创新。

北大学生以拥有诗人、哲学家和文艺鉴赏家而自豪，且不乏赞成寒冬夜饮温酒的特出之士。清华人以篮球队队长为榜样，他们毕业后很可能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或哈佛深造，闲暇喜欢打桥牌、看电影。南开学生有点像美国本科生，活泼开朗，乐观向上，稍嫌稚嫩，热爱集体活动，擅长短期规划，但很少思考未来的宏大问题。对他们而言，课外活动特别重要，因为南开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并特别讲究群育。在体育教学方面，讲集体荣誉，讲运动家精神，讲互助合作，讲坚持到底的精神。反对锦标主义，反对个人出风头，反对胜利第一。同样，这种注重团队的精神对办校、学习和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4]

三校一体

三所大学一旦组成西南联大，各家便争相阐发各校对联大的独特贡献：「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15]「北大开放，清华严格，南开活泼，而联大是三者的融合。」[16] 联大融合了「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17]「南开是顽皮好动的孩子，

却不免是活泼可喜的；清华沉着和气，有中年气概；北大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深沉老到。」[18]

在经济学家戴世光看来，联大的学风可以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这些特色继承了三所学校不同的传统。教授治校源于清华，由教授而不是校长来聘请学者；学术自由相容并蓄是蔡元培时期北大的传统；注重实干来自南开，商学系就是其典型代表。[19]校友金长振认为联大糅合了「北大的主动自由，清华的活泼进取，南开的踏实严谨，形成了学生奋发进取的性格，认真求知的态度，主动自发的行为」。[20]

南开自称是「民国时期唯一一所在国内取得显著地位的非教会大学」，[21] 但它无疑是这个联合体中资历较浅的一个搭档。因此，恰恰是南开从这些简洁的格言中获益最多——这些格言在修辞上赋予三校平等的地位，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难怪最有名的描述是黄子坚拟定、陈序经和查良钊宣传的：「南开坚定如山，北大深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黄、陈和查都是南开人。

幸运的是，三所大学不必仰赖诗一般的语言获得团结。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历史相互纠结，错综复杂。正如冯友兰于 1941 年代表北大出席清华周年纪念会时所指出的：「我是北大毕业，现在是清华的文学院长；而北大的文学院长胡适之先生，却是清华毕业生。」[22]1946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注意到，他同时是南开的校董，还是全美清华同学会总会长。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理学院院长（饶毓泰）都曾是南开教授。北大数学家江泽涵是南开校友，清华校长梅贻琦、教授朱自清也是南开校友。〔朱自清是北大校友，不是南开校友。〕这种例子举不胜举。[23]

三所学校创办时间不一，各自的发展步伐也不一致，但几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大是其他院校的基地。清华早期「五霸」中有三位教授出身北大，即刘文典、冯友兰和朱自清。[24]20 世纪 20 年代，公立大学财务吃紧，教师薪资没有保障，于

是许多杰出的学者选择了经费稳定的南开，当然张伯苓的个人感召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中学之一，南开中学为北大和清华培养了许多教授和学生。南开中学与清华有异常紧密的联系。长期以来，南开和清华这两所大学在足球场和篮球场上旗鼓相当。20 年代，南中学生的共同愿望就是考入清华。[25]1927 至 1928 年间，清华诱走了一批优秀的南开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蒋廷黻、经济学家萧蘧、生物学家李继侗及政治学家萧公权（步入清华之前，他还曾在东北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几乎一夜之间，清华从学者的接收站转变为输出地，它派到北大开课的教师，比北大回派到清华授课的教师还要多。[26]

历史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相互影响，除此之外，有些联大教员还有亲属关系。教授队伍中有兄弟，比如，闻一多（中文〉和闻家驷（外语〕，费孝通（社会学）和费青（法学），冯友兰（哲学）和冯景兰（地质学），还有许多人有姻亲和叔侄关系。这种关系跨越北大ー清华ー南开之间的界限，不分学科，有助于将联大教员变成联系紧密的共同体，俨然一个大家族。「在高校长大的孩子」在学生当中也很突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他的父亲杨武之曾是数学系主任。如果把叔侄甥舅关系考虑在内，我们可以绘制出一个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网，这个网络更加强了师生之间本已很紧密的联系。[27]

共同的战争经历促成了集体感。联大师生来自华北校园，而今远离大都市，安扎在偏远的昆明，都曾历经战争的艰难和贫穷。陈岱孙回忆：「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28] 在这种处境下，以前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教师和谦卑遵从的学生前所未有地亲密起来。有时候，老师和学生一起研究新材料。学生敢于质疑教师，而教师带着欣赏和尊重予以答复。有时，未经提示，教师发现讲授有误，就赶紧改正。学生之间也互敬互爱，切磋砥砺。[29]

三校联合优势互补，使薄弱环节得以加强。例如，清华率先在理科和工科方面取得卓越成绩。通过聘用留美深造归来的本校毕业生，清华能够紧跟现代科学发展前沿。1931 年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他为一批研究型教授争取基金，聘请年轻有为的学者取代能力较差的年长学者（其时中国学术界还没有终身制），也开始努力发展北大的自然科学。这一时期，北大、清华和北平研究院的科学家联合开设讨论班，以增强学者的团体意识。[30]

北大曾在社会科学方面引领潮流，但在 30 年代，由于国民党党徒的正统观念的压制，这些学科遂渐渐走向衰落。作为一所易受政治左右的国立大学，校长蒋梦麟又是坚定的国民党党员，因此北大不得不跟随官方学说，而清华拥有庚款基金，南开经费独立，它们都不像北大那样容易驯服。结果，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清华和南开开始超过北大。[31] 抗战前，三所大学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奠定了自己的声誉。北大和清华的差别在两校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就有体现。北大主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此说有误，应为《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以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和胡适整理国故为基础，他们采用了现代史学、考古学和文本考证的方法。而清华学者编有《中国近代经济研究集刊》，1937 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余秉权认为这是「中国最早把社会经济史当作一专门领域、开展深入研究的杂志」。[32] 南开经济研究所则致力于研究当时的经济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除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引领风骚，战前十年清华在人文学科方面也做出了颇有影响的贡献。梅贻琦虽是电机工程专业出身，但他与各学科的杰出学者都颇有交情。他主持清华校务时，有诗人学者闻一多、中国中古史大师陈寅恪、外交史家和思想评论家蒋廷黻、自成体系的逻辑学家金岳霖（除了蒋廷黻，其它人后来都到联大任教）。南开仍以卓越的经济学和商学研究知名，还办有化学工程学系（清华所无），因此为联大的工学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校教员不仅相互补充，而且有重合之处。他们志同道合，彼此尊敬，使昆明时期的联大自然而然地成为三校历史上互助协作的顶峰。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是三校共性增强差异减弱的交会融合之时。这部分是因为这个时期美国模式在中国教育中占主导地位。清华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特色，已经与南开相差无几，并且得到北大的认同。因此，当三校在昆明联合时，几乎无人反对这样的办学理念：所有学生在一、二年级都要接受通才教育，然后才能升入更高年级进行专业学习，此外还须通过平时的测验和考试。清华的学术等级制成了联大的制度。1937 年夏天，清华和北大准备举行联合招生考试，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尽管这一措施因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但这种合作的态势预示了美好的前景。[33]

清华声誉日隆，影响日著，与不同学校传统的交相汇合，在政治舞台上也得到了体现。虽然北大学生经常领导爱国运动，但 1935-1936 年的一二 •九反日运动最初是由城外的清华（及相邻的燕京）发起的。在运动过程中，联大三校相互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北大ー清华ー南开学生之间的竞争大约一直持续到 1941 年，也就是联大大部分学生在昆明开始大学生活的时候。为便于区分，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以字母开头的学号：P 代表北大，T 代表清华，N 代表南开，A 代表联大。这种标示延续了昔日的烙印。比如，按学号评分时，T 总是排在最前面，N 总是垫底。清华的学术优越感，加上清华师生在人数上的主体地位，使人们以为清华是主办学校。即使在今天，许多昆明的毕业生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清华校友，而不是联大校友。北大学生一秉其学校的贵族传统，拒不承认自己比他们认为缺乏想象力、只会考试的清华同学逊色半分。一看到南开学生差劲的学术能力和轻浮的布尔乔亚做派，清华和北大的学生对南开总有几分轻视。

尽管存在着这种竞争关系，但 1939 年有个观察者在昆明发现联大相当和睦的一面：「虽然佩戴不同的校徽，无休止地争吵，但他们至少不会打架。」与联大不同，在西北联大，「他们斗得头破血流」。[34]

学校高层的融洽协调更增加了联大成功的砝码。要是三位校长都想主导学校的管理，冲突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但南开的张伯苓远在重庆，有时候他向位高权重的朋友（包括蒋介石）进言，藉此协助联大。甚至在战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就对繁琐的校务失去了兴趣，他最终也去了重庆。作为一名积极的国民党党员（梅贻琦是出于工作需要加入国民党的），蒋梦麟和其他大学的领导人一道，疏通联大与政府高层的关系。

实际上，清华校长就成了联大的主要领导人，但由梅贻琦长校，其背后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逻辑：清华的教师和学生都比另两校的总和还多。由于拥有庚子赔款，清华不仅能够维持本校的运转，还奉献给联大。转移到昆明的图书和仪器大部分是清华的。[35]而且，梅的个人风范使他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理所当然的选择。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他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梅贻琦和妻子及四个孩子住在西仓坡一幢房子的楼上，他和儿子祖彦同屋。他们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家常的菠菜豆腐汤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梅贻琦每天步行上班，把归他个人使用的汽车让给联大。有一次，他因为校务到成都出差。他放弃乘飞机，为联大省了 200 美元，〔查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笳吹弦诵在春城》，第 68 页），是「节约两百多元」，而不是「美元」。〕不辞辛劳地搭乘长途邮车回校。教育部捐了一笔钱给联大，梅贻琦却不允许发给当时同在联大念书的四个孩子一分钱。当独生子祖彦自愿参军时，他表示支持。在处理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关系时，他不偏不倚。他还把工学院清华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36]

梅贻琦治校看上去像个道家——无为而治——而事实上，他事无巨细，一丝不苟。[37]他主持联大常务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蒋梦麟和张伯苓或他们的代表及列席的其它学校高层。他审慎而明智地给三校杰出的教授委以学校高层管理职务。常委会在名义上由三校校长组成，实际上由梅主持，其下设有教务处、训导处和总务处。教务长最初来自北大（樊际昌），然后是清华（梅贻琦和潘光旦）。训导长查良钊与

南开颇有联系。第一任总务长是清华的秘书长沈履。

1941 年，郑天挺取代沈氏，担任总务长。在联大校务管理中，郑天挺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在战前，郑担任北大秘书长。作为蒋梦麟的得力助手，他擅长处理日常事务。在联大，郑天挺职责更多。他协助梅贻琦负责具体工作，蒋梦麟缺席时他就成了北大的代表，并且是解决问题的总管。当学校遇到财政困难，是郑天挺去银行取钱发薪资，制定策略应对重庆的命令。每月临近发放教员粮食津贴时，他派代理到云南农村寻找最便宜的大米。同时，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指导研究生，还承担颇受好评的明清史教学任务。

在学院一级，三校之间也谨慎地保持均衡。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清华），法商学院院长先是陈序经（南开），后是周炳琳（北大）。清华理学院、工学院的师资都超过另两校，所以院长均为清华人。工学院院长是施嘉炀，理学院院长先是吴有训，后是叶企孙。师范学院院长由南开的黄子坚担任。在联大最后的岁月，梅贻琦在北平忙于清华复校，就由北大的傅斯年代理联大校务。

联大的行政机构精干、高效，不养闲职，拒绝冗员。即便注册组等重要部门也仅靠几个人运转。各系系务由系主任负责主持，辅以一两位助教或助理。伙食由学生自行解决。[38]

教授会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授权处理学校政策问题，不定期召开会议。它通常处理敏感而紧要的问题，特别是联大与重庆政府之间发生重大分歧——1945 年学生发起的一二・一运动就是最有名的例子。教授会每年轮流选出 11 名代表参加校务会议。校务会议还包括三位常委、各学院院长及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它讨论与学校有关的重要问题，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其职权为审议学校的预算，决定院系的设立和废止，颁行规章制度，添置建筑及设备，讨论改进校务。[39]

教授会为大学生活提供多方面的服务。教授答应学生的要求，为业余社团出谋划策，同意校务会议成立专门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大约有六七十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图书管理，指导防空工作，编制校歌校训，审查新生入学资格，指导一年级学生课业，审查毕业生成绩，颁发奖学金，租建校舍，聘任教职员等等。当学校 1940 年秋计划迁入四川时，有几位教授便率先到可能的地点勘查，最终决定在叙永建立分校，录取新生。[40] 教授治校基本上是清华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北大的传统；但是，由热心公益的全才管理社团和少数职员办公的理念，在毛泽东应对战时紧急状况时提出的方案中也可看到，即所谓的「延安道路」。

联大的顺利运转是对梅贻琦及其同事的礼赞，考虑到联大是「混合物而不是结合物」（周明道语），就更是如此。[41] 三校继续聘请各自的教员，向各自的校友作报告，各自授予学位，各自举办研究所，各自庆祝校庆，用各种办法维护自己的身分，包括保留各自的管理机构。陈岱孙时任清华法学院院长，尽管联大的法商学院院长是陈序经或周炳琳。如冯友兰所说，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42]

通才教育在联大

拥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联大是战时最大最全面的综合性大学，尽管它缺乏农科、医科和美术系。[43] 大学课程已很丰富，但新课仍不断增加。有些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增设的，有些是基于国际学术的新发展新开的。而且，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即便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的极为冷僻的专业课也能坚持下去。每学年开设的课程贴满了总务处办公室的墙壁，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的大山」。[44] 日复一日，学生们在那里逡巡徘徊，兴致勃勃地抄课表，准备选课。没有人能够将所有想选的课都列入自己

的日程表，因此旁听变得司空见惯。钱穆的「中国通史」选课者有数十人，旁听者多达数百人，以致座无虚席，后来者只能站在门外窗前听讲。[45]

联大实行学分制，修满 136 个学分方可毕业，〔应为 132 学分。〕但师范学院除外，因为它学制 5 年（包括教育实习），总共需要修 170 个学分。[46] 联大学生还得修完几门不计学分的课程：军训、「三民主义」及四年体育。各学院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安排不尽相同。文学院的必修课为 50 学分，选修课为 86 学分，法商学院和理学院也大致如此。[47] 平均说来，一个学生每学年要修七八门课，每天有三四小时在教室里度过。[48]

联大的目标是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正如梅贻琦所说的，「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49] 这一理念要求学生有开阔的知识视野，他们可以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50] 像它所模仿的美国的通识课一样，联大的课程有意避开狭隘的专业训练，让每个学生有广泛的选择空间。文法学院学生按规定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但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必修的两门社会科学可以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任选其二。每个学生都得学习哲学概论或科学概论。即便所有学生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课程，但在不同班级和教师中仍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而且在头两周可以自由加退选而不受惩罚。[51]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数理化概论由两三位造诣深厚、经验丰富的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讲授。其它课则安排在不同时间，或轮流开设。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各自讲授《楚辞》。彭仲铎和唐兰在其它时间也开过这门课。这样安排，可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使教师之间产生良性竞争。[52]

大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校的良好声誉，联大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子。根据战争形势，联大要么独自举办招生考试，要么与国统区其它高校联合招生。联大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被录取者往

往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都能竭力利用联大自由的学风。[53] 尽管如此，恰如陈岱孙所指出的，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闪闪发光：「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是进步的，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54]

不管是教员还是学生，联大都倡导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学生可以享用这种自由，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成绩评定方面，教师几乎享有全部主动权。在中国西式的大学被狭隘的、专业化的、僵化的苏俄体制改造了将近四十年后，回首昆明经验，一位历史系校友对联大模式深表钦佩：「因为年轻人的爱好和长处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对他们的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尽可能使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和长处得以充分发展。」[55] 当然，自由并不意味着松懈散漫。在联大，同战前的清华一样，其常规是经常测验，严格要求。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而在工学院和理学院月考两次。以理学院为例，计算上出现误差意味着会丢掉 50%的分数，方法上出现失误则意味着扣去 100%的分数。八千学生考入联大，但仅有三千八百人毕业，许多学生被「自然选择」所淘汰，这反映出联大严格要求的一面。[56]

联大教师

在 20 世纪上半叶，有两种模式——「京派」与「海派」——主导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一般认为，京派做学问比较扎实，思想倾向保守，并带有浓厚的士大夫习气。有时，这些知识精英自命清高，疏于国事，甚至在 30 年代仍然如此，而此时日本侵略加剧，国民党却奉行绥靖政策，致使华北的大学岌岌可危。然而，有些教师继承了五四时期实干爱国的传统。京派的两种人——士大夫和爱国学者——辗转来到昆明，在战争后期，后者在气势上压倒了前者。[57]

联大教授是个卓越的群体。战时年轻聪颖的学者的加入，更增强了联大已很强大的教师阵容。这些青年才俊包括伦敦政经学院博士伍

启元、富有创作才能的作家李广田、才华横溢的人类学家费孝通。选聘是很严格的，最有前途的新秀被北大、清华和南开包揽，同时由联大加聘。他们所在的学校期望他们战后能够继续为本校服务。当然，也有一些教师离开联大到别处工作，历史学家钱穆和作家钱钟书就是显著的例子。尽管有这种损失，但我们很难不同意校友李埏的评价，联大教授「是并世无与伦比的」。[58]

虽然有少数教授年复一年照本宣科，但就整体而言，联大教授以原创闻名。教师共享研究成果，师生合力钻研，实属常见之举。联大学生大都是本科生，教授传授的却是自家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人云亦云易于理解的「大路货」。历史学家陈寅恪讲授隋唐史时，在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59]

在中国学术界，学人相轻可能比学者互敬更普遍。在联大就有明显的例子（历史学家皮名举和古典文学专家刘文典就很瞧不起他们认为不入流的学者），但联大大部分教授还是相互尊敬，甚至相当友好。他们经常告诉学生在某方面某位同事更为博学，有时还互相听课。大多数情况下，教授们都会开诚布公地表达不同见解。一位左翼批评家承认，在联大宽松自由的空气下，「学派渊源各不相同的」学者可以「齐放争鸣」。[60]

联大教授群体是世界主义者。在 179 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 23 人未曾留洋。有些人赴欧洲留学，有些人在北美深造。取得美国大学学位相当普遍。[61]对大部分教授而言，英语不只是第二种语言，它已成为这些教师语言上和概念上不可缺少的工具。学生很快学会做双语笔记，因为他们的老师授课时常常夹着英语单词、短句，常常用英语板书专业术语，而且，条件允许的话还会使用美国或英国教科书。[62]

一点也不奇怪，联大教师一般都赞同西方的这种或那种自由主

义。不过，他们也难逃批评：他们身上仍留有士大夫文化的痕迹。1981 年，校友王康写道，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局限」，联大教授难免带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糟粕」。[63] 在某位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即便是联大学风的精髓——蔡元培相容并蓄的传统——也不无瑕疵：

当然在旧社会条件下……即或有所容蓄也有其局限，如马克思主义者就较难受到容忍。这固然与三校当权者的正统观念有关，同三校讲究学历、资历及宗派师承有关，但主要的责任毕竟还应由国民党反动派承担。[64]

王康的指责是很严肃的，因为，果真如此的话，联大大肆夸耀的学术自由的思想便会大打折扣。因为缺少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活跃分子，留学英美的学术群体恐怕难辞其咎。1936 年，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竭力把他们的同事张申府逐出清华，因为张申府是「华北共产党党魁」。张申府理直气壮地指出，这个控告「荒谬绝伦」，因为他几年前就已退出共产党，但「只讲政治不讲哲学」的责难还是被一位学生记录了下来。[65] 这位留学法国的通才本来就与拥有美国渊源的清华格格不入，加之对课堂的无端滥用，再加上政治压力，导致他被解雇。毫无疑问，张申府对伯兰特 • 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倾慕，即便不能抵消，也可以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他的影响。虽然张申府案不同寻常，但教授中不乏各种哲学流派的背景，偏偏缺少马克思主义者，这很可能是联大重视「学历、资历及宗派师承」的结果。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达到专业水平。尽管如此，当受人尊敬的学者吴晗和闻一多与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时，他们的地位并未因此发生动摇。

在长沙和昆明的九年间，这所大学只发生过两次令人瞩目的解聘事件。一位是坦率正直的自由主义者（罗隆基），另一位是鸦片瘾君子（刘文典）。联大学术自由的记录在民国史已属例外，更非共和国时代的建树可同日而语。

第三部分

谆谆教诲 济济良师

七 文学院

教授乃大学之中坚。在教学和研究上，每位教授必是其所在领域的专家。作为一个集体，教授们必定来源广泛，囊括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方方面面。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衡量卓越的标准，一流的教授还应具有宽广的胸襟、深邃的情怀。当思想相容并包、校风别具特色之时，一所杰出的大学变得更有活力，也更有魅力。

联大的教授个性独具，识见卓绝。在这所大学里，文学院腹笥渊深、性情古怪的教授比比皆是，我们从中可以找到联大精神的化身。

中文系

关于大学的使命，联大人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发现真理，探索新知，寻求中西文明的精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探讨未知的文化构想，培养青年才俊建设新中国。抗战时期，敌人的势力强大到几乎不可抗拒的地步，在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联大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保护民族遗产，这是当时所有人共同的目标，只有少数极端反传统主义者不在此列。但是，何谓民族遗产，哪些遗产值得保护，对于这些问题，即使致力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未能达成共识。正如评论者所说的：

> 在中文系既有决心要「里应外合」充当「杀蠹芸香」、改革中国封建文化的进步学者，也有「宁愿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诗」的老古董。有从事或提倡反映现实的现代文艺创作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也有「反对作家从政」、反对「文艺载抗战之道」的颓废文人。[1]

五四时期，北大教授名震全国，到这时都已成为联大中文系的著名学者。清华杰出的学者为联大增光添彩，丰富了联大业已繁多的课目。中文系分成两组：文学组和语言文字组。

文人学者

文学组以清华学者为主体，抗战初期由系主任朱自清主持。作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健将，朱此时已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其散文以语言洗练、文笔清丽、情致感人著称。在战前，他不仅勇于把现代中国文学引进清华的课堂，还投身经典普及运动。战时，他写了大量文章，讨论课程设置问题和教学方法，促进了这个运动的发展。

清华的闻一多是中文系大师级的人物。抗战前，他在文艺界以多才多艺著称，战后成为时代良知的代言人，名声大振。抵达昆明之际，他由 20 世纪 20 年代的浪漫诗人，转变成 30 年代的古典学者。在昆明，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文字学研究。在研究《诗经》、《楚辞》、《易经》、《庄子》和《管子集校》等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和哲学著作时，他别出心裁，新见迭出。后来，对古诗的兴趣引导他转向研究社会、风俗和神话。战时的经历促使他从更广阔的历史学、文字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古代传说，尤其是屈原的传说。同事白英（Robert Payne)认为他「能够敏锐地把握联大整个群体的思想」，并把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相提并论。[2] 抗战后期，他被视为联大的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楷模。

中文系文学组的学者还有：南开青年李广田，北大小说家杨振声；但没有人比清华的怪才刘文典更引人注目。刘文典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是一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趣闻轶事有多大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重要的是，人们普遍信以为真。

刘文典是个颇为自负的学者，对此他毫不掩饰，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价值。他鄙视那些在学识水平上不如他的人。传说他认为世上只有三个半人真正懂得道家的经典著作《庄子》，其一就是他刘文典，在这方面他是公认的权威，其二是庄子本人，其三是另一位中国学者，剩下的半个是日本人。[3]

刘文典的名气也得益于为《淮南子》作注，以及他在南北朝史（公元 420-589 年）方面的论著。他最吸引人的学术招牌不在课堂上，而是关于《红楼梦》的课外演讲，《红楼梦》是 17 世纪的一部流行小说。联大有两位公认的红学专家，刘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吴宓。吴的诠释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而刘文典的讲解是寓言式的。1944 年春，两百多人来听他关于《红楼梦》的四个系列讲演。一天晚上，听众挤到了门外，演讲因此改为露天进行。他手握话筒，坐在最高的台阶的椅子上，在月光下显得又瘦又小。他猛吸几嘴烟斗，然后开始讲解小说的女主人公——林黛玉和薛宝钗，声调抑扬顿挫，不急不徐。他认为，她们的生活代表了人类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听众几乎呆住了，完全沉浸于此人此情此景之中。

刘文典曾留学英伦，以生物学者的身分开始其学术生涯。〔刘文典曾赴日本留学，未曾去过英国。说他是「生物学者」，应是指其曾翻译过几本生物学著作，如《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等。——译注〕然而，在陈独秀的鼓舞下，他转向中国文学研究。但是，他讥嘲陈独秀大肆鼓吹的白话文；对于白话文，他只推崇《红楼梦》一书。他特别瞧不起白话文作家沈从文，当时沈任教于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刘文典看来，沈从文是个骗子，利用师范学院的关系进入了联大，且他的作品并非学术著作，而是最拙劣的「创作」——杂乱无章，恰恰是人们从「新文学」的拥护者那里可能得到的那种垃圾。当沈从文晋职时，刘文典勃然大怒，他声称：「陈寅恪（联大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副教授，那我是什么？」一天，大家正往山上跑警报时，他注意到一位同事向同一方向逃跑（根据某人报告，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沈从文）。他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4]

考虑到刘文典与他人格格不入的个性，他最终离开联大也就不足为奇。有人说，他离开只是为了获得更丰厚的薪水。有人则认为他是

被蒋介石逼走的，因为 20 年代他曾在一次有名的争论中羞辱过蒋。但最大的可能是，他被解雇是由于怠忽职守。他当时已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后来更成为云南着名的鸦片烟的品鉴者。正常情况下，烟瘾不会干扰他的工作。事实上，学生为他的烟斗装烟时，他可以躺在长沙发上口述学术论文，或构思诗文，就像他的朋友经济学家秦瓒所记录的。但是，他有时候会去云南的山里熬夜，因为那里出产最上等的鸦片烟。通过撰写寿屏寿序等骈俪文章为地方名流祝寿，他曾在滇南与一位当地官员同居了半年。他偶尔回到昆明，连续几夜补上遗忘已久的课，以此「完成」教学任务，然后又回到他的山中王国香格里拉。这种行径促使已很恼怒的同事达成一致，他们不再需要他的服务。被联大解聘后，他于 1943 年 8 月加入附近的云南大学，轻松地跨进另一所大学的校门。[5]

语言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中文系的语言文字组以北大人为核心。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罗常培，此时已成为在世的三大语言学家之一。他继朱自清之后担任中文系主任。同事包括同样出色的文字学家唐兰，和古典文献学家、文学史家罗庸。清华方面则有中国语言学奠基人王力，他在国内首次开设「语言学概要」一课，还有前途无量的青年古文字学家陈梦家。[6]

罗常培以铁腕治理中文系。经历过朱自清的平易随和之后，有些同事，尤其是闻一多，很难忍受罗的专断作风。然而，罗常培本质上仍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后来证明他能坚决维护学术自由的传统。老舍来联大讲演，就是他邀请的。这位作家在政治上属于激进派，更因为他是一位白话小说家，他的来访引起中文系传统派学者的争议。1944 年，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宣称联大将执行教育部的命令，不再聘用闻一多，对此罗常培坚决否认，斥责这一报导「殊与事实不符」，并声称自己「不能坐视学者尊严之沦丧」。[7]

古典文学是中国历史的具体体现，而大学中文系最初包括国学的广阔领域。国学是综合了词章、考据、义理和训诂的一门传统学问。[8]

在联大，仍有这种综合性的学问的痕迹，历史学家陈寅恪堪为代表，他同时在中文系任教。精通中国文化遗产不同领域的教授如此之多，中文系堪称文学院中的文学院。尽管如此，学术的趋势还是职业化和专门化。与战前清华不同，它的中文系所有学生必修「国学要籍」一类课程，而联大要求文学组学生必修「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语言文字组学生则必修「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选读」。文学组的学生还需学习断代文学史和各种文学体裁，以达到更高的要求。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作品可在选修课研读。[9]

尽管声誉卓著，中文系教师还是必须花很多时间分期讲授「大一国文」。一年级学生在这门必修课上用白话文写作，而阅读的大部分文章却是文言文。中文系的毕业生并不多，最多的时候有 14 人（1942 级），最少时仅有 5 人（1943 级）。对文学创作、比较文学感兴趣的中文系学生发现，外文系的课程更能满足其需要。其它人为这种课程而苦恼，这些训练须要下苦功夫，但它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却可能一无所用。

历史系

三所大学联合，给联大带来名目繁多的历史课，这些课涵盖了不同区域不同时代，比战前任何一校都全面。联大前六年，工学院之外的所有大一学生都必修一年的中国通史，到了 1944 年工学院也包括在内——据说，工科毕业生对历史一无所知（据报导，有些人连鸦片战争都没听说过）。1940 年后，由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在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讲授中国通史。三人不同的风格、思想和教学方式，突显出联大的兼容并包。

雷海宗

雷海宗是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理学院学生庆幸自己被分在他的班上，而别的学生企图混入这个班。雷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连门窗外都挤满了旁听者和过路人。还好，他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

外。

雷海宗记忆力惊人，授课时不带片纸只字。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提到数十位欧洲王室的姓名和在位时间，他都能信手板书，跟他讲中国通史一样，说到皇帝、大臣和文人，他如数家珍。学生记下每一句话，因为雷的小测验要求掌握准确的史实。然而，他绝不是书呆子。对他而言，史实细节是精心设计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而他就是一位建筑大师。有个学生记得，雷海宗讲述的纲要像是从他嘴里「迸」出来的似的，细节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谈到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时，他简直是在表演。[10]

一位从前的同事这样形容雷海宗——「与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位政治哲学家」。[11] 作为唯一一位痴迷史宾格勒和汤恩比的历史哲学（metahistory）的联大学者，他以如椽大笔在巨幅帆布上描绘盛典。他热衷分析文明的兴衰。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以淝水之战（公元 383 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周期。他在《文化形态史观》（与云大的林同济合著）中阐述的宏大理论，最初曾在联大课堂上讲解过。[12]

首先，他是个理性的人，冷静地剖析他的研究对象。他也是一位爱国者和广义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但不是沙文主义者。他是芝加哥大学欧洲史博士，用英语教材〔其中之一是他的老师詹姆斯・维斯特佛・汤姆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的著作〕讲授中世纪史，经常用英语板书，但上课时不像某些留洋归来的学者那样不时穿插几句英语。他曾对一位即将出国的青年历史学家说，要保留中国人的身分，就得和中国人结婚，继续用母语写作，通过阅读冯友兰的著作保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尽管这些著作不无瑕疵。[13]1946 年，他坦率直言，坚决认为苏联出兵满洲是沙皇帝国主义的继续。当他辩论时，泪水从脸颊上滑下来，爱国热忱压倒了理性，这是一个罕见却发人深省的例子。[14]

按照他对历史宏观的理解，他反对琐细的文本注解和以「断简残

编」为根据的文字学研究的传统，同时呼吁学者撰写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文章。1940 年，他出版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为这种学术方式树立了榜样。在这本书里，他批判了传统的「纯粹的文德」，并期望中国因二战而走向「军事复兴」。[15]

雷海宗逐渐右倾，最初是在思想观念上，然后是在政治上。1939 年，他加入了包括极右剧作家陈铨和云大政治学家林同济在内的团体，出版《战国策》。通过这个刊物，他和同仁采用「力的政治」分析国际事务，有时候甚至走到支持右翼集权分子、拥护轴心国的极端。钱端升的《今日评论》停刊后，雷海宗撰写简短的时事评论以支持更为保守的后继刊物——《当代评论》。到 40 年代后期，他明显处在反对共产党、拥护现政府的阵营，成为国民党清华党部的一员。但是，他从未因此阿谀奉承过执政党。1943 年，他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败笔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声称，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16]

吴晗

雷海宗的同事吴晗衷心赞成过去乃今日之镜鉴的观点，但那些镜鉴绝不是《中国之命运》所能阐发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年轻激进的吴晗与年长保守的雷海宗的思想大相径庭。吴专攻明史，刻意拿过去与当下相比较。在他看来，明朝末年，帝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官吏贪赃枉法，太监肆意妄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爱国士人和反叛的农民，这一切与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极其相似。除了中国通史，他还讲授宋元明经济史，及司马光的通史——《资治通鉴》，其借古讽今的做法并不局限于明史。当他怒斥汉代「外戚干政」时，只有最愚蠢的傻瓜才听不出这尖锐的讽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本人的。他的通史课由于尖刻的嘲讽而富有生气，吸引了大约五百名学生，这么多人只有食堂才能容纳得下。[17]

吴晗能够吸引那些不必修他的课程的学生，靠的是教学技巧和政治吸引力，因为他面对的是最难对付的学生，何况是在一所以严格著

称的大学。作为一位始终待在清华的才子，他绝不同情那些学术水平不高的人。虽然学生认为他过于严厉，但他们仍尊敬他，因为在最贫乏的条件下，他还能保持甚至提高思想活力。为治疗妻子的结核病，他把书卖给清华图书馆。[18]他继续出版大部头著作，写朱元璋传，写后来结集为《历史的镜子》的随笔，还写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政治评论。

作为教师，他颇受欢迎；作为学者，他水平颇高。尽管如此，他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同事当作一名外来者。他出身贫寒，又是研究中国的历史，既不必要也没办法像同事一样出国留学。[19]在云南大学当了好几年教授之后，吴晗在昆明重新加入历史系，清华这才把他评为教授。

孙毓棠

吴晗的清华校友孙毓棠则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集历史学家、文人和业余诗人于一身。他一袭刺繍长袍，身材颀长，英俊潇洒。卢沟桥事变后，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在那里，他不仅在所选择的历史专业领域受到良好的训练，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方面也颇有造诣，还通晓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

在学术道路上，他综合了本国的学术传统和西方的治学方法。1938 年冬抵达昆明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东汉创立者刘秀的小传。这本著作受到了传记作家林顿 •斯特拉齐（Lytton Strachey）和艾密尔 •路德维希（Emil Ludwig），尤其是安德列 • 莫洛亚（André Maurois）的影响。后来，他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以施亨利（Henri See）和陶希圣为楷模，前者曾撰写著作讨论 18 世纪法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后者属于国民党马克思主义修正派，是汉唐之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20]1943 年，他的论文结集出版，题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

对联大学生来说，孙毓棠更广为人知的身分是，他是昆明著名女演员凤子的丈夫。他们的家成为昆明文艺界精英的沙龙举办地。凤子是《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孙则是史学副刊的编辑。这时，她

的演艺生涯正处于辉煌时期，很快成为昆明最有名的女演员。孙毓棠随她走进剧院，并指导她演出曹禺的《原野》。然而，战时中国的戏剧中心不是昆明，而是重庆。于是，凤子前往战时的首都，孙毓棠则留在昆明研究学问。

钱穆

孙毓棠成为第三位讲授中国通史的三人小组成员时，他接替的是钱穆的位子。钱穆最多只接受过师范学校的正规教育，以小学教师身分开始其职业生涯。在中学教书时，他的论文发表在《燕京学报》上。这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把钱穆提拔到北大任副教授。他在联大执教的时间不长，但仍维持了声誉，他讲历史故事总是让人着迷——这需要非凡的才能，因为他的乡土口音很重，讲得好学生才能听得懂。

钱穆以讲授和研究儒家思想史闻名，他为传统文化辩护，反对盲目西化，这也为他赢得了名声。他的观点与雷海宗的保守思想迥然有别，后者的观念根源于对政治力量客观理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和雷的观点一样，钱穆的见解，也受到战争的影响。他广为流传的通史教材《国史大纲》（1940 年），写于日本侵略期间，据说「夸大了异族统治的残暴」，并「贬低了异族王朝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21]

「教授之教授」及其它

如果几位中国史教授在战初没有早早离开联大的话，无疑会留下更深的印迹。其中首屈一指的是陈寅恪。他是清华的资深历史学家，由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是 20 世纪中国学界的顶尖人物。出身于著名的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辛亥革命时期负笈海外（主要是哈佛、巴黎和柏林）前，他已被视为本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权威。20 年代初回国时，他通晓希腊语、拉丁语和几种仍在使用的欧洲语言，除此之外，他还会满文、蒙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有位传记作家说，陈寅恪能够用「大约十三种文字」阅读，但他以前的一

位学生、后来的同事向我保证，陈寅恪懂得的语言还不止这个数。[22]他很快加入清华，与梁启超和王国维并列为三大导师。〔更准确地说，应是四大导师，除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还有赵元任——译注〕

几乎没有学生够资格选修他的第一门课——「藏文梵文之比较研究与中国佛教经典研读」，那些修课的人也未必听得懂。（为说明他的观点，除了藏文和梵文，他还会毫不犹豫地说出一串突厥文。）在清华，他很快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包括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在内的同事都来听讲，远近的学者对他肃然起敬。日本汉学家和田清（Wada Sei）在孙毓棠的清华稿本上发现陈寅恪的名字时，他立刻豁免了孙的入学考试，并允许这位年轻人进入研究生院。[23]

虽然有资格为自己的学识感到自豪，但他还是很谦虚，「吾不敢言秦汉以前之事」，还把授课范围限制在魏晋隋唐时期。在联大任教时，因为缺乏藏文、梵文和突厥文的材料，他不得不大大降低授课标准，但即便如此，听得懂的学生仍寥寥无几。在课堂上，他不以引人入胜见长。他身体虚弱，眼力不济，闭着眼睛授课，时常板书，进度极慢，从来不看学生。他很喜欢在家里指导三四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在这数小时里他会侃侃而谈。虽然影响只局限于几位同事和少数学生，但他的存在本身象征了学术的至高境界，而这正是国难时期委托联大予以保护的重任。

就整体而言，联大的西洋史专家要比中国史学者逊色。在西洋史学者中，没有可以和陈寅恪相颉颃的文史大师，没有人像钱穆那样融会贯通，也没有人像雷海宗那样富有理论创造力。不过，有一位教师在辛辣的讽刺方面，与吴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是皮名举。皮氏乃朗格（William L. Langer）的得意门生，湖南人，又高又瘦，声音洪亮，胡子拉碴。与吴晗不同，他对任何人任何事，从共产主义到基督教的所有意识形态，都毫无顾忌，极尽尖酸刻薄嘲讽奚落之能事。他告诉学生，活字印刷的发明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把「God」变成「Dog」，把「Dog」变成「God」。如果有学生想弄明白

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独霸府邸的企图，他会建议他们去观察他们的校长。他声称，「如果你懂得梅贻琦，就能懂得凯撒。」如果说，对温和谦逊的梅校长的刻划似乎是不恰当的，那么他对独腿教务长潘光旦冷酷的挖苦，就更是如此了。他说，「上帝使盲人复明，使体弱者恢复健康，而潘光旦信奉基督这么多年，还是三条腿（一条真腿，一条木制义肢，和一根拐杖）。」

那些不能忍受皮名举的人便转到另一个班学西洋史。这个班由皮名举在南开的同事蔡维藩执教，他为人和善。在学生选课方面，与和蔼体贴的蔡维藩相比，冷漠蛮横的皮名举仍很有竞争力，这是因为蔡维藩还不大像一位学者。虽然上课教室人数爆满，但是蔡（金陵大学学士、伊利诺大学硕士）「并没有得到教授和学生的认可」。一位以前的同事这样写道：「其实，他的学识与本科毕业生几乎处在同一水平。因此，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教授交流。」另一方面，在同事看来，皮名举在清华和哈佛受过教育，「学识渊博」。作为一名教师，他极受尊敬。[24] 虽然如此，在抗战结束前，皮名举离开联大，去了湖南大学。

刘崇鋐（威斯康辛学士、哈佛硕士）是第三位具有南开背景的西洋史教授，尽管后来执教于清华。他研究西方近代史，待人和蔼可亲。作为一位热诚的爱国者，他也在报刊上发表评论：美国人为本国士兵的安全担忧，中国却把那些戴着缭铐的不幸的农民派往前线。

虽然当时还没有发明「区域研究」的说法，但是，有几位联大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从事「异域」研究。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以研究敦煌石窟闻名于世，翻译过甘地的自传，在联大教印度史和西域史。王信忠拥有清华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位，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和近代中日关系，还为当地报刊撰文解释日本外交政策。历史系系主任雷海宗同意传教士兼业余史学家吉尔伯特•贝克（Gilbert Baker）讲授英国史。贝克的教堂在文林街上，是联大社团课外活动的一个中心。此外，还有白俄贵族噶邦福（Ivan Ivanovich Gapanovich），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被聘为清华教授，教历史编纂学、古代史和俄国史。当学

生向其它教授请教政治意见时，噶邦福会说：「别把我当作外国人，中国的事情，我也懂。」[25] 这是从马可·波罗时代起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的共同感受。

哲学心理学系

为便于管理，哲学和心理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被合并为哲学心理学系。此前，只有清华设有心理学系，但它太小了，不值得在昆明单独建系。在联大校史上，心理学家的作用微乎其微。周先庚虽在战时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教学和处理系务方面几乎不值一提。剩下的一位心理学家——陈雪屏——同样微不足道，他主要隶属于师范学院。因此，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个系自建立之日起基本上就是哲学系。

如墨子刻（Thomas Metzger）所观察的，在联大，「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精神』与现代性问题相互关系的多面向的运动完全确定下来。」[26] 竭尽全力重新考察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大师级人物有贺麟、金岳霖和沈有鼎，以及联大最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身为文学院院长，著有广受好评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是昆明学术精英中的一位。一袭长袍，故意蓄着长髯，一副儒家圣贤的形象，冯氏俨然中国遗产的化身。[27]

作为 20 世纪的新儒家，冯友兰表里如一。抗战期间，他撰写了一套著作，阐述他的哲学体系，「期望在国难时期引导国人」，他称之为「写于民族复兴之际的系列论著」。[28] 第一本是《新理学》（1939 年），主体部分写于衡山，续撰于河内的医院，完成于蒙自。他一心致力于完成这项学术使命，其他几本书的陆续出版就是证明——《新原道》〔1944 年休士（E. R. Hughes）以《中国哲学之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为名译成英文，于 1947 年在伦敦出版〕和《新知言》（1946 年）。他的著作被认为「根本上是程朱理学的新发展」，是「新儒家理性主义与西方逻辑实证论及道家思想中的怀疑主义和先验论相结合」的产物。[29]

冯友兰对新儒家思想要旨和现代工业化主题的有机调和，使国民党保守派颇为满意，因为他们希望的就是这种调和。冯友兰认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之前，共产主义和议会民主一类的思想观念是无足轻重的——类似的观点受到了保守派的热烈欢迎。然而，他在重庆的被崇拜，预示着他在昆明的名誉将受到损害。前三本战时系列著作的出版，使他得以与蒋介石交谈。学生在联大民主墙上贴了一张漫画——一位长髯老人正在攀登由三本大书迭成的阶梯。从教室出来，他注意到这幅人物漫画，便停下来，背着手仔细观察。「样子很像，」他不以为忤，「样子很像！」[30]

冯友兰根据中国统治者的需要阐释哲学的本领，为他赢得了政治哲学家的荣誉，这一点在 1949 年后根本没有改变，后来他由孔子和朱熹转向了马克思和毛泽东。但是，在深入浅出地普及哲学思想方面，他是个不可否认的天才。在授课和写作上，他表现出同样显著的天赋。谈到上课，校友用了「原创的」、「创造性的」、「渊博」、「融会贯通」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他授课不带任何讲稿，但引用史宾诺莎、黑格尔和杜威（John Dewey）时，他随意自如，就像引用孔子、孟子和荀子一样。[31]

无论如何取悦执政党，在维护联大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方面，冯友兰毫不逊色于人。捍卫思想多元是新儒学的内在要求。当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公开谴责学术界「秩序混乱」时，他对蒋介石的这位连襟提出异议。[32]尽管如此，身为文学院院长和国民党区党部的参与建立者，这位联大最有名的哲学家还是不得不讲授由重庆政府指定开设的伦理课。但是，上课的人很少，这与他的「中国哲学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堂课上学生拥挤得把窗户都撞坏了。[33]最后，他只好点名，但由于要求所有大一学生必修这门课，所以每次只能点名单上的部分名字。对此，学生们在上课前聚集在门窗外，只有被点到名时才走进教室。剩下的人在上课一开始就作鸟兽散。他无计可施，对这种学生只好用他特有的幽默一笑了之。[34]

哲学系系主任汤用彤是研究佛教和魏晋玄学的著名权威。他的中国佛教史，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和西方，都被认为是经典著作。[35]他满头银发，体态发福，踱着特有的步伐，徐徐而行，看上去酷似一位佛祖，但是他从不布道讲经，只是教书——高超的水平使他成为联大最受尊敬的老师之一，尽管所讲的东西深奥难懂。[36]

汤用彤对佛教的兴趣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位中国传统主义者——他爱读侦探小说，并发觉它们对提升历史感很有帮助。佛教不是他的个人信仰，史宾诺莎哲学也不是，对于后者他也开过一门课。联大在儒学和佛学方面所有的大学者都曾到西方留学。汤用彤是哈佛硕士，而冯友兰是哥伦比亚博士，他师从杜威和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 E. Woodbridge）。[37] 即便没有洋文凭之类的玩意，冯友兰和汤用彤也完全能自成一家；不过，对西方学术的亲身经历自然有助于他们把中国传统传授给下一代学生，而这些学生习惯于到西方取得其学术合法性。

在佛学和儒学庞大的体系之外，联大哲学课上讨论得最多的要数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了。北大的郑昕在柏林大学和耶拿大学学习了六年，称赞康德主义是「哲学的最高境界」。[38] 贺麟是联大的黑格尔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北大教授。对黑格尔的欣赏和钦佩甚至影响了贺麟的国家观念，他的政治态度正好偏于保守。贺麟是国民党联大区党部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党员代表，并接受蒋介石的资助翻译黑格尔的著作。

郑昕提倡康德之学，贺麟深研黑格尔，而 19 世纪德国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马克思——却没有出现在联大的课表里。联大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没有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教师，这是当时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当时两极分化的迹象已经萌发——自由主义者退回到学术界，马克思主义者则转向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这一现象也反映了 20 世纪初英美学术界的气候，这是大多数联大教授的学术训练背景。一门叫做「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课

只上了一学期，终因缺乏学生的支持而停止。（有关洛克、休姆和罗素的课也是如此。）至于选课学生人数稀少，无论如何解释都是颇为矛盾的，一所被奉为英美自由主义中心的大学，却不支持一门有关洛克的课；虽然没有开设马克思理论课，但学生对激进政治却越来越感兴趣。

尽管存在明显的、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遗漏，联大哲学系涉及的领域还是相当广泛。陈康和王宪钧的著作都属于西方哲学的范畴。陈教授是用希腊文原文研究柏拉图的第一位中国人，翻译了《巴曼尼得斯篇》（*Parmenides*）。他为该书所作注解的篇幅比原作本身多出九倍。他开创性的工作特别值得重视，因为 20 世纪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哲学时，只想着赶上近代西方，却严重忽视了西方 18 世纪以前的思想，尤其是古典时期的经典著作。[39] 与陈康不同，王宪钧以 20 世纪奥地利人为榜样，「否认形而上学的一切价值，把它贬为『仅仅是一种诗歌概念』」，[40] 他把「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新逻辑引进中国。他从数学的角度研究逻辑，对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明显不感兴趣。

在冯友兰看来，哲学系能包容这么多领域是因为它融合了北大和清华不同的传统：

> 抗战前，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和清华大学的哲学系被认为是中国大学实力最强的哲学系。这两所大学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侧重历史的研究和著述，在哲学上倾向于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康德和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陆王学派。相反，清华的传统和重点倾向于使用逻辑分析来研究哲学问题，反映了实在论哲学的趋势，用西方哲学术语说，就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就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程朱学派。

用「观念论」和「实在论」概括北大和清华之间的差别似乎过于简单。或许这样说更为恰当，冯友兰和北大哲学家比他们的清华同事对庞大的哲学体系更感兴趣，而清华哲学家更关注数理逻辑和逻辑方

法本身的问题。[42]

清华哲人中最著名的要算金岳霖了。与新儒家冯友兰不同，作为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思想的拥护者，金岳霖看上去可能是一位彻底西化的哲学家，但他们俩显然并不拘泥于此。冯友兰的概念术语是中国的，但哲学框架却显示出他曾受过西方学术的训练。正如中国哲学权威陈荣捷所指出的，冯友兰「为新儒学建立了逻辑基础」，并「辅以近代认识论」，从而产巧生了宋代哲人与「新儒学、新实在论和些许经验主义」的综合体。[43]

与冯友兰不同，金岳霖从美国回来，没有树起现代化的新儒学的大纛，这跟他求学哥伦比亚有关，但他确实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他强烈批评「逻辑与认识论的意识」的「低度发展」和「思想自由冒险」的欠缺，但非常赞赏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并认为它「也是政治与伦理的统一，社会与个人的统一」。他还欣赏中国人「知足常乐」的天赋，称赞中国哲人及其哲学对人类共存思想的认同——他相信，这些优点和长处恰恰是西方思想的缺点和短处。[44]据说他一心思考高深的哲学，回避政治问题，因此有一家左翼杂志戏称他为「遁世派」的代表；[45]然而，在课堂上，他却世事洞明。他告诉学生，读小说比研究哲学家的论著更能领悟哲学的奥妙，而他最喜欢的诠释就来自英格丽 •伯格曼（Ingrid Bergman）的电影。

与同事、认识论专家和逻辑学家沈有鼎一起，金岳霖和他的得意弟子殷福生共同讨论哲学。（殷后来改名殷海光，成为台湾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之一。）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沈和殷手拉手走在街上，专心致志地探讨哲学问题。与行为怪诞的年轻同事沈有鼎相比，金岳霖的古怪就不免显得逊色了。战初，从哈佛、海德堡和弗莱堡留学归来后，沈有鼎在昆明成为被议论得最多的人物之一。在课堂和会议上，他才华横溢，却又深奥难懂。有时候，他会无缘无故喃喃自语。战前，他在清华经常穿着他的结婚礼服；在联大，换成

了一件破夹克和一条旧裤子，这身装束似乎从没换过。听说他把薪水藏在床底下和枕头套里。传闻他也不洗澡，因为不愿花钱买肥皂、付水费。

他喜欢在学校附近边散步边品尝小吃摊的小吃。他对某个茶馆情有独钟，在那里用两只袖子擦桌子，再用手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候，他会与联大另一位著名的不修边幅的曾昭抡辩论哲学问题，或者和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闲谈。因为沈学识渊博，罗始终尊敬他。[46]

沈有鼎给一位同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就是蔡维藩。蔡氏初次来到昆明，加入联大历史系，坐着黄包车去他的新住所。突然，一个头发蓬乱、衣冠不整的矮个子冲出来，挥舞着木杖，大喊道：「停！」黄包车夫大吃一惊，赶紧停车。「你是谁？」这个陌生的家伙透过金框眼镜死死盯着蔡维藩。「我叫蔡维藩，」他答道：「是联大新来的教授。」「这就对了。」这个幽灵二话没说就走开了。蔡维藩把这次遭遇告诉一位朋友，朋友耸耸肩说，「哦，别理他。他是沈有鼎，半个疯子。」

这种人的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系享有学术盛誉，学生却寥寥无几。从 1939 年到 1945 年，哲学系共有 65 名毕业生，在联大三千多名学生中仅占 27%。就像中文系的例子一样，我们可以推测出文学所要求的秉赋；这门学科与实用价值的明显背离，是该系难以吸引更多学生的原因之一。

外文系

中国最国际化的大学中最国际化的机构莫过于外语系了。该系所有资深教授都曾负笈海外。教员中有四位法语教授、三位德语教授和一位日语教授，偶尔会有一位俄语讲师。然而，这个系主要讲授英语和文学。大一英语是联大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所以从教授到助教每位英语专家都要担任其中的一部分。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大一英语是漫长的训练的顶峰，就像回到以前的中学。联大实际上期望所有学生掌握两种语言，能轻松阅读指定的英语课文，在课堂上听懂教授说的英语单词和短语，这些教授都有负笈英美的背景。当然，外语专业要求达到更高的水平。

在中国批评者看来，大一英语、法语和德语的程度较战前清华降低了，这可能是因为联大与外界的相对隔绝和海归学生的减少。战前清华分期讲授的西方文学断代史课在联大也未能继续开设。[47]尽管如此，为联大学生开设的课程仍然特别丰富。除了大二必修欧洲文学史外，这些专家在西方传统大作家与不同体裁的作品、西方语言学、语言学史、语音学和修辞学方面开设选修课：

在外文系，既有研究但丁、歌德、莫里哀（Molière）、拉辛（Racine）等等的专家，也有穿着长袍马褂，在课内宣扬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在课外大讲「红学」，提倡「林黛玉精神」的「雅士」。有英国「新批评派」的追随者，也有宣扬尼采的法西斯主义哲学的人。

因为能包容各种不同观点，联大自然充满生机。由于清华外文系图书馆的幸存，有相当多的图书经汉口、长沙于 1938 年运抵昆明，涉猎范围广泛的文学写作课和翻译课因此得以开设。此外，这个系拒绝从众随俗，不愿把图书资源束之高阁（战时尤其盛行），阅览室的开放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49]

系主任：叶公超、陈福田

叶公超是外文系第一位系主任，或许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他的语言天赋令人感觉不可思议。每学期开学，他会在黑板上写一句话："I am very well"，然后请每个学生大声朗读。由此，他能马上判断出学生的籍贯，只有一次没有猜对。[50]他在私底下模仿冯友兰的口吃和刘文典的安徽口音，使朋友们乐开怀。1939 年，他离开联大，到重庆加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情报部，开始其显赫的仕宦生涯。

叶公超的继任者是陈福田。他是广东人，生于夏威夷，具有夏威

夷人的思维特征，颇有管理才能，但作为教师和学者都声名不显。他对抗战主要的贡献是，调用联大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他所在的外文系，为驻扎昆明的美国空军担任翻译。即便身为行政人员，他也不乏批评。他坚决要求英语作为该系英语课的唯一授课用语，因为他自己英语说得比本国语还流利。甚至有人怀疑他利用少数讲师作密探，向他报告哪些教员不遵从命令。[51]

诗人：冯至、卞之琳

联大许多优秀诗人是出身外文系的老师和学生。其中冯至是最有名的一位，他既是研究歌德的专家，也是里尔克的追随者。1941 年冬，蔚蓝的天空，闪耀的银白色飞机，使他诗兴大发。沉寂十年之后，他重新开始写诗。[52] 在二十七首十四行诗中，他用大自然的意象编织绚烂瑰丽的梦幻。在宁静安谧的路上，他似乎在找寻一个超现实的王国。[53] 有人把他当作古代圣人，对他敬畏有加。

卞之琳是冯至的同事，但他比冯至年轻，他们被划为「玄秘派诗人」。[54] 卞之琳的灵感源于文化故都北平的光影声色。随着战事的爆发，他的生活和工作转到另一片天地。在西北与抗日游击队员一起生活了大约两年之后，他于 1939 年来到昆明。在联大，他没有写诗，却发挥了他已有的非凡的翻译才华，翻译了他曾借鉴过的马拉美（Mallarmé）、魏尔仑（Verlaine）、瓦莱里（Valéry）、艾吕雅（Eluard）和福特（Fort）等人的作品。他转而欣赏叶慈（Yeats）、奥登（Auden）和艾略特（Eliot）的诗歌。在翻译课上，他选了伍尔夫（Virginia Woolf）、劳伦斯（D. H. Lawrence）、福斯特（E. M. Forster）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短篇小说。他还开课讲授纪德（André Gide）和詹姆斯（Henry James)。

外国教师：温德、白英、燕卜荪

1923 年，伊利诺伊州艾文斯顿（Evanston）西北大学 36 岁的法国文学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为躲避他所厌恶的美国社会中的「贪

欲和种族主义」，便来到中国，开始其教学生涯。[55] 自 1928 年起，他一直在清华任教，并且是在北平战前外国团体的固定成员。因为有花园和宠物鹿，他的家很出名。出于对日益增长的日本势力的忧虑，温德在战争爆发前就避居香港，从事情报活动，并帮助活佛——相当于达赖喇嘛的内蒙古人——逃离已沦陷的北平。温德的一位作家朋友项美丽（Emily Hahn）打趣道：「如果那笔交易可以写成一篇很好的小说，他可以把他的祖母卖掉。」[56]

但温德渴望进入学术界，于是他在 1938 与 1939 年之交的冬天移居昆明。他时年 52 岁，在相当年轻的联大教师中俨然一位长者；但是，如项美丽所言，他青春永驻，保有活力。[57] 在昆明，他住在一家老戏院的楼厅里，身边有一群宠物猫和一只在他肩膀上跳来跳去的猴子相伴。他性喜自然，而研读道家经典《庄子》无疑使他更加「逍遥」。

温德讲授英国诗歌、现代诗歌、福斯特和莎士比亚。学生们发现这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老外「像年轻人一样活泼」。他把诗歌课搬上舞台，扮演修女或恶魔放声唱歌，学生们就在过道里摇晃而行。他能凭记忆背诵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用不同的声音和语调表现每个人物。1980 年，一位美国游客在北大发现温德和一笼金丝雀待在一起，那时他已 93 岁高龄，还在教书。[58] 百岁诞辰两周后，他于 1987 年 1 月 14 日离开人世。

白英（Robert Payne）阅历极其丰富，他的经历与学术上以美国为渊源的同事迥然不同。1943 年 9 月到达联大之前，这位 31 岁的英国作家造过船，译过俄国小说，写过一部小说。他采访过希特勒，亲眼目睹奥地利被吞并，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日本袭击珍珠港时他在新加坡海军基地值班，并曾在重庆复旦大学执教。在联大外文系：白英开设了大四英语作文、英国诗歌、现代小说、伊莉莎白时期文学等课程，并在工学院教造船学概要。他还坚持写日记，其内容汇编为三巨册文献——《永恒的中国》（*Forever China*）（1945）和《醒着的中国》（*China Awake*）（1947），及 1970 年压缩再版的《中国日记》（*Chinese*

Diaries）。

不像温德，白英对中文几乎一窍不通，却和同事及学生合作翻译他钟爱的唐诗。在他的英语课上，没有教学大纲，也没有考试，不过他要求每位学生把几百首唐诗或 20 世纪诗歌译成英诗。这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刊载于《小白马》（*The White Pony*，1947）禾口《现代中国诗歌》（*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1947）。

白英在联大任教期间，已是这所大学存世的最后三年。在那个政治动荡的年代，白英写了大量关于这所大学的文章，因此人们认为他与联大的关系比杰出的同胞燕卜荪（William Empson）与联大的关系还要密切。作为新批评派的领袖，燕卜荪后来成为 20 世纪英国最优秀的一位诗人。在衡山、蒙自和昆明工作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后，燕卜荪便打道回英国去了。

两位法语教授：吴达元、闻家驷

大一法语由吴达元担任。他是个精力充沛的教师，会把每个音节都读出声。四十年后，许多学生仍记得他缓慢而庄重的口吻，“PRO-FES-SEUR……”，“PAR-LEZ-VOUSFRANCAIS？”吴达元训斥学生是出了名的。一位批评者说，「他支持男女平等。如果女生没有预习功课，她同样会受到严厉的警告。」[59] 作为回敬，他被学生戏称为「大喇叭」。

不过，吴达元的家境让许多学生深表同情。妻子刚过世，他把两个小孩带到教室。当他上课时，两个孩子就坐在门口。一旦空袭来临，这个宠爱孩子的父亲就抱起他们跑到郊外去。[60] 虽然教学任务和家庭负担都很沉重，战争期间吴达元仍然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他研究莫里哀，做翻译，还写了两本关于法国文学的书，一本简介，一本全史。

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教大二法语。1941 年抵达联大之前，他曾在格林诺布（Grenoble）求学。[61] 身为一名教师，’他很喜欢幽默讽刺的范文。有一篇小说叫〈祈祷与纳税〉，它讽刺了一种每个人从出生

到死亡都要纳税的制度。讲解时，他举了一个例子，人们去公园呼吸新鲜空气，进门要收费，他戏称为「呼吸税」。他在政治上天生就是激进派，推崇罗曼·罗兰，因为罗氏否定过去的意志、追求复活的精神以及坚定地站在群众一边的立场。[62]1979 年，闻家驷已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参见本书第 351 页〔此为原著页码。〕），回想起哥哥对他思想的影响，他说：「我的哥哥闻一多劝我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从那本书上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真实情况。」[63]

在 1945 年反抗国民党武力镇压持不同政见学生的一二·一运动中，闻家驷积极参与，要求惩罚肇事者，并走在为受害者举行的葬礼游行队伍的前列。[64]然而，他基本上是个文人，而不是个政治人物，在闻一多出现的场合很少见到他的身影。[65]在他魅力超凡的哥哥的阴影笼罩下，天性腼腆安静的闻家驷度过了昆明岁月。

法西斯主义者：陈铨

作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研究尼采和叔本华的专家及「浮士德精神」，陈铨回国时身怀奥柏林（Oberlin）大学硕士和基尔大学（Kiel）博士文凭。因此，他同时讲授英国和德国文学。作为联大教员中唯一羽翼丰满的法西斯主义者，这是陈铨很可疑的特征。1940 年 9 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处于权力的巅峰，陈铨猛烈抨击中国的「接受英美自由主义的顽固保守的老绅士，和满脑子苏联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青年拥护者」。在一篇题名无冒犯意义的论文〈论新文学〉中，他提出了「真正的新文学」的纲领，他写道：「理想的生活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理想的人是武士，而不是绅士；理想的道德是征服，而不是同情；理想的教育是培养服从精神，而不是发展个性……无论谁不遵从这些理想的原则，都会被粉碎。」[66]

按照法西斯戒律，他认为历史是由英雄而不是平民百姓创造的。他哀叹道，因为旧式士大夫的衰落和后五四民主思想的兴起，英雄崇拜在中国已经式微，但是，要是中国渴望成为民族巨人，英雄崇拜就

得复兴。[67] 按照这个理论，他编了一个剧本——《野玫瑰》，歌颂刚愎残酷的超人。这部剧作在战时广泛上演，并获得官方文学奖，但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认为它「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要求教育部撤销「嘉奖」。[68] 即使在昆明宽容的环境下，陈铨的同事也很难接受他的观点。1944 年 8 月，他辞去了教授职务。

罗曼蒂克者：吴宓

吴宓是外文系声名最著——或最臭——的教授，难以归类。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写道，吴宓虽然被称为「本土主义者（nativist）」，但是，「与其说是社会风俗或政治实践适合的形式，不如说他重视文化理念的价值」。[69] 吴宓通过埋头苦读西方经典——而不是狭隘地研究本国传统——走向本土主义（nativism）。他是唯一能够通过文本比较讲述自古典时期以来丰厚的欧洲文学史的联大教师。他写古体诗，并与刘文典争做《红楼梦》研究的权威。即使要把他称作本土主义者，我们也必须加上一个与之对立的形容词：吴宓是一位「世界性」的本土主义者。

吴宓还是一位热心的老师，欧洲文学史就是他讲授的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他还教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70] 夏天，同事走出教室暂时休息时，他却自愿去教临时安排的基础课。由于十分喜欢《红楼梦》——他常用那个知名度较低的名字——《石头记》，于是他创建了石社。想要入社的人需提交一篇对这部小说的鉴赏文章，最好用第一人称写，因为这样可以把自己比作书中的某个人物。[71] 这个社团夜间在南食堂举办的活动生气勃勃，逸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在这种场合，吴宓游刃有余，大展身手。[72]

在教学上，吴宓很重视宏观的主题。谈到大自信（greatself-confidence）时，他会强调希腊－罗马、基督教、佛教和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相互比较。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

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73]

吴宓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在五四大会上，同事大唱白话文的赞歌，被邀请发表意见时，他却拒绝扮演文言文捍卫者的角色，而是应酬一番坐下了事，颇出人意料。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现代短篇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他如此表态。[74] 他声称，鲁迅这位左翼的宠儿实际上并非左倾，并把他与右翼的英雄尼采相提并论，作为一名作家，因其深爱世人，故作愤激之词。还有一次，《新华日报》试图把他与保守的战国策派联系在一起，他坚决反对，愤慨地说：「我自有主张，故非战国策派也。」[75]1947 年，联大前任的教师钱钟书出版了《围城》，这显然是一部以声名狼藉的学者为描写对象的爱情小说，并且以联大的教授（包括吴宓在内）为原型。同事都大肆抨击小说作者，吴宓却拒绝这样做，反而宣称这部小说「百读不厌」。[76]

抵达昆明之前，吴宓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二十年前，他从哈佛毕业回来，成为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作为《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用文言文写作，批判白话文，这使进步文人大为惊诧。后来他抛下妻子，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子——毛彦文。在最好的悲剧性的浪漫主义传统里，他与毛女士失之交臂，尔后在诗作里哀叹自己的「错过」，这使他自己受到道德文章、讽刺诗歌和刻薄漫画的嘲弄。[77] 吴宓提倡文学、艺术和个人思想的独立。他非常赞赏马修·安诺德（Matthew Arnold），而他自己被认为像安诺德一样，「在外表上是一位古典主义者」，而「在情感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者」。[78] 吴宓的桌子上放着一张他从未谋面的女演员的相片。她自杀后，吴宓作了一首诗，自称「我是东方安诺德」，将会爱她到永远。

吴宓表面的行为举止让人愉快而困惑，而他的内心生活同样如

此。在某些方面，吴宓扮演着正直的儒家学者的角色。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拄着拐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79]不过，他也像道家一样崇尚自然无为。他颧骨很高，留有唇髭，浓密的络腮胡子似乎只刮了一半，在这副面部表情的衬托下，锐利明亮的眼睛和瘦削苍白的脸更显突出。有个学生曾看见他在一家小店吃饭，他把米饭一粒一粒捡起来，并察看每份食物，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面前，然后用筷子指着所有的饭粒，口中念念有词。[80]另一则故事讲述他如何砸毁了潇湘馆，因为这家饭馆竟敢以《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寓所为名。老板是个联大学生，饭馆只好关门大吉。[81]〔这件事另有说法，吴宓并没有砸毁饭馆，而是要求改名，见张子良〈西南联大红学讨论会轶事三则〉（北京《清华校友通讯》复 7 期，第 5 页）和何兆武〈回忆吴雨僧师片断〉（载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02 页）。〕

其实，一般说来吴宓是个温和的人。他勇于承担责任，但易受批评的伤害。除了中午休息，他在门上挂出「谢绝来访」的牌子外，家门总是对学生敞开。在有月色的晚上，人们常看见他和年轻的追随者一起散步，探讨文学与人生。有一幅小插图把他画成轻佻的人——他站在月光下，一边看书，一边小便。

吴宓始终关爱女性。学生了解他内心丰富的感情经历，所以总是把他当作知己。有位年轻的女士向他坦承自己与一个已婚男子坠入了情网，吴劝她「别害怕，勇敢去爱吧！」1942 年，当昆明迷人的春天走向最绚丽灿烂的时候，一对年轻的夫妇服毒自杀，赤身裸体死在床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吴热泪盈眶。「美啊，美啊！」他感叹道。

像吴宓这样的人难免会成为谣言的对象。1952 年，他检讨自己腐朽的布尔乔亚的过去，承认自己 1929 年与妻子分居后，曾「试图追求各种女人，其中几位是我的学生，但都没有成功。」[82] 他在昆明

期间是否有类似的追求，或曾采取何种方式追求，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确实知道，1942 年他痴迷的恋人毛彦文在香港守寡，他试图与她恢复书信联系，最后还是无果而终。爱情上的灰心失意，使他最终躲在佛教典籍里寻找慰藉。[83]作为一名古典传统的浪漫主义者，他在理智和佛典之间左右徘徊，广受爱慕，但最终还是无人宠爱，吴宓是战时昆明独特的人物之一。但他不只性情古怪，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威严的中国学者，学术视野开阔，精通东西方文学，浸淫于自身的文化。在他钻研的各个领域，吴宓都不愧是个博学的怪才，而学识渊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显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的感性于一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联大的风采。

八 法商学院

联大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研究都继承了本国的学术传统，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与此不同，这些都是外来的学科。比如吴晗，他是清华学士，却能够成为公认的明史权威；然而，如果没能在国外至少拿到硕士学位，联大没有哪位社会科学家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此外，在融合中外理论，利用西方学术阐释中国传统方面，社会科学家比人文学者逊色。结果，他们所传授的大部分知识，要么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么与海外情形关系密切，与中国实际则较疏远。经济学系就是一例。

经济学系

联大经济学系的故事与系主任、清华的陈总交织在一起，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叫陈岱孙。1928 年，他担任清华经济系主任时，该系创办才两年，但学生已由 8 人增至 95 人。在他的主持下，清华经济系持续发展，1936 年学生人数达到顶峰，有 148 名。战前九年，清华经济学系比其它任何学科培养了更多的毕业生。[1] 在联大，经济学系甚至更受学生欢迎。除了它所在的法商学院，经济系学生人数基本上超过联大其它各学院学生的总数。

当然，为处理经济问题，中国统治者都要制定经济政策，而且每朝每代的史书里都有讨论粮食和财富的论著。尽管如此，作为一门以科学为指标的独立学科，经济学是西方的舶来品。陈岱孙及其大多数同事都拥有美国学位。因而，美国信条至高无上。1981 年出版的一本书对抗战前清华经济系的课程设置作了如下描述：

各门课程几乎毫无例外都采用美国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几乎绝口不提，只在有的课程中有零星的「介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也只是在《经济思想史》一类课程中做些介绍；绝大部分课程都是介绍各种流派的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全系最重要的

《经济学概论》这门基础课，长年用美国费尔切（Fairchild）等人的教科书，它主要以英国「新古典派」阿·马歇尔的理论系统为基础，讲授的理论是以「边际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杂糅而成。[2]

陈岱孙称本系将使学生「于我国实际状况，有相当之了|解」，该书编撰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这个批评有一定道理。[3]

战争期间，新经济理论的资源从美国转向英国，相应地，这个系的知识结构有所变动。几位刚获得英国学位的年轻人加入经济学系教师队伍，带来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使得经济思想由战前的自由市场模式转向「统制经济」理论。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也比战前多。[4]经济系的课程以英美资本主义思想为导向。

陈岱孙

英美资本主义也是对陈岱孙的思想的恰当描述。陈岱孙是清华—美国联合培养的人才。从清华学校毕业后，他相继取得威斯康辛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博士学位。高硕英俊，笔挺干净，他经常一身西式夹克和灯笼裤，颇为引人注目。有时，他会穿上中式短装，这使他看上去更加儒雅。到了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使得他无力购买西装，他才一袭长袍。他举止谈吐严谨持重，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使学生觉得他是个冷漠的贵族。不苟言笑，言谈简洁到极致。鼻梁稍歪，嘴唇明显下搭，使他令人畏惧的外表更加突出。至于下唇右撇这一特征，有些人认为是由于经常抽烟斗所致，另一些人则归因为遗传。

经济系所有学生排队注册时，会见到他们敬畏的系主任。他们发现，在他庄重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善良友好的心，他们也了解到，他极其不能容忍愚蠢的人。一次，有个学生交给他一份班级计划表，在「国际贸易」里有个错别字。陈岱孙指出错误后，那个学生交给他另一份计划表，却出现了另一个错别字。至此，他把「国际贸易」划掉，在旁边写道：「大一国文，三学分。」[5] 他的性格很适合干行政管理工

作。寡言少语，行事果断，令人敬畏，他把各种要求减到最少。难怪，有位校友赞赏道，经济系学生最多，问题却最少。[6]

在课堂上，他堪称条理清晰、稳重得体、细致周密的典范。总是上课前五分钟到教室，板书当堂课的纲要和英语参考书目，上课铃一响，即准时开始讲授。讲演从容不迫，逻辑清楚，解释准确到位。学期末，专心听讲勤于笔记的学生便可把课堂笔记整理成该主题的简明教材。由于上课教室相距较远，或上一堂课延时，学生往往会迟到。这时，他会言简意赅地概括迟到者所错过的内容。一般很少有必要提问，不过任何疑问都会得到同样准确清晰的答复，这是他授课的特点。然而，如果有学生第二次问相同的问题，他可能会叫道：「那么笨！」

他给经济系大一学生讲授「经济学概论」，这是一门必修课，来自外系的听众使原本座无虚席的教室更加拥挤了。他采用费尔柴尔德（Fairchild）、弗内斯（Furniss）和巴克（Buck）合著的《经济学概论》作为课本，老而可靠。「公共财政」主要使用中文教材，包括何廉与他人合撰的《财政学》，及斯里格曼（Edwin R. A. Seligman）的研究成果。他教导学生，在经济组织和生产方面，中国还须大力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但他保有中国观念，他认为在分配上避免贫富悬殊是很重要的。[7]

他的私人生活引来了诸多猜测。由于昆明生活单调，作为一个温文尔雅的单身汉，他便成了「长舌妇们」热衷讨论的话题。直到今天，有些校友还宣称十分清楚他的风流韵事。1980 年，在拜见他时，我漫不经心地问，像他这样的单身汉在战争期间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经常打桥牌，」他回答。当我把他的话复述给他以前的一位学生时，那个学生评论道，「那说明他有一位伴侣。」

陈岱孙的同事

同陈岱孙一样，联大其它经济学家都曾在美国或英国留学，偏向外国理论甚于中国实践。到毕业为止，联大经济系学生需学习统计学、

货币银行、公共财政、经济史和国际贸易，同时要读如下著作：马歇尔（Alfred Maeshall）的《经济学原理》、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经济分析》、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价格理论》、奥基（Frederic A. Ogg）的《欧洲近代经济发展》、奥林（Bertil Ohlin）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还有陶辛格（Frank W. Taussig）的《国际贸易》、卢兹（Harley L. Lutz）的《公共财政学》和凯斯特（Roy B. Kester）的《计量理论与实践》等。虽然老师和学生可能几年以后才能读到最近出版的图书杂志，但他们一般都会发现，他们以后在哈佛、哥伦比亚或伦敦政经学院的课堂上都非常随意自如。

赵乃搏与陈岱孙职位相当，他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赵氏曾在威斯康辛投身伊利（Richard T. Ely）门下，但却在哥伦比亚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指导教授是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在北大和联大，赵乃搏以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为榜样，自诩为「中国的马歇尔」。有些学生称他为「赵歇尔」。

虽然是留美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但是，赵乃搏仍保持着中国人的作风，穿着也很中国化。他褪色的蓝布长衫有一半被长髯遮住，至少在昆明有一段时间如此。他的国语带着杭州腔，常常即兴赋诗解释自己的观点，兴味盎然地引用中国诗文，煞费苦心地用中国术语解释西方商业周期。有个学生最喜欢上他的「经济思想史」，发现这个老师「很不时髦，有时还非常可笑」。[8] 按照他的马歇尔原则，及其回首过去甚于展望未来的性情，他喜欢小企业胜过大企业，因为他认为前者更能适应恶劣的环境。

作为一名教师，赵乃搏和陈岱孙一样条理分明，但他缺乏陈的优雅。有个同学回忆，他讲课「好像背书似的」。检查笔记时，学生们发现每个钟头所记的内容长度几乎一模一样。[9] 不过，由于博学和刻苦，他获得了普遍的尊敬。为躲避空袭，他在上午八点到十点上课。每天早晨，从岗头村走四英里路进城，晚上再走四英里路回家。[10] 上课出勤方面比较宽松。在学期初，他宣布期间会点三次名，「第一次

你缺席，我会假定你去了重庆；第二次，我会假定你去了桂林；第三次，我会假定你到滇缅公路做生意去了。」在一个不容易亲近教师的系，他却被认为和学生的关系相对比较密切。[11]

赵乃抟在北大的同事及念研究生时的同学（哥伦比亚硕士）秦瓒讲授「高级财政」和「中国财政史」。同赵乃抟一样，秦瓒也以善于组织闻名，授课条理明晰，层次清楚；但是，在对待中国传统上，他们意见不一。秦瓒对《周礼》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井田制——很感兴趣。1980 年，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在昆明，已是云南大学的退休教授，对乌托邦体制的热衷却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详细讲解了《大同书》里由康有为提出而广为人知的人类大同观念。与他闲云野鹤般的朋友刘文典一样，有时候他一学期只上几个钟头的课；而他一旦认真起来，一学年不会少讲一分钟。（他评分很宽松，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某些课没上所造成的后果。）[12]他很可能不怕被解雇，因为在联大普遍贫困的教师当中，他是最有钱的一位，只有法律系的芮沐可以跟他比，因为芮有利润丰厚的私人事务所。秦瓒的经济来源据说是他持有个旧锡矿的股份，那个矿是他父亲在云南做官时投资的。该矿在战争期间生意兴隆，使他成为联大唯一拥有私人黄包车的教授。[13]

秦瓒对井田制很感兴趣，赵乃抟偏好小型经济单位，陈岱孙倾向中国人的分配制度，在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联大经济学家的内心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价值观的残余。然而，总的说来，他们几乎没有尝试把这些观念与西方的学术原理融合为系统的理论。相反，这里所看到的是受过西学训练的学者以奇怪的方式对中国身分的再次肯定。

第三位拥有哥伦比亚硕士学位的北大资深经济学家是周作仁（不要混淆成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他在日本侵略期间仍待在北平）。他身体孱弱，戴线帽，戴金边眼镜，蓝布长衫上到处是粉笔灰。跟赵乃抟一样，他也住在城外，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时候，学生看见他背很多大米，步履蹒跚。他勤勉认真，但缺乏创见，不过从前的一位学生为

他辩解，说他的「货币银行」就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而这种课不允许海阔天空任意驰骋。[14]

周炳琳是第四位北大－哥伦比亚团体的成员，走的是周作仁的路子——北大学士，哥伦比亚硕士——但是，他还到伦敦政经学院和巴黎大学进一步深造。在学术知名度上，他不如周作仁，但是在教学的呆板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保证所有课程都使用英文教材。在高级经济理论班上，他几乎是逐页朗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系办公室里，他和几名学生坐在一起，这样他们无需仰视他，听周炳琳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逐字阅读马歇尔。他携着一沓英文笔记和修「经济思想史」的学生见面，这门课阅读和翻译轮流进行。因此，学生把他的课戏称为「大三英语」。[15]

在学生时代，周炳琳是五四运动的骁将，后来仍参与政治，处理北大和国家事务。他秉公廉政，不畏权贵，享有盛名。他批判的对象包括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思想控制、孔祥熙及中央训练团。然而，在一二・一运动中，他是联大学生罢课的主要反对者。[16]

最枯燥无味的授课者要数清华的萧蘧了。他教「国际贸易」和「经济学概论」。他讲课满是细枝末节，「你打盹十五到二十分钟，醒来后他还在原处不动。」[17] 因为上课开始的半小时用来复习上节课的内容，一些学生迟到半小时，而另一些人早退半小时，他们都自信不会错过上课的内容。不过，学生们禁不住同情他。萧氏为人和善，战时的通货膨胀使得他的大家庭一贫如洗。上课穿的衣服都很破旧，缝缝补补，几乎没有不是补丁的地方。他说——由于激动而哽咽——「今天我教你们，可是我却没钱给我自己的子女念书，你们还不好好念？」他的话打动了学生，但要使他们一直坐到下课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容易。为解决学术问题，可能还有经济困难，萧蘧 1944 年离开联大，就任中正大学校长。[18]

经济系学生最担心的课是杨西孟的统计学。他是密西根大学硕士，也是杰出的北大教授。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学生的数

学水平与他相当。他的基础课对于那些已学过微积分的同学就是一个挑战，而高级课程，即便对于高年级学生，那也都是一堆符号和方程式。一位校友代表回忆：「对于我们来说，那全是希腊语。」[19] 战争结束时，杨西孟四十四岁，在一群更年轻的经济学家当中俨然一位长者。这些青年经济学家超越他们系的理论导向，运用知识解决当前的政策问题。利用计量手段，杨西孟建立数据库，对重庆政府的财政政策提出异议。

伍启元是杨西孟最亲密的同事。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备极推崇。为抑制恶性通货膨胀，他主张控制物价，征收累进利得税或没收富家财产。[20] 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经济资料收集者，把塞得满满的档案夹和笔记——经济分析的原始素材——带到课堂，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幸的是，他的广东腔过于严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学生难以听懂。他认为自己在谈论「匠师」时，学生听到的却是「作死」。[21] 对于他和杨西孟来说，这尤其不幸，他们有那么多知识传授给学生，却不能相互交流。

伍启元获得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后，于 1939 年加入联大。[22] 他是战初从英美留学归国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他们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并运用新的理论工具分析问题。戴世光（密西根硕士，哥伦比亚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教统计学基础，在位于呈贡的人口研究室担任陈达的副手。因为很多学生畏惧杨西孟数学导向的统计学，戴世光具有实用倾向的统计学便成为他们的另一种选择，因此深受欢迎。戴世光和同事杨西孟、伍启元及云南大学人类学家费孝通一起，就社会和经济问题发表尖锐的批评，他们的意见刊登在 1945 年的《大公报》上。

在年轻的教师中，特别突出的还有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家滕茂桐（伦敦政经学院 1941 年理学硕士）和徐毓楠（剑桥大学 1940 年博士）。他们让联大的学生知晓了最新的经济学理论。滕茂桐介绍了庇古（Arthur C. Pigou）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观点，并把

indifference curve 译成「无所谓曲线」。徐毓楠使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了解到凯恩斯充分就业的思想。[23]

虽然南开专攻经济学，但它在联大经济系仅有一位代表——丁佶。丁氏 1940 年 10 月 4 日溺水身亡，他所担任的必修课「初级会计」由一位枯燥乏味的年轻同事和昆明银行的职员讲授，但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填补丁的空白。[24]

然而，联大经济系学生并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快而学习「死气沉沉的科学」的。大批学生选择该专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找工作。战时，银行、企业和政府机关都争相录用经济人才。证书上带有「经济」字眼的学生没有理由担心毕业后会挨饿。1939 年，仅中央银行就要走了联大经济系十位毕业生。

经济系学生寻找系统地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答案是注定会失望的。无论他们的出发点是马歇尔原则还是凯恩斯思想，联大的经济学教授并非理论家。即使到抗战结束，极其糟糕的形势迫使他们批评官方政策，但他们大多数人仍像技术官僚改革者一样处理中国的问题——如胡适所说，「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步的改善」。当历史系的吴晗和中文系的闻一多左倾时，经济系却没有一位教师动过马克思主义的念头。有的联大经济学家还试图通过边际效用理论来驳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认为，马克思错误地认为价值取决于「供应方」（生产者），而实际上取决于「需求方」（消费者）。[25]偶有学生无意间闯进陈岱孙的办公室，要求指导阅读马克思理论，陈岱孙会推荐英语入门书《马克思：学生读本》（*The Student's Marx*）。但在课堂上，他的经济史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讲到凯恩斯，却只字不提「科学社会主义」之父。[26]在联大所有科系中英美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学系，找不到这位德国激进主义巨人的位置。经济系毕业生基本功扎实，拥有良好的就业前景，想探求思想灵感的、躁动的知识青年只好另觅出路了。

政治学系

热衷于党派争议的学生可以转到联大的政治学系，在那里战时中国学术界的两极分化特别明显。该系教师几乎 100%是国民党员（系主任张奚若除外），教授分为两个方向——要么进入政府机关，要么坦率地反对现政府。到战争后期，政府引进了至少半打政治学系的教师，而他们的总数还不到一打。清华学者浦薛凤和王化成在战初就到官府任职，北大政治系系主任张忠绂紧随其后，于 1937 年离任，到外交部长王宠惠部下服务。战争期间，国际法专家崔书琴成了政府的常客。两位年轻教师——龚祥瑞和楼邦彦，他们把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信条从英国带到联大，最终也在官方谋职。

这个系名副其实。它是政治系——关于现实政治的系，不是研究政府与政治学的系。「政治」一词带有贬义，因为它属于「党」的范畴。「党」在传统意义上被斥责为野心家、利己主义者、流氓的密谋组织。民国初年以来卑鄙无耻的政治阴谋史几乎没有赋予这个词积极肯定的含义，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政治集团曾获得过短期的尊敬，因为它们为了国家大事而牺牲党派利益。联大后期的文人学士们对任何贴有「政治」标签的事一概予以回避。

还是有许多学生认为这个系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把它视为战时的国民党政府。抗战初期，政府威望较高，该系的学生也相对较多（大约占全体学生总数的 4%）。后来政府声誉下降，入学人数也降至约占全校学生数的 20%。[27]根据可利用的纪录和回忆材料，从 1939 直到 1945 年，该系 100 多名毕业生中只有 3 位女生，这个统计只屈居于工学院之下。看来，不管是学术还是其它原因，政治领域对女性的偏见仍很盛行。

张奚若

张奚若，矮壮敦实，衣冠楚楚，留着铅笔芯一样细的胡髭，戴黑边眼镜，白发被呢帽遮住了。他有时候在家穿一身长袍，但在公共场

合常穿一套熨得平平整整的黑色或灰色西装。可能会被误认为官员或企业家，但为了保持尊严，他会随身携带着拐棍，这使他看上去像一位外交官。在北伐到抗战爆发前，大多数同事累积了丰厚的钱财，张却债台高筑。他一家四口在绿意盎然的清华园过着舒适的生活，可是他却在城里租了一套装修精良的房子，这个陈设雅致的场所由一名厨师和两个佣人看管。为了这份奢华，单单租金每月就要花 75 元，在 30 年代中期通货紧缩的经济形势下，这绝不是一笔小数目。[28]

在清华执教很久以前，张奚若与北大－清华的人际网的几位关键人物都建立了联系。在家乡陕西，他曾经与吴宓同学。在上海准备留学时，他跟胡适学过英语。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的同学包括胡适、徐志摩和金岳霖。回国后，他曾任职于蔡元培领导的南京大学院。[29]

张奚若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30] 有位同事回忆，张奚若是条「硬汉」。[31] 然而，他演讲时，温文尔雅，机智幽默，极富魅力。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概论」课堂上，他狡黠地故作无意发表风趣的评论，然后继续他的讲演，好像没听到学生们的笑声。

身为教师和学者，张奚若毁誉参半。清华任教前期，他以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勤勉刻苦的工作而知名，但在后来几年，人们觉得他萎靡懒散。在法庭上的辩论技巧经常使他口若悬河。有一次，他在北大上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早上十时一直讲到下午一时左右，然后在下午三点继续讲，直到五点结束。虽然才思敏捷，谈吐诙谐，讲课引人入胜，但他严厉的评分标准却把许多学生吓跑了。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者并不能得高分，因为他最欣赏独立思考，哪怕与他的观点对立。考试成绩公布时，在 80 到 100 分这一档几乎没有人，有些人的成绩却在 30 到 50 分之间徘徊。[32] 例如，1936 年秋，只有八位极为勤奋的学生选修他的课，结果四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他却给张翰书（后来成为台湾立法委员）九十九分，外加一分得了满分。

这件事在北大、清华，包括两校校长在内，人人皆知。[33]

曾在北大、哥伦比亚和伦敦政经学院求学，英语流利，法语尚可，张奚若绝对见多识广。妻子杨景任是陕西省遣送留学的第一位女生。夫妇俩极为好客，经常英汉并用，与博学的客人交谈。联大最优秀的英语讲师之一——李赋宁——在这种交流中脱颖而出，使他对自己的专业和异域文化更加熟悉。[34] 美国领事菲利普・斯普劳斯（Philip Sprouse）发现，张奚若「彬彬有礼，坦诚正直，坚毅果敢，富有幽默感——具有中国最好的品德」。法国总理艾德加 •佛瑞（Edgar Faure）1956 年曾与张奚若见面，形容他「儒雅谨慎，并充满智慧」。费正清则断定，他是「二战期间昆明自由主义人士当中最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并且具有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气质」。[35]

张奚若能包容各种观点，但明显偏爱民主思想。虽臣服于黑格尔严苛的批判，但他讲授鲁索时充满激情，极富感染力。他的重心在英美自由主义派。他乐于告诉学生：「人家说胡适之中了美国的毒，我就仅次于胡适之了。」[36] 他曾对一个学生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说他想说的，那最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写。[37] 然而，对国家的忠诚常常使他推翻自己的自由信念。战时，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坚定分子、坦率勇敢的国民党批评者，但是在思想冲突的最后，恐怕他原则性的反对共产党的形象更为有名。在 1935-1936 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作为系主任，他协助把张申府教授赶出清华，因为后者在课堂上鼓吹共产主义。1941 年春，国民党没有通过政治手段解散共产党的新四军，他把蒋介石的诉诸武力比作医生在「化脓溃疡」处动手术。[38]

直到 1944 年 1 月，张奚若才开始怒斥国民党的腐败和压迫。他斥责重庆的当权派「独裁专断、腐败无能」，还说国民党反动派「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被指定参加国民参政会，他便利用职责对政府大加挞伐。有一次蒋介石打断了他的责难，他拂袖而去，返回昆明。下次接到参政会的通知，他拒绝参加，并把路费退回。后来，作为著名的无党派人士，他被提名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发言人却说他

是他们党最有资格的代表。他为此致信重庆媒体，宣称他曾以同盟会会员身分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从未加入国民党。[39]

战时，张奚若告诫政治学系学生要成为社会改革者，而不是紧盯着官府职位。他说，如果做不了社会改革者，那至少要成为正派的政治学者；即便当平民百姓也比一心想做官强。[40]然而，1949 年后，他担任了人民外交协会会长和教育部长职务。他愿意压抑自由思想以支持一党专政，因为该党承诺要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这和他在抗战初期拥护重庆政府如出一辙。

钱端升与王赣愚

钱端升是张奚若的同事与密友。同张奚若一样，在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钱端升从有保留地支持转向直率的批评，到最后加入共产党集团。钱端升曾离开北大，到国立中央大学任教，但抗战爆发后，他答应蒋梦麟回北大主持政治学系。他被认为怀有政治野心——这个看法是有缘故的，因为中央大学在地理上和学术上都位于国民党的大本营，靠近权力中心——在北大同事中，他并不是最有威望的，而清华同事把他看作「北大人」，对他颇有几分怀疑。以前的同事浦薛凤后来说，他「过于自信」、「未能免俗」。[41]

钱端升曾卷入联大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学术自由案——罗隆基案。重庆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傅斯年提议聘请罗到北大执教，这样罗隆基就在 1939 年加入了联大。对蒋梦麟做出的这个决定，钱端升并不知情，也不会认可，此时他除了主持政治学系，还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罗隆基本来就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也是一位自由的宪政主义者，但被普遍认为是个政治活动家，而不是一位学者。钱端升担心罗隆基会草率应付教学任务，便申请辞去两项职务，并不仅仅是头衔上的。然而，在蒋梦麟的坚持下，他同意只辞去系主任职务，继续担任院长。尽管如此，两年后，罗隆基因为对国民党的直率批评被解雇，钱端升扬言要辞去教授职务，抗议对学术自由明目张胆的亵渎。[42]身为哈佛博士，钱端升是政治学系一位严厉的老师，也是最优秀的学者。他是

两卷本《民国政制史》的主要作者，还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大量论文。从 1939 到 1941 年，他主编抗战初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言论杂志——《今日评论》。王赣愚是他事业上的左右手，也是哈佛博士。他是政治学系最勤奋的教师之一。他主要隶属于联大，讲授「中国政府」和「政治思想史」，但为了养家绷口，他还到云大做全职教授。

王赣愚是个无可挑剔的国民党员，但在战时，他是一位独立的评论家，同时还出版了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和县政府的论著。对日抗战胜利后，他致力于研究民主、改革和「新的政治前景」。正如研究主题的变化所表明的，与钱端升、张奚若及其它同事一样，王赣愚从完全支持执政党合法行为的客观的学者转变为政府批评者和改革支持者。1946 年，有个左派学生把他说成「政治系最进步的教授」，他「对现政府的憎恨和厌|恶」是「毫无疑问的」。[43]

法律学系

政治学系或法律学系的毕业生是直接为公众服务的。在战争后期，政府威望下降，政治系学生随之减少。然而，选择意识形态色彩更淡、技术性更强的法律专业的学生却急剧增加。

当然，这不是联大法律系教授的能言善辩吸引了莘莘学子，因为，从当时学生的意见和校友回顾过去的访谈中可以断定，法律系教师授课的索然无味是独一无二的。有人把这归结为欧陆和日本法律教育水平低，因为联大法律系大部分教授是在那里培训的；有人则认为是教学上缺乏创意，没有理论分析，只会逐条讲解法规。像近代法律很不容易融入中国的政府制度和社会秩序一样，它似乎也很难融入中国的教学体系。联大的法律学者很可能太过忙于理解法规的字面含义，以至于不能够关心法律的精神。

这个系几乎是由燕树棠一手创办的，他是该系唯一的留美教授（哥伦比亚硕士，耶鲁法学博士）。他自诩是儒家伦理的守护人。俗话说，「安贫乐道」，他的性格正是如此；而「择其善者而从之」，则

被认为是他坚守的行为规则。[44]抗战后期，法律系其它教授都做兼职以维持生计，只有他选择降低口粮定量艰难度日，却不肯动摇他的原则。以他严苛的原则来衡量，世上没有人能达到。「国际公法不教了，国际关系也不谈了，国际上于是乎太乱了。」言下不胜唏嘘。[45]

燕树棠批评北大式的个人主义使学生长于独立，而短于合作。他发现，战时中国的学生缺乏青春的朝气，像个早熟的中年人——一本正经、老于世故、精于算计。他说，他们需要更加「原始的激情」，他的意思是，更多道德上的热情。[46]一天晚上，有个联大学生打他的女朋友，被燕树棠拦住了。当那个年轻女孩争辩时，燕树棠斥责她放弃正当防卫的权利。在下次考试时，他的题目中含有不正当的行为对公共秩序的影响的参考资料。[47]

燕树棠提倡建立纪律严明的法治社会，直言捍卫国民党的正统。他竭力主张缓行宪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并建议赦免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李宗黄的法律责任，而李是 1945 年一二・一运动中使三位学生和一位老师丧命的凶手。他这些观点使激进的学生异常愤怒。[48]据说，在一次公开辩论中，他曾质问周恩来共产主义的价值，但失败了。一位政治观点相左的同事说，燕树棠是「联大所有教授中思想最反动、言谈最粗俗的一位」。[49]

燕树棠在法律系的同事都是北大人（清华与南开都没人教法学）。蔡枢衡为刑法教学带来崭新的视野和辩证分析的能力，他的犯罪理论就是「主观必然性」和「客观偶然性」的辩证。但是，如一个从前的学生所回忆的，他的课「枯燥乏味」。[50]因为重听，他背对学生大段大段地写黑板，他因为「本性顽固不化」而名声大噪。在校外，他遭到更大的挫折。1942 年 1 月，为补充微薄的收入，他开办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除了离婚案（这有悖于他的道德），他代理其它所有官司，当然他都错过了机会（以免他自己难堪）。为解决听力问题，他雇佣秘书随他上法庭，虽然如此，他做辩护律师的日子不到半年就结束了。[51]

学生对法律学系其它老师教学的评价令人瞠目。其一：「他真的是他们之中还值得一提的，『其实他一无所长』。」[52] 其二：「他像一只绣花枕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53] 与此相比，下面这个评价就算是恭维了：「他照本宣科，但他『宣』的比别人好。」[54] 唯一一位在个性和教学上获得好评的是费孝通的哥哥费青（东吴大学法学学士，柏林大学法学硕士）。有个学生认为，他勉励学生的作风「和若春风，冷若秋霜」，称赞他既熟悉英美法，又熟悉大陆法，还说他既能「谈论深奥的法理」，又能「举出有趣的案例」，而且是一位「运用理性追求正义和权利」的人。[55] 虽然这个赞美很有分寸，但是，在这个满是无聊的空谈家和古怪的庸才的法律系，费青的确是一盏耀眼的明灯。

社会学系

在联大，社会学系被并入历史系三年之后，于 1940 年取得了独立地位。尽管有清华教授和战时加入联大的新人，但社会学系规模还是很小，这是它处于从属地位的部分原因。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努力，社会学本身作为一门正当的社会科学才得到尊重。对于这个学科，即使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卓有建树的权威学者也曾有顾虑，更别说社会学在中国注定要被误解了。直到 1947 年，一份清华社会学系的简介开头还需要澄清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人认为社会学系是社会交际系，也有人认为社会学系调查……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社会学系的目的是训练人们做社会工作。」[56] 十年之后，在共产党的政治秩序下，社会学系被斥责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术堡垒。据说，法学家以「科学研究」为幌子，其著作「都是为反动政府张目的」，而社会学家更甚，他们「企图利用『学术』的外衣，掩盖他们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调查研究的活动」。[57]

联大社会学家曾经积极参与一些官方资助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研究项目，但这未必意味着他们自愿介入反动政府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活动。最阴险的可能莫过于它反映了学者「切合实际」的决心。对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接受训练的社会学家而言，「价值」意味着组织调

查社会状况，并帮助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当局——地方政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配合，联大的社会学家不可能执行任何任务，他们就只有回到以书本为中心的调查和理论写作，脱离他们致力于研究的社会。美国的学术训练和战时昆明的环境都不可能提供全新的选择，职业社会学家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现实政治秩序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的问题是，参与的方式、条件及思想与学术独立的代价。

1940 年，中央政府社会部的建立给社会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他们社会改革的思想和计划有了表现的机会，同时急需的资金也有了来源。当然，这个部有它自己的目标，包括打压政治对手、控制民众运动等。[58]结果，这样就成了社会学家和国民党官方之间的思想交锋，前者主张客观的社会调查和人道的改革；后者则想藉此实行政治和社会控制。社会部最初建立时，谷正纲部长欣然接受了一群联大社会学家的建议，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检查制度，成立检查所培养检查员，职员自然由他们的学生充当就足够了。然而，蒋介石亲自指定调查员承担「检查异党」的任务。该系两位老师被蒋介石召唤到重庆，为中央训练团进行高级培训。他们还同意给党政官员演讲「社会调查」，帮助起草关于人口普查、工厂检查和人口政策的法案，并指导训练社会行政人才。[59]

联大社会学家与政府合作时间最长的是位于呈贡的国情普查研究所，该所由清华社会学系系主任陈达主持。这个所的调查工作经常得到几个政府机构的配合与资助，尤其是内政部和社会部。[60]它在昆明－呈贡地区的人口研究、基础资料调查和农业调查，虽然都严格地采用了科学方法，但难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因为在中国的调查总是成为赋税、征兵以及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工具。

政府批准在「战后社会建设的初步研究」的总题目下开展调查研究，并为一些问题提供研究基金，如昆明社会救济、少数民族和县级社会管理。社会部提供的资金帮助社会学系支付行政费、图书购置费、

助教生活补助和学生奖学金。1943 年 1 月，陈达担任昆明市社会处顾问，因此他和他的学生可以在那里组织薪金调查，为制定「限制工资」政策提供依据。[61]

潘光旦

陈达虽是联大社会学家与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员的主要联系人，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呈贡，每周到昆明讲一两次人口统计，有时也讲劳工问题。在学生看来，联大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是系主任（1943-1945 年）潘光旦，他还担任过教务长。潘光旦善良友好，性格外向，擅长幽默。园脸，矮胖个，几乎从未离开过福尔摩斯式的烟斗，烟叶已燃烬很长时间，还紧紧地叼在嘴里。最显著的身体特征是缺了一条腿，那是他在清华读书期间踢足球意外造成的。他拄着拐杖走路。在跑警报到达山里时，他自嘲道：「看，我跑警报不比你们慢吧。」

这是潘氏典型的自我嘲讽。（在优生学课上，这位有五个女儿的自豪的父亲对学生说，「我说到做到。」）在美国读研究生期间，一天，正值盛夏，他摘下草帽站在火车站里。出于对这位英俊的东方跛子的同情，有个妇人掏出一毛钱扔进他的帽子里。一阵困惑之后，他反应过来，然后镇定地把钱放到口袋里。

潘光旦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学术创新毫无止尽。为搜集遗传在优生学上的证据，他埋头爬梳族谱。他翻译了靄理士（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学》，译文简洁雅驯，在详尽的注解里，他引用了中国历代正史、野史、专著、诗歌、戏剧和历史小说里的资料。[62]他心地自由，勇于标新立异。在普遍信仰无神论的学术界，他坦承自己是一名基督徒。面对反叛传统婚姻制度、支持自主择偶的一代，他谴责自由恋爱，宣传包办婚姻的好处。在一个女性解放的时代，他满不在乎地宣称，身为人妻就是做家务、看小孩。对于深信后天影响的学生，他强调先天遗传的重要性。由于相信当时流行于优生学界的观点——物种杂交的第二代会退化，他曾试图阻止一位美国朋友与中国未婚妻结

婚。[63]

关于爱情、婚姻、家庭和遗传的观点是他有机的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无论在科学上多么不可靠，他的优生学都是对当时问题的分析和解答。他用笔和嘴讨论了大量的历史、政治和社会问题——儒家思想、共产主义、专制与民主、战争与和平、青年与教育、中国的未来与人类的命运。他一个人就是一部《纽约书评》，堪称联大的通人。

同样，见多识广、博采众长使潘光旦给优生学带来了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视野。他推崇自由主义，摒弃党派观念。在 1935 到 1936 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作为清华教务长，他被左派学生虐称为法西斯；但是，在 1945 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抚慰年轻激进的学生。联大学生十分敬重潘教务长，连公开藐视他限制自由恋爱的青年夫妇都争相去上「家庭问题」课。此外，在教育问题上，他坦承拥护自由选择。当研究计划被持不同意见的系主任否决时，学生们知道，他们总能在教务长那里得到支持。有私人问题的青年也总是求助于他。据一位女校友回忆，她曾哭着请求他不要给她记过，因为她在正常的关门时间之后翻墙返回宿舍。[64]

潘光旦从来不会因为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而不知所措。他认为，人吃的东西老鼠都吃。而且，当地的老鼠又肥又大，他就张夹设笼捕捉老鼠来吃，然后把老鼠皮制作成战利品，陈列在墙上。潘家的日常飲食一旦众所周知以后，被他邀请去吃饭的朋友都不免战战兢兢。革命领袖试图打破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隔阂，而十年以前，他就建议把大学搬到农村去，学生可以在那里种植庄稼饲养牲畜，不但能提高饮食水平，还能和中国农民大众打成一片。[65]在昆明的岁月里，虽然学生们干各种工作，但如此系统的方案，潘的同事根本就没想过，更别说中央政府了。

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潘光旦最终感到自己与重庆政府格格不入，因为它的腐败和压制日益显著。1944 年上半年，国民党审查机关拒绝审核与他有关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出版物，他准备与这个恐

怖的机构大干一场。1946 年 7 月闻一多遇刺后，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就躲到美国领事馆去了。

社会学的不同路径

在个人性格、学科方法、学术工作和课程导向方面，陈达和潘光旦立场相反、意见相左。该系的课程在 1928-1937 十年间的发展和在昆明的调整，都是这两个路径相互影响的结果。陈达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是，把问题缩小到可操控的规模，然后严谨地分析。他理想的课程是使学生早早地专业化，着重培养他们收集和理解调查资料的能力。陈达试图缩小调查问题已知的范围，表明他对人类掌握更大真理的能力的深刻怀疑。「当你谈某件事的时候，」他告诉学生，「说话不要肯定。」[66]

另一方面，潘光旦是个无所拘束的人，他宁愿就未经证实的大问题发表富有争议的见解，也不肯就琐细的问题说一些已被科学证实的陈词滥调。潘光旦相信，只有在广博的通才教育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社会学的理解。作为一位研究过动物学的社会学家和优生学家，他相信，聪明的社会学家必须通过辅助学科来培养，尤其是生物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虽然与陈达在调查和统计技能上有相同的认识，但在他看来，那些只是调查人类状况的几种工具而已。在潘光旦的整套本领中，创造力才是最重要的工具。

在陈达、潘光旦及其它同事的相互砥砺下，社会学系的课程被分为三个部分：理论社会学（潘的特长）、实用社会学（陈的特长）和人类学。把他们联在一起，就构成了引导学生进入社会调查的四个阶段：（1）大一，通过学习社会学原理的基础课，以及对社会服务机构的田野调查，明确他们的研究对象；（2）大二，学习如何收集资料，上统计学和社会调查方巧。法的必修课；（3）大三，通过社会调查田野工作，学习怎样分析和组织材料；（4）大四，把所学到的所有知识用于撰写一篇学术论文。[67]1942 年一些论文的题目上有陈达的评论，从中可以窥知社会调查的资深工作者眼里的初出茅庐的社会学者的

成续：

中国旧节之初步分析(从书本上搜集材料,彷佛是史学家的工作。至于社会学者所应注意之点，仅偶尔提到)。

昆明妇女消闲生活之调查（用调查表，并用谈话方式搜集材料。范围太广，叙述太简，像是新闻记者的工作)。

一个关于使女的研究(访问昆明市内外使女八十人，每一次谈话所记不多……有许多是浮面话，有许多是重复的事实。这个研究不可采用访问法)。

大学男生的婚姻生活研究(本问题对于个人有极亲密的关系，用普通的问题表，得不着有趣而可靠的材料)。[68]

1939 年 8 月，教育部颁布对社会学系的统一要求，旨在扩大必修课科目并使之标准化。社会学系四年学习（1943-1947 年）的一份测试表明，联大的课程安排比战前清华的更广泛，比重庆制定的模式更灵活，所以没有修完教育部的「必修」课也可能毕业，而修习教育部批准的课表上没有的选修课（如潘光旦的「优生学」〉也能获得学分。[69]

费孝通

云南大学实力很强的人类学系至少有两位教授同时在联大任教。陶云逵（1943 年去世〉讲授「西南边疆社会」，这是与历史系、地理地质气象系合作的为数众多的「边疆研究」中的一门课。1944 年初，云大杰出的青年人类学家费孝通开始讲授:「民族学」和「小区研究」。作为布朗（A. Radcliffe-Brown）功能学派的追随者，费孝通引进了「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该法与陈达和李景汉的「社会调查」法有别。费孝通试图通过所收集到的资料检验特定的假设，从而超越纯粹的实验式的调查。

对于系里聘请费孝通，曾有一些反对意见。他曾是清华社会学系

第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唯一一个研究生，却从未跟陈达学习过，而且对于像陈达和吴泽霖这样老式的社会调查实验论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藐视。他发现自己确实与潘光旦志同道合，也只有潘光旦取代陈达担任系主任之后，李树青（系里的年轻教师，也在云大执教）才能够安排聘请费孝通。费氏其时还不到三十五岁，精力充沛，很快赢得学生们的欢迎。他和他们一起打球，一起开会，并把他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广阔天地。[70]然而，在学生中的迅速走红并不意味着老派人士的立即认可，尤其因为雄心勃勃的青年费孝通，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击败老对手后的兴奋之情。「我打败了陈达这个老家伙，」他在一封写给外国朋友的信中自夸道，「我扬我所长，击其所短。」[71]

费孝通逐渐获得了国际同仁的高度评价。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奠定了他作为 20 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的地位——事实上，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在陈达一丝不苟的方法论和潘光旦热情洋溢的创造力之外，增添了他的思想激情（intellectual excitement），使联大社会学系成为战时中国知识分子话语的典范。1949 年以后，社会学系被撤销，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沦为从政者的婢女。回顾联大社会学系，它已取得的成绩更加令人敬佩。

对法商学院其它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的评价肯定更加模糊，不仅因为战争的迫切需要，还因为在 20 世纪中叶中国动荡的大环境下，运用英美式的社会科学本身的困难。然而，在这些领域，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学术界相比，联大的成就使人更加钦敬。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终于开始重视现代社会科学时，他们转向寻求像费孝通、钱端升和陈岱孙这样的学者的指导，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联大时代历经磨难的幸存者。

九 战争与学术

以学术成果来衡量联大教师的优劣是不合理的，因为战时的研究者是在极其糟糕的条件下工作的。藏有珍稀典籍的图书馆和配有最新科学设备的实验室都搁置在沦陷区。运出的图书和仪器设备要么毁于途中，要么在到达时已七零八散。从化学用品到书写用纸，基础材料的供应都很吃紧，有时甚至不可得。停电是家常便饭，即使有，灯光也很昏暗。由于通货膨胀，薪水跟着贬值，教师不得不通过兼职补充收入，这样一来研究的时间就减少了。饮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这使他们体力不支，精神不济。

毕生的学术成果可能毁于一颗炸弹，也可能消失在一次空袭警报的混乱之中。1942 年，某次空袭过后，社会学家李树青到房间，发现已被窃贼偷得一乾二净，其中包括放在公事包里的 20 万字的手稿——《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为预防这种劫难，此后，无论什么时候跑警报，金岳霖教授都携带着《认识论》的稿子，那是一部累积了近三十年心血的成果。躲在小山里的避难地时，他就坐在那件宝贝上，格外注意防范。一天，空袭警报解除之后，他往城里走去。突然间，他意识到把自己的巨著丢下了，便赶紧返回，但已经不见踪影——「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这场灾难过去差不多四十年以后，他这样自我调侃道。他镇定自若，坐下来重写全部 70 万字的书稿。[1]

坚持学术的毅力

令人感叹的倒不是联大学术成果的坎坷遭遇，而是那么多的工作仍一如既往地进行。由于设备极度缺乏，实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削减得最为厉害。虽然如此，正如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报告的，自然科学的每个学科都有人在凑合的实验室坚持研究。1943 年 3 月，访问云南之后，李约瑟称赞道：「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自己国家的边远地区

坚持研究，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在逆境中，他们表现出非凡的乐观与豁达。」[2]

李约瑟的印象真正令人扼腕。他抵达云南时，战时科学研究最有成果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从 1938 到 1941 年，在通货膨胀使学术资金严重贬值之前，那时日本没有占领东京湾和缅甸，还没有切断至关重要的补给时，许多科学家还能继续在北平开始的工作，甚至能根据云南的环境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黑龙潭研究所，那里距离昆明有两小时的路程，李约瑟发现，车间尚好，但由于缺乏资金，机器无法运转；工资极低，连合格的技术工人都只好去私人企业。[3] 40 年代中期，条件更加艰苦，科学研究仍在继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约瑟主持的「英国文化科学委员会赴华使团」的援助。

要是科研机构不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那么，仅凭中国人的坚毅和外国的援助也会无济于事。北大、清华和南开仅仅是近年来才有研究能力。北大的理科研究所可以追溯到 1935 年。清华的航空研究所创办于 1937 年。金属学研究所、晶体物理研究所和国情普查研究所都是战时添置的。

战时在云南开展的大量研究，尤其是理工科的项目，都是在昆明僻远的乡村进行的，因为那里没有空袭问题。清华的无线电研究所设在大普吉，距昆明城外有五公里多路。[4] 清华的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也设在大普吉。当空袭变得频繁时，组长汤佩松把研究所的昆虫学组和植物生理组从新校舍南区也迁到大普吉。在四名学生的协助下，沈同教授在泥地瓦屋这样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开展动物生理学研究。他们在户外的高台上从手工注水的桶里土法炼钢自制蒸馏水。利用这套大材小用的设备，沈同设置了一系列试验，从测试维生素对人体和血红球数量的影响，到检验云南白药的疗效。[5] 半个世纪后，回顾战时昆明的研究所时，有位联大学者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很了不起，并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比战前更密切。[6]

在联大三校的支持下，大多数研究和研究生训练得以开展。尤其

是清华，能够利用庚子赔款基金，这笔钱在战初是用来资助 16 名学生赴美国深造的，他们所攻读的学科都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战时的条件不允许大规模遣送留学生，不久，梅贻琦便尽力重建清华研究院，并加强工科的高等研究。与清华一样，北大有文科、理科和法科研究所。南开有商科研究所。[7] 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六个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的分支机构的存在，使昆明周围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

除了身体、经济、心理和学术机构的原因，战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学者对中国边疆腹地的适应能力。由于理工科大部分领域需要精密的仪器设备，他们的工作因此受到外在条件的制约。对于这些学科，我们将在后面几章讨论。这里只讨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

相对说来，从北平迁徙到云南对某些学者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综合性的通论著作，尤其是那些根据讲义编撰而成的著作，在云南显然可以跟在北平写得几乎一样好。钱穆住在宜良城外一个庙里，根据所带来的旧讲义完成了著名的《国史大纲》。吴宓以课堂讲义为基础，用英文写出了《世界文学史大纲》（*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做翻译也是可能的，只要有原著。比如，吴达元就译出了博马舍（Beaumarchais）的《费加罗的婚礼》（*Marriage of Figaro*）[8]

在昆明也可以继续研究传统国学。当地图书馆虽然不能与北平的北大、清华或国家图书馆相比，但中国文史哲方面的基本参考书还是可以利用的。而且，受过传统教育的学者能把参考数据记在脑子里，并能凭记忆引用不误。例如，冯友兰把《新理学》的初稿丢在北平，但他可以从头再来。这成了他战时六书的第一书。他认为，战争是个动力，并在书中这样写道：「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这个样子。」[9]

对于冯友兰在哲学系的许多同事而言，抗战时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金岳霖出版了《论道》。汤用彤的杰作中多了一部《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也有人继续从事文本诠释工作，在这方面，语言学家王力写出了重要的论著——《汉语诗律学》。通过冯友兰主编的《哲学评论》，联大哲学家也能了解全国范围的学术动态。[10] 同样，历史学家如吴晗和雷海宗发现，利用当地收藏的材料，补充他们已很渊博的知识，仍可成为高产学者。吴晗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立传，完成于 1943 年，随后即出了增订本，被誉为「现代中国人写得最好的传记」。[11]

对文人来说，昆明的环境即便说不上激动人心，但至少可以调节心境。沈从文继续创作短篇小说，冯至写诗，陈铨编剧。[12] 钱钟书在联大待过很短的时间，把战时从教的经历糅进了他的杰作——《围城》。朱自清至少完成了五本书的文稿，包括诗歌评论、经典研究、随笔集和《伦敦杂记》，其中大部分在战后出版。他和同事还创办《国文月刊》，讨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各方面问题，促进了古代经典的普及。[13] 为联大大一国文课编选并随后出版的作品集，收有白话文的典范之作和标准的文言文作品，打破了傅统的编选方式。1944 年，中文系出版了《西南联合大学语体文示范》，进一步证明了中文教学的创造性成绩。[14]

在中文系，像罗常培这样的语言学家，像闻一多这样的文人学者，他们的学术兴趣截然不同，他们都能充分利用边疆的条件。通过研究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罗常培为语言学开辟了新的天地。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中文系语言组增加了一门「藏缅语系研究」课。[15] 在从长沙出发的长征途中，闻一多逐渐喜欢上粗犷原始的文化，带着新创的民粹主义研究《诗经》、《楚辞》，做出屈原是人民代言人的诠释。[16]

没有人比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新环境中获益更多。虽然难以获得西方的出版物，但他们对图书馆、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的依赖要比同事少。再者，西南地区是个天然的实验室，能做其它地方做不了的调

查，种类还相当多。在昆明几英里外的乡村，可以直接调查研究农民生活。对于像费孝通这样在中国其它地方的农村作过调查的人，那里就蕴藏着无数种比较的可能。在昆明，可以研究乡下移民到城市劳动力的转变过程，这是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之一。此外，还可以另辟蹊径，研究云南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

战时处境还促使学者把学术研究与公共服务相结合，社会学家吴泽霖就很赞赏这种方法。1942 年，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日本威胁到滇西，吴氏设想组织一个团体到邻近战区的边疆展开调查，为当地居民服务。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清华研究院和云南省卫生处的资助下，他在丽江建立了服务站，站员由青年学者和社会学系刚毕业的学生组成。该站除了社会调查外，还开展医疗卫生、教育普及和抗战宣传等工作。在墨江县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呈贡在昆明铁路线以东十五英里处，〔应为十五公里。据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滇越铁路以昆明市为终点，自呈贡车站至昆明车站，计十五公里」（246 页）。〕是田野工作的中心。那里建有陈达主持的国情普查研究所，从中诞生了他的《现代中国人口普查》（*Census in Modern China*）（1943 年）和《现代中国人口》（*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1946 年）。在昆明和呈贡周边地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该所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社会概况。

呈贡以西不远处是燕京－云南社会学研究站，先后由吴文藻、费孝通主持。该站虽然主要属于云南大学，但也像磁铁一般吸引了费孝通在联大的学生。在费的指导下，史国衡（1939 级学士）研究昆明一个工厂的劳工问题（《中国进入机器时代》，1944 年），张之毅（1939 级学士）和费孝通合作调查禄村（《云南三村》，1945 年）。[18] 社会学家潘光旦跟呈贡的任何研究所都没有关系。他依靠的不是田野调查，而是文献材料，写出了两本关于优生学的著作，并在十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四十三篇结集成《自由之路》（1946 年）。[19]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参与了教育部发起的多学科的边疆地区研究。在这个研究项目下，专门开设的课程有「西南边疆社会」、「汉藏系语言

调查」和「中国边疆地理」。[20]

在新建的机构中，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21] 该研究室成立于 1942 年 8 月，涉及社会、经济、语言、风俗和边疆民族地理，其成员包括南开哲学系兼历史系系主任冯文潜、社会学家陶云逵及联大中文系的罗常培、闻一多和游国恩。

这个研究项目是在战时迫切的要求下产生的。为发展滇西南交通，省政府计划在毗邻缅甸和老挝边境的佛海（今猛海）和石屏之间修建一条铁路，石屏位于滇缅铁路的支线上。在此期间，该研究室负责提供新建铁路沿线的少数民族的相关资讯。在当地名流缪云台的协助下，南开的黄子坚和冯文潜与当地政府签订合同，允许南开为该省和抗战服务，与此同时，也提高了南开的研究能力。在冯氏的领导和支持下，研究室成员虽少，但活跃的青年学者勇敢面对热带疾疫，冒着多疑的国民党官员监禁或处决的威胁，一边写学术论著，一边写铁路调查报告。该所办的《边疆人文学》杂志，吸引了整个西南地区学者的来稿。

当地工厂和乡村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很好的研究对象，县级档案、族谱、家谱、土地清册和口述资料则有待研究地方史的学生发掘利用。然而，固守于文学院的历史学者，并没有准备像社会科学家一样发挥这些材料可能有的作用。

如我们所知，某些类型的史书，尤其是各种通史教科书，在战争条件下也能写出来，像吴晗的历史随笔，以大笔勾绘过去，影射现实。为研究东汉魏晋的社会经济史，孙毓棠在联大图书馆查找各代史籍和其它标准参考书。最具雄心的历史学计划或许是由雷海宗、孙毓棠和邵循正合撰的三卷本中国史。他们从美国寻求资助，但显然一无所获，这部著作也就永无问世之日了。[22]

中国正处于峥嵘岁月，开拓进取的史学家可能着手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但是，历史学家撰写当代史被认为是不合适的。相反，能够

经受时间考验的是，收集现有的数据以供将来修史。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主要成员是历史系的研究生——在姚从吾的指导下开始运作。[23]姚的团队收集并翻译日本图书报刊，但是在 1940 年夏天日本占领河内之后，数据就此断绝，所以这项计划也未能成书。[24]

除了西洋史学家，还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训练和研究与美、英、法、德、日学术研究有关的其它专家——对于这些人来说，严肃的学术研究几乎都中断了。也有极少数例外，他们愿意把学术兴趣转向研究中国问题。比如，钱端升从各个角度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撰写了多篇论文；王赣愚出版了关于地方政府和县政府的著作。蔡枢衡出版了《中国法律之批判》，并写了一部很厚的刑法论著。[25] 在经济系，只有少数青年教师埋头研究中国问题。戴世光在呈贡的国情普查所从事人口统计，伍启元着重研究政策问题中的价格问题，杨西孟收集关乎切身利益的资料昆明教授的生活消费。

经济学家如陈岱孙、赵乃抟和周作仁在战时几乎没有著作问世。其症结部分在于，除非能追踪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否则，作为一所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学的教员，他们很难做出自己的贡献。不幸的是，中国许多专业期刊在战时停止出版。至于海外的刊物，如果能收到的话，也是断断续续的。此外，日本的炸弹炸毁了清华藏在重庆的西文经济学期刊。因此，以历史和理论为导向，联大的资深经济学家也就无力转向收集和分析当地资料了。

区域性的文艺复兴

虽然战时环境在总体上不利于严肃的学术研究，但沿海地区的高校迁至昆明和其它内陆城市，出版了许多严肃的刊物，提升了云南的文化水平。除了钱端升的《今日评论》及其后继者《当代评论》，在战争初期和中期，昆明还出现了《自由论坛》、《新动向》、《战国策》等刊物，在后期则有更加激进的报刊，如《民主周刊》、《观察报》、《生活导报》，它们都提倡和平、民主和联合政府。这些报刊给联大

教授提供了展现其学术才华的机会，对象是受过教育的非专业读者（如陈铨讨论尼采的文章），或者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解答现实问题（如钱端升谈美欧，王化成谈日本）。还有一些人，如潘光旦，他写了大量富有启迪意义的文章，讨论各种问题。当地的日报也很欢迎学识渊博的教授们的来稿，并为历史、文化、文学、科学和教育类文章开辟专拦。有些文章定期发表，最极端的例子是孙毓棠写的刘秀传，在《中央日报》分 20 期连载。

联大的许多出版物依靠的学术网络并不局限于昆明：像《今日评论》这样的期刊就吸引了来自全国未被占领地区的稿件。联大教授发表的文章也不局限于昆明的出版物。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一些昆明知识分子（沈从文就是其中之一）曾在上海和香港发表文章。战时，内地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重要起来。联大教授的专栏文章经常使重庆的《大公报》生辉，这份报纸温和而自由，颇具影响力。在遵义出版的学术期刊——《思想与时代》——就发表过钱穆与贺麟的论文。战争后期，许多联大作者为《人文科学》撰稿。这份期刊由昆明和重庆的一群教授负责，在重庆出版。战时，所有这些报纸和杂志，对长期流亡的知识精英保持思想活跃很有帮助。这些出版物不仅促进了知识话语的传播，还为昆明及其它内地城市的知识大众创造了活泼的思想氛围。

不可避免地，联大许多创造性的成果直到战后，甚至解放以后才最终问世。例如，郭沫若在 1949 年后撰写关于《管子》的论文，就采用了闻一多和许维遹战时的研究成果。刚从剑桥回国的徐毓楠，抗战时期在昆明以外几乎无人知晓，但那时为他研究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后来以此名扬全国。许多在美国成名的中国学者——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如何炳棣和邹谠，艺术家兼文人如许芥昱和吴讷孙，以及数学家、科学家如王浩、杨振宁和李政道，等等——在西南联大都是鲜为人知的学生、助教或讲师。

营造滋养学术生活的氛围，功成名就的教授仍孜孜不倦地研究，

更年轻的学者开始他们的学术事业，在这一点上，联大完成了使命：保护并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即便处在战争岁月。

十 理学院

尽管中国有过漫长的科学传统，但它与现代西方科学只有过短暂的接触。科学主义，也就是被捧为放诸四海皆准之的科学方法，曾深刻地影响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自然科学学科和算学系才立稳脚跟。20 年代初，地质学开始发展，十年之后，算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才逐渐发展起来。[1]

考取庚款学成归国的清华学子，奠定了中国学院派科学家群体的基础。通过聘请本校的毕业生，并从其它高校「挖」来一批高水平的学者，清华由此引领风骚。现代化的设备，良好的工作环境，学校的支持，丰厚的薪金，稳定的机构，成为清华最大的诱惑。1933 年一份调查表明，在中国二十七所大学中，清华理科的师资和设备均排名第一。这份调查还指出，北大「在科学方面尚显平庸」，南开则明显更差。[2] 虽然如此，从 1931 年起，蒋梦麟开始实施发展北大理学院的宏伟规划。战前南开的理科也有所发展，尽管程度较低。到 1937 年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时，三校科学家的某些研究工作已达到了世界水平。

理科特别容易遭受战争的破坏，以精密的仪器和复杂的架构为基础的新兴的实验科学尤其如此。在这种条件下，联大科学家在云南的八年中是继续发挥完好的创造力脱颖而出，还是受制于设备和材料的匮乏就此青黄不接？还有，由留学西方的一代学者刚建立的科学传统，在简陋的教室和寒碜的实验室里，能传给下一代受教育者吗？

同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一样，自然科学家也获益于三校的联合，因为清华拥有全国实力最雄厚的理学院。算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囊括了三校的教授，生物系的教授来自北大和清华（南开的生物学家最后落到重庆大学），清华的地理、地质、气象三组和北大的地质学家组建成联大的一个系。

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下，理科的课程非但没有减少，实际上还有增加。因此，以前的课程可能分开讲授，并开设新课，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及他们之间的分工合作。以生物系为例，由于拥有充裕的师资担任基础课，这样学者就可以结合各自的专长授课，如昆虫学和化学生物。普通植物学由几位教授根据专长分开担任。工业化学分成有机工业化学和无机工业化学两门课。[3] 由于课程难度增加，以及教育部的要求，理科学生须在三年内修完学校和院系的必修课。[4]

然而，在战时条件下，联大的自然科学要生存下来，还要有适应力、创造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刻苦的钻研。不同的系如何应对挑战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取决于该学科的属性和从业人员的学术取向。

维持水平的物理系和算学系

物理系和算学系延续了战前清华严格的入学要求，会无情地淘汰大量不适合从事高级学术研究的学生。普通物理学成绩低于 70 分的大一学生，便几乎失去了攻读物理专业的机会，而通过这一关的人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要求通过几乎每学期都有的三次月考和期末考试。物理系的要求极为严格。马仕俊教授曾对一个学生说：「上学期你的成绩是五十九分，给你加了一分变成六十分。这学期你得多考一分。」[5] 在物理系，这种让步肯定不会遭到拒绝。

要进入算学系，大一微积分必须在 75 分以上。对于难题，蒋硕民教授只进行粗略的讲解，学生坐着发呆时，他还不时发表意见：「太简单了！」他每周规定至少十五道习题，每月还要测试一次。几乎没有人能承受这种考验，开学初两周后，三分之二的学生都退选了。[6] 为什么算学系学生那么少，研究生更是寥寥无几，也就不言自明了。有时，学生数量勉强超过该系教授的人数，而教授有十二三人。在 1939 到 1945 年，联大及其三校共有 54 名算学系学生毕业。但是，不用说，这些毕业生的水平相当高。毫无疑问，算学系是联大保持了

战前水平的一个系，即便不说超过战前的水平。[7]

算学系师资雄厚，由两代人组成：年过不惑的学科创建者和颇有造诣的青年学者。前者有姜立夫、江泽涵和杨武之。南开算学系系主任姜立夫（1945 年 56 岁）是数学界的元老。他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北大系主任江泽涵就是其中之一。江氏也担任过联大的系主任，该职后由清华的系主任杨武之继任。战初，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才二十来岁。其中，以华罗庚、陈省身（汉堡大学 1936 年哲学博士）和许宝騄（伦敦大学 1941 年理学博士）三人最为突出。

在这些更年轻的学者的主持下，联大数学家至少发表了 127 篇论文，其中多篇达到了国际水平。这个成果的取得，不仅是因为该系有很高的师生比，教学任务少，科研时间充足，还因为青年学者回国，给联大群体带来了最新的数学思想。此外，清华数学系图书数据 1935 年即运出北平，基本上未受损失。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事实是，算学系的研究并不依赖于先进的物资设备，这与理学院大部分同事的研究颇为不同。[8]

华罗庚是联大——其实，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在格外注重洋文凭的学术界，他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念过大学，却能在大学任教，在剑桥大学学习也没有获取学位，却成为联大的教授。与他非凡的人生所经历的坎坷相比，在战时昆明所遭遇的孤独和艰辛，要渺小得多。在江苏省金坛初中毕业后，他被送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当店员的本领。由于擅长打算盘，他被安排在家帮忙做生意，但他真正爱好的是数学。还在青年时期，他突然发表了一篇论文，反驳有名的数学理论。在他因伤寒致残时，学术论文开始为他赢得声誉。

如果他的论文没有被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后来的云南大学校长）发现，这个初出茅庐的天才很可能会在偏僻的家乡度过余生。同事们认为，一个无资格加入「欧美同学会」的人根本不值得重视，但熊庆来对此不以为然。1931 年夏，熊庆来前往金坛，以练习生的名义和每月三十元的薪金把华罗庚引进清华。华罗庚旁听各门课程，并

学习外语，很快在清华谋得职位。1936 年，他获得奖学金去剑桥大学深造，于 1938 年回国。他不愿花时间获取学位，也不需要它。已享誉国际的二十七的天才以教授身分加入联大。[9]

在昆明，华罗庚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于左腿残疾，走路时打着圈儿，步法很奇特，但他骑自行车却随意自如。他经常光顾联大校门外的小吃摊，人们可以在那里看见他戴着一副眼镜，缀有单个耳塞和一条旧线，他早餐常常吃面。付钱时，他用三个指头夹着钱，手势很特别。[10] 一个 1938 级的毕业生回忆说，「其貌不扬，加上跛足，同学们都看不起他。」[11] 但是，不久他的才华比容貌还要出名。1941 年一份联大的出版物这样称赞他：「算学系的华罗庚举世闻名，他的名气与英国诗人拜伦不相上下。」[12] 战时，他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以第一部通论著作——《堆垒素数论》——获得教育部嘉奖。[13] 对日抗战胜利后，他开始在国际上讲学，第一站是苏联，然后是美国。

物理系中与数学最相似的理论物理发展迅速，实验物理却很薄弱。在附近科研机构的资助下，加上战前由北平运到长沙、随后运到昆明的几百箱仪器设备，清华的实验物理学家勉强能够维持研究工作。北大和南开不得不忍受学校里更简陋的设施，这还是 1938 年联大利用有限的中英庚款和中国教育文化发展基金配置的。在日本占领东京湾切断通道以前，一些中国制造的简单的仪器可以从上海带来。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如北大的吴大猷，估计在此期间得推迟研究工作，但随着战争转变成持久战，他开始认识到，除非中国最重要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持研究的技能和精神，否则战后学术建设是没有希望的。向清华借款以维持北大的研究能力失败后（因他敢于提此要求，清华的同事戏称他「有野心」），他便开始自己设计器材。他利用北大抢救出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低压汞弧灯——这是同事从美国带回来的，然后在岗头村一个小泥屋里临时的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他就这样继续研究拉曼效应。[14] 同样，曾经负笈剑桥的赵忠尧和张文裕，利用聪明才智，做实验研究

宇宙射线。赵忠尧用五十毫克镭，启动中子以产生人工放射性同位素。[15]

当然，这种寒碜的设备在实验物理有意义的研究上只能达到这种程度。那时，联大物理学家发表了三十篇论文，只有一篇不是理论物理的。[16] 这其中有将近一打是周培源的研究成果，他继续研究 1933 年就开始探索的湍流理论。他吸引了清华物理系约一半的研究生来钻研这个领域。[17] 另外几个学生则跟随王竹溪学习新兴的统计物理学；此外，王竹溪开始研究热力学，并因此于 1943 年获教育部奖励。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上。[18]

作为国际科学界的一员，联大物理学家加入了战争，其学术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界的坚持。多亏李约瑟的努力，他们能继续获得一些西方刊物，并通过他的帮助在国外发表论文。如英国文学教授燕卜荪所观察到的，物理上的隔离并不能削减他们的求知欲。1938 年前往蒙自途中，在一份法国出版物上，燕卜荪读到爱丁顿（Eddingdon）计算宇宙中的质子数的报导。这个戏剧性的猜想使他大为兴奋，他试图与新加坡的物理学家探讨这个问题。但他发现，他们并不感兴趣。然而，回到昆明，他碰巧遇到一位物理学家，他不仅了解爱丁顿的估算，还急切地想找人讨论。燕卜荪写道，这个人「也许薪水只有那些在新加坡的人的十分之一，两年前还不得不放弃他所有藏书，现在可能住在隔成两三个小隔间的屋子里，在中国内陆过着不安宁的生活」，但「对于一个好学的人来说，」他总结道，联大「是个很不错的地方。」[19]

诺贝尔奖得主的孕育之地

经过不懈的奋斗，两位联大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于 1957 年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证明了战时昆明科学界新秀的才能。

杨振宁早年就显露出数学天赋，但他的父亲鼓励他从事更为实际的事业，所以他的中学物理被限制在八年级的水平。然而，他自学物

理，到他考上联大时，已经决定把自己的才能奉献给这门学科。他本来可以在战前清华得到实验物理的训练，在联大却极度缺乏。在战前清华，每个学生每学期要做十到十二个实验（在昆明减少为三四个）[20]；不过，昆明时期实验物理的不足被理论物理所弥补，正是在这个领域，他最终声誉鹊起。在联大的六年时间（1942 年理学学士，1944 年理学硕士），他汲取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教授的精华。

在本科阶段对杨振宁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分子光谱学家吴大猷。在 1941-1942 年，吴大猷身边有一群极有天赋的学生，包括黄昆（后成为中国半导体研究所所长）、黄授书（后到美国学习天文物理，供职于美国太空总署，任美国西北大学天文物理系教授）、张守廉（后在美国学习电机工程理论，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电机工程教授）和杨振宁。杨振宁证实，他后来的工作，包括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关于相对论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他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以群论讨论多原子之振动〉。为攻读硕士学位，杨振宁决定跟随清华的王竹溪，他是剑桥博士，专攻统计力学。王竹溪以挑战学生闻名，是昆明「最热情最广博的教授之一」。杨振宁同时指出，在受到良好教育的更年轻一辈的科学家中，北大的马仕俊（又一位剑桥博士）对他也颇有影响。

杨振宁的经历表明，联大的高明之处在于能把传统的教学技巧运用于现代科学。在昆明，教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死记硬背，但学生由此掌握了基础知识——而美国的学生与此相反，学校教育他们要有自己的思想，并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但他们有时候基础不扎实。

1945 年秋，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芝大的物理学研究在当时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他师从著名的权威学者费米（Enrico Fermi）和泰勒（Edward Teller），据杨振宁回忆，他很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比美国的）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入」。在他卓越的事业生涯中，他仍查阅以前在王竹溪的课堂上所做的笔

记，发现在个别地方仍有帮助。他说，另一方面，泰勒的讲授「并没有增加我在王那里学到的知识」。但是，他在芝加哥研讨班、咖啡茶座以及脑力激荡的大型研讨会上所学到的东西，是战时中国所无法提供的。虽然早年在昆明的学习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和理论基础，但他是在芝加哥深造时孕育出真正的创造性思想。杨振宁回顾，「我在中国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在芝加哥受到了最好的研究生教育。」[21] 李政道也盛赞联大教育的高水平。他回忆，「当我到美国时，除了当时最新的现代物理，我几乎了解所有的物理学；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了。」[22]

杨振宁、李政道都有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加上他们导师的影响，但这些都难以充分解释联大何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诞生地。杨振宁的父亲、清华数学家杨武之曾为中国在科学和数学教育上的落后地位而愁苦。从外国回来之后，他和同辈人竭尽毕生精力迎头追赶。然而，老杨那一代已培养了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的学生，如吴大猷等负笈海外，回国时已是卓有建树的学者。作为联大的教师，这些更年轻的一辈引领杨振宁、李政道等英才迈向世界科学顶峰。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中国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在战时昆明走向成熟。

战时化学的基本元素

与理论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活跃的学术氛围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实验研究在走下坡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对外国化学用品的严重依赖，整个内地的基础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至少在战争的前半段时期，昆明因为与外界有相对便利的交通，能够拥有当时中国未沦陷城市最活跃的化学研究景象。[23] 除了在联大校区的研究，原子微粒和激素方面重要的工作则在昆明大西门外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进行。[24]

化学家们能够继续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几位教授的努力，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大的钱思亮。1938 年，大多数教师从长沙迁往昆明时，钱思亮和同事回到上海，在那里购买了三十箱原料，经航

运送达海防。在以后两年的夏天，他们都去上海补充相关用品。[25]燕卜荪生动地描述了把用品运过印度支那的艰难过程：

我曾记得，我和一个被派去接收大学物资的人在海防码头转悠。包装箱巨大的担架，钢梁锈迹斑斑，散落在公园的草地上，不停地冒着热气。他叫随从打开巨大的变了形的包装箱，或确认箱子是否裂开，那里面正是我们清单上所列的化学物品。但是，经讨论决定，这些东西不能运回学校，因为标签都已经腐烂了。[26]

在最初的几年里，北大化学系研究生开展了与战争或农村地区平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研究。为减少甲状腺肿在西南地区的流行，他们试着在食盐上加碘。他们研究如何利用竹子造纸，改进当地产糖的办法，制造活性碳。在人力和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也继续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27]

1940 年，钱思亮最后一次去上海。当他回到家时，日本人刺杀了他的父亲，因为他是地方法院的审判长。他只得留在上海照顾家人。敌人占领了印度支那，使黄（子卿）和朱（汝华）返回昆明的时间延迟到 1944 年——滇缅公路重新开通之时。[28]雪上加霜的是，敌人炸毁了许多仪器设备，那是清华化学系在战前小心翼翼地运往南方，暂时贮藏在重庆之外的北碚。这个损失包括高崇熙花了十年时间研制的一百多瓶化合物。[29]

1939 年以后不再有外国补给，师生只能利用手头所拥有的物资，以及自制的替代品。1943 年，一位来访的美国记者注意到，联大的化学家只能凭智能工作：

经过化学系的几个实验室时，我发现设备极度匮乏，还很粗糙简陋，有些还是临时制作的，他们对此忧心忡忡，但也有欢欣，因为他们通过充分发挥想象力制作出了我看到的一些仪器。旧瓶子、木箱、电线，加上中国人天生倔强的驴脾气，使他们临时制作出仪器来。[30]

同年访问昆明的李约瑟很高兴地发现牛津赠送的一整套《化学学

会会志》（*Journal of the Chemical Society*）和其它刊物，但他也注意到，研究工作「因为缺乏化学试剂及看起来比图书和杂志更为必需的供给，受到严重的制约」。尽管如此，李约瑟也发现有机化学和药物学方面严谨的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后者以联大朱汝华主持的北平研究院为中心。〔更准确地说，朱汝华主持的是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它主要研究中国传统药品以确定其抗疟疗效。由于战时缺乏奎宁，这种药就成了急需品。曾昭抡及其合作者正在研究乙二醇润滑剂，南开的杨石先也积极地从事有机物的研究。[31] 北大的钱思亮、孙承夸和清华的黄子卿、高崇熙和张大煜则致力于战时其它方面的研究。

战时化学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可能要数清华教授张青莲的重水实验。从 1939 到 1944 年，他在这个项目上发表了十二篇论文。1943 年，这些成绩为他赢得了教育部的奖励。但是，要是他没有从国外带回来的材料和仪器，这些实验是无从开展的。因为缺乏仪器、设备和化学用品的困扰，清华化学系最终停止招收研究生。[32]

然而，本科教育在努力维持之中。据一个 1939 级化学系毕业生回忆，他的大三、大四都非常糟糕。在长沙的三个月里，设施东拼西凑不说，还苦恼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化学系截然不同而且混乱的课程，大部分时间都浪费了。在昆明的第一个春季学期，则显得短暂而纷乱。大三全学年都没有实验课，连水、电、气供应都十分吃紧。大四除了寒碜的有机化学实验外，也几乎没有其它实验课。[33] 实验操作的大幅度缩减削弱了化学系的课程。实验课从战前清华的二十门减少到战时联大的五门，而且每门课的实验都几乎降到最低点。为节省宝贵的物资，有些教师和学生一起做实验。因为敌人的轰炸，好几年时间有些实验被迫完全中止。[34]

在新校舍南区四座平房里，化学家们利用自制品和替代物还可以勉强维持工作。这个系只有一台真空泵，是从南开带来的。没有煤气灶，就用酒精灯代替；酒精也无法得到时，就改用木炭炉。缺少蒸馏水，就用煮沸过滤后的井水代替。没有供冷凝用的自来水，就用两只

瓦楞铁槽，分别放在实验台架上、架下，然后在低槽里灌满水，又不停地把水舀到高槽里，保持水流一直畅通。[35] 双氧水、盐酸、硝酸和亚硝酸银等普通化学用品都得临时制造，并且得根据手头的原料安排实验。[36]

受设备的限制，加上化学试剂存有杂质，实验结果往往有很大的误差。学生站成一排做定量分析实验，分析天平的精确度能达到万分之一，但实验的精确度只能达到万分之五六。老师就相应地降低了要求，学生的实验水平也随之骤降。化学是一门高度实验性的科学，实验训练的不足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这对联大化学系毕业生找工作或出国深造都相当不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这些缺陷，化学系跟战前一样仍然是理学院最热门的专业。从 1939 到 1945 年共有毕业生 187 人（物理系 105 人，生物系 64 人）。当然，化学系的相对热门，与其说是化学的吸引力所致，不如说与学生更不喜欢理科其它专业有关。生物是一门杂乱的学科，要求解剖和其它令人讨厌的任务；物理和数学则实在太难了。化学被认为与工业实用有关，能保证毕业后找到工作。南开的化学系就特别倾向于实用化学。北大的系主任曾昭抡甚至在日本侵略前就教过「战时化学」，同事也做过一些与战争有关的研究。在联大增加的更实用的课程中，如「定量分析」、「药物化学」、「化学工程」、「燃料化学」、「酒精化学」等，都是为毕业生找工作准备的，尤其是化工方面。[37]

说到找工作，化学系毕业生特别幸运有杨石先这样的教授，他曾担任过该系的系主任。杨石先在教学上纪律严明，出勤点名，杜绝旷课，严格评分。但他同时扮演着慈父的角色，经常停下演讲，问学生是否听懂，对生活拮据的人给予资助，还为毕业生联系工作。杨石先的存在是学生发现化学很有吸引力的又一个原因。[38]

曾昭抡

北大颇受欢迎的教授曾昭抡也为化学系增添了魅力。他淳朴谦和，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邀请，自在地与他们一起吃饭、休息、参加政治辩论。跑警报在外烧饭时，他会和其它人一起捡柴火。1944 年，他带领化学系整个毕业班去滇南个旧锡矿实地考察。在路上，他和学生一块食宿，同甘共苦。学生待他如朋友，称赞他「安贫乐道」，是恪守传统美德的典范。

传闻北大聘请他还有一连串奇闻轶事。像所有故事的开头一样，那是 1931 年的某一天，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早早地去参加教授会。在会议厅，他突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像一个服务员，正没头没脑地寻找着什么。「你是谁？」朱厉声喝道：「出去！」这个可怜兮兮的家伙一言未发，转身就离开了。第二天，朱家骅收到那个陌生人的一封信，那是署名「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辞职书。被蒋梦麟抢先聘请到手，曾昭抡把北大化学系建设成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曾昭抡是个不修边幅、行为乖张的学者。外表十分普通，他穿一件带有污点的褪色的蓝布大褂，有时套一件似乎总是掉了钮扣的粗糙的白衬衫。旧布鞋总是露出脚趾头和脚后跟，头发乱蓬蓬的。只有极少数场合，比如参加重要的会议，他才会理发剃须。有人说他的袜子很少相配的，也有人说他经常穿一只袜子，还有人说他从来不洗袜子，一直穿到烂掉为止。

在昆明大西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幢老式的房子，里面有个院子，曾昭抡住在二楼，房间大约有十五平方英尺。邻居有助教、学生和城里人。家具极其简单：一张床，一套橱柜，两张桌子，一张藤椅，还有一些被用作长凳和书架的各式各样的肥皂箱。他在附近的西仓坡教工食堂用餐。邋里邋遢，双手总是拢在袖子里，有时喃喃自语，他成了校园周边一道熟悉的风景。他的步法很独特，总是拖着脚走路，但工作安排得很紧，发现时间不够时，便突然小跑起来。他一旦这样做，往往意味着上课要迟到了。

曾昭抡从不循规蹈矩，不过他的身世相当显赫。著名的保守派改革家、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的曾国藩就是他的先人。他的妻子俞大絪是西语系教授，是重庆政府兵工署署长、后来的军政部次长俞大维将军的妹妹。然而，曾氏夫妇俩关系颇为紧张。她没有陪同丈夫来昆明。据说，曾夫人坚决要求，凌乱邋遢的丈夫只有洗过澡后才能亲近她。[40]

在行为举止上，他彷佛是个心不在焉的学者，但在工作上从不肯马虎。抗战前，他率先开设国防化学课，一直持续到战初。他的教学大纲几乎全是应用化学。他讲解毒气时，不讨论生产，也不做实验，直接把毒气分类，然后指出对付各种毒气的相应的面具。[41] 1940-1941年，在叙永分校时，他教学生们如何净化饮用水、如何建造厕所。[42]

据说，曾昭抡在教学上不会杂乱无章，包括他在系里陆续开设的选修课。虽然满黑板的板书凌乱而潦草，但讲授的内容很丰富，且有独到的见解——从不照本宣科。他与云南工厂的负责人保持联络，可以经常带领学生去体验现实生活。他把学生当成人看待，考试时总是坐着读书或看报，也希望他们这样对待他——因此，对于作弊者，他会严加惩罚。在政治上，他也坚持原则，从不模棱两可，而且，对国内外的大事瞭若指掌。战争后期，他成为昆明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他是位条理分明、目光如炬的政治分析家。诺曼底登陆的时间与他的推断仅相差 48 小时，而地点完全一致。[43]

曾昭抡对人类处境的好奇心和对个人体验的渴望毫无止境。他热切参加从长沙出发的旅行团，并坚持全程步行。途中，他贸然与苗人结伴而行，把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到达昆明后，只要条件允许，他就继续出游。后来，他根据在滇西北、川西和西康地区连绵起伏的群山里的考察见闻，撰写了两卷本的日志。[44]第一次考察是在 1941 年，他带领地质系、化学系和生物系各一名学生，在七十天的时间里，徒步穿越大凉山地区。他们一路参观了矿厂、化工厂、酿酒厂、避难的大学、化学研究所、兵工厂、窑洞和清代铜器提炼厂遗址。最后到达

成都，在华西大学及时参加中国化学学会的年会。仍穿着沾满泥点的长袍，带着呢帽，穿着草鞋，他踏上讲台，与化学协会董事会其它著名学者坐在一起。[45] 他的考察报告于 1945 年出版，不但介绍了这个地区的地理、地质和交通状况，而且记载了沿途所观察到的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和日常生活。[46]

最令人惊讶的是，在满足无穷的求知欲的同时，他并没有懈怠工作。虽然没有取得跟战前相当的学术成果，但他在战时发表了至少六篇严谨的学术论文。[47] 直到深夜，他还在苦读化学著作上的小字，并继续研究脂肪酸的熔点和结构以及「电极旋转运动」。[48] 他 1946 年 2 月 26 日的日记展示出这个外表邋遢的人秩序井然的生活：「早上 9-10 点，为无机化学课作准备；10-11 点，旁听大三俄语；11-12 点，1:30-2:00，继续准备无机化学课；2-4 点，练习俄语；4-5:30，旁听大二俄语。」[49]

就学术兴趣而言，他的广博程度仅次于以潘光旦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式通人，而在科学探索的深度和专业水平上，无人能出其右。跟潘光旦一样，战争促使他追求全面发展。

曾昭抡在化学系的大多数同事不得不与生存作斗争。在一个对设备、材料和实验时间都有严格要求的领域，他们逐渐难以维持战前的水平，只能尽最大的努力适应战时的状况。他们为国家军事和工业服务，满足学生的经济需求，为此很重视知识的运用。在实验室，他们凭借常识和聪明才智来弥补技术上和原料上的不足。在每一个阶段，教授都得克服客观环境所带来的困难。相对而言，数学和理论物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未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化学研究只能勉强撑持。只有以田野调查为主要导向的研究领域，云南提供了教学和科研进步的可能，而那是战前的北平和天津所无法提供的。

生物学系的适应与生存

与理科的其它学科一样，中国的生物学成熟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在清华，战前数年堪称海归教授作贡献的黄金时代。[50]李继侗首开先河，以林业经济学撰写论文，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详尽的林业考察报告，获得耶鲁博士学位后，他加入了南开。靠一只跛腿，经过千里跋涉，从长沙到达昆明，可见他是一个不畏艰苦的人。战时，他和学生研究滇西荒山野岭的植被。

李继侗和生物系同事能适应中国西南地区自然环境，颇具创造才能。他们发现了大量不熟悉的植物，并加以收集、归类、研究。缺乏教材，他就和教普通植物学的老师把教学大纲逐渐加工成一本教科书。那是第一本根据中国材料编写而成的教材。深入中国腹地后，这群植物学家另辟蹊径，不再局限于早期教科书作者所涉及的欧美植物群样本。这部著作相当有用，直到 80 年代仍是一本标准参考书。[52]

课本并不是唯一短缺的东西。在很受欢迎的普通生物学课上，显微镜少得可怜，连学生观察标本也要排队。载玻片很难获得，就经常用当地大量的云母来代替。缺乏进口甲苯，就用氨素油代替。因为缺电，就用双手操作电动记纹鼓。没有烘箱，就用饼干箱。当然，聪明才智也并非万能。在战前要求按步骤操作精密的仪器，这项规定如今已不大可能实行了。清华的金鱼——陈桢教授在战前进行遗传学研究的项目——只能取悦于日本侵略者了，但滇池有无数的蝾螈可用作呼吸实验。[53]

从热带雨林到高山植被，云南有各种生态系统。生物学家渴求发现新的标本，而他们在这里比以前在北方干燥的黄土地带更有收获。到 1941 年，北大生物学家集中调查云南特有的动、植物，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54]

联大、云大和清华农业研究所的地质学家，〔地质学家（geologist）应是生物学（biologist）家之误〕每两周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主题相当广泛。[55]1943 年，李约瑟访问昆明时，发现张景钺正进行植物学研究，吴素萱开展细胞学研究，李继侗则从事植物生理学的研究。昆虫学家刘崇乐和陆近仁正研究紫胶虫，这种虫是紫胶的重要来源。吴

韫珍负责主持云南的毛虫研究和植物群的分类工作，直到他 1942 年去世，后由简焯坡继续主持。年轻的营养学家沈同发现云南当地的橄榄（余甘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使得吃橄榄风靡一时。[56]

清华在生物学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在农业研究所开展的。认识到农业对西南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后，清华增设了植物生理学组。利用 2,500 美元的洛克菲勒基金，加上 3 万元的经费，生理学家们购置了一些实验设备，并建成一个藏有三百本图书和十余种期刊的资料室。1940 年，实验室搬到黑龙潭，而就在大部分设备搬走的当天，一颗日本炸弹把仓储室夷为平地。该所由汤佩松主持，共有四名资深研究员。汤佩松在美国大学获得学位，并曾在芝加哥大学和伍兹霍尔（Woods Hole）研究所工作。李约瑟认为，汤佩松很有「创造天赋」，吸引了一批聪颖的青年学子。四十名更年轻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到实验室工作，他们集中研究电流生理学、植物化学、动物的新陈代谢及植物和细胞的生理构造。在李约瑟眼里：「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还能看到测定植物生长物质的完整的实验室，实在很了不起。」[57]

从一开始，研究工作既满足战时的需要，又考虑到农业的长远发展。从 1941 年 7 月起，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安排下，工作人员对中国战士的日常饮食进行营养学研究。他们还以大豆和当地草本植物做实验，这些东西是蛋白质和维生素的主要来源。他们还研究蚕、花生、桐油树和小麦——全部是中国至关重要的农作物。在李约瑟的帮助下，农业研究所的论文被寄往英美期刊。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植物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和《生物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Biology*）等刊物上。此外，实验室还发行《化学生物简讯》月刊，六年中发表了约六十篇论文。[58]

作为国际上文化与科学机构的参与者，与理科其它专业的学者一样，清华的植物生理学家可以依靠美国庚款基金和中英文化董事会适时的援助。然而，外界的援助只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科学家在战争年代还能保持如此活跃的研究工作。大部分的功劳必须归于学者自

身，他们运用创造性的手段应对材料问题所带来的威胁，克服困难继续研究。以植物生理学家为例，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型工厂自制一些工具，发展了制造萘醋酸的工艺，用它来代替昂贵的进口生长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的药物供应难以为继，他们便简化实验技术。

对植物病理学组的观察揭示出另一个维持生存的因素——重庆政府发挥的重要作用。在 1937 年夏天，北平动荡不安，该组丢下病历和种子逃离而去，留下未结果的实验作物。中央农业调查局和农业促进委员会的八千元拨款，为该研究组在昆明附近的重建提供了帮助。利用云南本地的各种种子，病理学家们立即着手实验，并计划集中研究棉花、小麦和大豆的病理，以满足当地的需要。[59]

清华的昆虫学组是另一个活跃的机构，建立于 1934 年，到 1941 年已有八名研究员，并在坡西（音）和呈贡建立了分站。其主要任务是消灭害虫，治愈受害植物，预防农业受损。这个组在七个重灾县大力开展田野调查，还到另外十个县进行普查，收集到八百多种害虫样本。对仓库害虫、蚊子及损害水稻、木棉、甘蔗、烟叶、玉米、高粱、桃子、橘子、咖啡、青菜、奎宁和尤加利树的物种，作了特别深入的研究。[60]

战时环境刺激了生物学的研究，让科学家和云南人都获得了更丰富的经验。在理科其它专业中，只有地质学的成果可与之媲美。

地质学的新天地

联大的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地质学系，因为另两个领域都只有一位资深教授。云南是地质学家的天堂，矿产数不胜数，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层保留得相当完整，地壳结构的复杂程度是中国其它地方难以相匹的。然而，在战前这个偏远的省份还鲜为人知，根本的问题仍有待解决。[61] 在开始全面深入研究滇池周边地区时，联大的地质学家把范围扩大到更远的地方，勘察金沙江、怒江（萨尔温江）和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地区，充分利用该省从东部「中国型」的构

造到西部的结晶岩石等显著的地质构造。

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地质学家们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张席禔调查贵州的三迭纪地层，孙云铸探讨云南南部和西部的古动物学现象。虽然这个系大部分教师认为工作的实际结果是次要的，但他们并不反对做一些矿物学调查以利于其它方面的研究。其调查范围包括滇缅公路周边地区、个旧锡矿、易门铁矿区、东阳铜矿以及昆明附近的铝土矿和磷酸盐矿床。这个系唯一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用研究上的是经济地质学家冯景兰，他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包括《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等。[62] 毋庸置疑，联大的地质学家促进了西南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张印堂是这个系仅有的一位地理学家，他也把智慧献给了国家。当日本军队侵入缅甸威胁滇西时，为了中国的军事利益，他在江心坡地区展开调查，并迅速建立起稳固的地理地质调查基地，为抗战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63]

与化学系、生物系、物理系一样，地质系的实验研究在战时也萎缩了。但是，与当今一些几乎不做田野调查、只靠计算机做研究的地质学系不同，三、四十年代的地质学家认为，要研究地质，就非得融入到大自然中去。只有辛苦地勘察过云南及其邻省粗犷的陆地景观，并把搜集来的材料加以归类、分析，经过这一番训练，联大地质学家才能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并保持思想的活力。

这个系也不是毫无研究设施。从北平带来六七百本书，战时添加了约二百本。除了国内的出版物，还订阅了八九种英美期刊。[64] 在一个由孙云铸和袁复礼教授主管的农村博物馆里，联大地质学家不仅藏有外国的岩石、矿石和化石，还有从云南及其毗邻省份采集来的大约五百种矿石标本和一千种古生代的材料。[65]

购置实验设备的经费极为有限，加上 1940 年越南边界被封锁和 1942 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图书和仪器的供应也就中止，这不可避免

地会影响到教学和研究。像理科其它专业一样，李约瑟也提高了地质系部分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李约瑟乘坐美国空军飞机，带来重要的材料，把科学家的稿件带给国外的出版机构，并安排在加尔各答的印度地质调查，以制作地质标本的薄片（在昆明最好的能切 1/200 毫米）。[66] 这个系与地方当局也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1942 年夏，该系在云南省建设厅下成立云南地质所，此后该所可以提供部分田野调查经费。[67]

联大相当年轻的教师队伍中，年纪最大的教授和副教授也就是四十岁上下，而地质系教师相对年长，显得较为突出。其中三人到战争结束时超过五十岁。在姊妹学科中，他们率先进入科学界，这要归功于丁文江的努力。丁文江 1911 年从英伦归来，竭力创建中国的地学研究。1917 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后，他继而在北大建立了至关重要的地质系，王烈就曾担任系主任。将近三十年之后，王烈已 56 岁，仍是北大教授，跟随联大来到昆明。与古生物学家李济普（音）（不在联大）一起，追随丁文江开创的事业，王烈拓宽并深化了现代中国地质学的研究。[68]

北大地质系的建设工作由系主任孙云铸（1945 年 51 岁）承担多年，他也是联大的系主任。清华地学系可以追溯到 1929 年，系主任是原北大教授袁复礼（1945 年 52 岁）。孙、袁被誉为联大游历最广的两位教授。袁复礼喜欢在香烟缭绕的书房里与研究生一起喝咖啡，但令他感到最幸福的是有生之年在新疆、蒙古和西南中国搜集的满屋子的标本。[69] 孙云铸擅长古生代研究，以此奠定学术声誉。他在地层学和植物学方面造诣颇深，是不折不扣的植物名称活字典。[70] 他的导师葛利普（Wolfgang Amadeus Grabau）是地层学和古生物学领域的巨人，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曾有过辉煌的学术生涯，于 1920 年加入北大。在战前，这些学科所有严肃的学者，像孙云铸一样，他们都是葛利普的追随者。他们自己的学生在战争前后就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第二代地质学家。

1940 年，孙云铸聘请米士（Peter Misch）来任教。他对中国地质学的影响仅次于葛利普，超过其它任何一位外国人。米士曾说他是「中国制造」，因为他的父亲（哥廷根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母亲〔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lhelm Dilther）之女〕是在访问中国时怀上他的。虽是哥廷根博士，并因 1934 年参加喜玛拉雅登山探险而享有盛名，但因为父亲是信奉基督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他是不可能有出头之日的。1935 年，他很愉快地接受了广东中山大学的聘书。抗战爆发后，他任职的大学迁往云南，而在 1940 年，米士接受了孙云铸的聘请，在昆明加入北大。

对于这个提供避难之所和无与伦比的工作机会的国家，米士予以慷慨的回报。在云南许多地方经过广泛的田野调查，他发现了新的地质构造，并研究该省的地质结构、地层、岩石的变迁和古生物。他开创性的工作结晶为十余篇论文，在 1939 和 1950 年之间发表。他对昆明地区磷酸岩矿床和铝土矿的研究为当地铝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他绘制的云南省地质地图成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战后出版的中国地质地图的一部分。步葛利普后尘，米士帮助中国的地质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71]

在远离教室的田野，他竭力用带有德国口音的英语与学生交流，这时他总是如鱼得水。大喊一声："Boys, flloow me!"，他会冲上山，使「学生忘记一天的劳累」。[72] 他多才多艺，从制图到水彩画，再到通宵飲酒而不醉，似乎无所不能，为此颇受好评。在系里同事的帮助下，他学会了相当程度的汉语，还向朋友、北大国际法教授李禄守（音）学习汉字。作为一名西方人，他竭尽所能适应中国的环境。在中国地质史上，米士自有其不朽的地位，这门学科源于以丁文江和葛利普为代表的对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到 20 世纪 40 年代，正是在过去二十多年奠定的基础上，联大的地质系才能出此成续。

联大的地质学家不仅向外开拓参与到欧美世界，还向内考察中国西南内陆世界。在那里，一定程度上是联大其它学系所无法比拟的，

他们充分利用在内陆流亡的时间，把必需化为美德。在矿物学研究和制图工作上，他们所作的贡献与内地对他们的庇护一样多。除此之外，唯一能够保持相当学术水平的自然科学家都属于数学和理论物理等抽象的领域，因为这些领域几乎不需要设备或材料。即便如此，实验科学家们还是别出心裁地应对战时的各种挑战。理学院未来诺贝尔奖的得主——杨振宁和李振道——的脱颖而出，绝非偶然，它证明，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联大师生成功地保持了卓越的学术水准。

十一 工学院

联大的工学院是在清华工学院战前十年的基础上成立的。土木工程系成立于 1926 年，是清华工学院最早建立的学系。1932 年，土木系与新设的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组建成工学院。在昆明，工科发展为五个专业，新增南开的化学工程系及中央政府指令创建的航空工程系。

清华工学院资金充足。它的三个系拥有十四个实验室和四个金工方面的工厂。这些研究机构都有最新的仪器和设备。土木系的水力实验室是模仿德国大学类似实验室建造的，被称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这些实验室不仅能够满足教学需要，也是为开展科学研究设置的。[1]

1935 年华北危机期间，清华工学院把大约三分之一的设－备转移到汉口。除了少数仪器在抗战爆发前的两年间运回北平外，其它所有仪器设备通过水路运到长沙，后来运到重庆用于建工厂和船坞，最后在 1939 年运抵昆明。因为又花了一年时间建设实验室和校办工厂，实际的训练直到 1940 年才开始。这时，许多学生得利用校外的相关机构。例如，空气动力结构实验室位于第十飞机修理厂，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巫家坝飞机场附近。大三以后，空气动力学的学生回到西郊的飞机修理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2]

虽然联大的车间比战时其它学校工学院的好，但它远逊于战前清华的工科设施。水力工程实验室的大部分设备都丢失了。连工科资金最充裕的机械系，也只能依靠战前清华抢运出的不到一半的设备来维持运转。锅炉、蒸汽和加热设备更是少得可怜，这方面的实验课只好停开。[3] 在冶金学方面，材料短缺，资金短缺，八个车间只有一把半英尺长五十毫米宽的钢钿尺，学生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操作。因为没有足够的纸、墨和丁字尺，设计和机械制图的要求也随之降低。

实验研究的设施实在太过简陋，许多教师便集中精力编著和翻译教科书——在教材短缺的战争年代，这不失为教学上的一项重要贡献。[4] 在大多数教师依赖英文著作和论文的年代，无论这种依赖是出于自愿，还是为了追求卓越，翻译都促进了教材的中国化。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蔡方荫的三卷本《普通结构学》。[5] 工学院用中文教学的带头人是刘仙洲（香港大学工学学士）。他早在 1935 年就出版了《机械原理》，该书收入「大学丛书」。在昆明，他和他的学生一起致力于研究中国本土的技术传统，搜集相关材料，为撰写《中国机械发明史》做准备。同时，他还发表了〈中国在热工发展中的地位〉和〈三十年来中国之机械工程〉等论文。[6]

为编著《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刘仙洲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抗战期间就修订过两次，词目增加到两万多条。这部词典对中国机械工程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很重要。刘仙洲拒绝对外国术语进行简单的直译，他会反复斟酌，创造新的词语——这些词语被收入中国的技术词典。工科同事的成果虽然不能和他的巨作相媲美，但日积月累之中，他们的著作、论文和报告对中文技术术语的创造也做出了贡献。

拓东路的生活

从校本部沿对角线穿过昆明，到达东南角，那里有几座装修成会馆的寺庙，也就是工学院所在地。迤西会馆是这个建筑群的中心，用作教室、办公室和图书馆。东边是全蜀会馆，用作教师和学生宿舍及大教室。西边是江西会馆，主要用作实验室。从这个建筑群向西几百米处是另一个区域，那里原先是个盐行，一幢两层的房子，围绕着鹅卵石庭院而建。这个地方成了学生的生活区。这房子是木造结构的，瓦顶，明显比大一住在新校舍的土坯墙、茅草顶的宿舍好，尽管双层床之间还是拥挤得让人觉得像是住在鸽笼里。除了宿舍，盐行一带还有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学生服务社，贫困生可以在那里租用棉大衣过冬。后院有厨房、厕所、水井和盥洗台。还搭建了一个简易棚架，当

作简陋的浴室。洗澡的人得爬上梯子，把一桶水倒进另一个下面有孔的桶里，然后迅速下去冲个冷水澡。[7]

乱糟糟的厅堂在盐行一层，盐行在以前是用来拴马的地方，那些马是用来运盐的。跟新校舍的食堂一样，这个乱七八糟的大厅只有桌子，没有椅子。食物也只有米饭和水煮蔬菜等主食，因为没有足够的油用来炒菜。小区门口的小摊贩售猪脚、豆腐干等美味，调剂了单调的飲食。[8] 食堂由不同的学生组轮流掌管。

这群未来的工程师们在校本部度过一年级的时光。他们在那里学习大一通识课——国文、英文、中国通史、物理概论、微积分——与理学院的核心课程大致相同。学生在工学院和物理系、数学系之间往返，数学系的赵访熊教授等人偶尔会在工学院开课。[9] 然而，在大二开学初，他们便搬到拓东路，在那里工学院有自己的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医务室及课外活动场所。从那以后，他们就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里学习、生活。不过，二年级学生有技术领域的各种必修课，以此避免了 1952 年以后中国过分注重专业化的培训。[10]

渴望成为工程师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与联大其它许多学生悠闲的学术生活明显不同，尤其是文学院。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旁听、读闲书或开展其它娱乐活动。相反，他们继承了战前清华工学院严格认真的作风。教授们条理分明、守时、严格。这个学院的一个特点就是「注意平时，注重练习」。基础课后总是规定很多习题，目的是激发创造力或提高技能。实验、制图、设计和测试都是不可或缺的任务。学习报告交迟了要扣分，为保证作业及时发还，助教有时候熬夜熬到天亮。作弊的学生会遭到停课或开除。[11] 对于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教授绝不宽容。计算尺不能标示小数点，所以运算之后还要确定小数点的位置。而一个小差错会使无可挑剔的答案变得荒唐可笑。有一位特别严格的老师规定，小数点位置错了一位，其分数就乘以 1/10；错了两位，就乘以 1/100。[12]

有些最好的训练就来自最严格的老师，最显著的例子是孟广喆的

「工程机械」，这是机械工程系大二的一门必修课。孟广喆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但他讲课生动活泼，能利用口才使学生的思维跟着他转。他和教「机械原理」的同事刘仙洲，经常轮流在周日上午八点进行小测验。有学生记得，他根据测试成绩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要是看到学生愁眉苦脸，他会暗自得意，认为自己出了恰当的考题；要是每个人看上去都很轻松自如，他会估计一定是题目太容易了。他评分极其苛严，为此弄得很不受学生欢迎，连助教白家祉都求他宽容一些。一天，白家祉对一幅题为「我若为王」（If I were king）的壁报漫画感到很愤怒——「我若为王」是当时在昆明放映的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漫画的说明文字是：“If I were king, I would kill Meng!”白家祉把这个消息告诉孟，孟广喆佯装大笑，但评分原则并未因此动摇。[13]

机械工程系其它教授在博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同时，也使他们产生畏难的情绪，这是这个学院的特点。刘仙洲总是准时到达教室，然后关上门，检查是否有人旷课。迟到者要么站在门外听课，要么当着众人的面走进教室挨他的训斥。一门课的成绩由考试分数和课堂表现两部分组成，过度旷课就意味着不及格。尽管如此，有一份学生出版物非但没有无情地抨击他，反而还称赞他的教学、著述及其处理公私事务的正直诚实。今天学生回想起他时，都认为他温和、友善、学问渊博、虚怀若谷，是一位认真对待教学工作的学者。[14]

刘仙洲顶住压力，坚决不加入执政的国民党。在课堂从不用英文。他增进了大家对中国伟大的机械发明史的了解。他是少数几位以爱国思想和社会责任感著称的工科教师之一。王遵明热情讴歌祖国的伟大。庄前鼎衣衫褴褛，总是骑一辆破自行车，花四十分钟上下班。在讲发动机这一专题时，他对战时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奸商予以幽默但尖锐的讽刺，使得课堂生气勃勃，充满活力。[15]

系主任李辑祥既鼓舞同事，也激励学生。每天，包括假期，人们都能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找到他。他与一位秘书及一位助教合用一个办

公室。随着战事的发展，李辑祥重新整合机械系以满足国家的军事需要。最紧迫的任务是利用机械系的资源建立航空系。他在力学的基础上扩充课程，把机械和制造方面的课都包括在内。这样一来，学生也逐渐增加了，因此必须物色高水平的学者，在这方面他自有看家本领，这成为他的另一个任务。在他的主持下，机械系成为拓东路最受欢迎的系。九年间（包括长沙时期），工学院共培养了 929 名学生，机械系毕业生占三分之一强。除了经济系，机械系有 381 名毕业生，比其他各系毕业人数都多。[16]

李辑祥关爱学生是出了名的。他保证学习好的学生可得八九十分，中等的七十分左右，大部分都能及格。[17]在工学院，这种宽容是例外，而不是常规。从大一微积分和数学开始，这群未来的工程师在学术生涯中要接受重重挑战。这两门课中只要有一门不及格，就意味着不能在工学院继续学习。二年级入系时，各系均由系主任亲自把关。土木系的蔡方荫铁面无私，严格把关，使得许多人获取工科学位的希望都化为泡影。[18]任何一门必修课成绩低于 60 分的学生都得重修。重修大一微积分会导致推迟学习大二的代数方程和应用机械，因为前者是学习后者的前提条件。未通过一门必修课至少会推迟一年毕业，未通过一门选修课则至少是一学期。[19]任何一名学生基础课得了 F（不及格），或者其它两门课得了 I（65 分），通常会被要求转系。

某些基础课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能通过，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20]有一年，航空系的八个学生修「动力学」，六人参加考试，四人及格。[21]在机械系，「统计力学」是特别难逾越的一大难关。这门课总有 20%到 30%的学生不能通过，有学生学了四次仍然无法得到 60 分。同样有三分之一比例在及格线以下的另一门课是土木系的「结构学」；而马大猷的「电机原理」是名副其实的「老虎课」。[22]考试结束后的成绩单上常常是密密麻麻一片红，那表示有哪些人没有通过。

拓东路上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及格率，简直就是战前清华趋势的延续。最初十年，清华土木系失去了半数以上的学生。据 1941 年考

上联大的傅乐炘回忆，同宿舍的机械系同学有八九人，第一个学年过后就有四五人转到别的院系去了，到毕业时只剩三人。1941 年进入机械系的七八十名学生有一小半获得工科学位，但只有三十人是四年间按时取得的。[23]

电机系对学生格外严厉。对于有志研究电机工程的学生，大一微积分和大一物理的成绩至少要达到 70 分。大二时，周日早上的小考检查学生课堂知识以外的能力，看他们是否能够灵活运用基本概念。实验课的研究计划得预先准备，实验报告交迟了则不计分数。1941 年进入联大希望成为电机工程师的七八十名大一学生，到 1945 年只有十七人拿到毕业证书。[24]

对于新校舍的学生来说，拓东路的工学院笼罩着一种骇人的神秘气息，他们在大一之后难得见到工学院的朋友。他们以文林街茶馆和绿意盎然的翠湖为中心，过着「正常」的生活，而工科学生则生活在丁字尺、计算尺和草稿纸的世界里，每学期还要拚命应付大约三十场考试。这种状态下的学生看上去更像一台机器，而不是人。[25]但工科学生决不是「文化盲」，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大一时期的通才教育，以及后来有时能上其它系的课。利用选修课制度，在开始从事工作时，机械系学生能掌握诸如「边际效应」和「泰勒法」等概念，这是他们在「工厂管理」或「经济学原理」课上学到的。

虽然在社会评论上不如文科学生活跃，但工科学生未必缺乏政治认识。事实上，许多人都是因为爱国才报考工学院的。从 1942 年 1 月的反孔（祥熙）示威游行到 1945 年的一二・一运动，工科学生都积极参加，致力于反对一党独裁，促进民主。[26]工学院甚至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织，还有一些先锋社团。其中最大的是引擎社，成立于 1939 年秋。如同在昆明北部校区更有名的政治组织——群舍，在 1941 年以前，引擎社是反抗三民主义青年团很有号召力的左翼社团。在 1941 年 1 月新四军事件之后，共产党开始实行「埋伏隐蔽」的策略。这个社每两周出版一期《引擎》壁报，抨击国民党统治区的虐待和不

平等，介绍马克思理论，刊登美国激进记者安娜 •路易 •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对共产党游击区的报导。[27]

不过，工学院最受欢迎的课外活动是体育运动，学生可以藉此释放精力。在教练黄中孚（被亲昵地称为「黄牛」）和夏翔的卓越指导下，工学院在校内外的比赛中都取得了令人忌羡的成绩。迤西会馆后面的开阔地带有篮球场、排球场、单双杠及其它运动设施。工学院继承了清华传统，埋头伏案的学生可以在中饭和下午上课之间参加短暂的体育运动。在铁马和喷火体育会的协助下，严谨认真的参赛者可以活动活动筋骨。铁马体育会赞助各种体育运动，从学生工人对抗赛到夏令营、冬泳，还提供从远近选购的、经济实惠的、具有异域风味的晚餐。铁马体育会于 1940 年成立，有 34 位会员；1946 年复员后回到清华仍然存在，到 1948 年会员增加到 270 多人。在中国和美国都有校友分会。[28]

黄昏是音乐时间。这时，小提琴、长笛、胡琴、二胡的声音会源源不断地从旧盐仓的窗户飘出来，还有唱机发出的经典乐曲声。全蜀会馆望苍楼，是许多工科教师的宿舍。林慰梓组织古典音乐的欣赏会，可以聆听贝多芬、舒伯特和莫扎特的作品。在院子里，学生喜欢演奏从美国军方借来的唱片上的曲子。[29] 音乐能诱使疲惫不堪的工科学生花一个多钟头走到城北的校本部。不管下雨还是天晴，西南合唱团成员每周晚上都会步行去大西门排练，一时间歌声飘扬。[30] 住在昆华中学的联大女生，是昆明北部唯一可与音乐相媲美的魅力之所在。学生把远足看望女朋友叫做「马拉松」，把忠诚的远足情郎叫做「马拉松拉伯」。如果女生从北到南去探望工学院男友，反过来，她的马拉松就成了「松拉马」。

理论与实践

工程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也是一门应用科学。可是，战前清华的教学有点忽视实践，更偏重理论。至于工科的训练，清华所有的实验室和车间倾向于闭门造车，远离其最终施展技能的工作场所。其实，

工科教育的「工读协作制」，早在清华工学院成立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却遭到官僚的冷漠和政治上的担心（害怕学生给工人带来坏影响）。卢沟桥事变期间，实地训练只不过是去企业进行短暂的参观，到工厂跟随初级工人实习个把月。[31] 总体上，教师和社会也相对隔绝。对大多数人而言，研究就是在美国深造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而不是满足中国的需要。政府、军队和实业团体要解决技术难题时，也很少向清华工学院请教。

日本侵略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甚至在离开长沙前往昆明之前，为应对战时的挑战，工学院就派出机械系和电机系的 28 名学生，协助徐庭瑶将军领导的苏联设备的装甲师。[32] 与战前清华不同，工学院在昆明既没有独立研究的资金，也缺乏相应的设施。而且，政府、军队和实业单位在抵御敌人、补给前线和发展西南边疆等方面都迫切需要专业指导。为建造飞机场及其相关设施，美国盟友需要会说英语的、技术熟练的助手。酬不抵劳的教授和一贫如洗的学生都很渴望获得兼职，尤其是既能缓解经济压力又能促进专业发展的工作。因此，工学院密切参与解决战时困难。甚至在课程安排上，与战前清华的美国模式基本相似，但在战时有所发展——设置电讯专修科，建立航空工程系，并开设军用结构、军用桥梁、军事运输以及要塞工程和兵器方面的课程。[33]

机械系大三、大四学生被派往当地工厂工作，包括电厂、机械制造厂、纺纱厂、飞机制造厂及其维修部门。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该系尽力邀请机械厂和兵工厂的高级工程师来学校授课。此外，该系还帮助云南省建设厅研究改良农具的方法，及改进昆明中央机械厂的生产方法。早在 1921 年，刘仙洲就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指导云南孟良煤矿采用自动马达带动载重轻的运煤车。一些教师为中央资源委员会承担工业燃烧引擎、水力涡轮机和锅炉的研究工作。最后，该系教授还协同兵工后勤学校开设机械培训班，并帮助该省团体训练前往美国的预备班学生。[34]

化工系也把他们的技能用于工业生产。谢明山与航空系的王德荣一起研制墨水。苏国桢创建酒精制造厂。在潘尚贞的协助下，当地成功地建立起乳酸钙厂。抗战后期，联大电机系在中央资源委员会的委托下，开展了十几个专题研究，为战后全国铁路电气系统的建设做准备。[35]

土木工程系是学术与外界交流合作互惠互利的模范。[36]土木工程师在城市、道路和飞机场等地进行定点调查研究。建设公路、机场和发电厂等兼职工作，既能给学生带来急需的金钱，还能让他们积累工作经验。政府机关也利用系里的设施。[37]工程材料实验室被云南省建设厅林务处和滇缅公路工务局征用。道路材料实验室配合公路工务局与美国陆军供应处工程部合作，开展公路和土壤实验。与交通部公路管理总局合作组成公路研究实验室，负责研究路面的改善、土壤的稳定、代用材料及经济分析，发表了多篇论文和报告，还办有《公路月刊》。土木系的教师协助解决土壤、材料的问题，并参与建设云南新机场，供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使用的飞机场也包括在内。

在水力工程方面，高校与政府之间也展开合作。与中央资源委员会合作，联大的工科研究所土木工程组成立了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由施嘉炀主持。在两年内，这个队制定了开发水力资源的初步计划，设计出一批水电站；这个勘测还与中央水工试验所合建昆明水工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水资源管理及其它问题上取得了研究成果。土木系还协助云南抗疟委员会实施「抗疟工程」。1939 年，该系的材料实验室和云南省建设厅林务处组建滇产材料试验室，与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作调查滇产木材种类，并实验研究木料性能。此外，该系教授还和当地公司签订合同，设计了昆明大戏院和六层办公大楼，为昆明的两层木制建筑带来了现代风格。

机械系是工学院物资最充裕的一个系。因为重要的杂志和超过三分之一的设备通过汉口和重庆转运到昆明，这个系设有金工、木工、锻工、铸工车间，还有一个热工实验室。虽然如此，除了战争爆发前

从清华抢运出来的设备，即便加上他们自己制作的仪器，机械工程师并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随着运转现有工厂日益困难，该系实行「商营管理法」，接受外界订单，生产小型的老虎钳、钻床、车床和水泵等。这项实践不仅带来了经费，还给学生带来了宝贵的实践经验。[38]

工学院的教师们一贯为抗战不遗余力地献计献策，与此同时，他们自力更生，勤工办校。最为突出的，就是清华服务社。[39]这个服务社既服务于抗战，又有利于自身及其机构。为满足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需求，利用清华校友捐助的资金，该社于 1943 年成立。航空队所需的便利设施，基本上是中国无法找到的。清华－联大的工科教师既熟悉美国的实际生活状况，又有技术，自然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院长施嘉炀把清华服务社分为八个单位。土木组签订合同，为遽增的美国军队建设营房。在精明谨慎的实业家教授阎振兴的指导下，从偏远的县城运来质量有保障的石灰，把废弃的家具裁到合乎规格。门窗铰链之类的金属配件则由机械组的孟广喆教授负责。为了给美国人提供自来水，机械组在金工实验室生产管道附件和水龙头。机械组下的家具队由李辑祥负责，他对美国家具有切身的体验，所以能制造出当地厂家难以匹敌的家具。为研制冰块——这在昆明是个奢侈品——学生有机会做一些热工实验。

第十四航空队需要大量的氢气充灌气球，这些气球供分布广泛的气象站使用。传统方法生产氢气需要用锌，可是这种材料在当时不易获得，清华服务社便设法利用从飞机上刮下来的铝，并巧妙地把原料弄到美国装置上，完全利用废弃的军事材料生产并包装氢气。

除了美国军队，清华服务社还生产大量的产品供中国的工厂和百姓使用。所获得的利润被用来补充联大全体教职工的收入。抗战胜利后，美国士兵回国，这些物品一度贬值，而清华服务社的使命也已完成，便停止运作了。

工学院：一个例外

相容并包是联大的光荣之所在。因为它包容了如此丰富的个性和思想，还设置了众多的机构，联大无愧于「大学」的称号——「大学」的本意就是真正的无所不包。但这种「无所不包」使这个归纳变得不切实际。工学院就是重要的个案。除了少数例外，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联大师生对教学和学术的兴趣。相反，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城堡，大学需要刻意加以保护，对周边社会急功近利的做法敬而远之，甚至超然于战争本身。但是，这种斩钉截铁的泛论并不适用于工学院。

为满足国家的需要，在政府的命令下，工学院增设了一个系（航空工程系〉，承担了一项新的培训计划（电讯专修科），允许增收的学生（在电机系和机械系〕操作设施，使得设备的利用达到极限。这是联大唯一的一个学院，它开设的许多课程专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也只有它把完善的研究设施和服务机构用来满足国家、地区、本省及周边城市的需要。但是，因为基础课基本保持了战前的课程设置，工程师们仍注重巧于满足国家长远需要的技能训练。因此，担心这种旨在应付战时急需的功利主义训练不能学以致用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自由知识群体给联大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但工科师生并没有完全被排斥在这个团体之外。说未来的工程师在联大像历史学者、文人和地质学者那样受到同等的通才教育，这是迂妄之词；但是，尽管工科的课程十分繁重，大一的通才教育并不是毫无作用的。直到今天，工科校友还自豪地断言，在通才教育的基础必修课方面，他们的收获比他们的同学还要突出。与大西门周围丰富的课外生活相比，拓东路的文化活动或许要逊色一筹，但他们证实，在工科学生中也有少数很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学生，他们绝不肯把自己的广阔天地限制在专业领域。

更显著的是，尽管工学院对昆明和云南的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无法用数字衡量，亦难以计算其影响，因为它们太分散了——这里一块飞机场，那里一个水电站，指导老师帮助改进工具，实习学生对化工

和纺织业的作为——但所有这些努力，无疑有助于把云南带入 20 世纪。正如联大作为一个整体，因其提升了云南人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而备受称赞；就其战时和战后在工业、交通和国防上的发展而言，云南省应该感谢联大工程师们太多的恩惠。

十二 师范学院

同工学院一样，师范学院有它迫切的实际用途，但它的目标更明显地集中于满足云南一省的需要。

战前十年，中国的师范院校已转变成（或被并入）文科院校，所以到战争爆发时，只剩下北平师范大学还在培养高水平的中学教师。[1] 1938 年秋，教育部为克服这种危机，强制在中国各个地区建立六所师范学院。云南的中学教师由联大负责培养。在北大教育学系、南开的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教育学组和云南大学教育学系的基础上，以现有师生为核心，组建联大的师范学院。[2]

教育部的这项措施在云南深受欢迎，因为全国的师范学院的衰弱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发展中学教育。由于缺乏合格的中学教师，中学教育水平持续下滑，而这导致考上大学的人数减少；反过来，也削弱了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学教师骨干队伍的力量。[3] 因此，云南省当局迅速解决新学院的校舍问题，最初安排在文林街的昆华中学北院，1940 年 10 月校舍被炸之后，便转移到大西门外龙翔街的昆华工业学校。

师范学院离联大的文、理、法商学院很近，但又独自成院，拥有独立的师资和课程安排。九十一名教师中，尤其是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标准通才教育学科的教师，大都由联大加聘。[4] 教育学系和公民训育学系以及专修科，通常都由师范学院的专职人员承担。一般说来，这些系和科的学生在师范学院一直待到毕业，课程设置也基本保持不变，而那些热爱文科的同学利用师范学院的低门坎进入联大之后，一有机会便转到更有名的院系学习。结果，只有少数学生从师范学院文科毕业。

大一期间，师范学院学生与其它院系学生在校本部一起上基础必修课。为修满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师范学院学生也可以到其它院系自由选课。该院所有学生必修教育学理论、教学方法和心理学

方面的课程，还必须花一年时间进行教学实习。除了通过基础必修课、参加期末考试、写毕业论文，师范学院学生还得在一、三、五年级参加统考。[5]

院长

前后八年，一直由黄钰生担任师范学院院长。1938 年 8 月 4 日，联大的常委会在大会上推荐黄钰生和吴俊升（出身于北大，其时在重庆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担任师范学院院长，根据官方规定，由教育部最后择定。然而，在把两位候选人的名字电报发给重庆时，蒋梦麟就通知黄钰生，院长职位是属于他的。接下来，唯一的阻碍是黄钰生不是国民党员，这个问题也很快解决了——因为蒋梦麟和梅贻琦一道提名他加入国民党。不到十天，教育部就批准了这一任命。[6]

黄钰生是承担这项工作的自然人选。作为南开秘书长，并担任过从长沙出发的历时六十八天的旅行团领导，在昆明还担任了大量的行政职务，他早就显露出杰出的组织才能。由于张伯苓基本上缺席常委会，他便成为事实上的常委会委员。而且，他的任职使联大高层行政职务的分配更加均衡，因为此前只有一位南开人担任学院院长。

就任院长时，黄钰生踌躇满志。他感到这是利用这所全国最著名大学的人才的时机，并可以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希望学生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导师直接交流，而不是一味由老师讲演；但结果他很失望：「我原本打算把师范学院办成类似牛津大学的学院，或者中国古代的书院，以区别于联大别的学院。但在办学过程中，大多数学生与文法学院的同学一起上课。因此，我的设想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联大环境的影响，也就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7]他意识到，师范学院的学生未能达到联大整体的知识水平，一眼就能看出这些学生的短处，他把他们的缺陷归结于他们总体上比其它学院本科生年长，而且英语基础较薄弱。而导师制就是用来弥补这个缺陷的。

虽然师院学生的学术基础不够扎实，但他们的体育和德育都很

好，黄钰生对此充满信心。与联大主流思想相反，他认为体育、德育与智育同等重要，这个观点和他的老师张伯苓相一致。张的教学理念是，教育不仅仅是智育，而且是体育和德育。

黄钰生模仿张伯苓在南开中学——不是南开大学——的办事作风。要求衣着整齐而不华丽，仪表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除了家在昆明的学生，其它所有人都得住校，未经许可不得外宿。男女生的交往限制在主楼接待室。早晨按时起床，晚上按时熄灯。每日清晨，学生得排队做早操，举行升旗仪式，并由黄钰生或查良钊训话。[8]

教师节那天（6 月 6 日），学生会盛情宴请他们的老师。在这种场合下，有五百多人出席，以学生的音乐和戏曲表演为特色，并由黄钰生和梅贻琦讲话。[9] 这里，同其它场合一样，会有人提醒学生，他们肩负着教育未来几代人的责任。这个讯息在师范学院院歌（黄钰生作词）和该院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传播光明」仪式上传达出来。第一次「传播光明」活动于 1938 年 12 月 12 日在昆华中学操场举行，为后来的活动定下了基调。教授举着没有点燃的火把，绕着熊熊篝火围成一圈。学生则在外面围成一个更大的同心圆，聆听黄钰生宣祷：

光和热是教育工作者的原动力。中间的营火，象征着光源，有无比的光明和热力。老师们得自光源的光和热，照亮和温暖了每个同学……大家各尽所能，更增加光源的强度。

然后，教授点燃手中的火把，并用他们的火把点燃学生的火把。这时，黑暗的体育场一片光明，每个人围着篝火歌唱，歌声此起彼伏：

传播光明，传播光明；传播，传播，光明，光明；还要光明，还要光明！

接下来，老师把火把扔进篝火，学生也跟着进行，这更加强了光和热。他们突然齐声歌唱，唱出中华民族必胜的心声。[10]

黄钰生把提升青年一代的思想和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使命。他在《中央日报》（1941 年 4 月 13 日）上发表了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谴责当代青年充满「心机」，认为他们「像老人」一样世故、精明、保守、目光短浅。他告诫青年，应该追求更高远的理想，应以伦理道德取代愤世嫉俗。[11] 在他精心撰写的这篇文章发表两年以后，他发现年轻一代并非完全不讲道理，他们能够容忍不同的观点，也不会心血来潮只争一时的快乐，或者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周遭的环境。[12] 黄钰生以严厉但公正的口吻提醒青年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长辈未言传身教。[13]

黄钰生总是把他个人的观点强行付诸实践，难免遭到批评。在从长沙出发的长途跋涉过程中，有些学生就发现他很尖刻，有人则认为他太直率，且不遵从团长黄师岳的决定。[14] 身为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同样给人们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以前的一位学生称赞他很有行政才干，并说他硬朗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赤子之心。而另一个人指责他对学生过于严苛，很不友好。在一位同事看来，他「太世故，太自命不凡，而且不够坦率」。[15]

有人谴责他把重点放在中学管理上，把师范学院的事务交给副手。[16] 在 1980 年的一次访谈中，黄钰生明确表示，师范学院的管理工作并不费时，所以容许他集中精力管理附中和附小。他认为创办附中的经历是「平生所做的最满意的一件事」。[17] 他主要依靠联大人来教这两所学校，由刚毕业的本科生教中学，师范学院五年级学生到附小实习。[18]

昆明的联大附中和附小全面继承了张伯苓的南开传统。黄钰生对教师要求相当严格。为保证学生尽可能听懂，教师得认真备课，并清晰地讲解。学生得按时完成作业，老师须及时批阅。老师的负担相当重。虽然每位教师每天只上两三节课，每周总共十二到十六节课，但他们每天必须花半天时间到学习大厅监督。有些人认为这个要求太繁重，便辞职不干了；另一些人则拒绝服从，因此被解雇。[19]

院长的同事

除了黄钰生，另外两人也为师范学院奠定了风格，他们是查良钊和陈雪屏。

查良钊隶属于教育学系和公民训育学系，讲授教育心理学。大多数学生认识他是因为他掌管他们的补助，且为人和蔼。在中央政府于 1939 年 7 月任命他担任联大训导长之前，查良钊在师范学院担任主任导师。他住在一幢学生宿舍的一楼，很方便看管学生。[20] 他精力充沛，热心诚恳，工作时乐观积极仁慈友善，恰与黄钰生超然的态度相互补充。他们两人使得师范学院学生外表整洁，内心高尚，服务勤恳，乐观向上，而这正是南开学风的精髓。

陈雪屏是教育心理学教授，在联大负责指导三民主义青年团。与黄钰生的道德说教、查良钊的欢快乐观不同，他把时间用于观察，而不是训诫或服侍学生。他对人性的弱点探察入微，以研究谣言心理学著称。他相信，削弱学生激进主义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专心学习。陈雪屏认识到，只有审慎地运作，三青团才能发挥作用。尽管他负责对联大学生灌输孙中山的思想，但那些初次见到他的人并不清楚他的政治立场。他就像桥牌高手和围棋大师一样，从不轻易亮出底牌。

陈雪屏的思想观念是如此隐晦，以至于有个共产党员在前后两个阶段下了不同的判断，一会儿称他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的民主人士」，一会儿又说他「右倾」。[21] 据一位老朋友的观察，除了在政治事业上，「陈雪屏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22] 另一方面，他大体上被认为属于朱家骅派，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学者，而朱派倾向于同情政学系的行政理性主义者，而且与陈氏兄弟的政党有来往。

陈雪屏天资聪颖，出身于东北富裕的地主家庭，在海外留学时是个纨裤子弟。在战前的北大，他以诗人兼书法家闻名，当时他还不是政治活动家。不过，他与北大的权力精英——傅斯年、周炳林，还有最重要的蒋梦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1941 年，正是蒋梦麟和梅

贻琦要求他担任联大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他答应了。[23]

陈雪屏擅长与各种人打交道，从政治权贵到普通学生，他都谈得拢。据昆明前市长裴存藩回忆，陈雪屏是与他接触最频繁的联大高层之一。[24]作为三青团的负责人，他总是位居幕后，以减少联大人对中央政府政治势力侵入校园的担忧。对有些校友来说，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他差不多被认为就是一个政治帮凶，但其它人，尤其是在台湾的，则常常想起找他和查良钊解决私人问题的情形。陈雪屏广受尊敬，以至于 1946 年左派学生出版物中有一篇速写，认为他口才和文笔俱佳，私人生活也很淳朴，值得称道，且没有一句贬斥他政治观念的话。[25]抗战即将结束时，有个每月评论的组织，活动遭到官方取缔，他们就援引五四传统的自由原则，要求他恢复召开会议。从这件事也可看出他的品质。

虽然与五四自由主义传统背道而驰的秘密活动遭到广泛的质疑，但他的正直、谦和、细致使三青团能够在联大开展活动，尽管说不上广受欢迎。还有，他在师范学院的地位为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政治基地。由于师范学院是官方为培养未来的教师设置的，与联大其它所有院系相比，它在政治上是最正统的。陈雪屏担任教育学系系主任，该系拥有师范学院四分之三以上的学生。他还一度兼任公民训育学系系主任，该系与教育学系有相似的必修课，也是国民党意识形态在师范学院的堡垒。

政治气氛

在一本已出版的回忆录中，黄钰生指出，师范学院学生的政治思想派别与联大其它学院「相差无几」。联大学生可以分为左（以中国共产党及其先锋队组织为核心）、中（是最大的一派，左右两派的皈依之地）、右（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为骨干）三派。[27]黄钰生的回忆就政治趋势而言是正确的，但它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师范学院本身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它学院不同，师范学院有主任导师。该学院还设置了对昆明国民党支部直接负责的分部。该院学生从

国民党政府划拨给师范学院的经费中获得全额补助，反过来，他们毕业后得扮演为下一代树立模范的角色。[28]

虽然师范学院学生可以在校本部自由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但他们在学院内部会受到政治限制。例如，1941 年秋，熊德基（一名地下党员）和他的学生鞠孝铭创办《春秋》壁报，挑战国民党和三青团的意识形态。出到第二期时，查良钊把熊德基叫到办公室，命令他停止出版。熊德基遵从了，但他把难言之隐贯注在最后一期的通告上。通告称：「本壁报奉查训导长面谕，下期停刊。」然而，鞠孝铭的最后一篇文章却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这时，他同云南大学的一位教授发生口角。鉴于他「有辱校誉」，学校把他开除了。熊德基的期末成绩在学院排名第二，但他发现，由檀香山华侨资助的优秀奖学金获得者名单上已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了。[29]

在开展党务工作时，其它学生党员发现欺诈比对抗更有叫效。师范学院创办不久，曹学源开始以办夜班来掩饰共产主义活动。曹学源想借用学院的大煤油灯，但遭到查良钊的拒绝，他便转向去说服黄钰生，辩称这项事业会给联大学生带来很好的教学实践机会。通过一年半的时间，曹学源总共办了四期夜班，学员超过四百人，这全是院长所赐。

为云南省和国家服务

在中央政府赞成继续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师范学院注重满足云南的教育需求。根据师范学院与云南、贵州的教育厅及江苏省政府驻重庆办公室的合同，许多学生毕业后都有教书的工作保障。由于第一期五年制学生要到 1943 年才毕业，该学院便招收经过短暂进修后就能出去教书的毕业生。[31]

在属于联大的八年期间（1946 年后，它属于云南省政府，更名为昆明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开设了几种专修班、培训班和暑期进修班，以满足该省的需要。[32]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1939 年十月开办

的中学在职教员进修班，这是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与联大的蒋梦麟、黄钰生、查良钊和杨石先会晤磋商的结果。进修班为云南中学挑选出来的菁英提供一年的专门培训，分国文、史地、数学、理化四科。一年之后，他们要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要么到云南其它中学执教。由于日本的狂轰滥炸，联大接到政府命令要重新部署学校，进修班遂于 1940 年 7 月后一度停办，但第二期和最后一期曾在 1943-44 年开办。[33]

应云南省教育厅的要求，专修科于 1941 年开办。这是一项三年计划，旨在提高该省中学教师的学术水平。它分为文史地和数理化两大科目。最后一学期用于教学实习。一般认为，专修科是为了让更多的云南人进入联大学习，因为该省考上师范学院的人数也不多。为参加专修科的入学考试，应试者需备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的毕业证书，或毕业于师范学校，至少有两年的教学经验。专修科每年招收大约六十名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云南人。老师主要是联大的初级教员。尽管这些学生与他们的校友在学业上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圆满完成专门培训，也能获得联大文凭。[34]

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的一部分，师范学院为云南省服务的同时，也为国家作出贡献。因为在推动中文教学方法改进和材料拓展方面所发挥的示范性作用，该院主办的《国文月刊》在全国都颇有声誉。[35] 此外，师范学院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36] 但是，如果大部分学生来自省外，这个学院又怎么能说它切实服务于云南呢？虽然竭尽所能招收合格的云南籍学生，但这个学院在八年间只有 36 名云南人（其中 31 人在教育学系），而它总共有 179 名学生完成常规训练。当地学生的遽增是源于专修科和进修班的开设，前者有毕业生 83 人，后者有 153 人。这些非常规的培训班主要是为云南省服务的。把这些非常规培训班毕业生计算在内，师范学院 65%（415 人中占 272 人）的毕业生是云南人。[37]

联大及其师范学院促进了云南全省的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最显著

的结果是私立学校的增加，由战前全省的四五所上升到抗战结束时仅昆明地区就达二十二所。据估计，这些学校百分之八九十的行政人员和教师都是联大学生，有些学校的职员全是联大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师范学院至少培养了五位省级教育部门领导、十二名市县一级的教育机构领导、二十三名省立中学和师范学校校长及六名中学校长。如果再加上推动该省教育事业发展的难以计数的联大其它院系的学生，不得不感谢联大对云南的巨大贡献。[38]

第四部分

联 大 八 年

十三 希望的岁月：1938－1941 年

在昆明的第一个学年是相当混乱的。宿舍和教室分散在各处。最初，理学院和工学院都安置在拓东路的旧庙里，1938 年春季学期后，拓东路就专给工学院使用。理学院学生和刚从蒙自转回来的文法学院学生，被安排在昆明西北的昆华中学和昆华师范学校住宿和上课，而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已转移到远离日本炸弹袭击的农村。学生刚开始安顿下来，他们当中有些人就挤着去住公共汽车西站附近的农校。起初，没有桌子，也没有地方吃饭，因为食堂被改造成图书馆了。[1] 一位来访的救助者报告：「学生在很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和学习……以前住两个人的宿舍现在住了二十四个人。他们睡在由木板搭建而成的床铺上。他们的全部家当都放在脸盆里，而脸盆放在床上。整个大学都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2]

然而，即使在这种环境下，1940 年以前，日本还没有封锁昆明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通货膨胀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师生们大体上还能坚持工作和学习。中央政府发行的法币在当地市场还有相当大的购买力。1938 年，每月七块钱，至少每周可以吃一次鸡肉和鸡蛋。[3] 大部分学生的生活还过得去。文、理学院大约 80%的学生在他们自己经管的大食堂用餐，每月要花六块钱。那些比较宽裕的人选择包饭，每月消费七块半到九块不等。少数富裕的人早餐喝牛奶吃荷包蛋和西式糕点，中午大鱼大肉，晚餐在基督教青年会挥霍五角钱。（每天光来往餐馆之间的交通费差不多就要一块钱。）而最穷的学生早餐只喝一杯开水，午饭和晚饭则就着辣椒酱啃大饼。[4]

除了家在上海、广东和四川等地的人可能获得家庭支助外，大多数学生，尤其是日本占领的北方难民，只能依靠自己。直到 1938 年秋，重庆政府建立学生贷金制度，那些极贫穷的人才能从学校当局获得紧急救助。

丰富的课外生活

众多社团丰富了学生生活。其中最早成立的是伙食委员会——几个人通力合作，监督食物采购和烹饪，然后在食堂指定的地方一起用餐。其它社团举办辩论赛、郊游、音乐会、戏剧表演、足球赛、学习小组、时事讨论等。与战争有关的活动有下乡宣传、冬衣征集和平民防卫工作等。1940 年夏，为战争救济，学生组织了一次全天禁食活动，在昆明及其周边乡村花五天时间宣传兵役。[5]

在众多活动中，计划最周全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的先锋组织群社及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联合举办的夏令营。主办者主要是想通过共同体验生活和娱乐培养合作的精神，而不是致力于政治宣传或宗教灌输。有经济能力的学生可组织夏日考察队，考察云南壮丽的高原峻岭，并近距离观察该省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在校学习期间，大部分学生都游览过昆明附近的景点。他们最喜欢的旅游是，爬到西山峭壁嶙峋的龙门，远眺浩瀚的滇池，或者在滇池泛舟，池的北端就是名扬四海的大观楼，楼上有著名的赞美当地景色的一百八十字长联。更远的旅游地是石林，在昆明东边约八十英里，那里有宏伟壮观怪诞无比的喀斯特地貌。[6] 一位访问者观察到，没有时间或金钱旅游的学生经常在宿舍里自娱自乐，他们聊天、唱歌或弹奏民族乐器，也捕臭虫、捉老鼠。[7]

体育

保持身体健康比较有效的方法是，遵循清华传统，开展有组织的运动。当然，云南不能像北平校园那样提供网球场、室内游泳池和热水浴设施。尽管如此，所有本科生都得上四年不计学分的体育课，早上七点上课，每周两次。学生可能在跳高、跳远、平衡木、跳绳、掷垒球或 600 米跑步等项目上达不到标准，但他们至少得上课。不止一名学生因为旷课次数过多而未能获得毕业证书，不得不延毕一年。

所有体育活动都在室外进行，运动场地分散在城镇周边。校本部

的学生可以利用昆明中学北院的设施。〔「昆明中学」应为「昆华中学」之误。〕工学院学生则租用一块稻田，等到八月稻谷收割过后才可使用。足球、垒球、篮球和一些篮框都很破旧，还有五花八门的运动器械替代品。[8]这些用品损坏或磨损了，就很难找到替代品。1943 年，一位教练诉苦道：「全校每月的体育费不够买一个篮球胎。」[9]

体育工作由传奇的清华体育之父马约翰主持。虽然没有人换穿运动服，但马约翰坚决要求每个学生都像他一样只穿 T 恤，在阴冷的冬天早晨也不例外。一天，跟平常一样，上课开始时和学生一起跑步，同时做深呼吸运动，马约翰摘下帽子，露出他留有银色短发的额头，对学生说：「我已六十一岁了，还很健康。」[10] 1946 年联大解散时，马约翰六十五岁，仍很健壮。他为联大校友树立了终身保持身体健康的目标。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像马约翰一样认真对待这个目标。跑步时，有些学生躲在树后或溜进屋子。有一次，一位领跑的教练转身时发现全班学生都不见了。跑步结束后，接着做健身操，或者是运动指导，然后是比赛。出过汗但还没洗澡时，学生们便涌向联大校门外买豆浆喝，为当天剩下的时间补充体能。[11]

除了定期的体育课，还有校内的比赛，偶尔也有市内不同学校之间的竞赛。在战争后期，美国军方也参加进来。具有拳击裁判资格的美国士兵马克 •孔恩（Mark Conn），问黄中孚他们在联大打不打篮球。黄中孚回答：「噢，我们打呀。」后来，在第一次联赛中，黄率领联大体育教师队把美国队打得落花流水。[12]

工学院几乎清一色是清华男生的天下，也是学生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心，成立了铁马和喷火两个体育会，它们赞助篮球、排球、棒球比赛和联赛，举办游泳、远足和夏令营活动，并注重透过自我批评和体育健身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学生也可以不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一个观察者在 1940 年 8 月写道：「有人喜欢跑到乡村运动，像人猿泰山一样吼叫。」[13] 1941 年 3 月，一群体育爱好者组成俱乐部，约定每

天早上七点前出去锻炼身体。[14]然而，在工学院功课和兼职任务繁重的压力下，再加上只能勉强填饱肚子的伙食，他们的晨间锻炼也减少了。

富有情调的娱乐

除了打桥牌，在联大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要数看电影了。1939 年，昆明有两个电影院。报纸、壁报和地保提的大灯笼上都有宣传剧目的消息。1940 年以前，无声电影经常由一个当地人解说。至少有一个学生记得，他在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学习云南话。[15]有些学生认为，国难当头看电影是极不严肃的。1938 年底，一位爱国青年声称，他从长沙来就不再看电影，以后也不会看，除非是有关抗战的电影，即便如此也只买最便宜的票。[16]

1940 年 4 月 1 日，现代的南屏大戏院在昆明市中心开业。这家戏院成了唯一的电影院，因为只有它放映外国电影，主要是美国彩色电影。许多学生把喜欢的电影看了两三遍。英格利 • 伯格曼（Ingrid Bergman）、克劳黛 •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斯宾塞 •屈赛（Spencer Tracy）、保罗，穆尼（Paul Muni）、葛丽亚 • 嘉逊（Greer Garson）和费雯丽（Vivien Leigh）都是流行一时的影星，贝蒂 • 格拉布尔（Betty Grable）也有固定的影迷。[17]影迷们喜爱的电影不尽相同，就像《小鹿斑比》（*Bambi*）、《道奇市》（*Dodge City*）和《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之间的差别一样。一些俄国电影，如列宁三部曲和爱森斯坦的几部作品，也很受欢迎。但一直以来最受追捧的是《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讲的是约翰 • 斯特劳斯的故事。有些校友自称曾看过八遍。他们说，这部电影放映期间，联大每个人似乎都会哼〈蓝色的多瑙河〉。[18]

校友吴讷孙的《未央歌》展示了战争初期联大学生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生活，而他的描绘至少可以从其它材料中找到部分证明。一篇写于 1946 年的带有左翼观点的文章认为，1938 到 1940 年是业余生活最活跃的时期，而他写的是更为严肃的活动——几乎每夜都有演

讲、讨论和其它社团的活动，周末和假期还组织远游。社会服务同样热火朝天，从慰问部队到开办夜校，不一而足。在一轮满月下，教授们在故事会上娓娓而谈。[19]有月色的晚上也很适合恋爱。但联大男女比例为九比一，中国又缺少日常约会的传统，所以成双成对的为数不多。像外文系这样的学科，女生人数超过男生，才会有男女混合的晚会；中文系在男女学生社会交际方面颇为出名。像经济系、政治系和理工学院，女生寥寥可数，这些院系的男生几乎没机会接触异性。[20]

初期，两性关系「很纯洁，就像兄弟姐妹一样」。[21]1938 年 12 月有一篇这样的报导：

男女生中间的壁垒依然森严，平日甚至同班同乡也很少交谈招呼。客观地说，这种关系是不健全、不自然的，还残留着星星点点的封建意识……间或双方有人突破了这条壁垒，或许就会就此成为爱人……其中固然可以找到一两双「既不念书，又不救国」的如胶似漆的「情人」，但是更常见的还是关系正常，相互勉励的爱侣。[22]

1939-1941 年，孙（任）以都就读于联大，她记得学生生活是高度精神化的。没有两人世界，大家都是集体活动。无需任何理由，他们会一起跑去看电影，一起远足，或突然放歌。相比之下，她转学到瓦萨（Vassar）时发现，美国学生总是很拘谨。[23]

交际舞被普遍认为是无聊的，即便不说有伤风化，而且与战时清苦的作风格格不入。一次，学校刊物上有一篇文章对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冷嘲热讽，差点引发被攻击者的暴力反抗。另一次，一个穿着入时的男人闯进南屏宾馆的通宵舞厅，愤怒地质问道：「你们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难道不知道现在正打战吗？」不久，龙云主席的一位部下要求梅贻琦开除舞会的组织者。梅贻琦回答，这些年轻的狂欢者都是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他们在道德上并没有犯什么错。这位留美的教育家还宣布，举办舞会与学校规章并不矛盾。[24]

当地人认为联大是纵欲之地，这个印象证明，与其说世风败坏，

不如说昆明传统保守。当时招到公众非议的事，比如，在茶馆跳舞，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实在不值一提。[25]况且，在贫寒和拥挤的生活条件下，几乎没有机会发生性关系。宿舍缺乏私密性，几乎没有学生住得起宾馆。女青年唯一方便能做超出调情之类的举动的地方是其男朋友的公寓，他们通过到缅甸贸易致富。极少数女生结交美国大兵。违背这种清教徒式的行为规范会招到同辈的斥责。服装艳丽或姿势轻佻的女生会受到批评。连一个少女坐在草地上伴随着收音机唱歌都足以因为附近教室里的人的教训而作罢。[26]

像高氏姐妹这样魅力四射的公主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姐姐是个中国古典美女，鹅蛋脸，五官匀称，皮肤白净；妹妹梳着两条长辫，是个肤色柔和的美人。只要其中一人跟他们搭讪，联大男生就会受宠若惊。[27]两朵名噪一时的交际花是四川将军杨森的女儿，分别被称为大辣和小辣。[28]在战时条件下，她们仍得到家人的资助，其富裕的家庭还赞助一个小而显眼的咖啡社团。有个女生是一位湖南将军的女儿，她记得自己参加聚会比上课还频繁，聚会活动经常在通过朋友关系借来的公馆举行，参加者有游手好闲的联大学生和云南上流社会的子弟。她还记得，那幢房子是云南前军阀唐继尧的家人的，特别奢华。[29]

树勋巷的生活

程应镠和李宗瀛是历史系的学生，他们合住在树勋巷 5 号，从那里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联大在昆华师范学校的临时校舍。[30]他们用破旧的汽油箱迭成一个四层的书架，组成一个小图书室，最初的藏书有《资治通鉴》、《战国策》之类的古代典籍和其它历史著作及诗集。两年间，他们增加了一本法文词典、英文版《父与子》和《安娜・卡列尼娜》、一些中文版的外国著作及更多的中国典籍。开学后，树勋巷 5 号就成了年轻的历史学者经常光顾的地方，其中有后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徐高阮，以及在中国大陆同样知名的丁则良。他们对计学分的课或旁听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课包括雷海宗的「欧洲中古

史」、刘崇鋐的「欧洲十九世纪史」、噶邦福的「希腊罗马史」及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

这些历史学新秀兴趣广泛。有两个女生也住在同一栋楼，他们便组成一个背诵俱乐部，高声朗读重要的英文著作。前来利用这个图书室的人，还有物理系的王逊〔「物理系」疑为「哲学系」之误。〕和数学系的钟开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积极分子，在中国西北游击区和香港之间往来，有时会经过昆明，进一步促进了这个团体的发展。由于编辑《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程应镠结识了联大一、二年级的文学青年。他勉力追随前任编辑，即后来迁居重庆的演员凤子（又一位树勋巷 5 号的常客）。有时候，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沈从文也会以《今日评论》文艺编辑的身分来约稿。

壁报

树勋巷是联大学生广阔的思想和活动天地的缩影。通过出版壁报《大学论坛》，在那里生活的学生可以在当天的政治、学术辩论中发表自己的见解。壁报是一种手写的、很特别的作品，一夜之间即可完成，并贴在醒目的地方。这些大幅报纸刊登专题评论、小说、诗歌和漫画，在战前就形成了固定的风格，成为校园的一道景观。由于战时更为正规的出版物费用剧增，壁报因此更加流行。一群学生集思广益，在早上很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一幅壁报，墨汁未干就贴出来。中午时分，它可能成为昆明的谈资；要是下雨，它就成了字迹模糊的潮而软的纸团。[31] 壁报几乎可以贴在任何地方，但在联大，它们被集中贴在大门外通往新校舍北区的一片墙上。于是，那里就被称作「民主墙」。

壁报为中国知识精英的弟子提供了用武之地。生活在敬畏文字的文化中，联大学生努力做到在课堂内外字斟句酌，锤炼文笔。他们偶尔在教授们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或出版自己办的杂志，或可能向昆明报刊投稿。然而，他们很难竞争得过他们的老师，展现三千名知识青年思想、观点和创造才华的管道并不太多。

壁报热开始于 1938 年，在 1941 年 1 月新四军事件前夕达到高潮，然后一直衰退到 1943 年，在 1945 年再次达到高峰。这些波动起伏成为联大政治与社会气候的晴雨表。任何人都可以出版壁报，但基本上都是集体合作的结果。许多壁报是文艺社团的产物。作为战争初期共产党主要的先锋组织，群社出版了一些壁报，一份贴在市区给群众看，其它的贴在校园里。到 1941 年 1 月，联大已有二十四种壁报，其中十五种覆盖了昆华中学北院的一整面墙壁，而文学院大部分学生就住在那里。写作者包括「反动分子、保守分子、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32] 一位观察者记录了各种不同的风格和观点：

全校壁报中，最出色的倒是小型的《热风》，文章泼辣湛深，多刊漫画；次是《腊月》，资格最老，立论公允，取校内舆论领导地位；再为《群声》，其格式时时变换，形式最美，常常一个新形式出来之后，各壁报争相模仿，文章亦活泼可喜，有一股年轻劲；再为《介绍与批评》，常常剪贴和翻译一些平常看不到的文章和言论。

音乐之声

虽然联大没有开设艺术课，但戏剧和音乐在学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可以在教堂唱诗班参加合唱，也可以参加由北平教会学校校友组织的多达一百人的合唱团。周六晚上，学生可以去文林堂听古典音乐的唱片。联大大多数音乐表演都是随意为之——吹口琴，吹箫，偶尔有人在宿舍拉小提琴，走在昆明街头，或漫步乡村，或树下闲谈，有时心血来潮便放声高歌。许多歌都是流行歌曲，从抗战歌曲到西方音乐作品，比如，〈胡安妮塔〉（Juanita）、〈我的太阳〉（O Sole Mio）或最新流行的美国电影插曲。[34]

群声歌咏队是个严肃的政治歌唱团，它向所有歌唱爱好者开放，不管他们是否有这方面的才能。它有一大批热心的业余爱好者，其中包括尽人皆知的化学系教授曾昭抡。这个歌咏队主要排练平淡乏味的征兵运动歌曲，而不致力于举办正式的公众音乐会。它偏重演唱爱国歌曲，比如〈救亡进行曲〉、〈祖国的孩子们〉、〈松花江上〉、〈再见吧

妈妈〉及其它俄国歌曲。更有趣的、招人喜爱的是以「张老先生有块地，咿呀咿呀咳」开头的歌曲，在结束时总能引起满堂大笑。1940年，五四运动二十一周年前夕，群声歌咏队一些更加严肃的成员组成联大歌咏队，举办刻苦排练而成的音乐会。其首次演出是在五四运动纪念大会的闭幕式上。1940 年 8 月 13 日，昆明广播电台（该市第一个广播台）成立不久，这个歌咏队演唱的爱国歌曲就通过它的节目传向四方。南屏大戏院落成开幕时，它表演了类似的节目。[35]

三青团 V.S.群社

同日本侵略之前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一样，联大也存在着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从执政的国民党到实力强劲的对手共产党。然而，华北知识分子抵达昆明时，1935-1936 年一二·九运动的紧张局势差不多已经平息，因为战前学生运动的主要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已成为官方政策，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致支持。运动的大部分领袖也离开了。许多左派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或者在全国未沦陷的地区为共产党的先锋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服务。学校由长沙迁到昆明的决定，使得其他积极分子也离开了大学，包括一大批国民党的坚定拥护者，他们加入了胡宗南的部队。剩下的人大都是不大关心政治的学生，他们决心在学业上有所成绩。

在新四军事件发生前，师生一致认为抗战是当务之急，而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争取中国的精英学子的信任而竞争。支持国民党和拥护共产党的派系在长沙时就已初见端倪，在昆明时则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右翼）和群社（左翼）的面目再度出现。战争初期，这两个社团虽然只招纳到一小部分联大学生，但双方的竞争一直都很激烈，有时还会发生暴力冲突。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于 1938 年，〔据最近的研究，「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开始于 1940 年初」，而「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的筹备较区党部略早」。详参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137 页。〕代表了国民党政

策的大逆转，因为它 1928 年掌权以来就企图让学生远离政治。国民党法西斯式的黄埔系试图通过给执政党提供选择，使中国政治恢复生机，因为在他们看来，执政党贪污腐败、残暴无情、官僚作风严重，这样三青团就应运而生了。战时条件下，三青团希望使国民党像 20 年代中期那样能吸引有理想的爱国青年。在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最初都利用了重庆当局的支持这一优势，但他们还得消除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深刻怀疑；因此，他们并不总是同实力旗鼓相当的社团竞争。国民党的联大区党部成立于 1938 年夏天，它负责吸纳著名的教授，组织学生的任务就留给了三青团。

在朱家骅的要求下，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联大分团的责任就落在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身上。他们都曾留学德国，朱家骅回国后成为国民党中组部部长。姚从吾虽然是忠诚的爱国者和民意上的国民党联大区党部书记，但他其实并不想参与实际政治工作，只是勉强接受了这个职务。1941 年，担任了一年多领导后，三青团没能达到他的目标，姚从吾于是辞职，接替他的是一个更适合承担这项任务的人，即心理学教授陈雪屏。

陈雪屏是个颇有影响力量的人，擅长处理事务而不激怒当事人。他建立了一年一度的三青团领导选举制，但以其学术地位和性格，及其乐意效忠的态度，三青团基本上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后来，许多校友记得，在陈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利用爱国思想、个人关系和自身利益等吸引力，三青团成员从三百人发展到五百人。这个社团日渐活跃，利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如三二九（青年节）、五四、七七，开展纪念活动，还在附近的乡村举办夏令营，组织文艺和文化活动，与群社一争高低。

群社的前身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共产党的一个先锋组织，民先队成立于 1936 年初。它的大部分积极分子要么奔赴延安，要么被派往全国各地执行任务。少数代表在昆明活动。联大的民先队是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这个问题仍有争议。据 1961 年的一份资料，民族

解放先锋队的一个秘密支部于 1938 年成立，地点很可能是在长沙。民先队被视为左翼组织，它对参加 1936 年学生运动的北平积极分子颇有吸引力，但对 1938 年的昆明难民学生却没有多少号召力。随着联大人开始为第一个学年做准备，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组织关注学生的活动，使背井离乡的青年拥有一种集体感。与党的策略相一致，通过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获取支持，青年积极分子组建伙食委员会以改善用膳条件。接着，他们在民先队骨干的帮助下，以几十名核心会员为基础筹备建立组织。到 1938 年底，他们已有四五十名成员，足够召开社团会议了。在讨论新社团的名称，他们拒不使用「力行社」，因为它带有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味道；也不使用「群众社」，因为它听起来太像共产党的刊物——《群众》。「群社」这个名字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董葆先想出来的；它的首任社长邢福津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36]

在自身及其周边组织的努力下，群社积极分子出版了一些壁报，内容不但涉及政治，还包括文学和艺术，既在校内张贴，也在校外宣传。群社举办辩论会、讨论会和座谈会；组织哲学、经济学、国是、文艺、诗歌、戏剧、歌咏、俄语、世界语学习小组；组织郊游；在昆明和农村开展宣传活动。[37] 在共产党领导学生组织的传统下，群社以小组众多著称。它有一个学术股，下设文学、大一英语、哲学、历史、物理和社会科学等小组，每两周聚会一次，谈读书报告，讨论时事，开展专题辩论。[38] 当核心会员发展到大约二百人时，群社又建立了许多周边组织，其中有合唱队和体育会。[39]

战争初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群社的路线是温和的：强调团结抗日、集体合作的精神（针对联大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严肃的学术活动。群社的领导很快注意到，学习成绩使它名声大振，而其它方面的活动无法取得同样的效果。考试前，这个社团组织集体学习，把材料分发到成员手中，然后阅读、报告。一些年轻的助教也成为群社会员。据说，哲学系教授金岳霖曾评论道：「这些人平时不上课，考试却总是很好，

真没有『办法』。」[40]

在学习方面，三青团无法同群社相提并论，正如一位支持国民党的台湾校友后来所承认的，成绩最优秀的是思想独立的学生，其次是左派，三青团成员垫底。[41]每个与三青团有联系的人要么热衷于政治权力，要么是为了发展事业，但是——除了它的政治仇敌不这样看——群社有一种纯粹的气氛。虽然它公开的活动不强调马克思主义，但与含混不清的三民主义官方学说相比，知识青年对左派政治理论更感兴趣。

两个相互对抗的组织作风迥然不同，这可以从 1940 年春夏开始的宣传活动中看得一清二楚。[42]在南针社的协助下，青年团在城南环两湖地区徒步宣传。这一活动有三四十名学生参加，持续了数日。到达县政府所在地时，步行成员展开「三民主义青年团环湖兵役宣传队」的横幅。面对在校的孩童和一些好奇的成人，合唱队唱起了爱国歌曲。他们还到中学举行讨论会。横幅还没收好，他们就继续前进。他们为不识字的军属代写书信。因为他们难懂的口音和形式主义，当地人对这群外来者没有多少兴趣。更加糟糕的是，不同派系的领导人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之中，有一次还把学生弄得一时没饭吃也没地方睡。

在昆明西北角的龙潭界，群社更受人们欢迎。那天恰是赶集的日子，于是学生就现场表演活泼的节目：为观众唱歌，年轻演员还用刻苦学会的云南话表演街头剧。学生与百姓在街头谈天，还到他们家了解情况。家访不仅给当地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还加深了学生对这些欠缺营养、遭疾病肆虐的百姓的同情。与他们的竞争对手截然相反，群社宣传队是带着献身于这项事业的坚定信念回到昆明的。

虽然如此，在陈雪屏精明谨慎的领导下，利用官方支持的有利条件，以及人们对抗战的普遍认同，青年团在许多方面先声夺人。在招募会员方面，它超过左派的社团，在校内政治和文化竞争中与对手平起平坐。从 1939 年春联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选举到 1941 年 1 月新四军事件后激进分子大撤退，亲国民党和亲共产党的代表都使用各种手

段影响中间派学生，并协商学生自治会领导职位的分配。在三次选举（1939 年春、秋和 1940 年秋）中，天平逐渐向左派倾斜。然而，学生会还是有三个派别，反映了战争初期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各方势力均衡的现实。[43]

戏剧里的政治

政治斗争也发生在昆明的戏剧舞台上。联大在表演艺术方面颇有渊源。三所成员学校都有戏剧传统，南开尤甚。[44] 联大第一批志同道合者于 1938 年到达昆明时，现代话剧团刚在中国沿海城市站稳脚跟，在内地却几乎一无所知。迟至 1940 年 1 月，只要买得起五块钱入场券的昆明人都可以买票坐在前排中间的座位，观看由著名女演员白杨导演的《塞上风云》。[45]〔据翟国瑾〈忆一次多灾多难的话剧演出〉，「白杨等演出《塞上风云》」，并非导演。（《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 260 页）〕随着新思想的输入和高级票友的涌现，加上当地媒体的热烈宣传，观众往往一票难求，戏剧公司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在四处出现。其中之一，由北平八所基督教中学的校友组成，上演了《雷雨》，一位戏迷评价道，这是他看过的曹禺杰作中最热情饱满的一出戏。[46]

从一开始，联大的戏剧就有说教的成分。战前十年，现代戏剧被用来传播政治和社会消息，一二 • 九运动积极分子的流动团体就为不识字的农民表演过抗日剧。随着更年轻的学生的加入，老资格的成员在昆明重建政治剧团。左右两翼的社团斗得你死我活，把昆明的舞台变成不折不扣的戏中戏，反映出更广阔的政治世界的斗争。

1938 年 12 月，联大在昆明第一个完整的学年刚开始不久，中共地下党、民先队和云南自由先锋队成员加入当地的金马剧社，排演《黑地狱》。[47] 接着，这个社倾力排练《祖国》。这是一出多幕戏剧，由联大陈铨教授改编，讲述无私的教授带领学生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祖国》演出获得成功。观众自发地跟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当地报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远

在上海的媒体也刊登了这个故事。[48]

1939 年春，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曹禺访问昆明，更掀起了一股戏剧浪潮。几个社团联合接连排演了抗日剧《黑字二十八》和曹禺的《原野》，曹本人在前者扮演配角，担任后者的导演。[49] 参与《祖国》演出的左派建立了联大话剧团，这是综合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合唱队、学习小组，旨在激发爱国思想，塑造在校学生的政治观念。[50] 表演了几出独幕剧后，话剧团到农村给农民表演《放下你的鞭子》等爱国宣传剧。

然而，剧团受到派系斗争的破坏，一派想丰富演出剧目，容纳古装戏和外国戏，另一派则想继续集中排练左派的爱国宣传剧。左派谴责对方的女主角不愿演配角，不愿做幕后工作。青年团和群社之间在戏剧界的紧张关系使得局势逐渐恶化。三青團声称要包揽大会，使他们的候选人都当选会员。[51] 对此，中共决定让一部分地下党员及其追随者离开联大话剧团，把它甩给右翼，然后用自己的骨干队员组建联大戏剧研究社。[52]

为败坏联大话剧团里青年团新领导的名声，中共地下党工作者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贴出公告，揭露青年团过去控制联大话剧团的无耻行径。这很快成为茶馆的谈资，并有人开始退出社团。三青团领导无力使这个政治分裂的剧团起死回生，便把它遗弃给敌对的左翼，建立了自己的青年剧社。[53]

1940 年 5 月 4 日，庆祝联大在昆明成立两周年之际，变幻无常的政治和戏剧突然同时上演。根据左派的回忆，参与活动的五个戏剧公司抽签决定演出的顺序。青年剧社对抽签结果不满意，便离开了会场。一个月后，为欢迎南开校长张伯苓访问昆明，它决定排演一出五幕剧——《刑》，但不和它的政治和戏剧对手同台演出。为防止麻烦，青年剧社把预定的座位票分发给青年团的拥护者，并安排剧社纠察队驻扎在剧场外面。虽然青年团要求其成员当晚离开校园，但没有得到票的学生开始争吵，在剧场门口唱政治歌曲、喊政治口号。混乱之中，

有人切断电源。演出者立即召集纠察队，派代表上台带领观众大叫：「打倒共产党！打倒左派！打倒群社！」随之而来的大吵大闹，得到了张伯苓的支持，因为他明显同情右派。局面稳定之后，张伯苓说，学生发泄情绪是完全正常的，但他们应该向训导长致歉。确实有一位学生向查良钊坦白是他切断了电源。肇事者是个国民党员，以前从未露出马脚。张伯苓把敌对的左派也请到茶会上。他回忆说，担任南开中学校长期间，他和一位叫周恩来的学生演员关系很好。[54]

戏剧活动有增无减，政治对抗似乎是催化剂。由田汉根据鲁迅的经典短篇小说《阿 Q 正传》改编的一出戏，把马克思主义者、基督徒及其它人联合在一起。1940 年 9 月 15 日，这出戏在国民党驻云南省党部的礼堂首演——据一位共产党员分析，这个安排是党「利用地方当局与蒋介石中央的矛盾」取得的；有位台湾作家则认为，这是由于「国民党宽容的态度」。[55] 这出戏连演了十五场。所得款项被用于建立学生消费服务社，供应便宜的早点和茶水，并设立阅览室和文娱室。这次演出调动了包括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在内的一百五十名学生做幕后工作，共产党从这次成功的活动中取得政治上的收获。[56]

获得高度赞扬的《阿 Q 正传》演出将近一年后，即 1941 年 8 月，国民剧社以陈铨的《野玫瑰》首演登台亮相，该剧描写的是国民党情报人员与日本傀儡之间的斗争。然而，与左派演出的一帆风顺不同，《野玫瑰》因个人喜好、派系宿怨、工作困难、资金短缺及武力摩擦而受损。此外，当晚开幕演出不久，昆明遭到日本空袭。笼罩在太过真实的悲剧中，市民对这出戏失去了兴趣。[57]

对于《野玫瑰》的评价，没有哪个地方比联大的意见更截然对立了。对共产党来说，在左派躲到地下活动以后，这出戏标志着国民党法西斯势力达到顶峰；对于制作人翟国瑾，它代表了战时戏剧的最高水平。翟国瑾回忆，「此后，联大的戏剧活动逐步萎缩。」[58]

大陆作者通常把《阿 Q 正传》当作联大标志性的戏剧成就。这出戏的演出阵容，在战时昆明的戏剧表演中是最强大的，演员们都积极

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他们常常不吃晚饭。一位女生为扮演尼姑毫不犹豫地把头发剪了。[59] 扮演主角的黄辉实记得自我牺牲和合作的精神：

在演出时，四十多个演员没有一个迟到的，……每天下装后都在午夜十二点以后。夜点也都是同学自己掏腰包的……小 D 在演出的第二天就打摆子，他仍然坚持，后来，竟在演出中把「摆子鬼」赶跑了。我演阿 Q 在体力上是相当辛苦的，每晚头上要挨赵秀才一竹杠，假洋鬼子一手杖，偷萝卜的一场还要翻过一堵墙，最后在监狱里还要让二虎骑在身上打一顿。尤其是挨超秀才这一竹杠最难，因为即使打得再重，也不响，台下听不见……翻墙是最吃力的，常常从墙上摔在后台，再加上连续熬夜，有一次竟然吐了一口血。[60]

因为共产党对《野玫瑰》的抵制及其对《阿 Q 正传》极大的政治支持，两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野玫瑰》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云南省主席和军队指挥官的夫人、云南三青团领导和一批联大名人——从左派的闻一多到右派的陈铨。演出在国民党大礼堂举行。至少有三位支持国民党的《野玫瑰》学生演员此前参加过左派的《阿 Q 正传》的演出。[61] 共产党员萧荻不夸张地写道：「这清楚地表明，联大话剧研究会与后来的联大话剧团的分歧日益明显，但在地下党的领导和关心下，我们小心地开展演出活动，以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的精神，把每一个在后方的形形色色的人都团结起来。」[62] 国民党的坚定分子翟国瑾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在国统区趋于宽容（甚至过于宽容）。相反，赤匪斤斤计较。你能想象国民党的剧团在赤匪总部延安的舞台上表演反共戏剧吗？实际上，那么多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帮助赤匪演出《阿 Q 正传》，但反过来，没有左派学生允许这样做。[63]

虽然如此，后来证明执政党无论如何也竞争不过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共产党。左派学生坚决反对明星制，在集体行动中基本上掩盖个人特性。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时候不能宽容对待对手——国民党，而他们几乎没有困扰于《野玫瑰》剧组的内部分裂。在昆明的政治戏

剧舞台上，共产党显示出同样强大的力量，而国民党同样弱小，这最终在决定性的全国政治竞技场上得到证明。

空袭

和暖的阳光内
我们来到郊外，
像不同的河水
融成一片大海。
——冯至《十四行诗》之七

从战争一开始，日本就不管是否具有军事意义，对人口中心狂轰滥炸。连教学机构也不放过，尽管其它大学没有像南开大学那样被蓄意夷为平地。虽然难民能巧妙地躲避空袭，但昆明毫无防备之力。1938 年 9 月 28 日，第一批敌机来袭，扔下十颗炸弹，落在联大租用的昆华师范学院校舍，有两名天津学生被炸身亡。[64] 1939 年初，如陈纳德所记：「日本开始对自由中国所有人口密集之地进行持续不断的轰炸，竭力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65] 当然，其首要目标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有雾的保护，这是阳光灿烂的云南省省会所不具备的优势。1939 年 10 月 13 日，一百多枚炸弹轰炸师范学院和联大其它校舍，使得许多学生无处栖身。[66] 灾难过后，教学工作照常进行，警报和空袭很快成了家常便饭。当警报响起，宝贵的科学仪器就放进大油桶，埋在由土坯筑成的实验室的地下。[67] 重庆好歹还有防空洞供市民避难，而昆明连那种地方也没有，高水位使得任何挖防空洞的尝试都注定落空。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到安全地带。于是，「跑警报」就成了战时的常用语。

空袭警报通常留有时间供人们疏散。警报分三个阶段：第一次汽笛鸣响，表示发现飞机朝昆明飞来；第二次表示已飞近，第三次表示空袭马上就要来临。预行警报一响，市民就拿起点心、书报什么的或他们希望带在身上的贵重物品。听到空袭警报时，他们便走出家门，或离开工作场所。联大大部分机构都在城北，人们便接二连三地穿过

城门，向远离新校舍的城外的小山跑去。第三次警报响起时，仍没有到达安全地点的人，便跳到最近的壕沟里。

如果早上看到耀眼的阳光照射在窗户上，人们估计日机会在十一点之前到来。每个晴朗的早晨，有些人不等防空警报鸣响就直接跑到山沟里。[68]空袭警报通常在下午两点以前解除。起初，学生对空袭泰然处之。利用这个时机，他们坐在阳光下，与朋友谈天，打桥牌，或者阅读，但随着空袭逐渐频繁，持续时间延长，乡村漫长的午后就变得单调乏味起来。待在外面还意味着没有午饭吃，而很少学生有零钱买当地农民的食物。

为躲避空袭，1940-1941 学年初，学校当局重新制定了时间表：上午七时开始上课；十时午饭过后，所有人都离开学校；下午三时恢复上课，直到六时。1940 年后期，曾一度在早上六点半或七点就开始疏散，有时在中午上课，尽管这时偶尔会有空袭。对于想讲完课堂内容的教师来说，这种条件实在令人沮丧。一天上午，吴晗去教室上中国通史课，却发现他的学生都跑到山里去了。一气之下，他决定不再上课，最后在学生代表的劝说下，态度才缓和下来。由于吴晗的严格要求，那学期期末的不及格率格外高。[69]

自然，在昆明有家室的教师总是特别担心。例如，费孝通一家空袭警报下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早餐过后，他妻子就开始烧饭，这样他们可以在下午回家后热一热再吃。预行警报在十点左右响起，费太太熄灭炉火，家里每个人就准备好「警报袋」。空袭警报一响，他们就加入人流，朝文化巷跑去，穿过城墙缺口处，绕过联大校舍和英国花园，钻进小山岗。因为费太太身体虚弱，他们时常在山后开阔处休息，听到紧急警报时，才躲到附近的壕沟里。在警报解除之前，费氏一家人常与朋友和联大、云大的同事聊天。费孝通有时会带上一本书，但终究没有心思读，他是不得已才带上它，希望能有所收获，何况还有和煦的暖风。在他看来，低空扫射的话，他们所有人都很容易丧命，但敌人总是在城里扔完炸弹就离开，因此有人开玩笑说，日本轰炸昆

明是一场演习，而在昆明上空往返飞行则是敌人空军学员毕业典礼的一部分。

1940 年 10 月 13 日，下午一时刚过，像往常一样，费孝通在山脚下跟朋友闲谈，这时有二十七架飞机从东边飞来，炸弹落得这么近，以至于他都能感受到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敌机飞走后，费孝通和同伴爬上山头，望见市中心升起一团巨大的烟雾。警报解除后，不幸的报告传播开来：大学区遭袭击，新校舍的建筑被炸毁。在回家的路上，费太太越来越着急。一穿过城墙，她的担心就应验了。昔日的文化巷到处是瓦砾，他们发现自己所在区已沦为一片废墟。房子四周全是断垣残壁。他们推门进去，四个小时前还是整整齐齐的一个小院子，现在看上去却成了一座破庙。院子里满是断裂的树枝、破碎的书报，但他们的房子还在。木框和窗槛一起被震落在院子里，玻璃全碎了，不过屋里的所有东西都在原地，上面有一层灰土。费孝通拭去桌上的灰尘，发现手稿还在原处。所损失的只是一个热水瓶。费太太哭了，费教授笑了，却都不知所以然。他们除去米饭和一锅红烧肉的灰尘，坐在院子里吃晚饭。

他们很快发觉房屋正常是一种幻觉。哭声从隔壁的院子传来。邻居的亲戚刚发现五具尸体，随后又传来其它死者的消息。费孝通走出门，所见到的景象使他毛骨悚然：血迹满地，尸横街巷。他关上门，回到灰尘满布的家。天黑了，没有电，点蜡烛。月光从窗户和屋顶罅漏处倾泻下来。无人能够入睡。房子比看上去更不可靠，所有的榫头都由于震动而疏松了。房东来察看损坏处，但没有钱修理。费孝通的妻子已处于临产期，不能再承受天天东躲西藏的生活。第二天一早，费孝通把她送到城东呈贡朋友的家里，然后去偏僻的村庄找新住所。[70]

10 月 13 日空袭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昆明西北角联大和云大的所在地。在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夷为平地，其它建筑严重毁坏。几条街巷之外，炸弹落在清华办事处前后两侧，梅贻琦一家就住在那里，炸

死了两个在城里看守的校工。还好清华重要的文件都埋在后院，得以保存下来。文林街一带全是学生食堂和茶馆，遭到了严重毁坏，云南大学大礼堂也是如此。[71]

作为避难之地，昆明的优势在于，凭借滇越铁路和 1939 年 75 初一度开通的滇缅公路，它与外界的联系比较方便。但是，随着日本开始向法国和英国在云南周边的殖民地施压，与越南和缅甸毗邻就不再具有优势，反而成了缺点。10 月 13 日毁灭性的空袭之后将近一个月——1939 年 11 月 11 日，日军在广东北海港登陆，并迅速向内陆推进，于 11 月 24 日占领广西西南部的南宁。1940 年夏，法国同意日本在东京湾驻军，并把它作为军事基地，该地就在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最北部。这不但使昆明更加容易遭到空袭，也使云南东南部暴露在日军的铁蹄下。

现在，中国面临新的危机：云南的学术和文化机构可能遭到毁灭，这将使全国百姓元气大伤。教育部拟定了一个计划，得到行政院的许可，命令包括联大和云大在内的十二所高校迁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到 1941 年 3 月，其中六所遵从了这个指令。其它学校要么抵制，要么未能找到合适的地点。[72]

校舍紧缺为联大迁徙增加了一重砝码。昆华中学决定迁回原地，联大占用了它大部分教室和宿舍，这样联大的新校舍便人满为患。为安置日益壮大的学术群体，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学校当局派了两位教授、后又增派教务长樊际昌去四川寻找新地。蒋梦麟飞往重庆，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及其它高官商讨局势。他们笼统保证四川有地方能容纳五千联大人，但找不到可以容纳三百人的大教室。此外，预计这次搬迁要花整整一年时间，而且所费不赀。[73]

10 月 13 日空袭后，又发生了连续四天的大轰炸（10 月 26 日到 29 日），于是学校当局决定把大学疏散到附近村庄，但实施这个计划之前，威胁滇东南边界的日本从宜宁撤军。1939 年 11 月未发生过一次空袭。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再三考虑，联大高层认为不值得为搬迁

劳神费心，但已来不及保持联大的完整了，因为教育部已发出通知，来年六百多名新生到四川西南小城叙永报到上课。11 月，联大正式批准该地为大一学生校园。[74]

在叙永的大一生活

我清楚而愉快地记得……石桥横过小河……对面狭窄的街道……河边，岩岸，还有庙宇，从其中一座庙可以跳望到那条小河。在那里，我度过了一个冬天，寒风呼啸，刮过没有玻璃的窗户和地板的裂缝。——许芥昱

叙永位于繁荣的农业区的中心地带。山坡四周都是梯田，在海拔更高的果园里，有汁多味甘的橘子。窄窄的永宁河把这个小城一分为二，西边是居民区，东边是商业区，两座桥把两岸连接起来。联大一年级学生校舍就设在两岸几个旧庙里。

办公处和大部分教室安置在东区纪念孔子的文庙。这个庙的大殿以前是学者集会之地，挂满了祭献圣人的牌匾。那些牌匾被集中放到一个角落，这样会所就被改造成可容纳一百多名学生的教室。院子里有个无线电台，手摇发电，这样便可以与昆明方面联络。[75]

学生初来乍到，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只能睡在稻草上。后来，他们才有简陋的双层床。大部分男生的宿舍设在春秋祠，这是小城西边的一栋二层木造寺庙。女生宿舍在帝主宫。法商学院学生住在楼上；文学院、师范学院和先修科的则住在厢房。理学院的住在中厅，从他们的床铺向上看，可以看到庙里的主神——战神关公——巨大的雕像，关公身旁还有两个侍卫，其中之一是挥舞大刀的雄伟的黑面神。后进的大房间是助教的宿舍。再后面是个庭院，从一扇小门穿过，就是县政府训练场，那里成为体育课和军训用地。工学院学生住在南华宫东厢房。南华宫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老庙，供奉当地神祇。它有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殿，用作讲授概论性基础课的教室，如中国通史、经济学、生物学、逻辑学，还用作军训场地。

由于叙永不通电，每个学生领有一盏桐油灯，有一到四根灯芯，散发出腐臭的烟味，光线却极微弱。夜里用功的学生会咳出浓痰。近视的学生往往靠灯太近，未曾注意自己与书本的距离，有时会「火烧眉毛」。有一次，每个人都为应付考试而埋头学习，突然一声尖叫打破了静寂，原来刚才有一个小伙子的眉毛被烧掉了。[76]在远处，这几百盏闪烁的油灯使小镇看上去如同一座军营。半夜熄灭油灯后，疲倦的学生却辗转难眠，因为夜里昆虫横行霸道——肥胖且闪着黄光的小昆虫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到处乱窜。

音乐爱好者打破了旧庙的宁静。在帝主宫，一个早早起床拉小提琴的学生被戏称为「公鸡杀手」。在南华宫，有个小伙子唱国剧。他的特点是定调的时间极长，以至于室友的笑声都被嘘声取代了。另一个小伙子则一天到晚都在唱〈我的太阳〉。

伙食量少得可怜。依靠每个月二十多块钱的政府贷金，节俭的学生勉强还能维持生活。午饭和晚饭供应米饭和四个菜——其中三个是当季上市的青菜，第四个是点缀少许肉片的青菜。每月有一天附加一盘肉。在这些饭菜之外，学生可以到街头小摊上买些烤红薯。吃饭的地方非常简陋。每天三餐时，男青年便带着碗（或漱口杯）和筷子，成群结队由春秋祠和南华宫陆陆续续到达城隍庙地下室。他们在一幅巨大的图画下用餐，这幅画描绘的是十八层地狱的恐怖世界。那里一张桌椅都没有，学生只好蹲着围成圈子，地板就成了餐桌。学生伙食委员会负责采购、收费之外，还监管厨房，这是一项很麻烦的任务，因为总是有厨师顺手牵羊。

因为建立叙永校区的决议很晚才下达，以至于按时到达这个偏僻的地方都颇费周折。第一学期从 1941 年 1 月 6 日到 4 月 4 日，期间由于过年还有短暂的假期；第二学期从 4 月 15 日到 7 月 21 日。两学期都很短。有些教授开学初露面了，随后其它人陆陆续续开始上课。由于学时缩短，第一学年的功课比平常紧张了许多。所有学生都报名参加英语班和国文班。理工科学生被安排在下午做试验。时间表排得

很紧，加上教室分散，所以从一堂课赶往另一堂课都有困难。

叙永的天气让人难以适应。一、二月很冷，庙里有穿堂风刮过，三月便开始有酷暑的味道。那年持续干旱，中午的温度超过华氏 120 度。在严寒的早晨，学生到永宁河洗脸；但很快他们便成群结队去游泳，有些人甚至就睡在县政府大楼前训练场凉爽的草坪上，或河岸边。上课时间改为：上午 6：30 到 10：30，从中午一直休息到下午 3：00，之后恢复上课。

当地百姓在屋顶泼水以求得些许凉意。为制止干旱，县长下令暂停捕杀禽兽，镇上有些人扮成稻草龙穿过街巷，其它人就向这支队伍一桶一桶地泼河水。这些措施都无法使大自然的力量消歇，当地人就说是联大女生冒犯了龙王，因为她们在河里洗澡，还把内裤晾在庙里。这时，有一位菲律宾华裔女生因为天气炎热中暑而死，但根据某些记载，她死于治疗未遂，校医大量注射针剂使其病情急转直下。一当晚下雨了。

这起死亡事件突显出当地的医疗水平甚至比昆明还不如。接触性感染病毒四处横行，许多学生因为喝了受污染的河水而患上消化病。校医是个胖子，心地善良，外号「蒙古大夫」(相当于汉语中的「庸医」)。他用水银红药水治外伤，用阿斯匹林治内伤。最后来了一名德国犹太避难的医生，但只缓解了一点点医疗危机。

在叙永，与疾病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普遍。到 1940 年，战时通货膨胀开始在中国所有未沦陷区产生后果，而叙永这座小城由于七百多名联大人的涌入，物价随之猛升。政府的贷金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那些家在四川和云南的人不能获得政府贷金，但有些人有足够的家庭资助，吃饱不成问题，还有新衣服穿，还可以和朋友一起吃喝。另一方面，师范学院有个姓张的大一学生，由于没有钱治疗，结膜炎已处于晚期。他只有一套衣服，冬天就在衣服里垫上卫生纸来御寒。

然而，即便最富有的学生到了叙永也几乎没有地方花闲钱。或

许有敲锣的地保走街串巷，通知邻里开会。壁报可以调剂小镇枯燥无味的生活。其中有五种是学生办的，以时事新闻、评论和文学作品为主。[77]还可以到茶馆听川剧，虽然对外地人而言，这种表演就是一阵阵嘈杂的锣鼓声，只不过比地保的锣敲得更响而已。

川剧嘈杂的音调会干扰学生学习，但他们可以欣赏茶博士更简单的艺术表演——从两英尺高或更高处给客人倒茶，一滴茶水也不会溅出来，也不会溢出来。不过，在茶馆老板看来，学生的光顾有利也有弊，就像一位访问者所记录的：

在那座小城，最大的茶馆的老板把门面装饰一新，并安上硕大明亮的电灯。每晚，学生都涌向这个灯火通明的茶馆。他们一般只要一杯茶，就可以借光学习。对于中国的未来，这个场景充满了希望，但对于茶馆老板，这肯定不划算。他决定恢复使用早先搁置的那光线微弱的油灯，把明亮的电灯卖给校方。这个老板是叙永少数几个不给学生送猪肉、糕点、糖果等礼品庆祝农历新年的商人之一，这些东西是用来对学生在小区做的社会救济工作聊表谢意的。

相反，当地颇有声望的一位北大毕业生——赵先生慷慨解囊，使每个联大人都感受到新年的快乐。赵先生在欢迎辞中说，学者的到来可以提高叙永的文化水平，并强调所有联大人在这三天里都有猪排吃有米酒喝，这让他很感欣慰。

假日过后，学生试图改变没完没了的刻板的学习生活，也想离开乏味的小镇到外面走走，于是便去叙永周边乡村寻找自然美景。城墙东边就有一座小山，山顶有个茶馆，是周末炎热的午后临风赏景的好去处。从城东过河更远的地方是红崖，那里受到地质调查旅游者的青睐。许芥昱记得在悬崖腰际的寺庙里过夜的奇妙景观：

岩石上刻着一个巨大的印记：「天半红云。」那个地方如此壮丽，那个夜晚如此荒凉。我们（我和几个同学）想，我们看到了两只老虎的眼睛，牠们在月光下跨过峡谷；我们肯定听到了吼声，那必定是某

种庞大的动物发出来的……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浪漫的地方。[79]

说到浪漫，叙永也是个不错的地方。学生喜欢闲聊看见谁和谁在一起了。有一首关于和尚和尼姑在观音庙相爱的流行歌曲，就改编自一个许姓男子和沈姓女子在叙永帝主宫相遇的故事。年轻恋人总是把夜晚的空袭警报当作他们去僻静乡间的好机会，常常不管空袭警报已解除。

叙永虽然十分偏僻，但并不能完全与战时中国剧烈的变迁相隔绝。开学大约一个月后，日军向云南边界推进，威胁昆明的安全，并最终会威胁到叙永的安全。访问大一学生校区时，梅贻琦对师生说，「有的人说这里不安全。我想要求安全，那大概也许只好搬到喜玛拉雅山上去，可是我们还不敢一定这样说。」[80]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这个认识有助于说服联大校方，在 1940-1941 学年结束后停办叙永分校。[81]实际上，战争对叙永而言，最近距离的影响发生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连续四天四夜，日军空袭重庆，使整个四川省都处于戒备状态。当地市场的粮食和蔬菜供应很快就跟不上了，还没有迁往昆明的学生只得去农村寻找维持生存的食物。

政治也对叙永群体产生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当然，有些学生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成员，尽管他们大部分人都隐瞒了自己的身分。共产党有一个很小的联大一叙永分支，这是由曾在昆明待过一年的先修班学生，也就是现在的大一学生，和还没有与同志建立组织关系的新来的共产党员建立的。它也有一个周边组织——社会科学考察队。左右两翼争相把持学生会选举。1941 年 1 月发生的新四军事件，在叙永直到 3 月份才出现对该事件的辩论，共产党叙永分支最先在过期的《新华日报》上看到对这一事件的报导。宣传这些材料的壁报，却被三青团成员撕毁，但此后共产党对该事件的解释已众人皆知。随着政治局势升温，当地部队介入纷争，包围了帝主宫女生宿舍，企图搜查信息来源。这个部队出乎意料地遭到了坚决的抵抗，最后只得撤退。局势更加紧张。共产党派信使去昆明和重庆寻求指示，这个举动被认

为是派党员进驻联大本部：疏散、隐藏。中共分支和社会科学考察队随即停止活动。[82]

于是，一些左翼学生改变工作方法，从政治行动转向思想观念研究和文学活动，另一些人则突然消失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但普遍相信其目的地是陕北共产党的藏身之处。

教授论坛

在昆明，就像在叙永一样，新四军事件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不管条件多么艰苦，离开亲人、家乡和熟悉的环境，联大群体下定决心要维持中国的高等教育弦歌不辍，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在团结坚毅的精神感召下，联大人开始在云南的生活。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小党派都齐心协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由于每个人都认为不懈追求知识、全力支持抗战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对其他事情也就很容易采取容忍的态度。在思想自由百家争鸣方面，此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像 1938 到 1940 年那样引人瞩目。

从 1938 年春天开始，随着大批北平知名学者的到来，昆明的思想地图为之一变。联大教授从不满足于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特定的杂志上，他们创办一系列严肃的刊物，吸引知识圈外的人士——包括他们自己的学生和同事。一时间，在偏远的云南省会，人们通过报摊上的刊物，借助于曾经留学哈佛、牛津和巴黎的人的观察，瞭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抗日战争集中并增强了联大教师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也使昆明市民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当地市场的米价，还依赖于伦敦、莫斯科和东京的事态。

在战争初期的刊物中，最突出的要数钱端升的《今日评论》，它使新一代学者领袖群伦，他们比战前活跃在北平著名的《独立评论》上的胡适及其伙伴年轻一二十岁。其编委成员包括钱端升在政治系的年轻同事王赣愚。这个杂志致力于公开传播不同观点，成为战争前期（1939 年 1 月-1941 年 4 月）联大知识分子的论坛，讨论他们关心的

问题。

放眼世界

《今日评论》的中心论题是抗日，对于这个问题，社论曾一度时而忧心如焚，时而满怀希望。到《今日评论》创刊时（1939 年 1 月 1 日），有远见的观察家明白，中国必定准备打一场消耗战。其主要危险在于，汪精卫之流会使日本相信，中国愿意投降，而这无疑是个假象。

向侵略者让步是绝不可能的。等到敌人筋疲力尽，意识到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继续侵略只会招来列强支持中国抗战，和平才会降临。[83]但是，谁会成为中国的盟友呢？虽然钱端升及其大多数同事曾在美国和英国留学，但他们并没把这两个国家视作潜在的朋友。在签订《慕尼黑协议》和希特勒－斯大林协约（1939 年 8 月）的日子里，苏联看起来很有可能成为盟国。是苏联，而不是西方民主国家，向中国派遣飞行员，运送战争物资。苏联领导人认为，一个强大的、友好的中国对维持东方的均势至关重要。此外，日本的军国主义统治者强烈反对共产党，预计会和它所憎恶的布尔什维克巨人在满洲国北部发生最后的决战。

在这种局势下，尽管《今日评论》的编辑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还是对莫斯科寄予厚望。到 1940 年 3 月，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仍被认为是中国可能效仿的模式，至少在基础教育上仍然如此。[84]但作为中国模仿的对象和抗日同盟，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令《今日评论》作者揪心的是，东京和莫斯科渴望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的趋势日益明显。1939 年 9 月 17 日，苏联派遣部队进驻波兰，有编辑认为，苏联正在把注意力转向欧洲。苏联与芬兰于 1940 年 3 月 12 日签订和平协约，希望苏联在亚洲扮演更伟大的角色就成了救命稻草。[85]

亲苏的潮流从未在英美派主导的联大教师心中扎根，其中一些人

很高兴藉此机会揭露苏联的阴暗面。法律系教授燕树棠断言，斯大林与希特勒的结盟是沙皇帝国传统的延续，并敦促其同事放弃依赖苏联成为盟国的幻想。[86]潘光旦对莱盎斯（Eugene Lyon）的《出勤在乌托邦中》（*Assignment in Utopia*）〔这里的人名、书名采用了潘光旦先生的翻译。〕的观点持同情态度，在评论中，他批判性地揭露了苏联社会更丑恶的一面。[87]

要是日本越过东北亚令人不安的停火线，苏联都不愿意立即出兵保护中国，那么，对于近来在自家后院屈服于希勒特的西方民主国家，还能抱有多大的希望呢？再一次，人们开始痴心妄想。伦敦的外交报告对中国处境表示同情，看上去西方大国有可能对日本实行制裁。[88]随着欧洲形势恶化，英法拒绝解救西班牙共和国，意大利无耻地吞并了阿尔巴尼亚，明显趋于绥靖政策就成为对民主大国外交政策悲观的预言。

显然，不管有没有同盟，中国都得继续抗战，持久战意味着开始延缓国土沦陷的速度。对于前线的中央政府军和共产党游击队，联大的作家们不再放大最渺茫的一丝希望。[89]战场上的消息已不能鼓舞最乐观自信的人。1939 年 1 月初，在陈雪屏看来，为了说服美国的孤立主义者，东京并不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必须迅速对日本予以重击；两周过后，他又说，为了长期抗战，中国可以有小的失利和部分领土损失。[90]钱端升对此表示赞同，并警告中国不可指望日本国内突然崩溃，或有大规模外援，但为了长期作战，必须巩固政治基础。[91]

不管作为哪派的自由主义者，联大教授都同情西方民主国家，谴责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无限膨胀的独裁专制。唯有联大历史学家邵循恪在一篇文章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写于希特勒－斯大林协约之前）。邵循恪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欧洲国界争端，但他极力告诫读者，应该从政治边界和民族分布版图不一致的角度看待问题。[92]邵循恪同情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目标，而不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的行径并未得到其政治体制的认可。还有，他的观点只是支持西方民主国家大合唱

中单独的音符。因希特勒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今日评论》为此欣喜若狂，于 1939 年 9 月 10 日发表了〈纳粹德国的孤立〉的社论。[93]

直到 1940 年春，英法疲于应付闪电战之时，昆明的刊物上才出现怀疑西方民主国家生存能力的声音。这股新浪潮的顶峰是刚创办的《战国策》杂志，它由云南大学林同济教授主编，得到了两位联大学者——历史学家雷海宗和尼采研究专家陈铨——的大力支持。「战国策派」建议用强硬的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取代对英法派的幻想。《战国策》的作者谈论大政治（Grossepolitik）、力的政治（Realpolitik）和英雄崇拜。在他们极力强调的科学中立原则的掩盖下，不难发现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赞赏。1940 年 6 月，纳粹军队进驻巴黎，自由主义者罗隆基所能做的就是提醒读者：法国的陷落既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也不表明独裁比民主更优越。[94]

随着法国的沦陷，英国为生存而战，联大的自由主义者最后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他们当中有太多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过。[95]然而，美国事务最老练的观察者钱端升觉察到，在选举年，华盛顿出现强力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罗斯福连任也没有让他感到有理由欣喜。[96]他说，除非遭到侵略，或者中国和英国将处于失败的境地，美国才有可能参战；无论如何，在 1944 年之前，美国的军事力量不会先发制人。他总结道，美国或许是可信任的朋友，但仅仅依赖它将是愚蠢之举。[97]

思考中国

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大家的注意力从希望外国援助或战场出现奇迹转向国内政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铸造最强大的抗日堡垒，并能为将来的安全提供些许保障？

在《今日评论》发刊辞中，钱端升向政府发出告诫，不能采取强硬措施谋求国家统一。[98]钱端升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

大会上说，只有提高政治和经济效率，减少审查，消除宗派主义，才能更有效地抗战。[99]他赞成傅斯年提出的「政治制度化」——以普遍原则为基础的韦伯式的官僚秩序的创立——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中国所需要的政权既不是具有超凡魅力的独裁统治，也不是根据特定派系组织的政府。高效率的政府意味着削减不必要的会议、政治集训和装模作样的报告。[100]

钱端升并没有把政治制度化等同于西式民主，但随着政治学系的同事王赣愚和张佛泉加入讨论，话语范围扩展到政府中的法治和民众参与。[101]张佛泉认为，应该从发达城市开始实行自治，这是对官方的孙中山理论的挑战，因为后者认为民主应该从县一级开始实施。然而，在政治系这个具有改革思想的国民党成员的中心，这些理论恰好都在执政党容忍的范围之内。

1939 年 9 月，国民参政会公开支持结束一党训政，开始实行宪政，这为政治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焦点。[102]国民党试图呼吁召开制宪大会，抢在争论之前先发制人。这个策略意在分化改革派。在改革者当中，有一派希望修订 1936 年宪法草案，该草案希望行政权力合法化；另一派则把整个宪法问题看作次要事件，是用来转移注意力的。钱端升属于后者，他后来写道：

小党派意识到，它们没有什么东西会遭受损失，自然不会反对（国民党的）新建议（实行宪法草案）。但国民党员和那些党外人士，急于看到政权稳定，即便进步缓慢也是走向真正的宪政，他们很清楚，但又不愿意承认，这个策略性的举动将导致更加怀疑宪政主义。[103]

从张德昌、王赣愚和罗隆基的文章明显可以看出，改革派没能达成一致。罗隆基忠于他的自由主义原则，他所寻求的东西比钱端升自上而下的改革理念更难以实现。他告诫钱端升，尝试通过中央集权来实现民主，这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罗隆基承认，国民党是领导中国度过当前危机的合适的政党，蒋介石也是合适的领导人。「不过，」他补充道：「国民党宜于当权，与国民党宜乎为中国独存仅存之一党，

实应分别而论。」尽管如此，他还是反对共产主义合法化，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容忍一个「畜养武力、培养革命力量」的政党。[104]

罗隆基召集会议修订宪法草案，试图强行限制行政权。这个举动触怒了蒋介石。1940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期限延迟召开国民大会。[105] 可是，这时的《今日评论》作者已经回到官僚效率的问题上，并更加怀疑立宪能否真正解决问题。[106] 连罗隆基也退出对民主和立宪的探讨，转而求助于传统的江湖膏药，认为政府应该「选贤与能」以减轻独裁的罪孽。[107]

立宪的希望渺茫，而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胜，使恐惧和怀疑蔓延到自由主义阵营，也使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拥护者受到鼓舞，其思想与态度强硬的战国策派相一致。1940 年春，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开始引起《今日评论》的共鸣。在 3 月 31 日题为〈加强团结〉的时评中，王赣愚指出，在当前国家危急时刻，不应要求新闻报导的高度准确性，这暗示为了国家利益，真理应该向宣传让步。[108] 5 月 5 日，王赣愚呼吁青年一代统一口径，因为国家再已承受不起党派不同的意见了。[109] 仅仅五个星期，《今日评论》就开始质疑自由主义的两大堡垒——坚决追求真理，信奉意识形态多元化。自由主义价值的信任危机扩展到整个自由中国的知识界。1940 年 8 月 29 日，陈源在四川乐山给老朋友胡适（时任驻美大使）写信，对局势表示担忧：

这四个月来，国际局面变化多端，是半年前所没有梦想到的。国内向有一部分人士倾向德国，现在更为明显。少年政治学者如何永信、林同济之流，在昆明办有一个刊物，名《战国策》，提倡「力的政治」，崇拜德国式的思想。大部分人的信念，都很动摇。……可是国内政治学者，除端升、努生数人外，恐同我观点者为数已不多。[110]

用戈德利（Michael R. Godley）更严谨的话说，由林同济和雷海宗创办的《战国策》是「为了使国人获知欧洲发生的大事，迫切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不断灌输……对惨无人道的现实政治的批判认识。」[111] 在 1940 年 5 月号的《战国策》上，联大德语教授陈铨在

〈论英雄崇拜〉中强烈谴责打倒权威、鼓吹无政府思想、消解文化和政治英雄需求的五四遗产。陈铨的同事沈从文马上响应，他说只有科学与民主，而非英雄崇拜，才能救中国。

联大的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及其它一些人很赞赏陈铨的观点，但陈铨并没有与他们联合，[112] 反而站在厚颜无耻的法西斯立场上。9 月 22 日，他在《今日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新文学〉，在「理想的人是战士，不是君子」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十一点信条。[113] 陈的观点并非没有异议。在带有嘲讽意味的驳斥中，一个名叫欧阳采薇的人建议陈铨加上第十二点信条——理想的婚姻不是以爱情为基础，而是以优生学为基础——这样便可以百分百地遵从希特勒的训导。[114]

与自由的《今日评论》发表陈氏煽动性的文章一样，《战国策》也刊登中间偏左的费孝通、曾昭抡和沈从文等教授的文章，体现了昆明学术群体开放的思想。[115] 尽管如此，战国策派的出现及他们对战争、权力和英雄的迷恋，表明在联大和云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动向。在欧洲民主国家明显失败以后，赞成中国一党专政的思想再次回潮，国共两党之间的敌意也日益增长，连《今日评论》的撰稿人也急剧右倾。这一论调是由钱端升的〈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奠定的。[116] 钱端升在抵制英美民主、传统官僚制度和现代极权主义的同时，他主张政府要依靠「现实」——蒋介石是至高无上的，要与党和领袖保持完全一致。与孙中山的民治观念相一致，钱端升希望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建议进言：「这种类型的政府在形式上接近集权政府，但精神上决不苟同，因为领导这个政府的蒋先生是忠于人民政府的原则的。」在这个引人注目的论断中，钱端升深陷于中国传统之中，他认为绝对的权力放在一个有正确道德原则的人的手上可能是安全的。更引人注目的是，钱端升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安排将引导中国走向民主。

一周以后，在第二篇文章〈一党与多党〉中，钱端升仍然认为，多党制在当代中国是行不通的，相反他主张实行开明的一党专政。「今代的国家必须握有大权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平等，我以为极权主义

不全是恶的。」[117] 他明确承认，国民党已经辜负了它自己主张的三民主义，为此他声称「不要和普遍原则不协调」，要是国民党继续为谋求自身利益而追逐权力，那它会被其它政党（暗指共产党）代替。钱端升一直扮演忠臣的角色，并祈求当权者在失去「天命」之前进行改革。

到 1941 年春，钱端升已不再介入集权理论，但他仍试图在孙中山主义的正统观念中寻找解决方法。他写道，问题在于，孙中山的民治理念已经被两个方面的极端主义者所误解：一方认同专制主义，另一方推崇英美民主。[118] 对一种新的中间偏右的中间道路的追寻，也使钱端升的年轻同事王赣愚对国际事务采取平行两分的办法。王赣愚写道，欧洲战争是两个极端的矛盾冲突：一方是只依赖理性的民主国家，另一方是依赖激增的军事力量的轴心国家。[119]

欧洲和中国的事件都使政治话语确凿无疑地偏向右翼。中国看起来已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问题变成国民党是否将建立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法西斯政权。为防止出现这种前景，《今日评论》的一些作者放弃了他们毫无作为的自由民主思想，转而求助于中国传统。罗隆基认为，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它与中国古代的「民意」相冲突。[120]

随着最新一轮立宪的失败，「政治制度化」理论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同钱端升及《今日评论》其它作者一样，除了对一党独裁的实践者进行道德说教，罗隆基拿不出更有效的方法。用中国的古话说，这是「对牛弹琴」。罗隆基很快发现，这头牛的犄角还很锋利。1941 年，在重庆方面的压力下，联大高层解聘了罗隆基。

精英主义 V.S.民粹主义

钱端升和《今日评论》其它联大撰稿人经常就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问题发表评论（见第五章）。钱端升坚信，重庆与昆明之间的许多分歧，并不是源于在特定手段上有太多不同的意见，而在于联大在中

国高等教育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他看来，为提高教育水平，确保政治正统及课程改革，教育部错误地把联大和其它几十所国立大学及高等教育机构混在一起，而联大其实几乎自成一体。中国有两所最杰出的大学，联大是其中之一，另一所是重庆的中央大学。要一所已经具有模范水平的大学「提高水平」，这简直是个笑话。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途径是，政府要认识到中国只有两三所名副其实的「大学」。而所有剩下的大学都应该被淘汰或改为专科院校。[121] 根据他的看法，除非高等教育改头换面，否则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联大与政府因政策问题产生的没完没了的麻烦。但他的建议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的，并且没有机会使陈立夫等任何负责人接受这个意见。钱端升对此泰然处之，并一再表明他的观点。[122] 在不同且不平等的高等教育机构强行统一标准，这一官僚举措引发的冲突无法得到解决。

钱端升的经济系同事丁佶更具体地指出了昆明的困境。他认为，重庆当局无视昆明极度的通货膨胀、物价水平比重庆高一倍的经济状况，对联大采取与其它高校一样的财政政策。他说，这种政策貌似公平，其实是对昆明学术群体的公开歧视。不过，他没有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央政府，因为有些富裕的学生也向有限的政府资助提出申请，使得为数不多的资金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分配问题。因此，他建议接受公共救助的学生承担公路、宿舍和防空设施的建设任务。这些计划可以用来代替传统的体育课，还能使学生保持因接受救济而失去的自尊。[123] 丁佶的建议后来被潘光旦进一步发展，他建议大学都迁移到农村，全天边劳动边学习，以消除中国学生与农民群众之间的隔阂。[124]

这些民粹派的方法并不比钱端升的精英理论更容易被接受，联大群体对此几乎没有丝毫兴趣；有文化的城市教授并不愿意置身于农村的文盲世界。对中国宝贵的受过教育的少数群体免除兵役这一设想，很少有人提出挑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他的声音。1939 年，历史学家雷海宗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君子与伪君子〉，直面现实。他在文中谴责了自春秋时代近二千五百年以来文武精英的分化，坚持认为只有摧毁罪恶的传统，当代

知识分子才能褪去自身的虚伪。[125]

丁佶、雷海宗和潘光旦一直逆潮流而动。《今日评论》的学术批评基本上没有批判知识分子，而把矛头指向以权谋私、生活腐化、蔑视知识分子的官僚。（行政院曾建议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参军入伍，而这暗示官员应该派自己的儿子参加抗战以树立榜样。）[126] 他们指出，重庆有权有钱的高官显然要比昆明一贫如洗的书生虚伪势利得多；这不乏例证，如高官要员在奢华的新年宴会上玩弄愚蠢的花招。《今日评论》的编辑发现，这种举动在国难时期是不得人心的。[127]

西化 V.S.文化保守主义

人们对贪官污吏和无私奉献的学者之间的差异很敏感，这种敏感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但新文化运动以来，它更是成为一个中心原则，而这场运动也突显出西化与文化保守之间的对立。自 20 世纪初以来，这个问题就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直到今天仍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日评论》的作者中，只有陈序经一人捍卫曾一度流行的「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没有人主张全盘否定西方。不过，辩论是在深刻理解近代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展开的。北京新文化时期是思潮澎湃的时代，昆明的 40 年代则是温和的学术时期。诚然，留学哥伦比亚的新儒家冯友兰带着讥刺的语调指出：崇洋媚外的新风尚已取代了厚古薄今的旧观念。但冯氏发现，他的民族自豪感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古代的辉煌，不如说是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就，他的证据来自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屈服于希特勒相比，中国不顾一切抵抗日本侵略，因此冯友兰有充足的理由保持民族自尊。[128]

与此同时，冯友兰支持把知识分子当作学术专家的西方模式，却不赞成把知识分子树立成道德楷模的传统观念。任教于西南联大的这个冯友兰与被广泛讽刺描绘为新儒家思想圣人的那个人几乎判若两人。冯友兰的例子突显出，经常被笼统标榜为保守主义的思想存在着微妙的差别。[129]

要理解联大的保守主义者，我们必须把传统的保守主义（忠于中国文化遗产）与现代的保守主义（其思想基础是新古典主义和浪漫的民族主义之类）区别开来。冯友兰的哲学系同事、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黑格尔专家贺麟就是一位现代保守主义者。从他的论文〈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可以看出，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者离传统思想有多远。为批判「体用」观的现代化理论，即以传统价值观为基础借鉴外来物质文化，贺麟引用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伦理与卡尔文主义的兴起有关。贺麟虽然发现韦伯的著作对此问题处理得过于简单，但他接受了它的基本观点：近代宗教对近代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写道，中国拥有庞大的基督教商人群体，就是一个近在咫尺的例子。贺麟的现代化模式，包括现代世界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很少考虑保护中国历史的完好无损。[130]

由于顽固坚持「全盘西化」是合理的、必要的、无可避免的，陈序经在学者圈中辩才无碍，名声在外。然而，在这种形势下，为使他绝对的全盘西化立场被接受，陈序经言辞极为含糊，批评者理直气壮地认为他的建议缺乏知识分子的严谨缜密。他解释，全盘西化并不是「被动的西化，奴隶式的模仿」，而是「自觉的吸引、采用、融化、批评与创造的精神」。陈序经还指责批评他的人思想混乱。在思想深处，冯友兰和贺麟都明确反对旧的「体用论」和精神－物质二分法，陈序经发现他们的头脑里存在同样陈腐的思想幽灵。他说，那些企图保护中国传统精髓的人，并没有建立从西方引进什么和保护什么的确切标准。[131]

在西化的概念中，陈氏忽视了选择的必要性，没有考虑到西方文化中矛盾的成分。在近代科学中运用全盘西化是可能的；但是，在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选择方面，则没有标准。资本主义民主制、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全盘西化论者想的是哪一种西方？伍启元坚决认为，「我们唯一的生路，就是就现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尽量吸收现代的科学和科学所产生的文化。」[132]

正如舒衡哲（Vera Schwarcz）所论，为促进战时爱国思想的发展，五四遗产的许多继承者向文化反传统主义妥协。[133]然而，在《今日评论》中关于中西方文化的讨论，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作者的结论——那往往是个平庸的总结——而是他们高超的论证水平。他们的目的不是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法，而是提高思想话语的水平。令人钦佩的是，他们成功了。

这里只探讨了出现在《今日评论》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大部分问题在粗略的概述中都省略了。在那里面，大家可以发现，费孝通在讨论农村问题，潘光旦运用他最擅长的优生学理论分析妇女的地位。还可以发现，作为倾向法西斯的战国策派思想的创造者，林同济对潘光旦关于妇女的活动场所在家庭的结论提出了反驳。撰稿人包括拒绝成为道德模范的自由主义者，及蔑视党的领袖的国民党员。作为一个公开的论坛，接纳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编者所厌恶的言论，《今日评论》是思想独立、自由表达、容忍异议的显著典范，而这些原则正是联大的精神基础。

十四 坚忍的岁月：1941 - 1943 年

1941 年初的新四军事件，几乎把战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拖向崩溃的边缘，随着美国的参战才告结束。国民党驱逐左派地下党，使得联大三年活跃的政治气氛告一段落；与此同时，随着陈纳德及其飞虎队的到来，驱逐了日机，并几乎消除了空袭的威胁。就在这一年，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不停地蚕食着联大得以集中精力追求学问的极其有限的保障。自此，这所大学进入长期自力更生的阶段。

新四军事件的影响

新四军事件后，联大的自由多元主义衰弱到极致。关于该事变准确的细节仍充满争议，这里不必讨论。毋庸置疑的是，1941 年 1 月 4 日，在皖南的中央军谴责共产党的新四军严重违抗命令，并袭击其总部。尽管官方的统一战线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但这次事变爆发后，团结只不过是个假像，用来掩饰这对有名无实的患难兄弟之间的仇恨，这种仇恨导致他们分裂。

读过共产党讲述新四军事件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新四军事件在昆明产生了令人慷慨激昂的效果，对于国民党突然袭击抗日的爱国者，知识分子群体义愤填膺，但事实并非如此。政府对这件事最初的报告抵达昆明后，联大教师认为相当可靠。几天之后，群社的活跃分子才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有一本题为《新四军事件真相》的小册子，以及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的题词，谴责了这起自相残杀的暴力事件。

事情闹大了。昆明高校教师就此展开了正反双方的辩论。一群本科生要求训导长查良钊允许在师范学院召开大会。同事觉得，在战争期间学生不应该讨论这种会造成分裂的事情，查良钊对此不以为然，便同意了学生的要求。[1]

在大会上，群社有几位成员声泪俱下，控诉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者，却把枪口对准爱国同胞。支持三青团的南针社社员发出反击，控告共产党不但在皖南公然藐视官方军事纪律，而且建立非法的盛气凌人的「边区」政府。[2] 根据台湾方面的说法，反共言论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南针社针锋相对的立场被认为很有道理，而群社感到无地自容，此后便自我限制转为地下活动。[3]

群社失势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这场辩论过后不久，活跃的激进分子传闻，他们将成为反共宿仇的牺牲品。到那时，龙云已准确无误地清除了在昆明隐密行动的国民党特务，为联大左派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庇护。然而，有些国民党要人极有权势，即便龙云也得屈服。康泽就是其中之一。他赶往昆明指导国民党工作。联大所有学生被召集到图书馆前，听康泽的反共演说，每个人还得签名作为参加会议的凭证。[4]

知名的左派并没有驻足观望。他们一大早就溜出寝室，前往昆明郊区事先安排好的避难地。第二天，他们便前往云南偏远地区的安全地带。疏散工作是如此隐密，以至于有个学生离开时仍戴着一位群社女生要他修的手表。[5]

随着群社有名的领袖远走高飞（少数人仍在地下活动），昆明的政治天平骤然右倾。这样，通过学生会选举、壁报和公开辩论发表意见的空间陡然缩小，国民党的支持者因此可以大做文章。哲学系学生殷福生和历史系学生李定一主编《民主思想》，所刊发的文章咄咄逼人，堪称拥护政府的典型。[6]

殷福生明确阐述了意识形态、政党和国家之间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理论。他声称，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每个成功的国家必有其「国魂」。俄国的国魂是共产主义，德国的国魂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些国家都已发展壮大。法国由于没有国魂而走向灭亡。如果中国想求得生存，就必须珍爱自己的国魂，即三民主义。共产党试图把苏联的国魂移植到中国，

在殷福生看来，这会使国家走向自杀之路。他斩钉截铁地说：「你说要抗战罢！民族主义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说要讲民治罢！民权主义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说要改善民生罢！已经有民生主义了！」唯一可行的答案是：除了国民党，其它所有党派「完全是多余的，或有害的」。殷福生的结论异常坚定：

中国其它党派，在建立民国运动史上，无半点功劳。……有什么资格与中国国民党争夺政权？……中国共产党，十余年来，……破坏国家的统一，阻碍国家底建设，祸国殃民，如是深重，然而失败后投诚，还借着「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等等烟幕，向中国国民党争夺政权，真是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

历史大潮汹涌而过，这些走中间道路的人却自鸣得意。李定一以中间派为攻击对象。联大到处都是这种人，他的笔杆子一个也不宽恕。这位爱国青年的论点有一个前提：国民党正领导国家与不共戴天之敌进行生死存亡之战。以新四军为代表的共产党蓄意违抗命令，并袭击战友。总而言之，国民党是中国的凝聚力，共产党则是不稳定因素。有了这些鲜明的对比，就不能优柔寡断，更别谈中立了。

殷福生、李定一都没有掩盖国民党所存在的贪赃枉法的事实。殷福生写道，贪官污吏不仅应该视为党的祸害，还是全中国人的敌人。

孔夫人及其「飞狗」

执政党在清扫自己的房间以前，腐败仍是个爆炸性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周后，独立的《大公报》引燃了导火线。随着日本进军香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逃离此地，该报发表社论对此深表痛恨。这家大名鼎鼎的日报称，有一架开往重庆的飞机载了某位高官的狗，而清华历史学家陈寅恪这样一流的学者却未能登机。

这一报导恰好与联大学生的思想倾向相吻合。一边是像他们的陈教授这样清贫的知识分子，忠心爱国但无权无势，被留在那里遭受日本领主的虐待；另一边却是富贵官僚占用宝贵的飞机座位，还带着他

们的狗——梳理整齐精心照养的「洋」狗，如冯友兰曾观察到的，这些狗比许多中国人吃得好。[7] 除了蒋介石的连襟、肥胖的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家人，还有谁敢这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孔祥熙曾宣称，要确保身体健康，其秘诀就是每天吃半磅猪肉——比联大学生一个月的食肉量还多！很快，有谣言称那条狗是孔的老婆宋蔼龄的。

那篇煽动性的社论发表八天后，《大公报》刊登了德高望重的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来信。他的私人银行被转为国有，部分原因就是孔祥熙玩弄手段。该信指出，经过仔细调查，根本就没有「飞狗」这件事。实际上，日本的空袭打断了重庆方面与香港机场的联系，受质疑的飞机还没有载满乘客就不得不起飞了。没有座位票，谁也进不了机场。唯一登机的「狗」是那个美国飞行员的，他习惯把像狗一样的宠物带进驾驶舱。张嘉璈的报告是辛苦调查的结果，随后得到美国作家格雷海姆・派克（Graham Peck）的支持。此外，对宋家颇为了解的项美丽（Emily Hahn）有更权威的证明。1974 年，项女士告诉我，宋蔼龄对所有毛茸茸的动物都非常讨厌，绝不可能容忍一条狗跟她待在同一个地方，更别提在同一架飞机上了。[8] 实际情况大致如此。

然而，表象比事实更重要。人们对孔夫人及其坐飞机的宠物的印象不会消失。在昆明，有个叫王无本的学生写了一篇有关该事件的详细而愤怒的报告，并把它贴在民主墙上。这篇猛烈抨击的文章名为〈喊!〉，很快就得到另一个壁报——《回应》的支持。[9] 群社停止活动以后，联大校园正从政治上的朦胧睡意中苏醒过来。

邹文靖是个大一学生，也是一名三青团成员。他相信腐败的官僚绝不可能领导中国战胜日本，于是他和两位同伴去找陈雪屏。虽是公认的谣言心理学权威，[10] 陈雪屏却从未怀疑过孔狗事件的准确性；他更关心事情的结果。孔祥熙是政府高官，又是蒋介石家族的内部成员，没有措施保护他是不可能的。此外，党内的孔宋派和陈雪屏所属的朱家骅派关系还不错。[11]

陈雪屏左右为难。他认识到已没有办法平息学生的愤怒。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化解矛盾。如果三青团无法领导，共产党就会趁机而入。而且，作为一位北大人，他深知联大继承了五四反贪官污吏的爱国传统。他虽然不能公然鼓吹一场反对领袖的裙带关系的运动，但还是悄悄地指示他所信赖的下级青年团领导示威游行。几个高年级学生敦促程涛（音）抓住机会大干一场，程是两名大一团员中的一个。[12]

然而，与此同时，事情已超出陈雪屏的控制。青年团包括邹文靖在内的大约二十名成员，已决定先发制人。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会上，他们公推邹文靖等三人起草宣言，诛讨「国贼孔祥熙」，并要求联大学生自治会鼓动学生舆论为政治活动创造条件。他们用毛笔大字书写宣言，并由二十六名学生签名，在学校大门口展出。

大一男生居住的昆华中学成为风暴的中心。1 月 6 日，刚刚吃过午饭，听说有个学生在寝室里挂起一张旧床单，在上面画了一幅漫画——孔祥熙钻在钱眼里。一些同学跑到那里，把床单挂到阳台上。这时，一群群人到清华办事处前会合，向大一学生宿舍进发，下午去上课的同学也加入进来，队伍立刻庞大起来。他们的情绪势必酿成危险的事件。程涛掌握着局势，冲上楼梯，走到阳台上，对众人讲话。他问，该怎么办？回答震耳欲聋：「游行！」挥舞着无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人流涌向新校舍，队伍越发壮大。他们前往昆明市中心，沿路经过其它学校，更多学生加入游行队伍。[13]

接到蒋梦麟即将发生游行的通知后，龙云立即召开高官和参谋会议。他本人反对示威游行。云南是表面上与外界保持直接联系的仅有的一个省，又是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的基地，不得不遵守法律维护秩序。对抗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然而，龙云很快发现，包括昆明市长裴存藩在内的几位官员，都同意陈雪屏的判断，示威游行已无法避免。作为麻烦的解决者，裴存藩和蒋梦麟一起，走在队列最前面，跟队伍保持一定的距离。[14]龙云别无选择，只得在总部架起机枪，队伍的领导者穿过这个令人生畏的障碍时，有几个惊心动魄的时刻。但他们继

续进城，大肆宣泄内心的愤懑，最终平静地解散。看起来，陈雪屏的拉拢策略起作用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尝到成功的甜头，青年团的学生领袖准备发起更大的运动。在昆明的部分大学和中学，学生开始罢课。蒋介石下令：运动是在分裂党组织，必须停止。示威游行三天后，联大召开师生大会。梅贻琦告诉他们，已经「够了」，继续运动将给学业带来不利的后果。蒋梦麟更是直截了当：「你们再闹下去，学校就要关门了！」昆明警备司令宋希濂发出警告，再次发生骚乱会干扰教学，威胁社会稳定，不利于抗战。按照惯例，陈雪屏在会后对青年团严加管制。

要恢复昆明的秩序，并维护自己在重庆的声誉，陈雪屏对此都没有信心。为使运动平息，需要蒋介石强有力的部下来访。于是，康泽飞到昆明，告诉青年团干部蒋大发雷霆。在该市三青团团会上，他告诫团员，抗日期间，他们已承受不起不团结的代价。[15] 为表示言出必行，他保证不再向青年团提供教室和油印机。[16]

三青团的羽翼被绑缚住了，它只得重新充任看护人，垄断学生会职位，举办学生服务中心。共产党及其盟友也许已能够充分利用右翼的惰性，尤其是示威游行之后，大一学生宿舍代表开会，中共地下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新四军事件，大队人马撤退后，联大的中共党员还没有重建组织关系，只凭他们单打独斗还难以采取通行的策略。其中两人确实尽力策划了马千禾（马识途）的选举，马是「倒孔」委员会一年级学生宿舍联系人，他们准确地判断出他是党员。因为左派既无力控制又不能完全了解委员会的性质，马千禾竭尽所能使它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有人忠告他；事实上，委员会在青年团高年级学生的控制下，由一个更年长的人带领，他可能是个职业学生，与国民党军事情报人员有联系。）[17] 经过冗长的辩论，大一学生建立了独立的组织——「倒孔」后援会。「倒孔」委员会解散时，后援会也停止了活动。[18] 没有国民党或共产党富有成效的带领，倒孔运动被证

明是昙花一现。

师生情状

联大学生的行动主义至少一时难以再次复燃。新四军事件以来，三青团和群社一度热火朝天的辩论渐渐隐入记忆，联大学生或埋头读书，或泡茶馆、打桥牌、跳舞打发时间。学生自治会选举时，所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保住职位，因此变得死气沉沉。在初期普遍有过的激动和兴奋都已难觅踪迹[19] 1941 年 8 月，经过半年躲躲藏藏的青年积极分子林元回到联大，发现校园「荒凉、寂寞」。抗日歌不唱了，读书会、时事报告会、辩论会没有了，壁报「转眼间不见了」。[20]

对于那些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情况并不见得糟糕。艰苦是冒险的题中应有之义，集中精力下定决心面对它就是了。在战争中期，1937 年以来过惯了漂泊生活的学生已不觉得昆明的条件特别艰苦。不管是专心学习，还是兼职、泡茶馆、打桥牌、参加舞会，青年学生的适应力使他们能够应对时局的变化。学习和友谊的欢乐，爱情的创伤，都成了当时生活的佐料和意义。

他们的老师却不这么看。离开中国的文化首都，不再享有优渥的生活，家人不得团聚，被迫用通货膨胀损耗过的收入养家糊口，这些教师觉得，战时在云南的生活不是浪漫的冒险，而是令人沮丧的煎熬。1941 年 7 月，钱端升埋怨道：「这里的大学生活极其不尽如人意。我不知道西南联大是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想它还是。要是这样，那么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很差。三所学校不能同一条心……无论什么事都是打水漂。没有人有积极性。」[21]

到 1943 年，这种抱怨已变成深刻的心理问题。当时在华盛顿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是前北大文学院院长，蒋梦麟校长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

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

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22]

蒋梦麟的沮丧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哲学家汤用彤在 1943 年正月 19 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为日常安全担忧，被经济问题困扰，学者成果减少。汤用彤说：「北大有名之『自由研究』渐趋不振，同人精神无所寄托。」[23] 稍后，北大语言学家罗常培描绘了一幅更加惨淡的画面：

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绝对的同行……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我渐渐失去了学术重心，专以文科而论，如锡予、如觉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则限于经费，一则限于领导者的精力，处处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气。[24]

通货膨胀逐渐消耗了这些受薪中产阶级的精力。1943 年 5 月，访问昆明时，费正清发现营养不良的「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事都不想做」。他的老朋友萧蘧以前精力充沛、身体健壮，现在穿得像个「传统的流浪汉——破烂的帽子，满是补丁的衣裳，一条小领带，好多地方磨得发光，洗得发白，就像迷彩服……逛市场，佣人不在时就在家里帮忙，在学校之间步行来回，消耗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费正清目睹了联大教授与 CC 系控制的重庆政府之间的斗争——「政府想看看他们能撑多久，它希望他们会相继死去，分崩离析，不用操心中国思想界的境况，然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返回校园的学生」。[25]

联大教师与生存相抗争仍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费正清写道：「（钱）端升把大衣卖掉，有一天在街上看到别人穿着自己的大衣。」[26] 杰出的哲学家冯友兰的妻子冯叔明〔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字叔明。〕做芝麻烧饼卖给学生。梅贻琦的夫人用她少女时代的名字作自我介绍，

把她在家里做的点心叫做「定胜糕」，卖给当地老板。在这么拮据的条件下，联大校长的妻子尽其所能维持体面的生活。[27]

经济补助

1937 年以前，中国大学生主要是富家子弟，几乎不需要奖学金。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学生最大的忧虑就是如何维持生计。教育部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在保持大学开放的同时，它决定给予学生经济补助。

从 1938-1939 学年开始，教育部每月发给学生四到十元的贷金，还有学杂费。[28]这个计划是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主意。他正在应对政治和道德的当务之急。当时的一位观察者认为这种补助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举措之一」，并认识到，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取青年一代」的一个表现——这是对延安的吸引力的一个回应。[29]

公共补助范围扩大了。1939 年秋，教育部命令所有大学不得征收沦陷区学生的学费。[30]联大学生从不用交学费和住宿费，但贷金并没有随着物价和学习用品费的增长而提高。就在失控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之际，1939 年 6 月一封写于昆明的信中说：「有些学生依靠难民费生活，每人每月领到七块钱。但太少了，何况日常用品和粮食的价格一直在上涨。」[31]

与此同时，反讽的是，陈立夫的计划遭到攻击，理由是对学生太过宽厚了，使得私立院校在学生来源上不能同国立大学竞争。信奉基督的教育家威廉·费恩（William Fenn）抱怨道：「对贫困学生提供补助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帮助极容易被滥用。眼下，毫无疑问有些钱到了某些并非真正需要它的人的手中，有时候伙食补助的金额多得足以使接受者有零钱。」[32] 1941 年 3 月，一本中文期刊发表文章赞成费恩的反对意见：「几天时间，他们就能再次领到贷金。他们虽然严格控制开销，但小姐们必定要买美国牌的化妆品，男青年的头发油光可鉴，身上散发出香水味，但这些人还能领到贷金。」[33]

然而，事实上这项补助使成千上万爱国的知识青年能够埋头学习，而这些人都在重庆政府统治区内，至少不会受到延安的控制，这是批评意见所无法否认的。学生开始接受政府资助，并认为这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一种特权。任何不能给知识青年提供足够物资的政府，都会招致一部分举足轻重的人的反抗。因此，补助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一项长久的举措，一直持续到国民党时代结束，进入人民共和国时期。

到 1939 年底，据报导，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联大难民学生申请了贷金，但即便如此，他们仍很窘困。通货膨胀使购买力大打折扣，每月仅有 10 元生活补贴，许多学生只能忍饥挨饿不吃饭；有些人没有暖和的衣服过冬。1939 年 11 月，日本占据南宁，关闭了滇越铁路；1940 年秋，宜昌陷落，紧接着暂时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了自由中国重要的物资来源，使得通货膨胀率上升。1939 年 6 月价值 100 元的货物，一年之后价格涨到 238 元，又一年之后涨到 600 元。昆明的通货膨胀率甚至更高。[34] 1940 年 4 月，昆明被描写成为一个「十八世纪的享受，二十世纪的消费」的地方。[35] 据说，这座城市有三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助教。[36] 一个学生的日记描绘了勉强糊口的状况：

学校快开学，纸笔都成问题。……交饭费的日子来了，明天必须设法去。……辛辛苦苦从北方带来的几本书，今天都卖去了。……把母亲送我二十岁生日小戒指换了一笔不小的数目。走过金碧路，屡次想去糖果店买点什么，但走到店门前便停住了。回到宿舍，付完十天的饭费，买了一打洗衣服的肥皂，剩下来的还不够两个月的用度。[37]

战时学生的生活状况随消费指数变化而变化。急剧上升的物价意味着营养水平下滑、健康难保、学术水平降低、精神不振。为维持生计而延长兼差时间，使人更加沮丧。人们以物价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1938 年，每月 7 元的收入，还可以每星期吃鸡吃肉吃蛋。到 1946 年，即使每月有 1 万元也只能勉强度日，而学生往往好几个月不知肉味。[38]

1940 年 4 月，教育部把每月贷金增加了 1 到 3 元，但太少也太

迟了。每月膳食费要 15 块钱，补助只有 14 元，连交伙食费都不够，更没钱买其它必需品了。[39] 1940 年冬，不断上涨的物价刺激政府增加了一项措施，即用粮食兑换货币补助，按通货膨胀指数补贴兑换其它物品。[40]

然而，政府的行为仍滞后于昆明的形势。1941 年 3 月，物价已上涨，而每月补贴仍是 14 元，学生要求增加贷金。学校便把这个责任交给代理训导长陈雪屏，他欣然接受了任务。他说，教育部建议每月补助增加 10 元，但仍然不够，由于昆明物价特别高，所以他要求增加到 30 元。[41] 陈雪屏没有极力反对，他也许想等等看。联大五百多名学生要求学校当局提高贷金和粮食补贴。[42] 于是，联大常委会把贷金提高到每月 24 元，有效期上溯至 1940 年 11 月 1 日；从 1941 年 1 月开始则增加到 32 元。那些没有贷金的学生则要求每月增加 14 元粮食补贴。

依靠贷金的学生要完成学业仍面临着一大堆难题。发放贷金有一套复杂的「公正制」，这使得有些青年未能得到应得的补助。贷金往往几个月以后才发放。基本的生活补贴只能保证一天两顿饭。接受补助的人只能寄希望于有资格申请「医疗补助」、「杂费补助」和「大衣补助」之类的专项补助。[43] 除了中央政府的贷金，还有各种其它资助。1939-1940 学年期间，贵州的学生获得该省政府每学期 200 元的补贴。作为回报，学生保证平均成绩达到八十分，并同意毕业以后回贵州工作。[44]

战争期间某个时候，应该不迟于 1943 年春季学期，民间奖学金成为公用资源。某位黄先生捐款 10 万元，分给 250 人，每人 400 元。夏威夷华侨捐出一年 600 元的奖学金（获得者得用英文写一封感谢信）。为便于判断这些经费的价值，下列开销可供参考：100 张书写纸 20 元，一顿便饭 15 元，理一次发或看一场电影 10 元，一张航空邮简 3 元，一杯茶 2 元。

也是在 1943 年春季学期，英国大使馆从本国殖民地和个人财产

中捐给每个中国学生 60 元补助和 500 元生活津贴，用于购置冬衣。殖民地政府如何慷慨解囊的消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些学生拒绝了这笔钱，他们认为中国学生应该依靠自己的政府，而不是帝国主义洋人。[45] 学生向受伤战士捐血，为补充营养，校友捐款 10 万元，这笔捐献反对者较少。[46]

1943 年秋，政府终于意识到日益明显的局势：贷金是直接拨款，偿还时已变成遭到通货膨胀侵蚀的货币了，要么根本就无法偿还了。从 1943 年开学起，政府贷金被称为「奖学金」——带有附加条件，其目的是使学生从人文学科转到更实用的学科。教育学、医学、药物学和工科学生可获得甲等奖学金，提供学费和伙食费之外，还发放生活费。乙等奖学金只有伙食费，发放给 80%的理科学生、60%的农科学生和 40%的文科、法科和商科及其它学生。[47]

1944 年 1 月，查良钊生气地问走投无路而又没有得到奖学金的学生：「谁叫你读文法学院的？」这个问题超出了这位联大「菩萨」的能力范围；有些大一学生不得不退学工作。[48] 战争后期，发放补助的责任转移到各系系主任身上。管理上的变化为善良的查良钊减轻了一些负担，但有时候会遭到更棘手的质疑。比如，法律系每个学生都会问：「为什么你有资格获得补助啊？」[49]

对政府贷金制度发生争议的一个焦点是沦陷区学生获得援助的优先权。1945 年，教育部把清寒的学生、华侨和边疆学生统统列入补助对象，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50]

不管如何命名，不管如何分类，学生补贴还是日趋短缺。1943 年 11 月，基督教救济工作者江文汉清楚地记录了这个事实：

自上次访问以来，四年间昆明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费指数已达到 41,000，而战争爆发前只有 100……非常穷的学生每月伙食费都要花去 600 元。这是「公家」的粮食。学生每月得到 450 元，剩下的 150 元还得他们自己掏腰包。[51]

1944 年 3 月，贷金已增至 614 元，但每月伙食费变成了 1,000 元。前清华工学院院长、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访问联大时，工学院代表团就要求提高贷金，并及时发放。顾毓琇推辞说：「这是全校的问题。」[52] 从 1 月开始，壁报和海报上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53] 可能是顾毓琇即将来访，促使爱开玩笑的人在工学院食堂门口贴了一首过年的诗：

天官赐粥
望穿秋水，不见贷金，满腹穷愁度旧岁；
用尽心机，难缴饭费，百般无赖过新年。

几个月后，贷金仍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位居陈立夫之下的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视察联大食堂时宣布：「联大学生的伙食并不算顶坏，只是膳费和贷金数目差得远了一点。」他承诺会呈请教育部增加贷金。[55]

抗战期间，自由中国的所有学生都历经艰辛，但由于昆明的通货膨胀率比其它城市高，局势也就格外严峻。1940 年秋，在四川一个学生每月伙食费是 12 元，在昆明则是 18 到 20 元。1942 到 1945 年期间，昆明趸售物价指数是重庆的两到三倍。[56] 获悉同为国立大学的中央大学所得经费超过其伙食费标准时，联大学生在感谢政府解囊相助的同时不免有几分怨慰之情。[57]

一次又一次，重庆政府表示要缓解联大学生的困难，但基本上都是藉此提高政府高官的声誉。1939 年 12 月，在昆明罕见的一次暴风雪期间，露天发表讲话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现学生直打哆嗦。视察食堂时，他发现伙食量严重不足。他随后立即把每月贷金增加了 4 元，每学期补贴增加了 20 元，用于购买衣服和图书。根据他的报告，蒋介石拨款 10 万元用于改善学生伙食。龙云随后也捐出 5 万元。[58] 1944 年 4 月，蒋介石安排行政院划拨 30 万元救济款给联大，10 万元给云大。同时，孔祥熙宣布下个月访问昆明，在这之前，他接待了蒋梦麟和云大校长熊庆来，同意拨款 300 万元和 100 万元分别给联大和云大

作为周转资金。[59]尽管补助有所增加，还有紧急拨款和私人援助，但战争后期局势还在继续恶化。1945 年 3 月，贷金已达到 1,400 元，但伙食费却是 3,000 到 4,000 元。[60]

战争结束后，政府取消了「公米」制，把粮食补贴增加到一万元，这时逐步上升的通货膨胀暂时停歇，改革颇受欢迎，人心欣慰。据联大师范学院一位学生报告，三月不知肉味的历史终于结束了。[61]

新校舍的生活

联大学生住宿是免费的。在始料不及的漫长的战争中，简陋的住宿条件与其说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权宜的「临时」设施的退化。建在城北旧坟地边上的新校舍，名不副实。虽然学校任命著名的梁思成和林徽茵为建筑顾问，[62]但结果取决于经济形势，而非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及其艺术家妻子的卓越才华。校园占据了环城北路两侧：南区是理学院和几个学生服务机构，更广阔的北区则有男生宿舍、教室、食堂和图书馆。各个小区用粗糙的泥坯墙隔开。师生提到联大校园时，一般是指新校舍，而提到新校舍时，一般是指北区。

北区有一扇简单的木门，它面对着穿过南区和北区的土路。一直往前走，右边有一个日本炸弹爆炸后留下的大坑，雨季时就装满水。坑的北边不远处是一块宽阔的空地，被称为「草坪」，它的后面有一幢唯一的两层建筑，那是图书馆。有个访问者写道，它「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有坚硬的泥地板，许多乌鸦嘎嘎叫着滑行而过，或者挑衅地停在书架或书桌上」，青年学子对此视而不见。[63]该区的东边是一排排一层的教室。教室后面是食堂。中间有条路，路西是排列整齐的男生宿舍。宿舍和教室的墙壁及地面都是用泥坯筑成的。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宿舍是茅草屋顶，教室是波浪纹般的铁皮顶，两者都不甚理想。下大雨时，宿舍会漏雨，教室屋顶会叮叮咚咚响，授课者只有大声喊叫学生才能听得见。宿舍两头都有门。墙上有木头窗户，没有窗户纸，更别提玻璃了，学生便糊上包装纸或报纸。

每个寝室里，中间是一条过道，两边约有四十个铺位。大多数学生在床铺上挂着床单、毛毯或帆布，围成四个人的小王国。一位记者这样描写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寝室：

通风不良，拥挤不堪，乱七八糟，让人想起旧中国的轮船里拥挤沉闷的二等舱。这四年航行生活，乘客在上下铺床上生活、睡眠，蚊帐一半好一半坏，行李箱、柜子、书籍、脸盆和衣服塞在床铺上下，洗过的衣物挂在过道中间。[64]

装饰品只有廉价的风景画、书法作品、女朋友的照片或外国女影星的海报，偶尔会有耶稣肖像。

这些建筑建于 1939 年，当时认为战争最多还会持续五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了。许多睡在上铺的人不得不撑开雨伞，以免雨水从日渐增多的茅草空隙中滴在自己身上。驱逐昆虫之类的小动物是个难题，对那些「两腿动物」也无计可施——由于新校舍的房子都不上锁，很难辨别谁是陌生人，也就很难防止入室盗窃。在隔成小房间的布幕上，有人写道：「非请勿进，免涉嫌疑」、「访友扬声」、「主人不在，佳宾止步」。[65] 有个学生发现，刚从当铺买来的西装早上挂在寝室窗台上，不一会儿就不见了。[66] 有个贼偷过十三双皮鞋、好几箱衣服。现场捉住的话，小偷往往会被心存报复的学生暴打一顿。只有极少数人在警觉的法律意识下免遭毒打，有个偷计算尺的人是其中之一。一位法律系学生来到现场，他提醒大家注意法律程序，那个小偷才得救，但放走时眉毛已被剃掉了。[67]

实际上，一些在新校舍有床位的学生在校外租房子，所以许多「小王国」只有两三个人住。剩下的地方就被用来放衣服、书本和其它东西，比昆华中学北院的条件好多了，在那里十六个大一男生住一个房间，还不能隔成小房间。在学校北区，五六个大一、大二女生挤在一栋破烂不堪的老房子里，寝室在二楼，到处落满灰尘。三四年级的学生则睡单人床，宿舍稍微宽敞一些。每当有女生走上破旧的木楼梯时，灰尘就会落在一楼食堂的餐桌上。

联大一直未能解决校舍问题。新校舍只能容纳联大一半的宿舍和教室。有些搬到乡村的学校决定迁回原址时，联大租用了它们的校舍，根本不可能马上安置妥当。梅贻琦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催要划拨地皮，再划拨地皮。联大在昆明八年期间，大一学生宿舍换过不止六次。每个学年都有新的难关。1942 年秋，为供应大一学生住宿，学校当局命令助教腾出宿舍，遭到年轻讲师的拒绝。学校根本就没有给先修班学生安排住宿，他们便涌向军训处要求纠正这种做法。此外，大一学生也没有地方吃饭，教室非常紧缺，有时候教师上课就安排在午饭时间，这意味着有些本科生中午得饿肚子。[68]

八宝饭

食物成了念念不忘之物。诸如八宝粥之类在战前吃过的美味只能撩起乡愁。就像它的名称一样，这种美食拥有丰富甘美的原料，糯米是主料，还有梅子酱和各种水果干及果仁。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是流动的，再加上杏仁酱就大功告成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八宝饭成了战时学生的主食。「八宝饭」这个词颇有反讽意味，指的是劣质的稻谷，红色的，经常是发霉的，还能看到糠壳、草籽、沙粒和小石子，有时还有老鼠屎——就像有些学生说的，有「动物、植物和矿物」。他们还发明了其他与「八宝饭」一样五花八门的说法。一碗清汤上漂着一根大葱，他们取了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青龙过江」。[69] 由于前九天的节俭，他们可能每十天可吃到 150 克猪肉，这被称作「打牙祭」。[10] 1945 年政府贷金还不到伙食费的一半，学生只好「三月不知肉味」了。[71]

因为「预算」少得可怜，伙食委员会在采购食物时总是十分细心。等到午后市场快要停业时，他们才去搜寻买得起的便宜货，带回来的却是烂得不成样子的卷心菜叶和一丁点毛皮肉。[72] 这些食物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地方加工处理，同南院女生食堂一样：

联大的厨房是世界上最脏的厨房之一。……学校里没有给厨工睡的地方，厨子就都睡在厨房里，四个人合睡一架双人床。经年不洗的

被盖，灰尘加上油腻就把被面和被里都镀上了一层有几分厚的黑色胶状物。有时买回来的菜没有地方放，也就放在上面。厨房里的桌子，大概自从建厨房以来就不曾洗过。灰尘泥渣，弄得满地污秽，……饭里菜里吃出苍蝇、老鼠屎、跳蚤、臭虫，甚至长串的头发，是很平常的事了。[73]

难怪少数家境好的女生「一走进饭厅就皱眉头，细喉咙咽不下粗菜饭，扒了几粒就走了」。[74] 相反，据说有个从北方沦陷区来的贫穷难民，完全依靠吃同学的残羹剩饭维持生存。[75] 一位上过大学的青年军官发现，只要在吃饭时间去南院，请他中意的女生到外面吃饭，就很容易促成一次约会。[76] 对于贫困的学生，香喷喷的鸡肉和面条无异于一顿盛宴。

午餐和晚餐时，有两个办法可以吃到足够的饭——要么盛满满一大碗，要么只盛半碗，迅速吃完，然后在饭被盛完之前赶紧再盛一碗。[77] 1940 年，吃早饭差不多就是一场「常规战」。为得到更多的稀饭，学生总是带着大碗，有时还一只手一个。有少数脸皮厚的学生就用脸盆大的搪瓷碗。[78] 到 1943 年，就不再有早餐供应了。路边摊上简单的一碗面条就要相当于两顿饭的钱。有些一贫如洗的学生在中午之前只能饿肚子。[79]

赶街子

〔原文是（Selling Belongings），意为卖东西，这里的「赶街子」是联大学生当年的说法。〕

战初，学生以为经济困难只是暂时的，偶尔急需时就求助于查良钊。但他们很快就明白，这种拮据的局面将持续下去。于是，他们当掉冬衣购买秋天开学用的书，到天气变冷时又把书当掉，把冬衣赎回来。逃离战区时带了一些贵重物品的学生便出售宝贝。由于买家和卖家几乎一样窘困，讨价还价便很激烈。到 1943 年秋，甩卖物品成了家常便饭，摊位名目五花八门，「离昆急让」、「因病急款贱卖」、「兹

因膳费无着，愿将……」、「代友急售」、「庆祝国庆暨……出让」。[80] 学生出售各种东西，包括半旧的西装、自制的墨水和浆糊。市场上甚至出售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笔和计算尺。为不丢面子，一些身无分文的文人就让校工代理，按售价提成。校工室于是就成了集市。[81] 另一种布告是寻物启事。学生弄丢了贵重物品，不能仰赖捡到者无私奉还，便贴出悬赏布告。大部分奖品都很朴素，也很让人同情——半罐花生、一些梨。对于像计算尺之类特别宝贵的东西，奖赏最多也就是一顿热腾腾的饺子。[82]

以前什么事都不做的富家子弟现在什么事都得靠自己了。他们洗衣服、补衣服，相互给对方理发，渐渐接管了联大周围的服务业。学生会福利股开始出售廉价的早餐时，当地食品摊就减少员工和原料以应付竞争。新井旁边有粗糙的洗衣台，学生不再请服务员洗衣服，尽管很便宜。[83] 在北京或天津一弯腰洗衣服就满脸通红的男生也无所谓了，与女生走在一起也是如此。[84]

少数富裕学生

在这个贫穷的集体里，少数富裕的学生是引人注目的消费者。圣公会传教士吉尔伯特·贝克是昆明学生生活锐利的观察者。他记下了他们的特殊生活：

租金非常贵时，住在校外的学生只能是最富有的人。他们通常能够和家里保持联系，要么就是自己有钱。其中大部分人穿着都很奢华。他们研究经济观察生意，在电影院附近的时髦小店里，有人把进口的奢侈品卖给美国士兵。其它人则较为传统，把钱存在银行里。[85]

除了少数人勤奋好学外，大多数有钱学生都把时间浪费在吃喝上，带女朋友去看最新的电影。在联大延期毕业的学生名单上，这类享乐的恋人特别多。[86]

富家子弟当中有一部分是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侨，其中许多人都带有广东或福建口音，还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有些家在沿海经商的

子弟发现，昆明是增加家庭财富的天堂，可以从仰光走私难得的海外商品。有些学生和退学者也加入这个牟取暴利的行列。李定一是一位有进取心的历史系学生，1942-1943 学年休学去了缅甸，经过讨价还价买到稀有的商品，转送到往中国去的运输队上。横渡萨尔温江时，日本的炮火毁掉了所有行李箱，只有他的除外，不过后来在大理也遭到敌人的空袭。他死里逃生，带着一只装有 2,000 美元的手提箱，在路边的卡车站搭便车前往昆明。在一个停靠站吃午饭时，那辆卡车载着他的手提箱离去，但在五英里外的公路边，他发现那辆车坏了，箱子仍完好无损。回到昆明，他的钱比联大一般学生见过的还要多，大四那年他过起了很气派的生活。[87]

有些去缅甸走私的学生始终没有毕业，但保留着联大学籍。在吴讷孙的历史小说《未央歌》里，有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叫宋捷军，穿着精心定做的外套、暖和的大衣，大摇大摆地走进茶馆，坐在长凳上，拿出装有昂贵的香烟的小锡盒。他为同学余孟勤打开烟盒，余响应道：「我早已改抽云南雪茄了。你买这一盒香烟的钱，够我买一条五百支雪茄的了。别叫我抽坏了嘴，再改回来难！」「别忙，有的是，」宋捷军说着喷了一口烟，把吸了一半的烟头扔在地上。抽完烟，他放好一盒奢华的烟，一套帕克自来水笔和铅笔，一只进口手表和一本《乱世佳人》。[88]

对这些给予帮助的富有的缅甸贸易者表示感激的同时，有些学生常带有几分嫉妒，贫困的同学则把这些暴发户看作无耻的牟取战争暴利的人。毕业之前或之后离开联大担任美军翻译的学生获得了更高评价。拥有稳定的收入，得到美国食品和其他权益，这些青年在当地炙手可热。[89]

衣着

在昆明的前几年，学生的装束仍让人想起在湖南的短暂岁月。十个男生中有八个穿着在长沙发的、洗得发白的哔叽布制服，天冷时就加上破旧的军帽和黑色的大衣，看上去相当、熟悉。长袍随处可见。

大部分人仍穿皮鞋——当地人做的三块钱一双的皮鞋很受欢迎，但一双布鞋只要四毛钱，便鞋也很流行。偶尔有人会穿丝袜，绝大部分人穿的棉袜脚后跟部位都磨破了，被戏称为「蛋黄」。有些从长沙跋涉而来的老学生仍自豪地炫耀着湖南产的粗袜，那些袜子沾过一千英里路的泥巴。夹克极为常见——有优质皮衣，也有缝缝补补五颜六色的棉衣。大多数女生穿着朴素的蓝棉衣和平底鞋上课。不过，据说有些家世显赫的妙龄女郎，即便军训也穿着鲜艳的连衣裙，别的一概不穿。[90]

到 1940 年代，最受男生欢迎的衣服要数皮衣了。售价七八十元，不用洗衣服，这是它的一大优点。「学习时可以穿，运动时也可以穿，出门是正装，在家是便服，雨天可作雨衣，夜里可作被盖在身上。」[91] 另一种四季皆宜的选择就是长袍了。有个学生 1938 年到达昆明，靠一身长袍过了五年。1942 年毕业时，那件长袍已被洗礼过许多次了，躲避空袭时沾有坑洞里的灰尘，但他从来不洗，因为没有衣服换穿。[92] 另一个 1942 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一套军事运输单位发的制服，那是他一个夏天的工作所得。那套制服伴随他度过了大学时代。[93]

最初来到昆明时，有些学生的穿著还很西化，在那几年，足够幸运的学生可能穿上来自天津、上海或香港的旧西服，引来忌羡的目光。[94] 1944 年底的寒假，有些难民学生穷到这个地步：洗完仅有的衣服，放在太阳下晒，然后睡个午觉，直到衣服干了再穿到身上。[95] 学生也变得擅长缝补衣物，连男生都有一种自豪感。有些人可以把旧衬衫改成背心。有些女生夸奖他自己做的书包时，有个联大男生向她们发出挑战，比赛缝衣服。[96]

红十字会和其它福利机构送来的旧衣服也很流行。[97] 传说联大学生穷得连抢劫犯都懒得多看一眼。[98] 战争后期，有位访问者认为联大学生是「一群外表五花八门的人。男生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从中国长袍到大概已不常见的洋夹克、衬衫、毛衣和裤子。女孩子看上去比

男孩清爽，穿着朴素的棉衣，留着整齐的短发。有些人炫耀高跟鞋，很显然那是她们从通商口岸的家里抢出来的唯一一双鞋。」[99]

到 1945 年，服装市场反映出有美国大兵涌人。许多人很慎重地出售制服。这不仅因为这些衣服质量比中国的好，而且款式新潮，很快就风靡校园。抗战胜利后，正当市场开始大量涌现由译员从印度带回来的服装时，这些被称作「大兵服」的制服的生意被政府宣布为非法贸易，价格因此一落千丈。

财物保护与一物多用

对财物的保护不仅仅是用补丁延长学生用品的寿命。英国领事馆每周五天出版新闻简报。五六名学生获得许可后，委托其中一人去领事馆，带回印在五到八张高级纸上的时事简报。起初，他们读这些东西当作练习英语。后来在背后做笔记。最后，领事馆的简报成了手纸。[100] 在化学系，有人更加极端，发明了校友所说的「完美循环」：尿用来酿酒，用售出后的钱买食物，最终又变成更多的尿。[101] 战时维持生计的另一个基本原则是一物多用。以搪瓷盆为例，可以用来洗脸、洗手、洗脚，有时还用来洗身体的其它部位。也用来储存和清洗蔬菜，盛做好的蔬菜、米饭或面条，有时在夜里学生不想出去方便，它就成了「响应自然号召」的用具。[102]

水是个老问题。新校舍的一口井坍塌了，成为一块水洼。白天不出水，但每天清晨学生带着奶粉罐到井边排队，等水慢慢冒出来，累积到晚上，这样就可以洗漱了。水冒过之后，如果有人到那里，那就只剩下红泥浑水了；不洗比洗了反而更干净。旱季可以从晚秋一直持续到来年早春，只能从池塘挑水到宿舍，一夜之间就用光了。从表面小心翼翼地舀去浮萍，不触动底下的淤泥，学生才能弄到合乎规格的洗涤用水。终于，在厨房附近建了一个浴室，可以凑合着用。靠在不固定的热铁锅上，学生把温水舀到桶里淋浴。半腰间有一块木板挡住洗浴者的身体。为了给厨房安装辅助设施，连这种简陋的装置也不见了。洗热水澡的学生只得走很远的路到市中心基督教青年会去。战争

末期，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中心终于在学校附近建了一个澡堂。[103]

有个地方早上有热水供应，那就是文林街师范学院。门上的通告称：「本校女生用水，禁止外人取用。」但这个诱惑太大，渐渐地，男生或独自，或在女生的帮助下，获得了这宝贵的东西。[104]

健康状况

鉴于昆明的条件——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营养；生活用水不卫生；长时间不洗澡；穿衣只能基本保暖，住宿就是有个地方睡觉而已——师生存在大量健康问题，也就不足为奇。早在 1939 年，就有报导说联大学生受气管炎、伤寒、猩红热和疟疾的困扰。[105] 据吉尔伯特·贝克报导，到 1940 年，因营养不良病情恶化「有少数人死去」。[106] 有些学生得了各种病，却无力承担医疗费。[107] 与学生救济委员会成员见面之后，有一位访问者在 1939 年 7 月写道：「医疗保障援助资金的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学生的伙食十分粗劣，一年下来，他们开始感觉到它的影响。在昆明，一年到头都有疟疾，而金鸡纳霜太贵，学生靠救济金根本买不起。」[108]

对于有家室的教师，要是有家人生病，生活就会乱得一团糟。正如燕京大学神学家赵紫宸在昆明休假时（1939-1940 年）所发觉的，他妻子由于跳蚤叮咬感染了立克次氏体，于是「我一下子成了护士、佣人、厨师、房主。我扫地、拖地、扇炭炉、找医生、搜寻医生开出的昂贵的药物……购买天价的保险，照管病人的琐事」。[109]

相对说来，赵紫宸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那时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爆发，日本还没有封锁通道，否则根本就得不到医药。像吴晗，在整个战争时期，照料患病的妻子，付出就要多得多。即便没有大病，教师家人的生活也会捉襟见肘。1943 年 5 月，访问钱端升之后，费正清写道：「他最近一直头疼，不想走远。他的妻子和三个小男孩都晒得黑黑的，看上去很健康，但瘦得厉害。她说她怕冷，对小病已没有抵抗力了。」[110]

校医室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正如 1944 年 1 月《新华日报》所揭露的：「近来同学患病的特别多，『昆明热』和『摆子』〔即疟疾。〕尤为猖獗。校医又迟到早退，每天只是上午九点来，到十一点半办公，因为他们当校医是兼差，主要的业务还是自己的诊疗所和生意呢！」[111]

医疗费贵得让人望而却步，据江文汉 1943 年 11 月报导，每次看病得花六七千元，其中三千元是预付款。[112] 营养不良是生病的主要原因：

（学生）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烦躁不安。其中一人患病后，他恢复健康的时间是其所在年龄正常情况下所需时间的两倍。当时无力治疗昆明热——一种轻微的伤寒症——这种病会转化成肺结核。因医疗设备所限，只有严重的肺结核患者才能得到治疗。疟疾司空见惯，往往致人非命。近来，伤寒导致的死亡率高得出奇。学生易感疲乏，毫无活力。每次在学校开会时，总有少数人因体弱无法坚持到会议结束。

学生体质下降，学术水平也随之降低。早上七点钟上课，学生看起来疲惫不堪。白天，没精打采，无力解决摆在面前的问题。他们的悟性和记忆力也在下滑。[113]

1944 年 11 月，校医室接待了 2,119 名学生，1,033 人看内科，573 人看眼科。据报导，其主因是缺乏营养和光线昏暗。[114]

画书馆和茶馆

从一开始，学生就很难找到一个安静明亮的地方学习。到处都是人满为患，光线暗淡。在狭窄的寝室里，与三个同学共用一张凑合还能用的书桌，这需要全神贯注才能办到。1939 年新校舍投入使用时，每个寝室都有三四盏煤油灯，但光线极其微弱，学生连睡衣都无法找到，更别说读书写字了。1940 年安装了电灯，但照明没有任何改善，只能从中看出昆明电力极其匮乏，100 瓦的电灯泡只有 30 瓦的效率。

电力部门轮流分配城市用电，停电也就司空见惯了。

联大唯一真正明亮的地方是拓东路工学院的图书馆，那里有学生搭建变压器增加电力。在城北一带，新校舍图书馆装有四盏硕大的煤汽灯，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在晚上七点开门前一个小时就蜂拥而去。到六点四十五分，图书馆台阶和前面的「草坪」上就挤满了抢占座位的学生。当两扇玻璃门打开时，疯狂的青年学子冲进去抢占靠近电灯的座位，并把书本、衣服或其他东西扔在邻近的桌椅上，为朋友占位。不一会儿，所有十英尺长的凳子都挤了六个学生。这个地方总共能容纳六百人。

不过，竞争最激烈的不是抢占座位，而是预约参考书，因为必读书一直都有人预约。几乎没有学生买得起通用的外版书——纵然有人很幸运地在当地市场上找到了——他们也得依赖参考书。这些书可以提前一天预约，但到时候未必就能得到，因为总是供不应求。菲尔柴尔德、弗内斯和巴克合着的《经济学概论》是寻求人数最多的一种教材，在陈岱孙的经济学概论课堂上，有一百多名学生，却只有五六本书。宿舍和伙食小组经常派人检查图书准时下传，以便第二天分配。[115] 临近考试，晚上在图书馆的人太多，许多学生便常常光顾明亮的茶馆。

大西门附近有五十多家茶馆，都很小，一般只能容纳十来个客人 [116]，但它们有克尔曼式的灯笼（后来装了电灯），是读书、写作、聊天的好地方。只花几分钱，两三个朋友就可以共用一壶茶，一直待到茶馆打烊。大部分男生都有自己喜欢的茶馆，他们认识店老板，与熟人打交道感到很自在。由于传统中国女性通常不出入这种场所，联大大部分女生在天黑以后就犹豫要不要去冒险，这样一来，泡茶馆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男性的专利。学习之外，他们还经常讨论，从女人到政治，无所不谈。当争论令人不安时，老板就会紧张起来，广为传唱的〈茶馆小调〉就记录了这一现象：

楼上，楼下，客满座啊，

茶房！开水！叫声高。
杯子碟子叮叮当、叮叮当响啊，
瓜子壳儿劈里啪啦、劈里啪啦满地抛。
有的谈天有的吵，
有的苦恼有的笑，
有的谈国事，有的就发牢骚！
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
走上前来，
细声细语说得妙，
细声细语说得妙：
「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
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117]

从做生意的角度看，学生是城北茶馆的主顾，尽管可能算不上理想的消费者。让这些年轻的穷学生在茶馆待整个晚上，没有老板可以发家致富（尽管他们的举止不像当地那些花钱并不比学生多，却很不礼貌的人那样惹人讨厌）。最初，由于联大市场的发展，茶馆猛增，但有些店主试图阻止学生进入，其他老板则故意调暗灯光。

某些茶馆也成为著名学者出没之地。例如，在他们习惯光顾的茶馆里，清华古怪的哲学家沈有鼎与北大放荡不羁的化学家曾昭抡进行学术辩论，这并不罕见。茶馆的格调各不相同，但都遵循着校历。考试期间，茶馆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期末考试一结束，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喧闹。暑期，联大图书馆闭馆，茶馆实际上就成了唯一灯火通明晚上可以读书的去处。

除了读书、写作、谈天、喝茶，学生有时候也打桥牌——他们幽默地翻译成「不理智」，〔「桥牌」的英文为 bridge，与中文的「不理智」谐音。〕或者吃米线或饵块，后者是在路边摊用木炭烘烤或者在室内煎炒而成的一种黏糕。

文学创作与讲座

茶馆是昆明发展迅猛的文艺中心。联大青年诗人许芥昱后来觉察到：「昆明的经历在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迹……昆明的思想和政治绿洲持续存在之时，它允许传统与新潮、本土货与舶来品之间不断的碰撞交流。当时恰好有足够的时间使它们融合成熟，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118]

昆明著名作家绝大多数是联大的教师或学生。教师包括年轻的小说家钱钟书，充满地方色彩的短篇小说家沈从文，杰出的散文家朱自清，诗人卞之琳、冯至和闻一多，以及李广田，他跟许多同事一样，既写诗又写散文。学生当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除了许芥昱，还有穆旦（查良铮的笔名，1938 年毕业后加入教师队伍）、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何达和萧荻。许芥昱认为，由于「尤加利树和烟枪」——优美的树林、宁静的校园与战争的恐怖之间的对比——昆明文学呈现出独特的品质。许多学生在躲避日军空袭时发现乡村的迷人之处：「皲裂的土坯墙只是象征性地使我们无法接触外面的世界，无法接触昆明市边缘地区淳朴的生存方式，无法接触公路上衣衫褴褛的新兵——有时，为防止潜逃，他们带着缭铐，无法接触战争及其所带来的动荡而丑陋的现实。」[119]

经过数年躲躲藏藏、空袭和政治动乱，在新四军事件之后，校园开始分裂。但从 1942 年到 1945 年，相对而言，联大不像战初那样混乱，也不像战后那样充满恐怖的气氛，联大文学至此确立自己的风格。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不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对激进分子而言尤其如此，他们委曲求全，按共产党的指示静观时变。然而，当群社和冬青社以前的骨干、中共地下党员及其它学生于 1941 年 10 月策划创办文艺期刊时，这段日子却成为他们的收获季节。[120]

这个社团由两位广东籍的文学爱好者发起，一位是中文系学生林元，因新四军事件流亡刚刚返回校园，另一位是经济系学生蔡汉荣。通过广告宣传，他们从旅居昆明的广东商人那里拉来赞助，得以创办

《文聚》杂志。他们认为昆明沉寂的文艺界需要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得到了老师的支持和赞同。在创刊号上，编者宣称该刊致力于扶持「纯文学」。对于政治积极分子，这等于默认局势不利于提出激进的倡议。但「纯文学」也暗示了对「战时文学」的拒绝，「尤其是纯粹『杀』『杀』口号的体裁」。无论爱国教诲在初期战争动员上可能起过什么作用，它都不能为忍受持久战提供至关重要的精神食粮。

彷佛是为了强调需要新动向，第一期刊登了朱自清的评论，他主张中国诗人超越抒情诗和象征诗的传统，以日常清朗的语言创作「明白和流畅」的「散文化」的诗。这期也发表了李广田和沈从文描写战时景象的散文。在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诗作〈赞美〉中，穆旦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由坚苦卓绝的抗战走向复兴的信念。另一首诗作是联大外文系杜运燮的〈滇缅公路〉，根据他当兵的体验写成。跟杜运燮一样，沈从文的追随者汪曾祺在中国文学上也占有光荣的席位，他发表了意识流小说〈待车〉——与林元关于当代学生生活的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是一篇现实主义作品。

《文聚》汇集了联大最好的诗歌、小说和批评。在这本刊物上，第一次出现了冯至几首著名的十四行诗，还有随笔，以及他翻译的里尔克和尼采的诗作。其它经常撰稿的教师包括沈从文、李广田和卞之琳。编者也向联大校外的人约稿，包括延安的作者，如何其芳、杨刚和袁水拍。1943 年起，《文聚》出版了一些丛书，包括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冯至的中篇〈楚国的亡臣〉，及刘兆凡、林元、蔡汉荣、李广田、卞之琳和穆旦等人的作品，证明了联大师生的创作活力。

《文聚》一直出版到 1946 年春联大解散。在战争和政治动乱的岁月，它勉力保持了精湛的艺术水平。《文聚》并不回避政治和社会评论，相反它刊发了杨刚的长诗〈我想念你呀，莫斯科〉，它写于 1943 年德国进攻苏联首都期间。不过，它的关注面向仍很广泛。正如林元后来所回忆的：

《文聚》上很多文章都是从这个或那个侧面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沸腾的人民生活的。但人们的生活像黄河长江之水，不是每时每刻都沸沸扬扬，而更多的时候是平静地悠悠流去。读者……需要艺术，需要美……《文聚》发表了不少美文，发表了不少有关自然景物和人类心灵的美文。[12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著名的讲话，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几个月后，这篇讲话刊登在《文聚》上。然而，真正对中国知识阶层引起共鸣和反响的不是在延安，而是在昆明。

然而，昆明的思想话语并不仅仅局限于出版，因为这需要时间、组织和金钱。演讲同样重要。整个抗战期间，联大教授和其它专家的公开演讲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由于考古学家董作宾、科学社社长任鸿隽、政治学家罗隆基、甲骨文研究权威陈梦家和长老会传教士 W. H. 克拉克都被学生自治会邀请来讲演，暑期生活因此充满活力。同样，在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钱端升谈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何永佶谈英国与东亚的关系，洪思齐谈苏联与东亚的关系，冯友兰谈哲学与青年，贺麟谈青年与信仰，沈从文、朱自清、罗常培和闻一多则探讨各种文艺问题。文化与人生协会主办了二十多场演讲，其中有冯友兰的「人生之意义」和潘光旦的「儒家思想和青年生活」。[122] 1942 年秋，一个学期下来，国文学会和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文史论坛就推出了联大教授主讲的二十多场讲座，每位演讲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是造诣深湛的权威。[123]

昆明的战略地位在于，它是滇越铁路、后来的滇缅公路在中国的终点站，也是飞越喜玛拉雅山的空运地，这就意味着知名学者和政治人物等名流常常路过这里，有时候就被说服在昆明做一次讲演。1938 年 12 月，国民党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追随汪精卫的陶希圣，与汪氏前往河内路过昆明时，他在演讲中表示对战争局势感到悲观。[124] 联大的讲台同样尊敬四处漂泊的学者，比如陈衡哲及其丈夫任鸿隽，在 1939 年到 1941 年他担任 37 昆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25]1941 年秋，优秀的小说家老舍连续作了四场讲演。[126]

联大没有礼堂。一些重要的讲演就安排在昆华中学北院进行，其它的则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1944 年，蒋介石臭名昭著的腐败连襟孔祥熙就是在云大礼堂遭到嘲笑，嘘声四起。新四军事件后，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康泽发表了充满争议的捍卫官方反共思想的演讲，那里也是每月时事讲演的地方。

人们通常认为全体学生都在听讲，其实绝大部分是大一学生，他们刚进大学，根本不把军训教官的命令当回事，甚至到了公然藐视的地步。1943 年 3 月，李约瑟的演讲「科学在战争中的地位」结束以后，奇瘦无比的毛鸿中校宣布点名。但学生一到集合地点，就有人大喊：「开饭了！」于是众人一哄而散。他们对吃饭时间极为重视。国民党正统分子刘健群演讲过后，邀请文池奖学金得主早餐时间聊天，便发现了这一点。连那些对他回答政治问题时含糊其辞表示谅解的学生，也不肯宽恕于他拖了老长时间使他们错过了午饭。[127]

在来访的演讲者当中，作家林语堂是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位。他曾于 1943-1944 年冬在云大礼堂演讲。在某些爱国者看来，与其说他是中国人，不如说更像个美国人。他遭到这些人的蔑视。因为他的道家思想，政治积极分子对他颇不信任。他在演讲中强作幽默，更增加了他的负面形象。不过，他还是被人们记住了，因为他形容联大学生生活的隽语：「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128]

物质与精神

不管林语堂对这个群体积极乐观的态度理解如何准确，联大学生并非没有精神上的忧虑。远离家乡和亲人，承受着联大精神自由但常常孤独的个性的痛苦，忍受着青年人情感上的骚动，困扰于维持生计的难题，彷徨于自己和国家的未来，他们在朋友、老师和社团积极分子中寻求帮助。深受中国世俗文化的影响，这群文人学士很少有人寻求宗教上的慰藉。还有，战争使联大三校的基督教协会中断活动，也使张伯苓在南开建立的基督教青年会式的更大的社会基督教协会停止活动，所以在联大建立基督教团契还得从头开始。

在这些活动中，有两个人成了先行者：赵紫宸和吉尔伯特·贝克。赵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也是中国基督教运动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于 1939-1940 年从北平来昆明休假。贝克曾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一直和难民一起工作。香港圣公会主教派他到昆明协助赵紫宸工作，建造学生教堂，贝克便在文林街大西门内租了一栋破败的房子。[129]

这座教堂被命名为文林堂，成了联大师生基督教活动中心。到这年年底，联大基督教团契会员已超过四十人。[130] 像潘光旦（社会学系）和殷祖澜（机械工程系）这样信奉基督的教师也参加教堂的活动。一群大都不是基督徒的教师在教堂定期见面，讨论宗教、哲学、伦理学和艺术问题。[131] 文林堂最受欢迎的活动是，周六晚上用贝克装有发条的留声机播放大量古典音乐录音——对于经济上一文不名、文化上极度饥渴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种极难得的享受。

昆明有个为学生难民服务的基督教青年会。它建有一个招待所，从事救济活动，为学生社团提供会议场所。学生救助计划开始于 1940 年夏，发放奖学金，提供就职服务，建立生活、工作合作项目，让学生做一些工作，如木工、烹饪、文艺表演和群众教育等，帮助学生度过暑期。在战时昆明，就像在战前的北平，一些左翼积极分子加入了「Y」活动。在战初建立「Y」计划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龚普生，她曾任基督教女青年全国协会（YWCA）学生部干事，也是一二·九运动的资深骨干。1944 年，基督教青年会秘书李储文在组织茶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第十四航空队美国青年飞行员有机会认识联大激进派学生。[132]

对流亡昆明的知识分子来说，基督教慈善机构在减轻物质压力、缓解精神痛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许多学生不得不兼职谋生。战前中国学生都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但昆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和极其微薄的政府补助，使得工作成为当务之急。兼职在 1940 年前后兴起，到 1943 年已相当普遍。[133] 到 1946 年，大多数联大学生都有兼差。[134]

昆明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国立中央大学位于重庆郊外的山区，教会大学群体在成都市外，与它们不同，云南省会很小，从联大步行就可以到达该市的各个地方。而且，由于那里文化水平较低，对人才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尽的。最受欢迎的兼职是家教。云南有钱人家很高兴请得起近在咫尺的家庭教师来指导他们的子女考上云南大学，甚至可能考上联大。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同样高兴能利用这前所未有的人才资源。许多中学不仅为联大教师增加教学机会，也为联大学生提供职位，而且不少学校都选择联大教师和刚毕业的学生担任校长和训导主任。联大还有学生成为公司职员、公务员、当地报刊杂志编辑和记者、手稿抄录员、银行出纳和公共汽车售票员。有些人则自己做老板，开茶馆、酒吧和餐厅。文林街最大的餐馆文林食堂就是一位联大学生经营的。有些年轻人用云南有名的烟草自制卷烟，有的人种菜，还有人养猪。就连时间，昆明市民也依照联大学生在中午和半夜所点燃的城墙上的大炮声。[135]

联大学生是昆明一支极重要的劳动大军。据李钟湘（1944 级经济学系）回忆，要是他们持续罢工——由于缺乏员工和管理者——所有中学都得关闭，有些报纸势必停刊，杂志将会失去作者和读者。法院将没有会计主任发工资，邮局也会没有职员出售邮票。放映外国电影时将不会出现中文字幕。某些进口化妆品也就不会出现在市场上。银行就会没有人存放款，也没有人发电报、制作广播节目，敌机临近时也不会发出空袭警报。[136]

有时候，有些同学来自同一所高中，曾经一起生活，于是便共享勉强维持生活的钱物。每个人轮流休学，转去工作支持朋友。[137] 例如，李模离开学校一年，但债务却增加了，因为他把钱都给了朋友。要不是富有的朋友为他还债，他恐怕很难返回学校，也就不大可能成为将来的台湾经济部次长。[138] 机（械系）四（年级〉学生工程服务社使相互帮助更加制度化。该社办了一所夜校，开设绘图、技工、英语等课程，并提供设计制园、打字与描图、代装水电工程等方面的服务。全班同学都在课余参加工作，收费极低廉，故业务相当繁忙。某大型电

工厂遭遇火灾后，有几千张工作图需要觅人重描底图，于是动员全班同学，不到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任务。[139]

除了经济上的需要，兼差使联大学生比以前的中国学生对世界有更深入的认识。一位联大学生证实，工作可以「增加生活阅历，使人看到你所生活的是个什么样的社会」。[140] 但是，全职工作会使学习生活大打折扣。木水工和几十名联大学生一样，在一家邮局上夜班。为准时赶到位于昆明东南部的上班地点，他不得不狼吞虎咽吃完晚饭，早早离开联大。第二天早上七点回到宿舍，他筋疲力尽，但又不能睡觉。他的平均成绩只有四十分，为应付期末考试，他请了两个星期假，才勉强没有因学习成绩不及格被退学。他没有业余生活，连看报纸的时间都没有。他从不认为自己的工作能丰富阅历，对此他愤愤不平，毫不掩饰自己对那些同学的忌妒，因为他们能在青年时代开展更有启迪意义的活动。[141]

创造新群体

联大与战前本科生群体的传统和作风大相径庭。战前学生多半是上流社会富家弟子，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像清华那样完全照搬美国大学模式，这种情况也已成为历史。对于许多初来乍到的大一学生而言，他们都已二十多岁，战时的磨砺使他们严肃刚毅，无檐小便帽和戏弄欺凌已不合时宜。大学岁月不再是承担成人的责任之前无忧无虑的最后时机。

联大是社会经济变迁的缩影。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之前，沿海商人和海外华侨娇生惯养的孩子，在北方贫困的难民群中很是惹眼，但战争环境可以使这群富家子弟身无分文，在缅甸经商几个月后又能使贫民变成富商。在难民学生的辅导下，当地上层家庭的子女开始考上大学，随着局势的变化，云南「封建」精英与联大骄傲但贫穷的智者之间的隔阂也烟消云散。

由于学生因籍贯、年龄、履历、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而走向分化，

战前清华、南开和北大所形成的独特的集体感趋于瓦解。在思想倾向、课外生活和政治立场上的差异把学生分成微型的亚文化团体。在联大四年期间，他们的交往范围可以仅限于住在同一个小隔间的四个熟人。青年男女不但疏远同济，而且因生活所迫而相互竞争。联大是一个「拼抢」的世界——抢水洗漱，在餐桌上抢食物，在预约书桌上抢书，在图书馆抢座位，在教室抢椅子。

然而，无论争抢的东西有多小，无私的动力并未完全消失。1944年秋，联大学生为贫寒作家筹集了 150 万元，他们还和他们的老师一同为抗战共捐血 15 万毫升。只有愤世嫉俗者才会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每位捐献者可以得到两枚鸡蛋和一碗豆浆。[142] 为了教育，师生同甘共苦，互敬互爱，于是一种集体感诞生了。与其说它像战前高高在上的大学的风气，毋宁说它是传统书院的精神。

对于那些历经战争中期联大岁月的人来说，在贫困的处境下，「蓬勃、昂扬，而有创意的精神生活」是一种骄傲和满足。[143] 正如一位校友所总结的：「重要的是，师生患难与共，但没有腹背受敌。」[144]

十五 考验的岁月：1943－1945 年

1943 年，当白英开始在联大任教时，他发觉有一个主题在学生的作文里反复出现——一个崭新的人道的中国即将诞生，知识精英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 经过五年的空袭和通货膨胀，生活在肮脏污秽的环境下，乐观精神仍屹立不倒。

老一辈也认为，新中国的胜利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的劳累困顿超过欣喜快慰。对于大学生来说，战时在昆明的四五年是一段愉快的旅居经历。然而，对他们的老师而言，待在这个中世纪式的与世隔绝之地是历经磨难的流亡。自从离开北方的家园和学校，对他们而言，这就是永远。1943 年圣诞节，昆明传教士吉尔伯特•贝克和马莎•贝克（Martha Backer）在信里写道：「日渐上涨的物价已成为受薪阶层的沉重负担，这对我们的大学朋友尤其是个巨大的打击。」[2] 如陈纳德所说，联大教授在「更有权势的中国人悲观泄气的气氛」中挣扎。[3]

行动主义的复苏

1943 年，不同辈分的人出现不同的心态，这部分是因为学生来去自由，而教师得坚守岗位。但这种差异也反映了进退循环的转变，这是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生政治生活反复发生的。1931 年，政府压制反日示威游行，学生撤离政治活动的舞台，直到新的危机一触即发，于是出现了 1935 年的一二•九学潮。在联大，1941 年 1 月新四军事件后，压抑的气氛同样迫使学生退出政治行动，回到课本，满足于茶馆和电影院的小乐趣。与 30 年代中期一样，国民党政府在 40 年代中期未能有效抵抗日本加剧的侵略，导致学生行动主义思想复苏。其导火线是一号作战（1944 年 4-12 月），就像 1935 年日本要求华北「自治」一样，它使侵略者就在学生眼皮底下耀武扬威。

如同 20 世纪 30 年代，在紧急事件爆发几个月之前，联大的政治气氛已开始逐渐转变。不过，与战前青年不同，40 年代学生面对的

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不堪的环境。这次，年轻的学者走出象牙塔，并不是因为敌人迫在眉睫的侵略威胁。到 1944 年，联大学生准备行动了。

变化的预兆

当群社和三青团在壁报、戏剧演出和学生会上争论不休时，1941-1943 年在校园萦绕的漫长如光年的压抑气氛消退了。个人的孤独和「小圈子作风」使初来乍到的大一学生尤其失望，他们是满怀理想来到昆明的，有「一种民主热情和反抗精神」。[4] 那几年，联大几乎没有举办过公共时事论坛之类的大型团体活动。新四军事件以来的政治寒意，加上中国共产党的「低调」策略，使得集体活动极不活跃，而重庆当局对知识精英实行孤立和非政治化的政策，使他们免于直接参战。美国加入世界大战，使中国确信决定性的战役将在别处展开，而华盛顿的「欧洲优先」战略更加强了这种看法。鉴于中国战线相对稳定，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军团作战，战时生活比较正常，爱国青年认为已没有必要继续 30 年代后期的动员和宣传活动。而且，在 1943-1944 年庞大的美军基地建立之前，美国货物和出版物还无法顺畅送达，联大的学术流亡者感到与世隔绝。

尽管被隔离，但稳定也有优点。至少日军空袭停止了。[5] 1945 年春，梅贻琦通知清华校友，虽然遭到通货膨胀的破坏，但联大已能够不受战争的影响，进入「小康」的岁月。[6]

一些学生在政治之外寻找乐趣。他们很喜欢和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探讨，谁也不干扰谁。有个外文系学生记得，她 1944 年毕业时，许多同学对政治现实仅是一知半解。他们不关心时事，不管高官政要姓甚名谁，不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之类的书。她写道：「我们不是嬉皮士，但我们有一种『超越边缘』的感觉。」[7] 不过，那时她的一位校友在覆有保护膜似的环境下过着相似的生活，也绝不是一个左派，记得当时大多数联大学生已不再只对学术有浓厚的兴趣，「形势正在恶化」。[8]

经济和社会不公

战前的本科生已能觉察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挫折漠不关心，他们自信家人会照顾他们的需要和欲求。战时学生受政府监护，不得不省吃俭用，但贷金数额越来越滞后于物价水平，他们对通货膨胀、吏治腐败、经济萧条、社会不公等问题极为敏感。反讽的是，正是政府希望维持知识分子和职业精英基本生活的补助使这个群体反对它。当生活沦落到无产阶级的水平时，高校教师开始理解弱势群体。实际上，在校门外公路上就能找到政府不公的明显证据——一群消瘦的士兵绑在一起，被持枪的卫兵押往战场。在滇缅公路上当过兵的杜运燮，在〈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中表露出义愤之情：

给我一个墓，……
都可以，都可以，
只要有个墓，
只要不暴露，
像一堆牛骨。[9]

去军营慰问部队时，学生注意到军官的残忍。在村子里，他们听说年轻人宁愿剁掉手指、掏掉眼珠，也不愿忍饥挨饿，遭受蔑视和侮辱，而这正是被抓去派往前线的亲戚朋友的遭遇。三十年后，一个从前的学生对那位奔赴战场的广东同学的外表记忆犹新：「他们更像一具具骷髅，而不是一个个人。他们虚弱得什么都拿不动了。」[10] 同样是在滇缅公路上，除了可怜的士兵，还有一群走私者——他们衣冠楚楚，手头阔绰，有权有势。这些人与当地的投机倒把分子、贪官污吏和蝇营狗苟的乡绅，使得即便最不关心政治的联大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不平等。

明目张胆的不公使闻一多教授成为炽烈的激进分子。在学生时代，他就尊崇诗人屈原，把他奉为麻木不仁的统治阶级刚正不阿的批评者；但亲身经历中国统治者的残暴时，他仍然惊诧不已，于是他开始行动了。有一天，和一位学生散步时，闻一多突然冲上前去，高声

吼道：「放下你的手！」原来，有个士兵由于生病，骨瘦如柴，身体羸弱，倒在路旁，军官正用鞭子抽打他，想让他起来。听到反对的声音，那个军官看着这个长胡须穿长衫的中年男人，僵硬地咧嘴一笑，用最下流的话要他别管闲事。闻一多火了：「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

那个军官试图指使部队围攻这个鲁莽的不速之客，那位学生赶了上来。「你们要干什么？」他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时，有一群人围上来，那个士兵已经死了。那个军官破口大骂了几句，猛然扯下死者制服上的徽章，扬长而去。

闻一多回到家，气得直哆嗦。「太无耻了！太无耻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大骂着。妻子劝他平静下来，朋友也劝他：这种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发生，个人能做什么呢？「我不管，更没人管了！」闻一多厉声应道。接下来几天，他神情恍惚地坐着，连鼻涕流到胡子上也没有察觉，他心乱如麻，无法工作。他茫然地望着窗外，身上似乎挣扎着孕育出一个新的闻一多——一个改变了历史进程的闻一多。[11]

民主墙

1942 年，联大学生倒孔（祥熙）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桂林时，王念平非常震惊，便从广西大学弃学，奔赴联大重考入学。到昆明后，他发现「『联大』也是一片沉寂，同学们大都埋头学习」。[12] 他花了两年时间才意识到，如果要采取行动，他得积极主动。1944 年春，日军步步紧逼，威胁到贵州的安全，他收到浙江大学朋友的来信，该校避难的地方——遵义——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这封信中附有〈反内战宣言〉，呼吁国共两党联合抵御外敌。一天凌晨三时许，王念平偷偷溜出寝室，把那张措辞尖厉的宣言贴到大门外民主墙上。这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海报、壁报和评论，一致要求民主，谴责内战。他意识到：「『联大』还是『联大』！」[13]

实际上，联大已经历过一次「壁报热」，那股浪潮在 1943-1944

学年加速升温。到 1944 年 11 月，已有不止九种壁报，还有三数种可望在最近出版。[14] 受国家近期一再出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联大人的注意力从校园焦点转向国家大事。壁报逐渐左倾。三青团便贴出语气强硬的〈打倒卖国贼〉，训导长查良钊的办公室间或要求登记壁报出版者的姓名，但无济于事。暴躁的右翼分子偶尔会撕毁他们认为极其可恶的壁报。[15]

因为每种壁报只有一份，他们很容易被戴上蓄意破坏公共财产的帽子，也很容易遭到官方的打压，要是他们发出带有争议的主张，就更是如此。比如，1943 年 10 月，《游击》第二期被撕毁后，有人在原处贴了一个通知，「《游击》负责人请到训导处一谈」。[16] 那篇被训导处认为明显严重冒犯的文章是对联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分析，据说是在苦闷、消极、寂寞的环境下写的。《游击》针锋相对，回忆了北大自由研究、讨论、组织辩论会的传统，当然也包括出版大量壁报。[17] 另一个违抗官方规定的壁报是《女艺》，贴出两天后便不见踪影。然而，让对方更难以容忍的是，随后又有一张声明，称《女艺》已被「训导处耗子」咬坏了。其它作者则极力辩称自己是遵从规定的，已经把壁报上的所有笔名及作者名单移交给了训导长。[18]

在 1943 年秋涌现的第一批壁报当中，有许多壁报关注学生生活问题。1946 级毕业生举办的各种活动之一就是出版《生活》壁报，其宗旨是「反映生活，批评生活，改造生活」，表达改革决心。它第一年专注于校内，1944 年秋与其它壁报加入壁报协会，重申其关注点，把注意力放在学生会选举上。然而，到第二年，壁报的主要关注点转向翻译未经审查的外国媒体的报导，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的准确消息。第三年，《生活》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

壁报反映自身的现象。第一期《耕耘》赫然出现在「招领」、「寻物」、「求购」、「转让」一类启事的海洋中，轰动一时。《耕耘》是如此引人注目，使 1946 级的某些政治积极分子也着手创办了一份壁报，

名为《文艺》，经常贴在《耕耘》旁边。在鲁迅的文章的启发下，《文艺》谴责《耕耘》发表「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作。这一指责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探讨艺术真谛是为了审美还是为了实用。《耕耘》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对方所谓的「诗歌」充斥着口号，根本不配称之为「诗」。[20]

在如何处理孔祥熙拨给联大学生的 30 万元用款问题上，争论更加激烈。在这个过程中，有七种壁报主张建立报联，「集中」使用这笔拨款，到 1945 年初联合会已有二十多个会员。该会注重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批判，并发表声明要求建立联合政府。[21]

壁报联合会的成立只是交往更加频繁的一个信号，显示出公共舆论左倾运动的扩大和深入。《现实》壁报翻译《时代》杂志上与中国有关的所有报导。通过《现实》和《生活》等翻译的外国媒体报导，学生了解到美国人对史迪威事件的看法，孔祥熙的幕后角色，以及胡宗南的精锐部队不是去抗日而是被用来封锁共产党根据地，还有普遍存在的腐败、农村的崩溃和征兵制的滥用等许多问题。[22]

关于重庆政府控制区声名狼藉的政治和生活，另一个消息来源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它在昆明设有营业处，联大后期在昆明公开发行。非共产党的传媒开始宣传共产党的观点，在左翼书店学生可以读到秘密印刷的共产党文件，比如〈质问国民党〉、〈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整风运动〉等。[23]

1943 年 3 月 10 日，就在左翼观点开始拥有听众时，国民党出版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导致其自身意识形态基本瓦解。蒋谴责麻木迟钝的满洲统治者，和强取豪夺的外国人大肆破坏中国传统，却不敢面对削弱其政府道德合法性的问题。蒋介石保守地阐释了孙中山思想，倡导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拒绝接受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不能切实对待毛的新民主理论，更别谈他所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了，《中国之命运》可谓一无是处，对珍视新文化运动遗产的联大师生来说尤其如此。联大社会科学家认为国家领袖的著作简直是

「胡说八道」；金岳霖瞧都不瞧一眼。[24]

联大加入抗战

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不能起领导作用外，重庆政府也不能把学生爱国的思想资源利用到抗战中去。正如一位联大学生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所抱怨的，「我羡慕美国、英国和俄国的青年，他们好像都能……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我们中国……我们都被排除在全国的抗战之外。坦白地说，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很困惑迷茫。」[25] 有些教师也有同感。前教育部长王世杰刚刚随代表团从英国访问回来，说英国已经发动全民参战，这个消息给社会学家陈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之相比，中国在这方面差得实在太远了。[26]

到 194-1944 年冬天，官方建议在中国西南部城市招募学生参军，但办事拖沓散漫。日益增加的驻华美军及美国人在印度训练的远征军，特别需要英语翻译。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后来的第十四航空队）抵达昆明时，有些联大学生响应号召参加双语志愿团。后来，在 1944 年 4 月，联大教授会表决要求，毕业班所有身体健康的男生投笔从戎当翻译。[27]

从上个学期第一次提出这个决议开始，大家反应不一。有些大四学生很感沮丧，便旷课到茶馆打桥牌消磨时间。有些人则担心，作为翻译，如果表现很糟糕，会使自己的国家蒙羞，于是加倍努力学习英语。反对这项计划的壁报有时会「不翼而飞」，[28] 赞成的则要求女生鼓励男青年担任翻译。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借《红楼梦》中的恋人评论道：「林妹妹会拖住了宝哥哥。」这遭到另一位批评者的指责，他认为这是「打气不足，抽气有余」。[29]

为增加吸引力，校方宣布服兵役者可以免修大四的课程，并同意退伍复员时颁发毕业证书。还有，过渡到军队生活将是循序渐进的，训练译员在昆明专门学校进行，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得到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和社会学系教授吴泽霖的大力协助，大部分教官由联大教授

担任。[30]

1944 级学生参军的方案是联大——而不是政府——主动提出来的。此外，按照计划，这些训练有素的军官是用来协助美国人的。这与蒋介石 1944 年 10 月的宣言大相径庭，他宣称将发动十万知识青年参军——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对执政党愈来愈反感，蒋的动机不只是坚持国民党对这一群体的控制。他还试图画安抚美国批评者，他们认为美国小伙子为了盟国的利益而血染沙场，而中国已达到服役年龄的学生却仍然免于参战，这是不公平的。然而，中美当局对受过教育的军人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却有不同看法。总司令魏德迈（Albert Wedemeye）想把他们编入美国训练的阿尔法部队，然后进驻缅甸作战；蒋介石则希望把他们训练成十个精锐师，供他自己调遣。[31]

联大师生都很清楚其中的政治意味，然而，他们对蒋介石的呼吁莫衷一是。由于联大已派出几百名青年参加译员训练团，所以很难不同意学生应召参军。但与此同时，仍有许多疑问。这些新兵是帮助中国战胜日本，还是仅仅用于增强蒋的实力以打压国内的竞争对手？军队怎样对待这些士兵？特殊对待是极不公平的；但是，像对那些排队走过联大校门的可怜的士兵那样滥施责罚，这些人又忍受不了。据冯友兰后来的观察，「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32]

在政治和道德上徘徊不定的情况下，联大坚持执行教育部分配的指标。常委会召开群众动员大会，一些有名望的教授在会上鼓励学生入伍。冯友兰说，迄今为止，学生之所以免于服役，是因为过去军事器械太落后，与他们的聪明才智很不相称。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中国需要有知识的人操作美国先进的新式武器；学生责无旁贷。[33]

在爱国心的驱使下，闻一多也登台讲话；然而，他谈的几乎全是他的政治观点。他说，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军队一塌糊涂。军官贪

生怕死，克扣军饷，大发横财。士兵愚昧落后，孱弱不堪——打不过日本人。然而，有了武器，加上训练，这样绝好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一旦拥有了武器，中国的知识青年就可以抵抗任何侵略者！[34]

冯友兰、闻一多很快都有机会重申各自的主张。离开大会时，冯友兰看见一个学生张贴反对参军的传单。他撕下传单，质问那个学生，持这种骇人听闻的观点的作者是不是真正的中国人。[35] 对闻一多来说，挑战来自左派的盟友：难道他没意识到，反诘的胜利无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难道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正被国民党的阴谋——引诱爱国青年脱离学生民主运动，加入国民党青年军，然后反对自己的同志——所利用并使之得逞吗？没有人否认他的错误，他为此懊悔不已。[36]

联大兵员超过了指标。据昆明的一家报纸报导，联大共有 303 名志愿者报名，加上五位教授，占学生总数 15%，其中有 28 名女生。[37]

蒋介石的征兵计划使联大教授对统治者的普遍怀疑表面化。闻一多的观点使教授主流派中的左翼颇为满意，但即便如此，梅贻琦也毫不掩饰他的保守看法。在一次专门召开的教授会上，他坚决认为，这支「知识青年军」会严格用来保卫国家，而不会偏袒某一方。训练应该由美国指挥官安排，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举行，并应该提高全体士兵而不仅仅是学生军的待遇。他还告诉教师，校务会议正在考虑制定计划，以军训作为大学生活的中心。学校将开设军事基础课。为便于开展服务于战争的活动，将裁汰冗余的课程。重点放在实地训练和武器运用上。为使学生能够承担新任务，膳食的营养水平也有待提高。[38]

令人疑惑的是，许多人对开展荒谬的军训这个建议充满信心。实际上，联大校方不停地向政府提出：「如果希望我们让学生打战，那就要提供必需的物资——粮食、衣物、武器，要认认真真地办事。」中央政府应承担培训和武装青年的责任，这个要求对重庆当局是个一

针见血的提醒，因为它既没有给联大翻译志愿者提供衣物，也没有发放军饷，现在却还要提供武器！这项计划的夭折也就不难理解了。[39]

在青年军存在的短短几年里，始终有争论困扰着它。根据昆明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的口述，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指出，学生「尤其对受骗加入所谓的『学生军』愤慨不已」。据说，百分之八十的军训是「用来镇压民主，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做准备的」。[40] 执政党可能认识到，不管在军事上占有多大优势，它在执行学生征兵政策的过程中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

教师的不满

在和战争有关的问题上，教师与国民党当局诚心合作，但持不同政见者还是不断增加。许多教授被迫由中立的自由主义转向更加激进的立场。对一些人来说，这个转变来得极为迅速。1943 年 10 月的一天，有个学生经过新校舍一间教室，听见闻一多高亢的声音。黑板上写着诗人田间的名字，他的诗作明快有力，令人惊奇，被称为「鼓诗」。朗诵过田间的〈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之后，闻一多高声说道：「我们沉醉在软弱的弦调里太久了，我们需要鼓的音乐！鼓的敲击使我们想到战斗。什么是鼓的时代？战争的时代！」[41] 田间的诗歌引起了闻一多的共鸣，使他想起从长沙徒步长征期间，湘西和贵州的部落民族粗犷原始的野性带给他的震撼。这次，他不再满足于把感情限制在学术竞技场上。那些听过闻一多激奋昂扬的战斗呼喊的人，不难领会其中的含义。有个人离开演讲厅，即兴吟了一首诗：「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42]

尽管闻一多准备加入革命先锋组织，但不同层次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选择也迥然有别。精明练达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就是一例。1944 年 1 月，张奚若告诉芸芸听众，蒋介石修订新宪法的建议，除了欺骗外国人没有任何意义。[43] 张奚若在私下对美国领事说，没有既定程序，就「没有法治，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自由，也就没有反抗被捕和惩罚的保障」。[44]

学生积极分子记得，同样是张奚若，在 1935 年一二 • 九运动期间，他没有站在他们一边，使他们颇为愤怒，而早在 1941 年，他曾把共产党比作政治躯体上化脓的溃疡。闻一多曾写过一首诗，讥刺联大的张奚若们采取行动：

新中国的学者，文人，思想家，
一切最可敬佩的二十世纪的经师和人师！
为你们的固执，
为你们的愚昧，
为你们的 Snobbery，
为你们替「死的拉住活的」挽救了五千年文化
遗产的丰功伟烈，
请接受我这只海贝，
听！[45]

像张奚若这样温和的改革派的沮丧表明，中国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者对时局已无能为力，这种状况费正清早在 1943 年 9 月访问昆明时就注意到了：

清华和北大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就是美国体制和科学水平的最佳代表，在中国仍毫无活力。至于中国共产党，其实质是，他们是极端反动分子。他们没有特别的办法推动国家进步。他们非常耐心地等待往昔通才教育的好日子再次到来。这可能永远不会发生。[46]

费正清没有说谁的名字，但他很可能会想起潘光旦这样的人，因为他曾告诫学生：「青年朋友，热情有余，理智不足，由于对现实认识不清，常常会做盲目的行动；我劝大家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对什么主义没有搞清楚，不要参加任何的党团——像我就是『独来独往』的。」[47]

战争期间，经过六七年的煎熬，像潘光旦这样的人也很难冷静地思考自己的无所作为。尽管如此，费正清还是一语成谶，就像他的老

朋友及北大－清华自由主义者的支持者所作所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费正清的判断，有两个显著的例外：一个是吴晗，他从来没有在外国生活过；另一个是闻一多，虽曾留美学习，但他对美国社会持负面的评价。

日益增加的持不同政见者

由于中国人对历史事件的当代含义非常敏感，利用历史做文章会在政治上受到谴责。意识到 1919 年 5 月 4 日学生示威游行的纪念日可以为学术上的抗议提供一年一度的机会，重庆政府便把青年节改为 3 月 29 日，这天是追随孙中山的七十二烈士的殉难日。其设想是，鼓舞年轻一辈认同为「国父」和执政党而献身的那些人的思想，而不是那些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文化反传统思想紧密相联的爱国思想。这种一眼就能识破的计谋只会使年轻人对国民党更加失望。

1944 年的五四

随着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临近，联大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热烈。无论官方是否把 5 月 4 日定为青年节，学生都坚决认为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据一份报纸报导，训导长查良钊虽然撕毁了学生的五四海报，却鼓励教师「根据各人情况停课」。[48] 联大常委会则更进一步宣布这天为「春季运动日」，为 1940 年以来联大第一个五四庆典创造条件。

纪念活动在 5 月 3 日晚上就已拉开序幕，由历史学会这个孕育左翼活动的温床主办会议。这项活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李晓通过同伙王康主持。将近三百名学生和二十位老师与会，他们就恢复 5 月 4 日为全国青年节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集会上发表讲话的名教授有行动主义者（activist），也有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前者认为 1919 年的北平和 1944 年的昆明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延续性；而后者认为，不应把五四的经验教训与当前现实相联系，只有在五四自身的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五四。张奚若第一个发言，为行动主

义者的观点树立了标尺。他拿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相比较，指出前者不过是表面的权力转移，而后者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思想、价值观和封建衙门，还挑战了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张奚若认为，由于这些邪恶势力仍然存在，现在的青年人必须继续奋斗。

周炳琳提出历史主义的观点。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也是国民党老党员。他回忆了当年示威游行途中的见闻，使听众很兴奋，但他暗示过去与当下没有相似之处。吴晗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今天的青年不能光往回看……要冲破今天所受到的束缚。」吴的观点遭到历史系主任雷海宗的驳斥，战争期间吴晗倾向左派，而他向右派靠拢。在他看来，为了自己，为了祖国，学生都应该坚持学习。「雷先生说得对呀！拥护雷先生呀！」有学生高喊，他们很可能是三青团成员。

这时，天开始下雨了。在外面听讲的人也挤进会议室。临近散会时，捣乱分子大叫道：「走呀！不开了！散会了！」他们闹哄哄散去之后，下一个演讲者闻一多严厉斥责这些年来一味埋头读书，然后对年轻的听众说：「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的大事，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去过问政治，就是『不幸』的事情。那么，我要问问：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呢？（他望望他的老朋友雷海宗，勉强地笑了一下）我不懂历史，我只知道，这不都是因为没有民主！」[49]

五四在学校全体大会中开始，梅贻琦在会上呼吁学生爱护学校的民主精神。当晚现场举行的五四文学论坛把活动推向高潮。预计会有大量的听众，活动安排在能容纳五百人的大教室举行。帷幕还没拉起，紧张气氛就蔓延开了。何达是历史学会活跃分子，被指为「赤匪」，被挡在讲台外。教室人满为患，不适合举办活动，这时主办者和右翼分子大声争吵起来。前者想转移到图书馆，后者则坚持在原地，因为他们占据了大部分座位。有人跑去图书馆占座位，有人待在原地不动。联络员来回跑动试图协商解决。最后，大家都聚集到图书馆。突然，断电了。图书馆陷入黑暗，论坛变成一场扔石子的斗殴。为弥合分歧，

中文系系主任罗常培赶紧申明，将召开新文学运动的学术研讨会。5 月 8 日晚上，昆明各地三千多人——老师、学生、公务员和报社职员——坐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趁着月光，聆听联大五位全国闻名的作家演讲，他们是杨振声、朱自清、冯至、闻一多和沈从文，还有翻译家闻家驷、历史学家兼剧作家孙毓棠，以及罗常培本人。

主办者总结了 5 月 3 日的经验，他们派纠察员维持秩序，并准备好两盏大煤汽灯以防断电。最后一位讲演者是闻一多，他发出战斗的号角：「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冲毁孔家店，要打倒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50] 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使一件事明朗起来：转移到偏远的西南边疆的华北知识分子准备扮演历史角色，充当唤醒大众的先锋。[51]

1944 年 5 月开始显现的骚动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天。这一学年即将结束，联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得知美国副总统亨利 •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将莅临昆明访问两天。就在华莱士 6 月 15 日抵达之前，吴晗委托何达通过某种管道向美国使节报告中国的真实情况。通过联合七家左翼壁报，何达制作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欢迎华莱士副总统！我们决心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西斯战斗到底！」这幅广告吸引了华莱士随从的注意，并被拍摄下来。学生的信息通过美国驻昆明领事威廉 • 兰登（William Langdon）传到华盛顿，他评论道，「学生由原先的冷淡转向抛头露面，至少在现今中国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52]

在一整天的会见中，华莱士倾听了联大教师的见解。午宴由兰登做东，副总统会见了梅贻琦、曾昭抡、张奚若、陈岱孙、黄钰生和雷海宗，还有罗隆基——三年前受蒋介石命令，他被联大解聘。据在场的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说，这些教授告诉华莱士，国民党领导已经「疲于奔命，腐化堕落，目光短浅，死气沉沉」，而共产党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其领袖更有精力、想象力和推动力」。[53]

傍晚，在北门街唐继尧公馆花园鸡尾酒会上，作为贵宾的副总统

听到学生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他们对执政党的批判比午餐时所听到的更加激烈。华莱士对在场的联大和云大师生说，他希望建立一个「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他在日记里写道，联大的教授「几乎全部毕业于美国大学」，「非常开明，同情中国共产党」。[54]

1944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七周年，日军正处在一号作战的顶峰。控制平汉铁路全线，并占据粤汉铁路，他们把自由中国一分为二。长沙已经沦陷，美国设在衡山的空军基地已暴露。在这种形势下，学生会和壁报联合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大会把两千多名听众吸引到云大礼堂。

当地政府曾试图阻止召开这次会议。他们无法说服云大拒绝借用其设施，也未能成功地把会议主题限制在非政治的学术范围内。最后，他们调遣宪警「维持秩序」，但是在主办者的要求下，云大校长把这群人赶走了。尽管如此，当潘光旦宣称知识青年应该关心政治时，熊庆来突然站起来表示反对。他用自己擅长的数学原理打比方，说学者应该遵守定律，而不是支持突如其来的不规则的变化。他不顾会议主席发言简短的要求，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直到学生嘘声四起。

闻一多坐在前排，抽着烟斗，婉拒了学生请他发言的要求。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惊呼，老师和学生当书虫的时间太久了，现在是表达他们正当的愤怒的时候了。他说，任何企图压制言论保护自身利益的人都是可耻的、自私的、有罪的。

「闻先生，您太误解我了，太误解我了！」熊庆来提出异议。

「不，我没有，」闻一多大声应道：「云南大学当局就是这样的！我们西南联大当局还不是这样的！胆小，怕事，还要逢迎……这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55]

到 1944 年夏天，闻一多已成为激愤的持不同政见者。8 月初，他和其它联大教授出席一场「时事座谈会」，这是由刚来昆明的第五

军军长邱清泉安排的一个社交活动。客人沉浸在美酒佳肴的欢乐中，为了不破坏祥和的气氛，大家都不愿谈严肃的话题，更别提有争议的谈话了。然而，闻一多绝非等闲之辈。他坐在头排贵宾席上，被尊敬地邀请发表高见。他当场大发雷霆。他说，在参加这个会之前，没有听到对邱清泉的评论，他曾经相信，无论其它地方如何令人绝望，军队里总有希望。现在他意识到自己以前完全错了。他想起中国的前途，不禁打颤。他说，要是局势仍然没有转机，那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革命！[56]

还是那个夏天，闻一多同意帮助训练自愿担任军队翻译的联大学生。鉴于是自由选择教材，于是他选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他坚持认为，作为语言教学工具和提升中国政府威望的方法，这本书非常有用，如果被人家知道中国最聪明的大学生连这么重要的文献都没有读过，肯定会很丢脸。[57]

昆明政治气候反复无常，谣言四起，人们无端地感到恐惧。北大和南开的教授获得一年的续聘之后，清华还没有开展评聘工作，有传言称某些有争议的教授将被解雇。7 月 30 日，《新华日报》称教育部已命令停止续聘闻一多和潘光旦。一星期后，该报公布了教育部的声明，对此坚决予以否认。但 9 月 4 日，《新华日报》报导说，联大学生和清华校友正集资支持闻教授和另一位「因故被解聘」的联大教授。另一位教授可能是指吴晗。[58]这件事以该报 9 月 20 日刊登的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的来函而告终。他指出这个报导「殊与事实不符」，并要求编者「停止散布无根据的谣言」。[59]

虽然获得续聘聘书，但闻一多的羽翼被束缚住了。他被免除教授会书记职务，改由三民主义青年团领导人陈雪屏继任。秘书处散布谣言说闻一多神经错乱，他的文章被枪毙、审查，或被国民党检查官任意删改。

联大与民主同盟

随着日本令人震惊的一号作战的巨大影响传播开来，在重庆，还有昆明，人们惶恐不安，纷纷要求根本改变。1944 年 9 月 15 日，共产党谈判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说，联合政府和军队一体化是问题的关键。四天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并易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40 年代初，作为既不属于国民党又不属于共产党的第三种势力，政团同盟现身于重庆的政治环境中。可是，在昆明，小党派实际上并不存在，政团同盟吸收了个人的力量，但不是团队的力量。随着日本占领桂林，罗隆基领导的民盟昆明支部就成了该组织左翼的中心。[60] 离开战时首都的政治势力范围，与青年党之类的右翼团体了无纠葛，昆明同盟决定扮演独立的、激进自由的角色，这使它在国内政治上向共产党的立场靠拢。其领袖有中共地下党员楚图南和周新民，也有政治上很活跃的著名教授，如联大的潘光旦、吴晗、闻一多、曾昭抡、闻家驷和王赣愚，云大的潘大逵，及服务于雨校的费孝通。昆明支部与省主席龙云有密切的联系，他成为阻挡国民党压迫的屏障。[61]

作为拥有各种「进步」知识分子的联盟，云南民盟没有任何思想观念的试金石。其成员有英美派民主人士，如潘光旦、潘大逵，还有罗隆基，他起草的民盟总部的纲领，主张「英美的政治，苏联的经济」，「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器」。但是，罗隆基不拘一格的改良作风遭到了民盟内部左翼的批评，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相比，他们更喜欢毛的新民主。[62]

到 1944 年夏，云南民盟对国民党的改革能力已不抱任何期望，开始设法联合对蒋不满的军事将领，以及像他们自己那样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取代蒋介石。在这种紧要关头，民盟与温和的改革者钱端升分道扬镳，其时他仍不愿放弃一线希望，那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将被迫退出政治舞台。[63] 然而，国民党未能遏制敌人一号作战的势头，也未能实施民主改革，使得温和派向左派靠拢。到 1944 年 10 月，据谢伟思（John S. Service）报告，

大多数留美的、具有民主思想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已不再尊敬和信任蒋了。[64] 与此同时，如高思（Clarence E. Gauss）大使所说，民盟和中共的关系已发展到「即便不是发自内心的喜好，也有精神上的共鸣」的程度，他们开始直言反对国民党。[65] 从 1944 年 10 月起，民盟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经济资助。[66] 战后，云南支部不仅得到了联盟内部成员的支持，还得到了同样反对内战、支持建立联合政府以取代国民党专政的人的拥护。

双十论坛

中国民主同盟的崛起标志着持不同政见者的日益增加，他们在昆明已颇有反响。1944 年 10 月 10 日，五千余人不顾官方的恐吓，参加国庆节论坛，盛况空前。在论坛上，吴晗、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楚图南和罗隆基都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闻一多生动地指出，中国有三亿人处在敌人残暴的统治之下，其余的人则在「政专于一党，权操于一人」的处境下生活。会后，紧接着发生了穿越昆明大街小巷的示威游行。[67]

双十论坛代表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即流亡知识分子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事实上的联合。特务被革职以后，龙云的宪警赶来维持秩序。接下来的 12 月 25 日，在蔡锷 1915 年起义（此举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的纪念大会上，双方加强联合的信号再次得到确定。纪念仪式的现实意义不言自明——龙云和其它「进步」军阀可能联合其它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摆出架势取蒋介石而代之。

在蔡锷起义纪念会上，大约有六千名教师、学生、市民、士兵和地方名流在云大操场倾听吴晗、罗隆基和闻一多的讲演。闻一多说，中国处在三十年前的境况下，「袁世凯能不死吗？」大会宣言由吴晗起草，经闻一多润色而成，痛斥国民党的政策：

纲纪废弛，贪污成风，这是我们的政治；商人的黄金让它冻结在国外，国内不值钱的通货，却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让它膨胀，这是我们

的财政；朋友得罪了一个，再得罪一个，这是我们的外交；借党化之名，行奴化之实，这是我们的教育；……至于军政，讲起来更令人痛心。[68]

终止一党专政、召开国民大会、建立联合政府，这纸公告实际上就是脱离重庆政府的独立宣言。会后，在参加过 1915 年起义的老革命的带领下，人群涌向昆明街头。[69]

就在同一天，发生了另一件事，将对云南新的左翼联盟产生巨大的影响——重庆国防部长何应钦在昆明建立总部。这表明中央政府的势力对事实上曾是龙云的独立王国的逐步渗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两股势力齐头并进：一方是地方政府和反国民党的力量；一方是中央当局和遏制反对势力的力量。这对于希望政治和平变革的人来说是个恶兆。

公共舆论

1945 年 1 月，云南批评国民党的一种报纸——《正义报》——请昆明八位著名人物（多半是联大教授）书面回答时事问题。[70]所有答复都认为日本有可能侵略云南，虽然不能说很有可能。这是一号作战所引起的悲观情绪的显著表现。恰当应对威胁的建议五花八门，有谨慎的「守卫」，也有激进的「武装发动人民」，后者是联大左派吴晗和曾昭抡提议的。考虑到有责任保持士气，没有一位知识分子领袖提到不可思议的选择——撤退到西藏去，其实这一方案已引起街谈巷议。

知识分子的日益不满在他们对下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显露出来。这个问题是：「过去一年，在国内或国际间有那些成功或失败的教训最值得记取？」联大经济学家伍启元的回答比较平和：

远在三年以前，学术界若干人士即曾指出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士兵的待遇减低，国家的战费实值减少，必然连累到战事。……本年夏至今，由于日军的进攻，经济危机完全暴露出来，而负责的人

又说今日只有经济没有危机，只有军事方面有危机……而危机发生了，还不知危机的发生……

吴晗则强调自欺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失败，在自欺欺人！……要成功先要从说老实话下手。」最显著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公的深入思考。伍启元指出，富豪阶层拒绝承担起应当承担的经济负担。王赣愚对此表示赞同：「战时的全国人民，注定是要吃苦的，但所重的是公平。」

八位被调查对象都很悲观。连温和的政治学家崔书琴都在琢磨，中国是像法国一样走出战争的阴影，团结一致恢复生机；还是像希腊一样滑入内战的泥淖。史学家蔡维藩列举了盟国近来在缅甸和滇西取得的胜利及其它地方大规模的失利，并隐晦地写道，「国内和国际因素」相互交织，如果胜利，则应归功于盟国的强大，而失败是中国弱小的结果。

除了在地理上把中国分成两半，一号作战也使全国舆论对重庆政府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个又一个作者揭露政府的腐败无能、盲目自欺。王赣愚认为，「心理压抑的现状」是「滥用政治权力」造成的。重庆政府与昆明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逐步扩大。

批判社会经济不公最严厉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自身十分贫穷的人——李广田、吴晗和闻一多。李广田从 1941 年开始在联大师范学院担任专任讲师。他出身贫寒，是个农民的儿子，中学时代参加共青团，战时从济南转移到昆明，目睹穷困饥馑和冷漠无情的人类生活。[71] 吴晗曾是清华少数贫困生之一，当时正艰难地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

在联大这个小世界里，几个人就可以改变舆论的气氛。战争后期，除了闻一多，还有历史系同事邵循正和向达，人类学家费孝通及其哥哥、法学家费青，他们都受到吴晗的影响。[72] 在更广阔的思潮中，吴晗的圈子只不过是个漩涡。据联大历史系教授孙毓棠后来的回忆：

人们思想是在五光十色的转变中。原来不反国民党的变为要反国

民党了，原来不问政治的变为激进的人了（如闻先生——指闻一多），也有原来是纯学者而后来变为很反动的（如雷海宗）。这些转变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统治腐败、社会不满所致，但也由于共产党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等进步党派（均受龙云保护）暗中活动宣传所致。[73]

孙毓棠本人就是发生这种蜕变的典型。战初，他和他的妻子、演员凤子已是昆明戏剧界的中坚人物，也是这座城市沙龙的成员。然而，到 40 年代中期，孙毓棠却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社团——十一学会——的成员。

潘光旦把社团命名为十一学会，是因为「十一」这两个汉字组合在一起就是「士」（知识分子），其成员包括几位资深教授，如潘光旦、罗隆基，还有担任青年赞助人的张奚若。青年成员有历史系教员丁则良、外文系教员王佐良，及孙毓棠。聚会定期举行，由会员和客人宣读论文，但最后这个社团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学术活动成为掩饰其真正的时事论坛的门面。为避免怀疑，十一学会还有意邀请右翼的陈雪屏和雷海宗讲演。

所有会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只是所宗奉的自由学说不尽相同，青年当中有几位偏向左派。然而，即使在年轻人当中，观点也迥然有别，从丁则良的激进主义到哲学系讲师王逊的谨小慎微，不一而足。虽有各种政治派别拉拢，但该社拒绝承担任何事务。在一次聚会上，潘光旦提出会员参加中国民盟的问题。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随后都接受了王逊的意见，他们应该坚持学术和无党派。然而，在闻一多加入社团后，聚会变得纷乱起来。1945 年初，十一学会和《自由论坛》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一系列公共论坛，讨论人有燕树棠之类的保守者，也有罗隆基、张奚若和潘光旦这样的激进派。这些讨论激发了大家对时事的热情。[74]

另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团体，明显不同于十一学会，它以青年经济学家伍启元、杨西孟和戴世光为中心，还有人类学家费孝通。蒋介石从 1943 年 12 月 1 日召开的开罗会议归来后，《大公报》刊登了一

篇文章，使这几位经济学家闻名全国。他们发出警告——中国还将继续抗战，但由于政治机制腐化，军队效率下降，通货膨胀正威胁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而既得利益者仍逍遥自在，穷人却越来越穷。这个分析报告在重庆内部引起争论，但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两年后，这群经济学家写文章呼吁对富人征税，并实行其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这回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邀请伍启元和杨西孟去战时首都担任顾问。在梅贻琦的敦促下，他们提出，除了报销飞机票和寄宿费外，不拿薪水。他们提请宋子文取缔暴利，反对战后像近来在自由区控制民众一样对待百姓，并敦促厉行遏制通货膨胀。回到联大后，他们发表了第三篇文章，宣传上述观点。

在第四篇文章中，他们提醒政府，革命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采取行动，其它人就会掌握主动权。这是一群经济改革者孤注一掷的呼吁。他们表示，不希望国民党领导人走到最后才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自救。像吴教授和杨教授这样忠诚的专家治国论者的幻想逐渐破灭，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后期政府彻底疏远昆明中间道路知识分子的结果。[75]

民主青年同盟

在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欣然接受共产党的同时，一群联大和云大温和派为保护民盟的利益，奋力反对共产党的侵入。问题在于，新成立的青年同盟是隶属民盟还是共产党。李文宜女士是中共地下党员，于 1943 年 10 月加入民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动建立独立的青年组织，据她观察，在亲近民盟教授闻一多和吴晗的学生中，不少人要求参加民盟。中共地下党情报员、云大的周新民负责民盟的组织工作，因此他向党提议，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青年同盟，吸收新成员。在他们看来，民盟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并不适合这些政治上很「单纯」的青年，于是周新民和几位年轻同事起草同盟简章，规定「民主青年同盟是进步群众的团体，在先进的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76]

为掩盖其活动，中共通过中国民主同盟控制了民主青年同盟的所有准备工作。吴晗是关键人物。他负责指导民盟的青年工作。他在联大历史系和几位激进学生讨论问题，其中之一是他的学生、共产党员袁永熙。袁赞成组建青年组织，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77]

从共产党情报员马识途的回忆中可以把中共的意图看得一清二楚，它计划把民主青年同盟转变为共产党天然的后备力量：

一九四四年底，……等同志发起搞一个青年组织。起初，他们在民盟的吴晗等教授那里商量过。当时民盟想搞他们的青年组织，但是他们没有群众基础。一九四五年初，在云南省工委的同意下，王汉斌、洪季凯等同志在联大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第一支部。[78]

中国民主同盟的坚定分子，如罗隆基、潘大逵和潘光旦，都相信青年同盟应该属于民盟。他们认为，由于民盟的人和民青成员是师生关系，民青在逻辑上就是民盟的周边组织和预备盟员，就像共青团之于中共。然而，在吴晗等人的支持下，参加民青的中共地下党要员楚图南与青年同盟成员辩论了一天，最终同意民盟和民青的关系类似于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关系，但不是父子关系；还把民盟的作用限制在革命的「民主」阶段，但就长远而言，它没有权力引导青年。[79]

民主青年同盟于 1945 年初正式成立，在滇池游船上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支部以袁永熙为首。第二个支部成立于 1945 年 5 月，其领导马识途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有四位同党。共产党已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先锋组织，并巧妙地掩盖了它存在的痕迹，以至于政治观察家仍认为民青是附属于民盟的，至少在战后初期是如此。[80] 实际上，随着民青队伍的壮大——除了联大各院系，还在云大、中法大学及部分中学建立了分部——民盟和民青成员之间的师生关系增强了共产党对这两个团体的影响。[81] 民盟和民青合作无间，相互支持，由于政治信念和组织的重要性，共产党坚决认为联合政府是避免内战的不二选择。

戏剧的复苏

在表演艺术方面也明显可以看出左派已东山再起。新四军事件后，中共地下党员的撤退使激进的剧团深受打击。失去对手的刺激，三青团的演员也没有了动力。但是，左派开始重建。联大剧团组织部分没有逃难的成员，联合其它剧团的演员，上演了共产党剧作家宋之的编写的《雾重庆》和《刑》，这两出戏都「揭露了国民党黑暗的反动统治」。[82]

与此同时，联大激进的戏剧传统在流亡途中兴盛起来，这是新四军事件后逃离昆明的活跃分子在中国西南部各角落活动的结果。他们深入各种军事机关，然后由表演团体巩固力量，从 1942 到 1945 年他们利用暑假到滇南部队慰问演出。1944 年春，随着一些藏身乡村的党员的回归，昆明左翼剧场开始焕发生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激进的戏剧额外得到了国民党官员查良钊的鼓舞，他以训导长身分要求刚回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施载宣（萧荻）为学生志愿军安排一场演出。在新老成员的配合下，施载宣组织排演了夏衍的《草木皆兵》。这次成功的演出使他相信，三年前因《阿 Q 正传》引起轰动而建立的传统可以再显活力。到 1944 年秋，左翼控制的联大剧艺社已准备就绪，拥有三四十名学生社员。[83]

为纪念联大成立七周年，新剧团表演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随着社团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它不仅能够排演自己的剧目，还能推动中学开展戏剧活动，并协助昆明专业剧团演出。社团还办有《剧艺》壁报，并参与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84] 1945 年春，军事上的惨败意外地使昆明剧场增加了新的团队。为躲避日本的一号作战，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到达昆明时已一无所有，但热切盼望演出。联大剧艺社全力支持这个新来的团体。这个逃难的表演团把活报剧搬上舞台，讽刺了滇缅公路上的走私者，这群人利用国难中饱私囊，并唱着〈茶馆小调〉之类的歌，这首歌抨击了执政党的腐朽和压迫。[85]

尽管联大话剧在战争后期有所复兴，但从来没有像新四军事件前

那样充满活力。在日军炮火轰鸣的形势下，《阿 Q 正传》和《野玫瑰》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极大的成就。1944 年开始的左派霸权使说教类的戏剧存活下来，为避免党派争议毁坏了早期的作品，但霸权不能代替对峙势力下公开竞争的促进作用。

学生自治会的振兴

联大中期左右两派斗争主要的竞技场是学生自治会。自治会似乎不像政治辩论场所。在中国高校，作为官方许可的学生政治积极分子团体的替代品，学生会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但是，即使这个毫无恶意的形象，在联大组建学生自治会初期却费尽周折，从学校当局的阻扰、重庆的威逼利诱，到学生滥用论坛趁机约会异性会员，不一而足。[86]

教育部规定，学生自治会一旦成立，就得「根据三民主义管理学生思想发展，不得参与校外活动」。[87] 起初，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控制下，联大学生自治会遵照官方准则办事。例如，1940 年 2 月寒假，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开展兵役宣传。[88] 新四军事件后，自治会成了三青团领导下的日常事务执行机构。一名 1943 级联大毕业生回忆，自治会「实际上毫无作为」。[89] 有个左翼学生领袖记得，三青团密探：

> 趁新四军事件后进步同学离校之机，把持了学生自治会，找些公子哥儿的人物帮他们撑门面。但他们号召的事，同学们不听，同学们要做的事，他们不干。……学生自治会办公室整天关门，常年不见人，不干事。大多数同学都对它不感兴趣，不闻不问。所以，那几年学生自治会可说是名存实亡。[90]

1943 年秋，梅贻琦呼吁健全社团。学生自治会召开学生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委员会，开始显露出复苏的迹象。[91] 然而，在 1944 年的政治复兴中自治会无所作为。相反，联大学生活跃分子寄希望于报协主持七七纪念大会。但是名目繁多的政治联盟并没有成为左派可信赖的工具。因此，在 1944-1945 学年初，一个新的、严格挑选的组

织——报联，「代表了联大进步的舆论界」。[92]

1944 年秋，为控制学生自治会，联大内部开始出现争斗。根据社团章程，最高选举人是班级代表大会，每二十名学生中选出一名代表，每学期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左派在上个学期就开始在幕后活动，主张选举真正一心一意为学生服务的代表。三青团意识到，它已不可能依靠一群对胜负无动于衷的选举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取胜利。为应对挑战，它在法律系、政治系和师范学院等「势力范围」活动以争取支持。两派争夺的首要目标是不明底细的大一新生团体。

选举结果是左派和中间派获胜，但获胜的程度模糊不清，因为工学院规模相当大的代表团的政治意向尚未明确。新任代表召开大会选举理事，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标志着联大学生政治步入新时代。十七名成功当选的理事都是「进步和中间同学，其中有地下党员」。[93]

为赢得信任，新当选人立即着手解决学生生活的头等大事：伙食。住在新校舍的同学自愿结合，每百人左右组成一伙食团。在学生自治会膳食委员会的协助下，第一次有早餐提供给曾经不吃早餐的学生。委员会成员负责到边远地区购买廉价但可以食用的大米。学生自治会还出版通讯，定期举办论坛，邀请教授演讲时事。发表在自治会刊物上的报导，提高了学生的觉悟，促进了学生运动的开展。[94]

1944 年 12 月 26 日，与共产党联系人一起，学生自治会精心组织了「护国纪念」活动，其中中共的常委会委员齐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看来，这是冲破国民党控制上街游行的大好机会，国民党当局为贬低护国纪念的意义，把它改为地方性的庆典，而非国家庆典。共产党还利用重庆与云南之间的矛盾，通过这次庆祝活动与龙云加强联系。[95]

通过校内外一连串成功的活动，左派领袖声望陡增，在春季学期自治会选举中，左派领袖席位增加。新任领导人在胜利的鼓舞下信心倍增，于 4 月 6 日代表联大全体学生发出电报，要求中止一党专政、

召开国是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由于自治会以前从未发表过这种声明，而且这个立场与共产党的主张完全一致，这封电报引起了剧烈的争论。一连串激烈的议论被贴到民主墙上。有人直接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联大全体学生发言，并质疑其发表政治宣言的权利，但绝大多数院系和班级团体、壁报及学生组织都支持这一举动，而这种支持为学生卷入整个自由中国的国是问题创造了条件。

1945 年的五四

利用这种支持，学生自治会领导人计划把五四纪念活动弄得比去年的庆典更加隆重。[96]活动将延长为整整一个星期，从 4 月 30 日开始，有音乐会、诗歌朗诵会、文艺座谈会、戏剧演出、自治会刊物和壁报专刊报导及体育比赛等。5 月 3 日晚上将举办中国青年运动论坛；5 月 4 日下午将召开纪念大会，接着是师生晚宴、火炬竞走和篝火晚会。每个项目都超出了大学范围，使整个群体都参与庆祝活动。国民党当局警惕地关注着这些计划，并迅速先发制人。结果，五四变成不止是对一次历史性事件的纪念，它成为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名声日益败坏的统治者与慷慨激愤的青年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的目标。

在联大，5 月 4 日被定为值得庆祝的假日，这已是去年的事。1945 年，昆明各中学提出这个问题，联大各院系大批学生和即将毕业的学生决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自己放一天假。国民党省党部为控制局势，向地方当局和校方施压，要求严加防范「昆明『奸党』煽动学生的……不轨行为」。[97] 谣言传来，说联大学生计划动用武力。当地和中央国民党党部都命令「采取严厉措施防止学生游行」，并命令龙云把这一指示传达到各治安机关。在去年 12 月 26 日的方案中，龙云的宪警组成保护游行者的方阵不得再次出现。官方的阻止并不局限于警告。在长达一周的纪念活动准备工作期间，三个男人——两个穿制服，一个自称是校友——突然闯进自治会办公室，翻查文件，抄录理事姓名和住址，并殴打一名学生，扬长而去。有传闻称，穿制服的不速之客是重庆政府派来监视五四庆祝活动的特务。[98]

联大和蔼可亲的训导长查良钊向学生自治会领袖保证，学校当局不会干涉学生校内活动，但他警告，如果发生示威游行之类破坏公共秩序、违反战时规定的事，将严惩不贷。自治会的反应是，加倍努力动员群众，组织纠察队，在基本上准备游行的同时，物色有相当地位的朋友向当地政府疏通，并阻止龙云干预。[99]意识到恐吓并不足以控制事态，当局亮出最后的王牌：利诱。5 月 3 日黎明前夕，他们贴出通知：为庆祝五四，昆明三家大电影院向联大师生免费赠票观看下午和晚上的电影。学生急忙吃完早餐，赶到训导处外面排队领票。[100]左派组织立即在训导处门边墙上贴出「大字报」，抵制这个活动。「大字报」称，免费票计划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阴谋诡计，其实是国民党省党部利用公款买的票。

看到这则告示，有学生当场把票撕掉，并把票根贴在墙上；工学院学生决定全体拒绝赠票，并用数学公式说明其原因：「电影票钱＝一斤猪肉＝大学生的灵魂？！」随着公众舆论的传播，迫于同济的压力，训导处前面的队伍逐渐散去。与此同时，一场自发的运动突然兴起，大家把票送给贫民和伤兵，而不是一撕了之。赠票就发于新校舍大门处。接受者主要是昆明衣衫褴褛的流浪儿童。关于电影票斗争最后的话是联大的历史类比大师吴晗教授说的。他说，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对逮捕他的人说：「别杀我，我会给你一个王国。」在中国，却是「别开会，我会给你一张电影票」。[101]

5 月 4 日早上，在整座城市，士兵和警察随处可见，联大的五六个侧门也不例外。离云大校门不远处停着几辆卸下石子的军车，有谣言说那是用来袭击游行学生的。然而，动武的迹象未能威慑住数千名大、中学生涌向云大操场，参加下午一点钟的集会。

正当大会要召开时，天开始下起雨来。学生冲向避雨处。组织者催促闻一多召集大众。「同学们，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闻一多开腔。他的故事上溯到公元前 12 世纪，周武王集合部队准备推翻罪恶的商朝统治者纣辛。在进攻发起之前，天下雨了。有人说，这是一

个恶兆，因此必须推迟战斗。但官方占卜者不以为然。他说下雨是个好兆头，是上天在洗兵器。闻一多大声说：「我们今天也碰上了这样的机会，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回来，走近来，勇敢的人站过来！」[102] 闻一多的演讲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大家重新聚集在一起。他们倾听闻一多的亲密战友吴晗和云大激进的社会学教授潘大逵发表演讲，这时雨过天青。

大会最后，学生列队大摇大摆地走向昆明街头。途中，教师、店主、公务员和其它工作者及当地学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估计有一万人。在游行的同时，他们高喊口号，反对一党专政、支持民主和联合政府。不过，在国民党省党部，卫兵走上来阻止学生在墙壁和军车上写口号。纠察员出面介入以防发生冲突，游行者大喊，「实行民主！改善军人生活！」士兵退去，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游行坚持了四个小时，贯穿整座城市，然后回到云南大学。最后，闻一多发表告别演说，「『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103]

数十年前，1919 年的五四游行促进了全国学联的成立。1945 年的五四游行则产生了昆明学联。在队伍解散以前，游行学生选举共产党员、组织者齐亮担任学联主席。[104]

为了对五四在学生运动中的先驱作用致敬，那个星期的活动以表彰它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贡献而告终。5 月 5 日晚上，大众集会，十来位昆明文艺名家，多半是联大教授，讨论了「新文学」的各种问题。「新文学」包括左派作家鲁迅、艾青和田汉的作品——向提升了政治异议主旨的革命文化敬礼。[105]

转折年代

从 1943-1945 学年可以看出一股联合力量：

1、形势越来越明显：重庆政府不仅不愿也不能坚决处理失控的

通货膨胀、官吏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更糟糕的是，它还不能阻止日本人对自由中国的进攻。

2、这些现实引起部分师生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现状的日益不满，使联大变成唤醒民众的策源地。

3、愤懑促进了大学群体内反对派组织的发展——除了左派在社团中的全面复兴，它的力量还渗透到大学各个角落，此外，还有青年教师组成的十一学会和崭新的学生自治会。在这股浪潮中，以采取新的活动策略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最为显著。

4、中央政府与龙云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敌对情绪加深，后者逐渐与持不同政见的联大和云大知识分子联合。

5、最后，蒋介石及其右翼的同僚日渐相信，除了动用武力，不能解决任何危机。

事态的发展预示着，一旦战胜日本，蒋介石把注意力转向巩固其国内政治大本营时，在昆明爆发最后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

十六 完成使命：1945－1946 年

战事结束了，我们反更不耐常住在昆明，盼望能回北平。——江泽涵致胡适函，1945 年 9 月 2 日〔应为 9 月 3 日。〕

1945 年 8 月 15 日，梅贻琦和冯友兰在云南省财政厅厅长家晚宴时，主人被请去接电话。接过电话后，他回到餐桌对客人说，日本已经投降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欣喜若狂，但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隐隐觉得中国抗战之后的道路并不平坦。[1]

对中国未来的担忧并没有使联大放缓迁回战前平津校园的脚步。在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大家已普遍相信这件事已经发生。8 月 13 日，联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该学年上学期在 11 月底结束，为北上复员做准备。[2] 在抗战胜利日的早上，《观察报》的头条新闻是：「联大要搬家——预定本年内迁回平津。」[3]

据报导，大一学生比平常更少，将于 9 月 3 日开学。大家都以为，这将是在昆明的最后一学年，甚至可能是最后一学期。尽管猜测年底才搬迁，老朋友之间已开始谈论「复员」和「回家」的事情。他们相互打招呼时已不再问「还好吧？」或「吃了吗？」，改问「走那条路？」或「有什么东西还没卖吗？」工学院学生计算出走滇越铁路返回所需的时间，及一艘船可承载的人数与行李的重量。刚毕业的学生与学弟学妹交谈时，不免有几分忌妒，因为他们很快就能回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传奇的清华园继续学业。[4]

抗战胜利也使联大高层发生了重大的变动。8 月 23 日，联大常委会任命以郑天挺为首的五人小组制定北返复员计划。两周后，梅贻琦去重庆参加教育界的复员大会。10 月 24 日，早已厌倦学术行政工作的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改由傅斯年暂代。11 月 21 日，与被提名加入常委会的清华物理学家叶企孙和北大佛学家汤用彤一道，

梅、傅在北平考察各自学校的恢复情况。[5]

由于战后调整的繁难日益明显，联大便把复员日期推迟到 1946 年，具体时间待定。不过，另一批战时在昆明生活的五万余名旅居者，则不慌不忙地离去。抗战胜利后，与迅速的复员步调相一致，美国把军队撤出昆明，动作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菲利普·斯普劳斯（Philip Sprouse）领事可以和所有剩下的美国人一起在他的餐桌上共度圣诞。[6]

离开之前，美国人已经在昆明和联大留下了印迹。无论什么时候走上街头，他们都很容易被认出来。魁梧健壮、随意花钱的外国士兵引来了各种反应。1943 年来到昆明的一位美国红十字会工作者，招募联大女生和美国大兵跳舞，先教她们舞步，末了有同伴陪她们回家，最后，这一活动随着怀孕人数激增而停止。[7] 1945 年 3 月，当地一所大学在校门上贴出通知：任何前来访问女生的士兵都得向训导长报告。另一则用英文写的通告则禁止男士进入女生宿舍。对此，有个报纸专栏作家评论道：「显然，不懂英语者不在此列。」[8] 醉醺醺的美国大兵及其中国女友乘坐敞篷吉普车招摇过市，这种现象在昆明不如重庆那样常见；然而，人们下意识地认为，凡是与美国士兵厮混的女知识青年与妓女相差无几。

另一方面，联大群体和美国军队在某些事情上进行合作。他们曾经一起打垒球、打篮球，举办田径运动会。[9] 由联大工学院院长主持的清华服务中心，在盈利的基础上为美军提供木材和其它服务。联大心理学家曾为战略服务处的中国空降兵做过咨询。由联大社会学家吴泽霖负责的战地服务团曾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国军队培训学生翻译。受训者包括 1944 级全体男生。在英语系系主任陈福田的指导下，服务团还为同盟报纸《战区服务指南》监听新闻。在费正清五千美元的军队专项服务基金的安排下，一些联大教授给美国大兵授课，赚取急需的收入。[10] 与美国团体有过接触的一些联大学生受到民族或种族歧视，许多人对美国人挥霍资源十分吃惊；但他们对美国军队的整体评

价是，这支部队实力强劲效率高，与中国军队相比尤其如此。从这些钦佩的印象中，有时可以体会出其中含有的嫉妒和愤恨。

除了翻译人员、服务组织成员和培训教师，此外联大几乎没有人与同盟国人员有过哪怕是最表面的接触。有些教师与美国人交朋友，尽管他们不是典型的美国大兵。历史系教授孙毓棠指导罗勃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学习司马迁的《史记》，他出生于中国，是美国空军情报局上尉。[11]一群留学美国的教授，包括政治学家钱端升和张奚若，在北门街美国领事馆一起聊天、打桥牌，情趣相投，其乐融融。他们还为战时中国某些最敏感的外交情报报导提供原材料。

许多联大学生在黑市上购买美国大兵的夹克衫和太阳镜，经常出入昆明市中心的英美图书阅览室，但几乎没有人遇见美国人。邂逅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人更是寥寥无几。只有极少数年轻的美国大兵越过横在城北校园和城东空军基地之间的无形障碍，一等兵海曼（Pfc. Howard S. Hyman）是其中之一。基地布告栏上的通知把他和几位同伴吸引到联大南区学生服务中心参加茶会。在那里，他们与六七位联大学生缔结友谊。他所不知道的是，对方至少有三人是中共党员。通过他们，海曼及其朋友了解到「另一个」进步的、爱国的、廉洁的中国。最后，他和同伴在空军基地举办了一个论坛。在论坛上，他的新朋友们向数十名美国大兵介绍了激动人心的延安的故事——直到海曼发现自己已受到美国军情人员的调查。[12]

不管与美国人交流有多深入，联大几乎没有学生像他们留美的教授那样认同美国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例如，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出现问题时，不少中年教师都不情愿接受对美国的负面评价；有证据表明或有意识形态让他们相信华盛顿犯了错时，学生基本上会毫无顾忌地斥责美国无伤大雅的缺陷。罗斯福总统在世时，对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他是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象征。他去世以后，无论谁多么倾向于中国的战时盟友，都越来越难以否认，美国对华政策是偏向于支持国民党的（把史迪威将军

从中国战场召回美国一事就已很明显）。

一二·一运动

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大肆宣扬美国帝国主义与反动的、蓄意发动内战的蒋介石政府罪恶的勾结，更加强了美国的负面形象。另一方面，随着党员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昆明的中共地下党准备更积极地参与当地政治。

中共联大支部成立于 1939 年初，最初只有六名党员，到 1941 年大约有六十名。新四军事件后，党员疏散到乡村，联大的中共支部也就不复存在。由外地调来的几位青年骨干和少数留守的未暴露身分的同志承担起艰难的重建工作。他们以「勤学、勤业、勤交友」为方针，成为模范学生和不可或缺的社团，从创办学习小组和壁报开始，他们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学生会，最初是班级和系组织的领导，最后，在 1944 年，成为学生自治会的领袖。民主同盟成立于 1945 年初，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即便不说受其控制。到这年秋季学期，地下党及其先锋组织和联盟团体，已成为联大政治和课外生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13]

中共在联大和云南绝大部分地区能东山再起，部分原因是它充分利用了龙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龙云成了共产党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与国民党政权的缓冲屏障。毛和蒋在重庆谈判期间，是战是和悬而未决，这个问题取决于蒋能容忍这个敌对的、半独立的政权在这个战略性边疆省份持续多长时间。

10 月 2 日，答案出来了。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第五军闯入龙云的住所。到 10 月 6 日，龙云挂着虚衔前往重庆，云南被蒋介石任命的人牢牢控制。龙云有名无实的继任者卢汉到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于是云南的政治权力落到国民党保守的 CC 派成员李宗黄之手。黄埔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和第五军新军长邱清泉控制军权。在一大批党政机关、情报和警察部门及特务系统被中央势力接管

后，他们一致决定摧毁云南作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堡垒之声誉。最使云南新任统治者头疼的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聚集在联大和云大。这为最后的决战埋下了伏笔。

危机突然降临，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共两党是和平解决分歧，还是动用武力决定中国的命运？八年血战过后，联大师生坦言对和平的渴望，更直言不讳地指出避免内战的责任就落在国民党肩上。在这群批评者众目睽睽之下，国民党一意孤行，走向不祥之路，它依靠美国的培训和后勤支持为战争做准备，却不承认共产党是联合政府的正式成员。

就在日本投降前夕（1945 年 8 月 13 日），闻一多和吴晗在「从胜利到和平」集会上宣称，美国正「加紧压迫」中国。得知这个评价之后，联大学生自治会给美国总统哈利 • 杜鲁门和国务卿詹姆斯 • 伯恩斯（James Byrnes）发电报，呼吁他们把美国鼓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政策颠倒过来，转向支持共产党。[14] 然而，这种吁请石沉大海。蒋介石利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持，对华北共产党占领区先发动进攻，中共部队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转移到满洲。有些人，尤其是资深教授，他们责难国共双方，而许多人赞成政治学家王赣愚的评论，「共产党解放区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查《一二 • 一惨案特辑》（第 31 页），这句话是闻一多说的。〕和平的危险来自怀有「武力统一的梦」的国民党主战分子。[15] 连王赣愚的同事、西化的自由主义者张奚若也带头主张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16]

舆论的浪潮在反内战集会上达到顶点。这次集会由昆明四所院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计划于 11 月 25 日晚上在云大礼堂召开。但在邱清泉将军的威胁下，云大校长熊庆来命令取消集会。对此，主办者把集会地转移到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17]

组织者经过慎重考虑，没有邀请被认为支持共产党的左派教授，如吴晗、闻一多。相反，教师演讲者有两位是国民党改革派（钱端升

和伍启元），一位自由主义人类学家（费孝通）和一位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云大社会学家潘大逵）。尽管如此，在集会过程中，枪声仍在聚会地点上空鸣响，室外照明用电也被切断，国民党特务还试图控制讲台。不可思议的是，这次集会没有发生暴力事件，但党棍和士兵一直持枪封锁回城的街道。第二天早上，国民党的官方喉舌《中央日报》竟说「午夜枪声」是「西郊匪警」所为。

对此，昆明所有大学和大多数中学举行罢课。11 月 30 日，愤怒的学生穿过城镇宣传罢课原因时，遭到士兵、警察和特务拳打脚踢刀戳枪击。第二天，也就是 1945 年 12 月 1 日，学生还在学校重整旗鼓时，士兵和便衣警察就用石头和棍棒发起攻击，并两次使用手榴弹。手榴弹夺取了四个人的生命——在联大大门外有一位中学教师，在联大师范学院有两位联大学生和一位中学生丧生。这四名受害者被称作「四烈士」，这起事件被称为一二・一运动。

在以前从未受到侵犯的校园杀害学生，这是在抗议烈焰上火上加油，罢课的激情四处蔓延。四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图书馆。全中国发来唁电，寄来挽联和感情炽烈的诗歌，它们沿着许许多多花圈陈列在棺材周围。学生剧团到周边的乡村表演匆匆忙忙完成的戏，这出戏的主角是四烈士中唯一的女生潘琰。

政府官员进退两难。由于四个无辜的青年已经死去，动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政治解决仍难以服人，而同情的表态会被误导。在悲剧发生的第二天早上，警备总司令关麟征来到图书馆，脱帽向死者鞠躬。他误把肃静当作殷勤，开始发表讲话，却被学生簇拥着从图书馆赶出前门。

学生要求撤除对这场悲剧负有责任的官员的职务，矛头直指关麟征、国民党头目李宗黄和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就在惨案发生当天上午，云南籍将军卢汉就任省主席。他无力，或许也不愿果断采取行动。相反，惨案发生三天后，他才出任首席法官开庭审讯。李宗黄和关麟征坐在他旁边充当「陪审员」，他审理了四名被告的证词，他们把死亡

归咎于学生的挑衅和未被逮捕的共产党特务的阴谋。这个审判被普遍认为是个摆设，随意抓两只替罪羊的处决无法安抚任何人。

学生罢课一直持续到 12 月 25 日。由于担心失去持同情态度的温和派的支持，罢课学生回到课堂。这时，被杀害的青年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局不允许举行葬礼，仍然陈列四烈士遗体的图书馆就成了成千上万的朝觐者表达敬意的圣地。

地方当局最终同意举行葬礼。3 月 17 日，估计有一万两千名吊唁者穿过昆明曲折的老街，在祭坛边，走过一群群同情的旁观者，然后停下来，六个钟头后，四烈士被埋葬在新校舍东北角。

在国共两党关系急剧恶化的冲突中，一二・一运动成为标志性事件，成为文献日繁的汉语文学主题。[18] 这里我只探讨这次运动对联大历史的意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联大，那就是「自由」。在它存在的整整九年时间里，说联大是自由的，包括下列几重含义：它是通才教育的中心，思想多元相容并包，继承了训练它绝大多数资深教授的大不列颠和美利坚的民主传统。

抗战初期，联大的政治自由主义被对蒋介石独裁的国民党政府的忠诚所掩盖。不过，这种忠诚是视情况而定的，当时是因为蒋介石成功地集合了全国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一旦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自由主义者就开始估量重庆政府——用西方民主的标准，也用传统中国政府的准则。渐渐地，大家发现国民党专政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在一号作战后，蒋介石连保卫自由中国的领土，阻止敌人进一步侵略，这样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满足，这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信心都销蚀得一干二净。日本战败后，没有人能找到任何理由继续支持一个蓄意发动内战的独裁政府。政治现实以自由原则为基础，这就迫使联大师生不得不反抗国民党。

抗战后期，对于一些人，尤其是未曾留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英

美自由主义开始失去吸引力。而且，他们没有在南京政府平静祥和的岁月里度过童年的印象。他们也不再把美国看作反法西斯同盟的拥护者，相反却成了法西斯式的国民党的帮凶。更有吸引力的是温和的共产党的方针路线，它祈求统一战线、联合政府和「新民主」。「新」和「民主」的并列使人们想起五四时期神圣的保护符。谁会怀疑一种「新」民主不是对「旧」民主的超越呢？虽然没有人完全理解毛著的含义，尤其是它由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但年轻的读者（和一些不很年轻的人，如吴晗、闻一多）发现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中国式民主，在延安汇聚了进步的、爱国的力量。最后，共产党及其先锋组织的一小撮人，对该党所理解的马克思理论达成了郑重的承诺。因此，在不同的程度上——一小部分中年教师，更多的青年学生——一二·一运动是政治自由主义衰退的重要阶段，也是统一战线版的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的重要阶段。

然而，日益增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魅力，却没有共产党对学生政治组织的控制来得重要。他们巧妙地把各个阶段的抗议风潮推向成功的顶点，共产党及其联盟再次赢得尊敬，因此这种控制在一二·一运动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虽然共产党没有提出罢课的设想，但他们热烈支持这种普遍的要求。但是，随着罢课的进行，他们意识到，在国民党当局威胁解散大学之前，回到课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共产党采取主动，首先放弃惩罚李宗黄和关麟征的前提条件，接着允许以梅贻琦和熊庆来发表声明取代要求《中央日报》收回谎言。

在有效的策略和革命的纯洁性之间，共产党更喜欢前者，这样一来它就挫败了左派顽固分子，并掌控了中间路线派。连那些不知道共产党对学生自治会，和罢课委员会有多大影响的人都注意到，《新华日报》表现出共产党的高度克制。共产党是灵活多变的，但也是不屈不挠的，在四烈士遗体安放在图书馆三个半月期间，它有效地获取了群众的同情。

对于联大津津乐道的师生团结，一二·一运动同样是一次考验。教授会前所未有地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罢课吗？起初，为表示支持，全体教师确实这样做了，并强烈地谴责恐吓大学的国民党领导人。但接着许多教授改变了想法，公开提议返回课堂。二月底，联大半数以上的正、副教授联名要求苏联从满洲撤军，而这件事未能引起学生的热烈反响，进一步证明了「代沟」的存在。

虽然老师和学生都对执政党的批评越来越激烈，但两者的不满程度是不同的。只要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殴打、谋杀校友，大多数学生都不会为反苏的事情转移注意力。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教授则愿意不偏不倚地反对任何威胁中国主权的行为，而拥美反苏知识分子很高兴藉此机会把对美国的爱国激愤转向针对苏联。这是抗战以来老师和学生的政治观点第一次发生巨大分歧，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共产党时代。

北返的决定

官方的恐怖主义在 12 月 1 日达到顶点，这表明在动荡的环境中联大无法维持安宁。在暴力面前，联大的「民主堡垒」被证明毫无防御能力。一二·一的凶手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在 20 世纪中叶的中国，拥有自主权的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

直到龙云被推翻以后，联大群体才开始意识到，它曾获益于中国国内的分裂。如同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北大，联大获益于国内的政治权力真空，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免受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控制。然而，一旦国家领袖强大到足以把权力伸进中国校园，学术独立的日子也就更加遥遥无期了。联大群体在 1945 年意识到的事情在 1949 年之后变成了不可逃避的现实：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盼望的政治统一，将从他们手中夺走对学术生命力最为关键的自由。

在昆明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一二·一运动暴露出联大的脆弱无力，使教师和学生趋于政治化，削弱了学术群体团结的联系，象征着

这所大学的瓦解。随着悲剧在全国上演，联大师生渴望回到原来在平津的校园。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联合体在黑暗的战争年代，完成了保持知识之灯常明的使命。现在，灯火却在政治斗争和内战的寒风中摇曳。

上级并没有规定避难的大学必须回到原来的校园。新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还批评了战前把教育资源聚集在东部沿海主要文化中心的形势，认为它不利于像昆明这样的内陆城市的发展。然而，各大学都极力支持回到原地，教育部也无力阻止。[19] 2 月中旬，复员日子定下来了。5 月 4 日，西南联大将不复存在。北大和清华将返回北平，南开将返回天津。获得官方批准后，联大宣布其师范学院仍留在昆明，改称为昆明师范学院。[20]

中国首屈一指的学术中心撤离昆明，只留下一个师范学院，当地掌权者并不甘心。难道，在北方的大学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庇护的云南就得到这一点点东西？对这个问题，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当地报纸撰文指出，昆明在联大人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大学有「不可抗拒的原因」必须迁回北平：「在现在学术研究日趋精深的时候，一个大学是不能离开它的校址底，因为它的研究设备，大部分是不能随便迁移底，一个离开它的校址底大学，好像一个离开了它的领土底流亡政府，是不能永久存在底。」[21]

冯友兰的意思很明显：北大和清华返回北平和政府返回南京一样天经地义。他说，关心昆明高等教育未来的人应该指望教育部，因为它曾表示要把云南省会建设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但它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兑现诺言。冯友兰没有说，师范学院可以继续保持联大的卓越水平；相反，他敦促教育者集中力量把云南大学办成一流的学府。[22] 为进一步抚慰当地人的情绪，梅贻琦举办了一个告别晚会，感谢云南名流的热情招待，并希望北方大学的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继续汲取云南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23]

尽管由衷热爱云南及其人民，联大师生还是迫不及待地踏上回家

之路。根据学术特长、师资和个人爱好，学生选择返回的学校。工学院主要是清华工学院的延续，其学生也基本上选择了清华。对国学感兴趣的学生选择了北大。决定在商务世界打拼的人选择了南开。[24]除了少数教授偏爱留在昆明的师范学院或云大，其它教师都选择回到原校。[25]

北返心切使得迁徙的飞机、汽车和卡车都人满为患。直到最后一刻，安排仍然混乱无序。为遵循教育部的指示，联大试图把北返时间推迟到五月，但迫于师生早日北上的压力，不得不把期末考试开始的时间提前到 4 月 25 日。5 月 2 日最后一场考试一结束，北迁就开始了。

为帮助大家度过难关直到秋季开学，政府给学生发放五、六、七三个月的奖学金，每人还得到 15 万元旅费。每位教师及其家属也获得 15 万旅费。当地雇员得到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解雇金。[26]每天都有运送学生的汽车在白天出发，这些青年在湖南中部的长沙和广西东部的梧州之间选一条路线，然后乘船到上海或香港。第一批开往长沙的汽车于 5 月 2 日启程。[27]

五四早上，细雨蒙蒙，两千多名学生、教师、校友和当地客人聚集在新校舍，聆听梅贻琦的讲话。他回顾了在昆明的八年经历，并向当地官员和人民的盛情表示感谢。北大的汤用彤、清华的叶企孙和南开的蔡维藩分别发言，赞颂三校在战时联合期间和睦融洽的关系。联大附中学生唱起校歌，为联大纪念碑揭幕。[28]

持不同政见者之死

为纪念联大所坚守的信念，并记载其历史使命，冯友兰用古文创作了一篇典雅的美文。由语言学家罗庸书丹，然后刻在巨大的石碑上，竖立在新校舍东北角，与四烈士墓相邻。

碑文称，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政府南渡，这次是第四次。但这次是前所未有的南渡：中国从「其命维新」的战争中崛起，准备在

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联大的历史与中国的抗战及战后的命运紧密相连。联大已经证明，学风各异、传统不一的学人和机构可以联合一体，共同提高，并不会妨碍各自的独立。后来证明，整体比各部分相加的总和还大，冯友兰在颂词中说：「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外，联大还为中国树立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典范：「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29]

闻一多就是一位这样的「士」。在许多方面，他都堪称联大精神的象征，因此由他来为这篇碑文篆额可谓恰如其分。他曾是从长沙出发的长征的积极参加者，在战时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坚持教学和研究。他擅长篆刻。为了赚钱养家，他刻印章直到深夜。这种艰辛的工作差点把他的指头毁了。因为生活艰难而走向政治化，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使他更加激进，他直率批判现实状况。国民党准备内战的举措及其使用暴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迫使他全力参与反对现政权的政治活动。

大部分同事和学生都北上返回故园时，闻一多由于政务缠身，仍留在后方。1946 年 7 月 11 日，在中国民盟的朋友和同志李公朴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时，他还在昆明。在 7 月 15 日纪念大会上，闻一多在悼词中总结道：「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踏出家门五个小时后，和儿子回家时，他被枪杀在地。[30]

残破的梦

联大九年（包括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时期）的首要主题是奋力图存，而这一诉求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如冯友兰在告别辞中所说：「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然而，为了生存，大学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最初是因为战争，最后却由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现实。

尽管费尽心力隔离这所大学，但从一开始外界势力就侵入进来。

持久战及其伴随而来的社会经济难题，逐渐消磨了战初的爱国热忱。比摧毁教室、实验室和宿舍的空袭更具破坏力的是，切断云南与外界联系最重要的交通动脉——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这些生命线的中断不仅意味着物资上的匮乏，而且意味着心理上的孤立。1940 年之前，通货膨胀还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但从这以后，通货膨胀呈几何级数发展，对老师和学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1930 年以后，当陈立夫成为教育部长，国民党在政治上控制学术界的意图越来越明目张胆。此外，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导致左派积极分子越来越锱铢必较，也使战争初期放任恣肆的气氛烟消云散。还有，即便政府能控制地下的批评者，或恐吓使他们沉默，但官吏的腐败和战场上的无能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声誉。从 1941 年开始，他们的沮丧有增无减。

直至战争后期，有一样东西还是完好无损的，那就是联大的集体感。后来，随着中国政治趋于两极化，连这种集体感也开始遭到侵蚀。只要联大仍是一个政治的岛屿，维持内部团结还是有可能的。随着它的军阀保护人龙云在政变中出局，再加上全国逐步陷入内战，联大也日趋两极化。回顾 1945 年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1 日所发生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虽然联大在一定程度上与战争相隔离，但它在左翼革命和右翼的恐怖暴力面前不堪一击。然而，联大大部分教师未能完全理解这一教训，尽管他们一直都忠诚于未曾中断的通才教育传统的理念。以罢课抗议谋杀学生，以妥协避免大学被解散，被迫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许多教师和领导人都不支持青年一代。

想要平静地追求知识，这并不容易。与现实短暂的缓和之后，最终却是自己人的牺牲。闻一多是联大的绝佳代表。他的被谋杀，象征着这所学校英雄史诗的悲惨结局。四烈士被埋葬之后仅仅过了四个月，随之而来的闻一多之死，突显出联大奋力保卫的理念——不受战争和革命摧残的自由大学之梦——已成明日黄花。

十七 结语

在中国学术自由的传统上，联大既是其成就的高峰，又是它急剧衰落的预兆。联大出身高贵。它的家族史反映出允许中国通才教育蓬勃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北大、清华和南开在 20 世纪初中国混乱的局势中崛起，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为教育家提供了颇有吸引力的模式，他们寻求满足本国文化需求的长久之策。海内外的公共和私人资源为中国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经济资助。由于弱小，它还难以为通才教育提供可靠的支持；而北京的中央政府同样弱小，无力破坏对其成长至关重要的学术自由。1928 年后，曾在西方留学的学者致力于通才教育事业，他们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能够组织力量支持大学发展，抵制党国的势力，使教育机构不致沦为政治思想灌输和技能培训的工具。

同西方同行一样，中国的通才教育也是非功利的，有意为将来进入白领阶层提供的大学学位除外。有人认为，在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文化水平低、内乱频仍的中国，浪费宝贵的资源以开拓少数精英的心智，这样做是不值得的。然而，如果用清醒的目光来审视一下在那些没有受过通才教育的军阀、意识形态的激进者、独断专行的独裁者们统治下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二十世纪别无出路的选择。对于中国，除了所有其它制度，通才教育可能是最匮乏的高等教育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联大留洋教授传播的西学，大都是与中国毫不相干。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就全局而言，这是站不住脚的。显然，即便今天，中国仍在奋力融入这个世界，认识 20 世纪的世界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绝非毫不相干。而且，联大的西学倾向，及其对中国遗产的批判性同情（critical appreciation），这两者相结合，使该校学生既不会在文化上感到孤绝，又不会觉得被政治边缘化。

五四时期是创造、发现和孕育新思想的时代，抗战时期则是走向

成熟的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从西方归来的学者，正走向他们事业的巅峰。主要以诗人著称的闻一多，凭借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了他在联大的学术声誉。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在课堂上赢得天才的声誉，稳稳地奠定了他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利用了 20 年代以来的学术成果，而那时正是留学西洋的第一代博士主持新创的科学院系。

联大的成就并不局限于学术方面。面对武装暴力和政治压迫，它刚毅坚卓的精神激励了多年来历经患难的知识分子。到 40 年代后期，内战摧毁了自由、宽容与尚文的脆弱的基础，而这三者决定了通才教育的未来。后来的历史证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暴政，的确被某种更为糟糕的东西所取代。1949 年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学术自由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压制。

要详细考察批判、坦白和思想改造的精神创伤、百花运动（大鸣大放）的承诺及随后反右清洗的骇人听闻、文化大革命的惨绝人寰、邓小平时代的支吾遮掩及 1989 年 6 月 4 日的悲惨结局，这已超出本书的范围。要公正地评判联大的教师和校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及海外国家所作的贡献，这需要另外撰写一部著作。但是，考虑到联大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思考它的历史遗产。

联大精神在当代中国

联大的成功在于拥有共同的经验和价值观。对于这所大学存在时的中国和 20 世纪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不管是联大精神的批判者还是拥护者，他们都承认，个人主义是这所学校一个鲜明的特色。在当代中国生活过的任何人都可以作证，个人主义在那里远远没有死去，但它与联大盛行的那种个人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联大丰富灵活的课程设置，及住宿、课外生活和实习工作的放任政策，都鼓励自由选择。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控制，铲除了个人言论自由的社会基础。展示个性的言论，必须跟现存的政治制度

保持一致。

联大的个人主义源于现实需要，而现实要求独立自主。中断了家庭资助，而政府补助杯水车薪，学生只能依靠自己。不过，劳动的物质报酬被认为是学术研究的副产品，而不是它自身的结果。放弃学业去滇缅公路走私的学生会遭到鄙视，拒绝合作的个人主义也会被人瞧不起，友谊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更富裕、更幸运或更勤劳的同学的帮助。

借着重申蔡元培的北大遗产，联大精神要求尊重同事和同学的思想、习惯和癖好。这所大学不期望人人遵从正统观念，学生很喜欢它五彩斑斓的人性。它以异为常，包容个性。联大知识分子以才论人，不以身外之物衡人，并对反潮流给予高度评价。

有一个理念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那就是，知识界每个成员都有权利追求个人要探索的真理。尤其是战争初期，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带着对科学方法的崇敬探索真理，这意味着客观独立的调查，实验的技能，并愿意以证据说话。联大不存在官方强加的正统观念。就像一个大一学生所发现的：「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一进去有一个月的新生训练，灌输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用自己的方法，自由地追求真理，而且可以用否定、反传统或相对论，自由地结束研究。[1]

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寻求启蒙，这种信念表明，没有人可以垄断真理，更别说谁有权指使他人遵循某种特殊的信条了。其次，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名声，取决于它对开放社会、宪政主义和政治自由的支持。在校内，民主源于宽容和妥协的意愿。在机构层面上，这意味着三所不同的学校团结合作的能力，从三方组成常务委员会到全校师生，都能相互协作。这正应了「和而不同」这句老话。

民主墙是联大宽容的象征。在那里，各种不同观点的作品公之于世，交由公众审查。正如查良钊后来带着可谅解的夸张的笔调所写的：「大家为了学术原则也曾彼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八年联合，却从来没有为了私人利害发生冲突。」[2] 像思想开明这种最基本的原则，在联大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一位联大的铁杆拥护者写道：「也许一向生活在这地方的人不晓得，然而来自全国其它各地的学生就会欣赏这份自由，羡慕这份自由。」[3]

联大群体视自由为天经地义的一个原因，是它与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关系，他出于政治的考虑，允许市民自由批评令人讨厌的中央政府。1945 年 10 月龙云的突然下台为压制打开了方便之门，突显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悲哀的现实处境：在中国自由不像在西方一样拥有法律的保障，只能间或出现在权力的罅隙里。这个国家每次统一强大之时，个人自由就首当其冲沦为牺牲品。学术自由，在军阀统治时代的北京和龙云保护下的昆明达到鼎盛，但它先是遭到国民党的挑战，最终被共产党摧毁。

联大的另一项基本原则——爱国思想，最初表现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其实，专注于战胜外国侵略者的知识分子，会支持任何表面上拥有卓越领导的抗日政权。因此，1944 年，联大毕业班大部分学生都响应了蒋介石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的号召。只有国民党的领导被证明不仅独裁、腐败、自私自利，而且无力阻止日本进攻时，在爱国心的驱使下，许多联大师生才放弃支持重庆政府。

共产党政权在初期同样能够获得国人的忠诚，是因为它在战时一个时期内使国民党锦上添花。只要看上去致力于建设统一、强大的国家，抵御外敌，共产党领导人就指望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遵从其政治规则和意识形态，并为此付出空前的代价。

然而，在政党和意识形态方面，蒋介石都未能获得同样的待遇。相反，他根据自我利益和共同关注的原则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他们埋头读书，把政治交给从政者，至少可以保证昆明的学者能维持生活。

知识分子可以依靠政府反抗日本侵略、保卫中国文化的政策表达爱国思想。保护自我、保护制度和文化与保护国家息息相关。

不言自明的是，尽管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蒋介石政府瓦解，但知识分子未能找到与蒋的继任者——共产党——合作的方式。从 50 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特别是从 1957 年以后毛泽东主义者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只有不再注重自我——自尊的、独立的、批判的自我——他们才能在新社会生存，爱国与生存成为不可兼得的选择。

知识精英与大众

除了要求知识分子顺从外，’毛泽东及其同伙还追求社会平等主义。毛不愿担任特权精英联合体的主席，这个联合体由学者、科学家以及受强大的官僚集团保护的技术官僚构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联大校友和中国其它学术贵族都被揪出来批斗。这种批斗正中靶心，因为社会平等与联大师生所广泛共用的假设截然相反。从他们处于大学界的顶峰来看，这群知识分子并不愿意接受全人类平等的学说，更别提假定所谓的贫农和工人道德优越性的意识形态了。即使在大学里，梅贻琦校长也树立了谦虚谨慎、不事张扬、平易近人的榜样，教授被认为更有发言权，资深教授更成为寡头集团。

少数受教育者和多数文盲的区别由来已久，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孟子式的二分法并没有消失。战时条件可能使经济阶层的界限模糊不清，上层精英同平民大众一样，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同甘共苦并不意味着共享价值观。当他们吃大众吃的苦味米饭时，知识分子则单独开小灶。在 20 世纪，这种现象比过去更加严重，受过良好的教育意味着离开绝大多数文盲同胞。现代教育和都市社会经历基本上扩大了中国学生和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

在行动主义的高潮时期——1919 年，1925-1927 年，1931 年及 1935-1936 年——学生走向群众，以消弭学术和社会之间的隔阂。然

而，这种断断续续的了解、开导和争取平民百姓的努力，超出了参加运动的青年准备承担的范围，这是一种位高任重的现代启示；这些阐释者认为，他们从群众身上学不到什么东西。

战争使成千上万的学生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为到达避难的校园，这些年轻的学者穿过边远地区，得以接触到劳工、农民和少数民族。兼职工作使学生体会到劳动阶层的疾苦，通货膨胀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与苦力没有什么差别。数百名参军的联大学生亲眼目睹了军人所受到的虐待。一二·一运动期间，学生宣传者发动城乡群众，于是安放殉难者遗体的校图书馆就成了方圆数英里平民百姓瞻仰的圣地。

战争可能使精英和大众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但这种经历对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知识分子，贫穷困顿是为了国家事业作一时的牺牲。对于群众，这种牺牲是长久的，贫穷也是长久的。到头来，就像联大校歌所宣称的，教授可以期望「复神京，还燕碣」，以及校歌没有说的，即恢复战前的生活。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认为，要使他们自己长期陷入普通民众的状况，过着日日操劳却贫困的生活，或按照群众的智慧重新武装思想，任何手段都无法奏效。一场抗战还难以把这种观念转变成国家政策。那是共产革命的任务。

从中国边远地区的农村和军事经历中崛起，北京新的政治精英对城市知识分子抱有一种强烈的怀疑。这种不信任是相互的，但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统一的利益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而且，因为知识分子切实同情中国民众的需要，而中共可以利用他们疏远平民百姓的负罪感。因此，只要共产党官方不侵犯学有专长的知识界，知识分子不挑战中共索要的政治权威，就有充足的理由相安无事。

从 1949 年初到 1950 年中期，强行接管中国期间，共产党竭尽所能打消知识分子的顾虑，新政权将保证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完好无损。但是，朝鲜战争为中共对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强制推行新的风纪，提供了极其诱人的机会。同样，美国也成为中国的敌人，因为有那么多学者曾经在那里接受本科和研究生训练。共产党领

导人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并决定把他们列入执行延安时期发展起来的思想改造政策的对象。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政党独裁与城市文人之间的斗争将持续四十余年。

毛去世以后，政府意识到，要使知识分子重整旗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就有必要恢复集体感和个人价值。中共统治者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不仅提高了知识分子的职业经济地位，还使他们心灵安乐，而且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微不足道。在闻一多的弟弟和同事闻家驷的主持下，联大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治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在一片欢庆声中恢复活动。尽管民盟仍只是中共的附庸，但这个团体的复苏象征着邓小平领导阶层对安置知识分子的信心。

民盟仅仅是知识分子唤醒集体认同意识的一个工具。在北京、昆明及其它城市，校友会开始重建，这样北大、清华、南开和联大的毕业生可以聚在一起表彰他们共同的遗产，重申校友联系，当然也表现出其对官方政策的支持。20 世纪 80 年代初，北大、清华和南开出版了各自的校史。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著作是在共产党的审查下完成的，作者们在赞扬母校成就和谴责西方自由纽带之间走钢丝。尽管如此，像校友会一样，已出版的校史能够使知识分子为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感到骄傲。[4]

神话和记忆中的联大

在允许知识分子维护其集体认同的同时，共产党制造了一个神话，即联大的核心精神是在中共领导下塑造起来的。闻一多被拔高，逾越他的同事，进入革命烈士先贤祠。据称，他从美国研究生训练的泥淖走出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官方史学家的眼里，这个联大模范人物已经超越学术自由主义和无党派爱国思想，步入更高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行动主义王国。反过来，在反抗意识形态「污染」时，中共攻击联大宽容、怀疑的态度和学术公正等基本价值观。只有在「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的狭隘范围内，才允许展开辩论。1982 年在昆明发表的一篇文章警告学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学习西方哲学，因为如果「盲目地阅读西方哲学著作，会造成『思想混乱』」。[5] 在坚持疯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之后，1989 年 6 月民主运动的覆灭，是官方非难者进一步限制政治和哲学讨论的通告。在这种形势下，联大精神只能勉强撑持。

能够生存下来的都是了不起的。没有可能反对，更别提反抗，学者别无选择，只能做出政治顺从的姿态。不能以儒家的方式表示抗议，就采取道家回避的方式抵抗政治压制。学生对政治课不屑一顾，老师对政治学习会感到厌倦，他们根本不愿努力，只求满足他们认为无聊、无趣、无关紧要的要求。1980 年，一位在重点大学教思想史的联大校友的朋友告诉我，他正在用讨论「资产阶级」理论的方式向学生介绍西方对共产主义教条的自由选择。1991 年，尽管有无数的运动反对「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共产党理论家的其它目标，我的朋友仍尽力把联大遗产传授给年轻一代。

尽管有这样坚定的人，但随着联大教授的逝世、毕业生的衰老，联大遗产变得不可捉摸。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句古话中，可以察觉联大的许多真相。昆明的那些岁月会成为传奇的材料吗？会成为中国的卡米洛特（Camelot）吗？

总有一天，梅贻琦和他的同事可能被比作阿瑟王（King Arthur）和他的骑士。即便现在，闻一多作为加拉赫（Galahad）的观念也逐渐成型。虽然暂时还有太多与联大经历有关的鲜活的物事，可以防止历史完全变为传奇。不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台湾、欧洲和美国，数千名男女校友的言行成为联大精神长存的证明。

因此，有人可能预测，这些幸存者将会逝去，与他们相伴的联大遗产也将烟消云散。这是一个悲观的预言，也是不合理的预言。在中国人寻求一个现代而人性的社会时，他们必定会汲取最近的资源，也

会汲取遥远的过去的资源。随着他们迈入 21 世纪，他们将发现联大经验的价值和启示。

实际上，有许多联大遗产已经奉献给了世界。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着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适应力，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附录：访谈清单

二十多年来，难以计数的联大校友、教师和其它人向我口头传递了大量信息。这个清单仅限于我记下了时间和地点的正式采访。

对当年联大学生的采访

按毕业级别和专业为序

1．采访匿名日记作者。巴尔的摩，1971.11.12
2．1938 级经济学系。台北，1973.10.30
3．1938 级经济学系。香港，1973.12.18
4．1938 级教育学系。西雅图，1978.7.10
5．1938 级历史学系。台北，1973.11.16
6．1938 级历史学系。台北，1973.11.28
7．1938 级历史学系。香港，1973.12.11
8．1938 级历史学系。巴尔的摩，1977.7.17
9．1939 级化学系。台北，1973.11.17
10．1939 级社会学系。香港，1973.12.7
11．1940 级化学系。巴尔的摩，1977.7.17
12．1940 级经济学系。纽约，1975.11.1
13．1940 级经济学系。昆明，1980.6.6
14．1940 级经济学系。昆明，1980.6.6，6.17，6.21
15．1940 级教育学系。纽约，1974.4.8
16．1940 级历史学系。纽约，1974.4.8
17．1940 级历史学系。天津，1980.3.22
18．1940 级历史学系。昆明，1980.7.1
19．1940 级哲学系。华盛顿特区，1983.12.30
20．1940 级政治学系。波士顿，1974.4.3
21．1940 级社会学系。北京，1980.3.21

22．1941 级生物学系。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Md.）1973.8.12

23．1941 级中文系。成都，1980.4.2

24．1941 级商学系。台北，1973.12.7

25．1941 级经济学系。马里兰州贝塞斯达，1973.8.12

26．1941 级外文系。台北，1973.11.7

27．1941 级历史学系。纽约，19773.26

28．941 级历史学系。北京，1980.8.21

29．1941 级法律系。台中，1973.11.25

30．1942 级中文系。北京，1980.3.18

31．1942 级经济学系。马里兰州贝塞斯达，1973.8.12

32．1942 级经济学系。香港，1973.12.7

33．1942 级地质学系。纽约州刺木，（Thornwood, N.Y.）1975.7.12

34．1942 级历史学系。北京，1980.3.20

35．1942 级历史学系。昆明，1980.5.3，6.21

36．1942 级历史学系。昆明，1980.7.1

37．1942 级机械工程系。北京，1980.3.18

38．1942 级物理学系。纽约，1980.10.31

39．1942 级物理学系。纽约州石溪（Stony Brook），1980.11.1

40．1942 级政治学系。纽约，1974.4.8

41．1942 级政治学系。台北，1985.4.28

42．1942 级师范学院史地系。台北，1973.11.6

43．1943 级航空工程系。台北，1973.11.17

44．1943 级经济学系。旧金山’1993.12.29

45．1943 级外文系。加州谛伯朗（Tiburon, Calif.），1973.10.4；三藩市，1975.3.27

46．1943 级外文系。北京，1980.3.15

47．1943 级外文系。昆明，1980.6.23

48．1943 级历史学系。旧金山，1975.3.26

49．1943 级历史学系。北京，1980.3.20

50．1943 级历史学系。北京，1980.8.21
51．1943 级历史学系。台北，1985.8.6
52．1943 级法律系。香港，1973.12.7
53．1943 级社会学系。北京，1985.11.16
54．1943 级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台北，1973.11.29
55．1943 级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昆明，1980.7.8，7.13
56．1944 级航空工程系。昆明，1988.11.3
57．1944 级化学系。台北，1973.11.17
58．1944 级经济学系。台北，1973.10.10
59．1944 级经济学系。香港，1973.12.18
60．1944 级经济学系。昆明，1980.4.29
61．1944 级经济学系。昆明，1980.4.29
62．1944 级外文系。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1973.9.12
63．1944 级外文系。旧金山，1975.3.26
64．1944 级外文系。昆明，1980.7.12
65．1944 级法律系。台北，1973.11.17
66．1944 级法律系。台北，1973.12.3
67．1944 级政治系。纽约，1974.4.8
68．1944 级师范学院史地系。台北，1973.11.12
69．1945 级经济学系。台北，1973.11.10
70．1945 级经济学系。台北，1973.11.17
71．1945 级经济学系。北京，1980.3.8
72．1945 级外文系。北京，1980.3.18
73．1945 级历史学系。台北，1973.11.15
74．1945 级法律系。纽泽西州特兰顿（Trenton, N.J.），1974.4.11
75．1945 级机械工程系。台北，1973.11.10
76．1946 级化学工程系。台北，1973.11.12
77．1946 级外文系。北京，1980.3.11
78．1946 级外文系。昆明，1980.7.3，1985.12.8
79．1946 级历史学系。北京，1980.3.15

80．1946 级历史学系。北京，1980.3.15

81．1946 级社会学系。台北，1973.11.16

82．1946 级师范学院史地系。昆明，1980.7.20

83．1947 级经济学系。台北，1973.11.9

84．1947 级经济学系。西雅图，1978.7.10

85．1947 级经济学系。西雅图，1978.7.10

86．1947 级历史学系。北京，1980.3.26

87．1947 级社会学系。台北，1973.12.5

88．1948 级经济学系。香港，1993.12.18

89．1948 级外文系。昆明，1980.6.21

90．1948 级社会学系。香港，1979.7.2-3

对联大教师的采访

鲍觉民，地理学系。天津，1980.8.20

陈岱孙，经济学系。北京，1980.3.17

陈国符，化学工程系。天津，1980.8.21

陈雪屏，教育学系。台北，1973.10.31

费孝通，社会学系。1980.8.18

冯友兰，哲学系。北京’1980.3.25

何炳棣，历史学系。波士顿，1978.4.2

胡毅，外文系。天津，1980.8.20

黄钰生，师范学院院长。天津，1980.3.23

黄中孚（Jack Huang)，体育教师。纽约，1975.10.31

江泽涵，数学系。北京，1980.3.24

金岳霖，哲学系。北京，1980.3.16

李树青，社会学系。维吉尼亚费尔（Fair, Va.），1979.10.21

李田意，外文系。维吉尼亚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Va.），1980.11.16

李卓敏，经济学系。加州柏克莱，1986.11.21

刘崇鋐，历史学系。台北，1973.12.6

马大猷，电机工程系。北京，1980.3.12

米士（Misch, Peter），地质学系。西雅图，1978.7.10

白英（Payne, Robert），外文系。纽约，1974.4.9

钱端升，北京。1980.3.25，3.26，3.27

钱思亮，化学系。台北，1973.10.30

秦瓒，经济学系。昆明，1980.7.21

任之恭，电机工程系。马里兰州贝塞斯达，1973.8.12

沈同，生物学系。北京，1985.11.16

施嘉炀，土木工程系。北京，1980.3.14

孙毓棠，历史学系。华盛顿特区，1982.6.28，6.30，7.15，7.20，8.3，8.18

陶葆楷，土木工程系。北京，1980.3.11

王恩治，外文系。昆明，1980.7.1

王赣愚，政治学系。天津，1980.3.22

王遵明，机械工程系。北京，1980.3.11

王佐良，外文系。北京，1985.9.16

吴大猷，与施耐德（Lawrence Schneider）一同采访，1978.5.8

伍启元，经济学系。纽约，1974.4.10

吴泽霖，社会学系。北京，1980.3.21

吴征镒，生物学系。昆明，1980.6.14

阎振兴，土木工程系。台北，1973.10.29

杨石先，化学系。天津，1980.8.21

杨西崑，外文系。台北，1973.11.12

衣复得，土木工程系。台北，1973.11.12

袁复礼，地质学系。北京，1980.3.26

查良钊，训导长，教育学系。台北，1973.11.26，12.4

张德昌，经济学系。香港，1973.3.13

郑天挺，历史学系。天津，1980.3.23

对非联大人士的采访

按被采访者在联大时期（1937-1946 年）的身分为序

梅贻琦家眷（匿名）。纽约，1977.3.23

Baker, Gilbert，昆明文林堂牧师。香港，1978.6.21，6.28

Clough, Ralgh N.，曾服务于美国驻昆明外事处。华盛顿特区 1973.7.31

Drummond, Bob，昆明的美国居民，香港，1973.12.12。北京，1985.10.15

费慰梅，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45-1946 年访问昆明。波士顿 1974.4.2

方仲伯，中国民主同盟李公朴烈士的秘书。昆明，1980.5.10，5.15

韩咏华，联大实际上的校长，已故的梅贻琦的夫人。北乐，1980.3.19

候方岳，昆明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昆明，1980.5.9，5.15

许烺光，云南大学人类学教授。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Evanston），1973.9.9

Hyman, Howard，美国驻昆明军人。纽约州白石（Whitestone），1980.10.31

李宗黄，1945 年云南省代理省长。台北，1973.11.30

梁吉生，南开大学校史专家。天津，1980.3.22

Lindsay, Michael，在中国的英国教师，昆明访问者。旧金山，1975.3.25

龙绳文，龙云之子。华盛顿特区，1974.6.4

Ma, John，1941 年驻昆明中国军人。加州史丹佛，1973.10.8，10.17

梅祖彦，联大实际上的校长梅贻琦之子。北京’1980.3.19

潘大逵，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昆明，1985.12.6

裴存藩，1937-1942 年昆明市长。台北，1973.11.18

彭少彭，1945-1947 年《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主管。1980.6.12

Roser, Harold，曾服务美国驻昆明外事处。纽约，1974.5.2

Sprouse, Philip，曾服务于美国驻昆明外事处。加州奥林达（Orinda, Calif.），1973.9.24

Tseng, David，驻昆明中国军人。加州门洛帕克（Menlo Park, Calif.），1973.10.17

王汉兴，联大会计室主任。昆明，1980.7.9

Wellborn, Alfred T.，曾服务于美国驻昆明外事处。华盛顿特区，1973.10.17

吴俊升，1937-1944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香港，1973.12.17

杨维骏，1944-1945 年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昆明，1980.6.16

张友铭，联大注册员。昆明，1980.7.11

朱家璧，中共游击队领导人。昆明，1985.12.7

注 释

注释简称

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评论周刊》），上海，1927-1941。

GDJYJK 《高等教育季刊》，重庆，1941-1943。

GLXNLHDX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

JRPL 《今日评论》，昆明，1939-1941。

LDBN 《联大八年》。

QH 《清华大学校史稿》。

QHXYTX 《清华校友通讯》，新竹，台湾，1962-。

QHXYTX: B 《清华校友通讯》，北京，1980-。

QHXYTX: Bp 《清华校友通讯》，北平，1947-1948。

QHXYTX: C 《清华校友通讯》，重庆，1939-1941。

Rem1 《笳吹弦诵在春城》。

Rem2 《笳吹弦诵情弥切》。

SD 美国国务院档案，国家档案馆，华盛顿特区。

XFJW 《学府记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XHRB 《新华日报》。

YNSD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

YNWS 《云南文史资料选集》。

ZYRB 《中央日报》，昆明，1938-1945。

ZJWX 《传记文学》，台北，1962-。

导言

1.吴讷孙（1942 级学士）以「鹿桥」为笔名，以他的母校为题材写成一部浪漫的长篇小说——《未央歌》。

第一章 从北平到长沙

1．郁振镛，〈三十年忆长沙〉，*QHXYTX* 26-27：10（1969 年 1 月 31 日）；李鹤龄，〈逝者如斯夫〉，*QHXYTX : B* 2：82（1980 年 10 月）。

2．吴大猷，《回忆》，第 31-32 页。

3．同上，第 32 页。

4．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ZJWX* 17.6：91（1970 年 12 月）。

5．李鹤龄，第 83 页。

6．同上。

7．罗常培，第 91 页。

8．同上；《北平时事日报》，1937 年 7 月 15 日，转引自毕胜（T. A. Bisson），《日本在华》（*Japan in China*），第 18 页。

9．李鹤龄，第 84 页；格雷哈姆・帕克（Graham Peck），《穿过中国之墙》（*Through Chinas Wall*），第 294 页。

10．罗常培，第 91 页。

11．易社强（John Israel）、唐纳德・科雷（(Donald W. Klein)，《反叛者与官僚》（*Rebels and Bureaucrats*），第 139 页。

12．陈达，《浪迹十年》，第 156 页。

13．李鹤龄，第 84-85 页。

14．同上，第 86 页。

15．访谈 9；易社强、科雷，第 139 页。

16．李鹤龄，第 86 页。

17．陈达，第 157-158 页。

18．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QHXYTX:C* 5.3：1（1939 年 5 月 1 日）;，第 289 页。

19．派克，第 259-260 页。

20．《北京大学六十年》，第 98 页。

21．休伯・福雷（Hubert Freyn），《战时中国教育》（*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War），第 16 页。

2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人民战争》（*The People's War*），第 50-51 页。

23．《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 363-364 页。

24．王文田，〈张伯苓先生与南开〉（下），*ZJWX* 13.1：19（1968 年 7 月）。

25．萧公权，〈教学相长（二）·清华五年〉，第 14 页。

26．采访郑天挺。

27．蒋梦麟，《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第 211 页。

28．何廉，《回忆录》（Memoirs），第 317 页；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上），*ZJWX* 39.2：72（1981 年 8 月）。

29．罗常培，第 92 页。

30．同上。1947 年，胡适告诉一群联大校友，「成立联大的主意是我最先想出来的。」访谈 89。

31．采访郑天挺。

32．萧公权，〈漂泊西南〉，*ZJWX* 17.5：58（1970 年 11 月）。

33．陈达，第 159-160 页。

34．福雷，第 18-19 页。

35．教务处，〈抗战二年中教务处工作概况〉，*QHXYTX: C* 6.1：2（1940 年 1 月 1 日）。

36．吴大猷，第 33 页。

37．陈达，第 161-164 页。

38．访谈 6。

39．QH，第 290 页。关于临大，见 *GLXNLHDX*，第 18-25 页。

40．采访郑天挺。

41．蒋梦麟，第 213 页。

42．*QH*，第 289-292 页。

43．张起钧，〈从长沙到昆明——草创期间的西南联大〉，*QHXYTX* 75：72（1981 年 4 月 29 日），重刊于 *XFJW*，第 27 页。

44．张起钧，*XFJW*，第 28 页。

45．李钟湘，〈国立〉（上〕，第 73 页；*QH*，第 291 页。

46．郁振镛，第 11 页；李钟湘，〈国立〉（上），第 73 页；*QH*，第 290 页。

47．郁振镛，第 10 页；傅幼侠，〈衡山负笈〉，*QHXYTX* 28：20（1969 年 4 月 29 日），转载 *XFJW* 第 86 页；《北京大学六十年》，第 111 页。

48．江文汉，〈中国学生难民救济〉，未刊稿，长沙，1938 年 1 月 18 日，基督教青年会（YMCA）档案。

49．郁振镛，第 11 页。

50．傅幼侠，第 19 页；杨振声，〈北大在长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 34 页。

51．郁振镛，第 11 页。

52．查良铮，〈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之高等教育》，第 1 页；郁振镛，第 11 页。

53．陈达，第 165 页。

5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334 页。

55．同上。

56．傅幼侠，第 21 页。

57．郭铎，〈西南联大片断记〉，*QHXYTX* 75：620981 年 4 月 29 日）；张起钧，〈从长沙〉，第 71 页。

58．陈达，第 166 页；郁振镛，第 11 页。

59．杨步伟，〈撤退后方〉，*ZJWX* 15.3：39〔1969 年 9 月）。

60．同上。

61．陈达，第 166 页。

62．访谈 8。

63．陈纯英，〈女同学就应该回家去吗〉，《火线下三日刊》15：119（1937 年 12 月 28 日）。

64．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LDBN*，第 3 页。

65．黄恪，〈一个大学生的自白〉，《火线下三日刊》12：84-85（1937 年 12 月 18 日）。

66．岳铮，〈从长沙到武汉〉，《火线下三日刊》17：135（1938年1月5日）。

67．易社强、科雷，第77页，209页。关于临大学生参军，见*GLXNLHDX*，76-78页。

68．*QH*，390页。

69．陈达，第167页。

70．查良铮，第1页；郁振镛，第10页。

71．雨兹，〈反对文化逃避政策〉，《火线下三日刊》20：156（1938年1月15日）。

72．杨振声，第35页。

第二章 联大的长征

1．〈闻一多年谱〉，《闻一多全集》，1：62。近来关于联大长征的描述，见*GLXNLHDX*，第25-32页。

2．〈新增学生赴滇晋学之手续及路程〉，北京大学档案，承蒙萧荻惠助，谨致谢忱。

3．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QHXYTX* 62：17（1978年1月）。

4．匿名日记，1938年2月19日。

5．同上，1938年2月20日。

6．史靖（王康），《闻一多的道路》，第70页。

7．匿名日记，1938年2月21日。

8．长诚（戚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大公报》（汉口），1938年3月13日。

9．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第9-10页；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大公报》，1938年3月14日。

10．长诚，1938年3月14日。

11．同上。

12．同上，1938年5月1日。

13．匿名日记，1938年2月28日。

14．林沃特（Ringwalt）快件，1935年5月16日，doc.893.114

Narcotics /1208，SD，转引自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 Marshall），〈1927-1945 年国民释党中国的鸦片与匪徒政治〉（“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7-1945”），第 26-27 页。

15. 钱能欣，第 17 页。

16. 同上，第 21 页。

17. 同上，第 18 页。

18. 访谈 1。

19. 访谈 11。

20. 钱能欣，第 17 页。

21. 同上，第 19 页。

22. 匿名日记，1938 年 3 月 4 日。

23. 访谈 12。

24. 访谈 1。

25. 〈从长沙到昆明的长途跋涉〉，ISS *Bulletin* 15.1：14（1938 年 10 月）。

26. 长诚，1938 年 4 月 27 日。

27. 钱能欣，第 20 页。

28. 访谈 1。

29. 长诚，1938 年 5 月 1 日。

30. 同上，1938 年 5 月 14 日。这些日期有些混乱。根据两份资料（王玉哲和匿名日记），旅行团，或至少第一大队，于 3 月 12 日早上乘车离开沅陵。根据长诚的报导，第一大队于 3 月 13 日早上出发，第二大队则在次日出发。虽然长诚是一名职业报社记者，但他的纪录与独立材料相矛盾。因此，我利用历史学家的职权，对他的记载作了调整，使之与其他材料相一致。

31. 从沅陵到晃县这段行程的叙述参考了长诚的纪录，1938 年 5 月 1 日和 14 日。

32. 匿名日记，1938 年 3 月 17 日。

33. 同上，1938 年 3 月 16 日。（应为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第 21 页。）

34. 蔡孝敏，第 22 页。

35. 访谈 11。

36. 根据他们的文字功柢，选中了丁则良、高亚伟和黄明信三人。丁是清华历史系优秀的毕业生，1957-1958 年反右运动中自杀；高出身北大，后成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来自南开，是黄钰生的侄子，后来游荡到西部边疆青海，学习藏语，成为一个喇嘛，身陷共产党的囹圄。访谈 11。

31. 黄钰生，〈序〉，刘兆吉，《西南采风录》，第 1 页。

38. 蔡孝敏，第 22 页。

39. 山蒂，〈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生活纪实〉，《中国青年》4.3：100-109（1941 年 3 月 1 日）。

40. 唐德刚、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Memoirs of Li Tsung-jen*），第 297 页；钱能欣，第 59 页。

41. 匿名日记，1938 年 4 月 2 日。

42. 同上；访谈 1。

43. 匿名日记，1938 年 4 月 9 日。

44. 访谈 12。

45. 王玉哲，〈三千里路云和月〉，《南开大学》1979 年 10 月 15 日，第 6 页。

46. 访谈 1。

47. 同上。

48. 同上。

49. 匿名日记，1938 年 3 月 21 日至 30 日。

50. 访谈 1。

51. 匿名日记，1938 年 4 月 28 日。

52. 见《云南省政府公报》10.23：7-8（1938 年 3 月 23 日）。

53. 钱能欣，第 101-102 页。

54. 蔡孝敏，第 20-22 页；访谈 11。

55. 匿名日记，1938 年 4 月 28 日。

56. 访谈 1。

51．匿名日记，1938 年 4 月 28 日。

58．蒙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玉哲惠助，1980 年他还记得这首歌。

59．弗朗兹・麦克尔（Franz Michael），〈长征途中的大学〉（“*A University on the March*”），《亚洲》（*Asia*）311：33-35（1939 年 1 月）。

60．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Rem1*，第 20 页。

61．访谈 12。

62．黄钰生，〈序〉，刘兆吉，第 2 页。

63．访谈 12。

64．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LDBN*，第 5 页。

65．王康，《闻一多传》，第 188 页。

66．同上，第 188-189 页。

第三章 蒙自的魅力

1．采访陈岱孙；杨步伟，〈撤退后方〉，*ZJWX* 15.3：40-41（1969 年 9 月）。

2．陈文辉，〈母校经海防迁滇经过〉，《清华十级毕业三十年纪念特刊》，第 22 页。

3．访谈 6。

4．访谈 9。

5．陈文辉，第 22 页。

6．同上；访谈 16。

7．陈文辉，第 22 页。

8．费马里（Mary Fei），〈穿越中国西南：一个女孩从印度支那到云南的旅途通讯〉，《中国新闻界周末杂志》（*China Press Sunday Magazine*），1939 年 3 月 19 日，第 17 页。

9．格雷哈姆・派克（Graham Peck），《穿过中国之墙》（*Through China's Wall*），第 266 页。

10．张起钧，〈从长沙〉，第 75 页。

11．费马里，第 17 页；帕克，第 265-266 页。

12．匿名日记，1938 年 4 月 29 日。

13．胡嘉，〈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宇宙风》5：206（1939 年 5 月 1 日）。

14．赵元任致胡适函，1938 年 5 月 3 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 371 页。关于设立和后来取消蒙自分校的决定，参见 *GLXNLHDX*，第 32-34 页。

15．孙愚（徐祖慧），〈蒙自杂忆〉，未刊稿，蒙徐祖慧赐稿，第 206 页。

16．张起钧，〈从长沙〉，第 77 页；胡嘉，第 216 页。

17．朱自清，〈蒙自杂记〉，《新云南》，3 ：29（1939 年 4 月 31 日）；孙愚。

18．徐祖慧，〈蒙自忆旧〉，*QHXYTX1X* 34-35（1980 年 4 月）。

19．胡嘉，第 207-208 页；张起钧，《儒林逸话》，第 30 页。

20．郁振镛，〈忆蒙自〉，*QHXYTX1X* 29/30：30-86（1969 年 10 月 29 日）；陈达，《浪迹十年》，第 181 页。

21．遇春，〈介绍蔡枢衡先生〉，《生活导报》，1942 年 12 月 25 日，第 1 版。

22．何期明，〈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战时知识》12：16（1938 年 12 月 25 日）。

23．郁振镛，第 8 页。

24．陈达，第 180-181 页。

25．1980 年 6 月，我参观时发现，由于文革时红卫兵对封建建筑遗迹的愤怒，石狮已被迁移，廊柱被劈成两半。

26．陈达，第 177 页。

27．王云，〈访蒙自随笔二则〉，*Reml*，第 140-141 页。

28．徐祖慧，第 35 页；陈达，第 177 页、第 180 页；采访陈岱孙、李卓敏。

29．张起钧，〈从长沙〉，第 177 页。

30．王云，〈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的情况〉，油印件，昆明，1980 年，第 2 页；朱自清，〈蒙自杂记〉，第 38 页。

31．张起钧，《儒林逸话》，第 83 页。

32．郁振镛，第 7 页；徐祖慧，第 35 页；孙愚。

33．张起钧，〈从长沙〉，第 77 页。

34．朱自清，〈蒙自杂记〉，第 29 页。

35．郁振镛，第 8 页。

36．王日叟（即张起钧），〈南湖盛事〉，《自由报》1977 年 5 月 31 日，重刊于 *QHXYTX* 75：78-79（1981 年 4 月 29 日），和 *XFJW*，第 47 页。

37．胡嘉，第 204 页。

38．陈寅恪未刊稿，藏于蒙自档案馆，蒙王云 1980 年 6 月复印，特此致谢。

39．燕卜荪，〈一所中国大学〉，第 239-245 页。

40．朱自清，〈蒙自杂记〉，第 38 页；何期明，第 11 页。

41．徐祖慧，第 35 页。

42．郁振镛，第 35 页；孙愚。

43．胡嘉，第 207 页。

44．王云，〈西南联大〉，第 2 页。

第四章 联大与云南人

1．陈纳德，《战士之路》（*Way of a Fighter*），第 73 页。

2．孟南，〈昆明忆语〉，第 16 页。

3．霍尔（J. C. S. Hall）致笔者函，1976 年 7 月 4 日。可参见霍尔，《1927-1937 年云南省的帮派》（*The Yunnan Provincial Faction*，1927-1937），各处。

4．采访王赣愚。

5．王日叟（即张起钧），〈南湖盛事〉，*QHXYTX* 75：74，或见 *XFJW*，第 47 页。关于联大和云南的互惠关系，参见 *GLXNLHDX*，第 96-100 页。

6．匿名日记，1938 年 4 月 29 日；章廷谦，〈在昆明〉，《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西南联合大学现况〉，《教育杂志》29.2:93

〔1939 年 2 月 10 日）。

7．冯保罗（Paul Feng），〈步行千里上学堂〉，《中国新闻界周末杂志》，1939 年 1 月 I5 日，第 3 页；〈西南联合大学现况〉，《教育杂志》29.2：93（1939 年 2 月 10 日）。

8．匿名日记，1938 年 4 月 29 日。

9．慕文俊，〈联大在今日〉，《宇宙风》14.95：379（1940 年 3 月 1 日；）。

10．〈1939 年春赴西南和西部中国的青年与宗教运动使命报告选录〉（“Extracts from the Report of the Youth and Religion Movement Mission to Southwest and West China, Spring，1939”）《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939 年 12 月，第 752-753 页。

11．毛文贤，〈昆明学府近影〉，《青年月刊》8.3：37（1939 年 9 月 5 日）。

12．吉尔伯特・贝克（Gilbert Baker），〈昆明的学生教堂〉，《教务杂志》，1940 年 2 月，第 89 页。

13．云胜（音），〈七封信从山国里寄来了〉，《战时青年》，1938 年 5 月 100，第 29 页。

14．胡嘉，〈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宇宙风》5：206（1939 年 5 月 1 日）。

15．卡尔顿・莱西（Carlton Lacy），〈移民、法国和教堂〉（“Immigration, France and the Church”），《教务杂志》，1940 年 10 月，第 634-635 页。

16．访谈 14。

17．王日叟，*QHXYTX*，第 73-74 页，刀^/炉，第 47 页。

18．1936 年，清华 256 名毕业生中有 3 个云南人；1939 年联大 282 名毕业生中有 1 个云南人。1945 年，410 名毕业生中云南人有 45 人，但其中 22 人是教育系学生。

19．楚图南，〈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新动向》1.1：18（1938 年 6 月 16 日）。

20．访谈 26。

21．采访龙绳文。

22.〈云南龙主席斥「和」〉，*JRPL* 1.20：1(1939 年 4 月 29 日)。

23．采访龙绳文。

24．陈达，《浪迹十年》，第 208 页，第 213 页。

25．霍尔致笔者函，1976 年 7 月 14 日。

26．访谈 90。

27．周明道，〈追忆滇史〉，*QHXYTX* 32：10（1970 年 4 月 29 日）。

28．采访龙绳文。关于开会的叙述是据采访所得。

29．访谈 40。

30．同上，采访龙绳文。

31．访谈 40。

第五章 重庆与昆明

1．林登（Allen Bernard Linden），〈中国的政治与高等教育：国民党与大学社群〉（*Politic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Kuomindang and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第 393 页。20 世纪初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综述，见边理庭，〈各大学各院系科目表定盘之经过〉，《教育杂志》30.6：8-15（1940 年 6 月）。

2．张起钧，〈北平的五大学〉，《儒林逸话》，第 3 页。

3．见陈立夫，《战争期间的中国教育》（*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the War*），第 1-6 页。

4．关于战争期间教育部对政治和思想控制的正当性，见吴俊升（On Tsuin-chen）〈战时中国的教育〉，载薛光前（Paul K.T. Sih）编，《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1937-1945），第 107 页。

5．顾毓琇，〈教育〉，《中国年鉴（1938-1939）》，第 642 页。

6．同上。

7．吴俊升，第 107 页。

8．同上。

9．采访吴俊升；参见陈立夫，《战时教育新政回忆》，第 20-21

页。

10．吴俊升，第 107 页。

11．访谈 20。

12．〈教育消息〉，《教育通讯》，1939 年 7 月 8 日，第 2-3 页；*QH*，第 302~303 页。

13．见边理庭在〈各大学各院系〉制作的表格，第 12-13 页。

14．*QH*，第 301 页。

15．在官方的教条与联大的规定之间，解释一般更强调两者的差异，而不是他们的共同点，见 *YNSD*，第 60 页。

16．罗滋（Jessie G. Lutz），《1850-1950 年的中国与基督教大学》（*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第 386 页。

17．林德赛（Michael Lindsay），《无名之战：1937-1945 年的华北》（*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之〈1937 年的燕京大学〉。

18．*QH*，第 302 页。

19．朱自清，〈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GDJYJK* 1.3，转引自 *QH*，第 302 页。

20．*QH*，第 302 页。

21．钱端升，〈大学往何处去〉，*JRPL* 3.24：377-379（1940 年 6 月 16 日）。

22．金岳霖，〈当代中国的教育〉，载哈利·麦克尼尔（Harley Farsworth Mac Nair）编，《未沦陷中国的声音》（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第 97 页。

23．*QH*，第 302 页

24．见边理庭，〈各机关学校对于部颁科目表意见的选集〉，GDJYJK 13：135（1940 年 9 月 1 日）。

25．*QH*，第 303 页。

26．陈达，《浪迹十年》，第 205 页。

27．*YNSD*，第 69-70 页；*GLXNLHDX*，第 45 页。

28．札姆莱特（Drumright）致高思（Gauss）函，附有重庆大使

馆的 1149 号快件，SD；吴俊升，第 109 页。

29．陈立夫，《战时》，第 22-23 页。

30．同上，第 25-27 页；采访吴俊升；对不同校友的采访；*LDBN*，第 42 页。

31．采访吴俊升；访谈 83。

32．采访吴俊升；《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下）；欧元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1.1：13-14〔1947 年 1 月 5 日）；孙邦正，《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第 429-430 页。

33．吴俊升，110 页；欧元怀，第 14 页；参见陈立夫，《战时》，第 23-24 页。

34．转引自陈立夫，《战争期间的中国教育》，第 5 页。

35．欧元怀，第 14 页。

36．采访任之恭。

37．费正清致 Lauchlin Currie 函，1943 年 7 月 19 日；费正清文件。

38．《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503 页，转引自 *QH*，第 300 页。

39．钱端升，〈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4.21：328-329（1940 年 11 月 24 日）。

40．关于潘光旦的观点，见他的〈宣传不是教育〉，*JRPL* 3.18：115-118（1940 年 5 月 5 日），和〈再论宣传不是教育〉，*JRPL* 3.14：213-216（1940 年 4 月 7 日）；关于潘公展的观点，见 *ZYRB*，大约是 1940 年 3 月 1 日，5 月 12、13 日，9 月 30 日和 10 月 14 日。这一论战的部分内容重刊于潘光旦，《自由之路》，第 221-338 页。

41．马灿华，〈青年思想问题〉，*JRPL* 4.17：268-270（1940 年 10 月 27 日）。

42．〈本期撰者〉，*JRPL* 4.17：272（1940 年 10 月 27 日）。

43．*QH*，301 页；*YNSD*，第 71 页。

44．同上；访谈 44。

45．71^80，第 71 页。

46．*YNSD*，第 301 页。

47．同上，第 308-311 页。

48．XHRB，1944 年 4 月 8 日。

49．见孙愚，〈剃度记〉。

50．沈从文，〈给青年朋友〉，《新动向》1.10：319-3200938 年 11 月 15 日）。

51.胡兆圻，〈闲话十九、二十两级〉，*QHXYTX* 26/27：12-13（1969 年 1 月 3 日），重刊于 *XFJW*，第 285 页。

52．访谈 44。

53．翁同文，〈从入学时说起〉，*XFJW*，第 78-79 页。

54．胡兆炘，第 285 页。

55．黄钰生（黄子坚），〈再论青年的志气和思想〉，*ZYRB*，1941 年 4 月 24 日。

56．黄坚立，《中华民国时期去政治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s in Republic China*），第 159 页。

57．教育部，〈专科以上学校训导处分组规则〉，1939 年 5 月，转引自 *QH*，第 296 页。关于陈立夫对设立训导处理论依据的回顾，见他的《战时教育新政回忆》，第 27-28 页。

58．*YNSD*，第 55-56 页。

59．*QH*，第 308-311 页。

60．教育部，〈实施导师制应该注意之各点〉，转自朱佩弦（朱自清），〈论导师制〉，《新动向》1.12：378（1938 年 12 月 31 日）。

61．教育部，〈大学和中学导师制原则〉（“Principles Governing Tutorial System For Middle and Higher Schools”），《教务杂志》，1940 年 3 月，第 188 页。

62．教育部，〈专科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摘自 *QH*，第 310 页。

63．罗滋，第 278 页。

64．欧元怀，第 13 页。

65．冯友兰，〈论导师制〉，*JRPL* 1.1：9-10（1939 年 1 月 1 日）；参见朱佩弦（朱自清），〈论导师制〉，第 378-380 页。

66．方靳、方群，〈陈岱孙教授谈西南联大〉，*YNWS*，第 6 页。

67．采访钱端升。

68．对查良钊有深刻了解的颂文，见他的儿子查瑞传，〈「为人服务何所愁？」——回忆父亲查良钊〉，*Rem2*，第 345-348 页。

69．*QH*，第 296-297 页；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 325-326 页。

70．冯友兰，《三松堂》，第 326 页。

71．同上，第 297 页。

72．访谈 45。

73．林元，〈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Rem2*，第 145-146 页；冯友兰，《三松堂》，第 102 页。

74．冯友兰，《三松堂》，第 103 页。

75．*ZYRB*，1939 年 12 月 23 日。

76．访谈 27。

77．*ZYRB*，1940 年 1 月 15 日。

78．关于联大最终确定何为校训，存在不同的意见。根据 198〗年出版的 *QH*（第 308 页），联大当局被迫接受官方训令；而 1988 年的 *YNSD*（第 39 页）称，联大校方并未遵办，而是坚持用自己制定的校训。参见，第 92 页。

79．潘公展，〈教育上两个迫切问题〉，*ZYRB*，1940 年 5 月 12、13 日。

80．*ZYRB*，1940 年 5 月 14 日。

81．贺麟，〈中国教育的新局势〉，《当代评论》，1943 年 12 月 21 日，第 5-7 页。

82．*Rem2*，第 153 页。

83．〈一樵六十自述〉，《顾一樵全集》第三卷，第 155 页；采访孙毓棠，1982 年 8 月 18 日。

84．关于吴加入教育部之前的履历及思想，见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第 1-78 页。

85．匿名访谈，纽约，1974 年 4 月 10 日。吴俊升所说的独立思考的学者与他之间就集权正当性的问题产生的矛盾，见薛光前编，第

106-111 页，及吴俊升，第 80-82 页。

86．伍启元致笔者函，1975 年 1 月 9 日。

87．关于经济方面的细节，见 *QH*，第 320-321 页，第 373-374 页；梅贻琦的报告载 *QHXYTX:C* 1939 年 5 月 1 日，1940 年 4 月 20 日，1943 年 1 月 13 日；赵赓扬，《梅贻琦传稿》，第 59-60 页；胡嘉（音），第 208 页。

88．费正清，〈从昆明到桂林（1942 年 8 月 20 日）〉，费正清文件。

89．费正清致希思（Alger Hiss）函，1942 年 9 月 23 日，费正清文件。

90．关于蒋介石和陈立夫企图阻止帮助联大的例子，见费正清 1943 年 1 月 14 日到 7 月 17 日的回忆录，费正清档。

第六章 联大的学风

1．对三所学校最好的比较性叙述是张起钧的〈西南联大纪要〉，载 *XFJW*，第 8-25 页。

2．罗家伦，〈国立北京大学〉，张其昀等编，《中华民国大学志》，第一卷，第 52 页。

3．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第 21-22 页。

4．同上，第 26 页。

5．同上，第 21-22 页。

6．《中国大学图鉴》，第 72-74 页。

7．金刀，〈三位一体的西南联大〉，《青年公论》2：30（1939 年 4 月 1 日）。

8．萧公权，〈教学相长（二）• 清华五年〉。

9．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第 19 页。

10．采访德叶尔（Svetlana Dyer）。

11．胡适，〈教育家张伯苓〉，《另一个中国》，第 6 页。

12．见李采珍（Chae-Jin Lee），《周恩来的早年生活》（*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加州，史丹佛：史丹佛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特

别是第 38-39 页。

13．见唐际清，〈国立南开大学〉，张其昀等编，《中华民国大学志》，第一卷，第 89 页；加内特（Shirley B. Garrett），《都市中国的社会改革者：1865-1926 年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Social Ro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 M. C. A.，1865-1926*），第 97 页，第 116-117 页，第 122 页。

14．王刚（王树勋）页。

15．《大公报》1946 年 11 月 26 日。

16．周树勋，〈三十年往事说从头〉，*QHXYTX* 48：32（1974 年 4 月）。

17．张春风，《国立各学校投考手册》，第 71 页。

18．金刀，〈三位〉，第 29 页。

19．戴世光，〈怀念抗战中的西南联大〉，*Rem2*，第 25 页。

20．沈琨、沈靖，〈叔叔给我们讲西南联大和联大人〉，*YNWS*，第 232 页。

21．蒋永珍（音，Chiang Yung-chen），〈中国的社会工程学和社会科学（1896-1949）〉，第 13 页。

22．刘烟生，〈联大点滴〉，《联大青年》1.1：12-13（1941 年 6 月 6 日）。

23．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Rem1*，第 514 页。

24．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第 24 页。

25．刘烟生，第 13 页；王刚，〈我入〉，第 391 页。

26．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第 23 页。关于「挖角」的过程，见萧公权，第 21-22 页，及 1978 年 5 月 8 日施耐德（Laurence Schneider）对吴大猷的采访。

27．见姜淑雁、叶楷，〈怀念慈爱的叔父姜立夫教授〉，*Rem1*，第 117-122 页。

28．方靳、方群，〈陈岱孙教授谈西南联大〉，*YNWS*，第 6 页。

29．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YNW*S，第 66 页。

30．施耐德对吴大猷的采访。

31．许烺光，〈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书目提要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4：16（1944 年），摘自林登（Allen Linden），〈中国的政治与高等教育〉，第 260 页。

32. 余秉权（Ping-kuen Yu），〈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期刊札记〉（“A Note on Historical Periodical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3.4：585（1964 年 8 月）。

33．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第 27 页。

34．《毛文贤，〈昆明学府近影〉，《青年月刊》68.3：370939 年 9 月 15 日）。

35．*QH*，第 294 页。

36．郑天挺，〈梅贻琦先生与西南联合大学〉，译文载《中国教育》21.2：230988 年夏季号），原文载 *Rem1*，第 68 页；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Rem1*，第 59-61 页。

37．奠跃挺，第 23 页。

38．*Rem2*，第 33 页；也见王康，《闻一多传》，第 86-87 页。

39．方靳、方群，〈陈岱孙〉，第 1-2 页；*YNSD*，第 15 页，第 53-55 页；李玲，〈余冠英老师回忆联大〉，*Rem2*，第 33 页；也见王康，〈联大的学风〉，译文载《中国教育》21.2：86-87（1988 年夏季号），原文载 *Rem1*，第 189 页。

40．*YNSD*，第 15-16 页；熊德基，〈联大的回忆与思考〉，*Rem 2*，第 47-48 页。

41．〈联大的娱乐衣食住行〉，*QHXYTX* 76：30（1981 年 7 月 31 日）。

42．冯友兰，《三松堂》，第 347 页。

43．*YNSD*，第 19 页；赵赓飏，第 58-59 页。

44．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YNWS*，第 76 页。

45．同上。

46．*YNSD*，第 61 页。

47．李埏，第 74-75 页。

48．王康，《闻一多传》，第 83 页。

49．*YNSD*，第 60 页。

50．李埏，第 77 页。

51．同上，第 75 页。

52．同上，第 80 页；王康，《闻一多传》，第 79 页。

53．李埏，77 页。

54．方靳、方群，〈陈岱孙〉，第 6 页。

55．李埏，第 79 页。

56．*YNSD*，第 18-19 页；*GLXNLHDX*，第 2 页注脚。

57．冯至，〈昆明往事〉，*YNWS*，第 29-31 页。

58．李埏，第 76 页。

59．同上。

60．王康，《闻一多传》，第 77-78 页（应为王康，〈联大的学风〉，*Rem1*，第 184 页。）

61．*YNSD*，第 17-18 页。

62．见贺联奎，〈在工学院的天地里〉，*YNWS*，第 398-399 页。

63．王康，《闻一多传》，第 76 页。（应为王康，〈联大的学风〉，*Rem1*，第 183 页。）

64．从同上，第 77 页。（应为王康，〈联大的学风〉，*Rem1*，第 183 页。）关于蔡元培的信条，更常见的说法是「兼容并包」，有同样的意思。

65．舒衡哲（Vera Schwarcz），《是说出真相的时候了》（中译本为《张申府访谈录》）（*Time for Telling the Truth Is Running Out*），170-171 页。

第七章 文学院

1．*QH*，第 324 页。

2．白英，《毛泽东》，第 250 页。

3．据其它版本，刘说只有一个半人是这方面的权威：他自己和那个日本人。

4．张起钧，《儒林逸话》，第 82-83 页。

5．关于刘文典的趣闻轶事，虽然细节有别，但在总体上是一贯的。上文资料有：周明道，〈追忆滇史〉，第 9 页；胡保佑，〈联大二三事〉；*QHXYTX* 52：31（1975 年 5 月），*QH*，第 307 页；张起钧，《儒林逸话》，第 81-85 页；与九位校友的访谈；采访刘文典的密友、经济系教授秦瓒。

6．*QH*，第 327 页。

7．*XHRB*，1944 年 9 月 12 日。关于它的背景，见 1944 年 7 月 30 日、8 月 6 日、9 月 4 日的《新华日报》。

8．见林登（Linden），〈中国的政治与高等教育〉，第 261、263 页，261ff。

9．*QH*，第 327-328 页。

10．访谈 27；采访孙毓棠，1982 年 7 月 13 日。

11．周明道，第 9 页。

12．访谈 45；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上），*ZJWX* 2：73（1981 年 8 月）。

13．访谈 45。

14．*LDBN*，第 170 页。

15．见孔飞力（(Philip A. Kuhn)，《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第 10-11 页。

16．访谈 48。

17．访谈 69。

18．访谈 42。

19．《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4：425。

20．采访孙毓棠，1982 年 7 月 23 日。

21．《民国名人传记辞典》1：370；更多关于钱穆的纪录，见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2），《宇宙风乙刊》29：17-19（1940 年 9 月 16 日）；《民国名人传记辞典》1：368-371；费侠莉编，《变化的极限》（*The Limits of Change*），34 页；布列尔（O. Brière），《中国哲学

五十年（1898-1950）》，第 8 页，第 115 页，第 123 页；张起钧，〈史学大师钱宾四〉，《儒林逸话》，第 49-53 页。

22.《民国名人传记辞典》1：259；采访孙毓棠，1982 年 7 月 23 日。

23. 采访孙毓棠，1982 年 7 月 23 日。

24. 访谈 64。

25. *LDBN*，第 190 页。关于皮名举的资料有：对其学生的采访；朋丽 32：9；关于蔡维藩，*LDBN*，第 182 页；*QHXYTX* 32：9；对其学生的采访，其中一人（访谈 65）称，与其它资料相反，蔡的学生大约有 20 人，皮的学生则有 200 人；关于向达，*LDBN*，第 187 页；关于王信忠，1942 年教育部表格；采访吉尔贝特·贝克。关于刘崇鋐及其同事，见对刘的采访。

26.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摆脱困境》（*Escape from Predicament*），第 10 页。

27. 访谈 64。

28.《民国名人传记辞典》2：34-35。

29. 同上，第 35 页。

30. *XFJW*，第 302 页。

31. 采访何炳棣、李田意；李钟湘，〈国立〉（上），第 75 页。

32. 冯友兰，《三松堂》，32；326 页。

33. 采访李田意。

34. 胡兆炘，〈闲话十九、二十两级〉，*QHXYTX* 26/27：12-13，转载于 *XFJW*，第 285 页。

35. 许理和（(Erik Zürcher）为他的著作撰写介绍性的历史综述时，对汤用彤表示由衷的谢意，见《佛教征服中国》（*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莱顿：Brill，1972 年)，第 18 页。

36. *QH*，第 334 页；*LDBH*，第 169 页。

37.《民国名人传记辞典》2：33。

38. 布列尔，第 72 页。

39. 同上，第 75 页；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 39-40 页。

40．布列尔，第 100 页。

4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第 333-334 页。

42．*QH*，第 334 页。

43．陈荣捷，〈中国：哲学与宗教〉（“China: Philosophy and Religion”），麦克尼尔编，《来自未沦陷中国的声音》，第 329 页。

44．金岳霖的论文〈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写于 1943 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1：89-93（1980 年 3 月）。

45．《周报》，1946 年 8 月 3 日，第 19 页。

46．关于沈有鼎的资料有：墨子刻，第 10 页；张起钧，《儒林逸话》，第 160-162 页；余瑞麟，〈多难因有兴国运〉，*QHXYTX* 75：96；*LDBN*，第 181 页；邹克定（音），〈北京宣布龙云平反〉，《华语快报》，1980 年 9 月 19 日；李钟湘，〈国立〉（上），第 76 页；采访校友。

47．第 331 页。

48．同上，第 24 页。

49．张春风，《国立各院校投考手册》，第 72 页；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QHXYTX: B*p 2：2（1947 年 4 月 25 日）。

50．对一群校友的采访，纽约，1974 年 4 月 8 日。

51．关于陈福田，见 *LDBN*，第 176 页，及访谈 62。

52．许芥昱，《20 世纪中国诗选》，第 131-132 页。

53．*LDBN*，第 184 页。关于冯至，也见许芥昱，《20 世纪中国诗选》，第 71 页。

54．许芥昱，《20 世纪中国诗选》，第 132 页。关于卞之琳，*LDBN*，第 193-194 页，及白英，《目击：动荡十年之个人纪录 0937-1946〉》（*Eyewitness: A Personal Account of a Tumultuous Decade*），第 252 页。

55．大卫 •芬克斯坦（David Finkelstein）、贝弗利 •胡柏〔（Beverley Hooper），〈在华五十七年〉（*57 Years Inside China*），《亚洲》（*Asia*）2.5：10（1980 年 1-2 月）。

56．项美丽，《中国之于我》（China to Me），第 106 页。

57．同上。

58．芬克斯坦、胡柏，各处；诸有琼，〈感谢您，温德教授〉，《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21（1985 年 4 月）。温德的年龄按中国传统计算。

59．*LDBN*，第 176 页。

60．访谈 27。

61．*LDBN*，第 183 页。

62．同上。

63．梅秀棠（音），〈民盟与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建设》，1980 年 2 月，第 6 页。

64．*LDBN*，第 183 页。

65．孙毓棠致笔者稿，华盛顿特区，1982 年 6 月。

66．〈论新文学〉，*JRPL* 4.14：189（1940 年 9 月 22 日）。

61．《战国策》4：2-10（1940 年 5 月 15 日）。

68．*XHRB*，1942 年 5 月 14 日，转引自 *QH*，第 332 页。

69．费侠莉编，第 40 页。

70．李钟湘，〈国立〉（上），第 76 页。

71．李觐高，〈泾阳吴宓〉，*ZJWX* 4.4：23（1964 年 4 月）。

72．杨树勋，〈忆吴雨僧教授〉，*ZJWX* 1.5:26（1962 年 10 月）。

73．同上；温源宁，〈小事看吴宓〉，胡晶清编，《作家写作家》，第 300 页。

74．杨树勋，第 26 页。

75．同上，第 25 页。

76．同上。

77. 关于吴的恋爱悲剧的背景，见张起钧，《儒林逸话》，第 147-149 页。

78．施耐德（Laurence Schneider），〈民族精英与新知识阶层〉（“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费侠莉编，第 82 页。

79．一生，〈胡子先生〉，《生活导报》，1942 年 11 月 27 日，第 1 页。

80．周明道，〈追忆滇史〉，第 85 页。

81．李钟湘，〈国立〉（上），第 76 页。

82.《大公报》（香港〉，1952 年 8 月 10 日。

83．杨树勋，第 26 页。

第八章 法商学院

1．*QH*，第 22 页。

2．*QH*，第 224-225 页。

3．*QH*，第 223 页。

4．*QH*，第 355 页。

5．周明道，〈当年师长素描〉，*XFJW*，第 180 页。

6．同上。

7．采访陈岱孙。

8．采访吉尔伯特·贝克（Gilbert Baker）。

9．LDBN，第 180 页。

10.《正义报》，1945 年 6 月 4 日。

11．王民嘉，〈悼念赵乃搏老师〉，*YNWS*，第 210-211 页；访谈 83。

12．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中），*ZJWX* 39.3：65（1981 年 9 月）。

13．周明道，〈当年师长素描〉，第 181 页。

14．访谈 44。

15．*LDBN*，第 180 页；张友仁，〈国民党的革命派周炳琳先生〉，*Rem2*，第 157 页。

16．李钟湘，〈吾爱吾校〉，*XFJW*，第 178-179 页；*LDBN*，第 180 页。

17．访谈 44。

18．周明道，〈当年师长素描〉，第 181 页。萧住在郊区。要是错过公共汽车，他就得步行一个钟头才能到达学校上课。为他方便计，校方把他讲授的两门课合并为「国际贸易」。有一次，学生等他等了五十分钟。当他最后走进教室时，一个学生也没有了，他不禁落下泪

来。见苏有秦（音），〈我们那个时代呀，就是这样的!〉，摘自《清华校报》1985 年校庆特别版。

19．周明道，〈当年师长素描〉，第 183 页。

20．LDBN，第 186 页；《大公报》（重庆〉，1946 年 11 月 26 日；李钟湘，〈国立〉（中），第 65 页。

21．周明道，〈当年师长素描〉，第 183 页。

22．出版时更名为 An outline of International Price Theories（《国际价格理论纲要》）（London: Routledge，1939）。

23．周明道，〈当年师长素描〉，第 182-183 页；李钟湘，〈国立〉（中），第 65 页。

24．*QH*，第 354 页。

25．一位校友（1944 级经济系学生）不定期的笔记，1985 年 10 月。

26．采访陈岱孙。

27．4%是根据 1939、1940 和 1942 年可利用的记录计算的，2%是根据 1943、1944 和 1945 年的纪录，加上参军学生人数计算的。见《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各处。

28．张起钧，《儒林逸话》，第 175 页。

29．李赋宁，〈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Rem2* 第 135 页。

30．《联大青年》，1941 年 10 月 16 日，第 27 页。

31．采访钱端升，1980 年 3 月 26 日。

32．杜汝楫，〈怀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Rem2*，第 166 页。

33．张起钧，《儒林逸话》，第 176 页。

34．李赋宁，第 134 页。

35．采访菲利普・斯普劳斯（Philip Sprouse）。

36．杜汝楫，第 169 页。

37．张起钧，《儒林逸话》，第 175 页。

38．刘烟生，〈联大点滴〉，《联大青年》1941 年 6 月 16 日，第 13 页。

39．同上。

40．同上。

41．浦薛凤，〈金碧弦歌〉，*XFJW*，第 147 页。

42．采访钱端升，1980 年 3 月 27 日。

43．采访王赣愚。

44．胡保佑，〈关于法律系〉，致笔者函，台北，1985 年 8 月 24 日。

45．李钟湘，〈国立〉（中），第 64 页。

46．同上。

47．祝仁民致笔者函，昆明，1980 年 5 月 14 日。

48．*LDBN*，第 173 页。

49．孙毓棠，致笔者稿，华盛顿特区，1982 年 6 月。

50．彭令占，〈在校追忆——法律系种种〉，*QHXYTX* 8：21（1964 年 4 月 15 日）；访谈 29。

51．彭令占，第 21 页。

52．访谈 29。

53．胡保佑，〈关于〉。

54．彭令占，第 21 页。

55．同上。

56．摘自一份无从鉴别的清华学生报，1947 年 4 月 I5 日；蒙黎启颖惠助，特此致谢。

57．《北京大学六十年》，第 110 页。

58．*QH*，第 156 页。

59．陈达，《浪迹十年》，第 455 页；转引自，第 357 页。

60．同上，各处；，第 356-357 页；《民国名人传记辞典》，1：237；国情普查研究所《中国研究通讯》（*China Institute Buttetin*）5.2：20-21（1940 年 11 月）。

61．*QH*，第 356-357 页。

62．李钟湘，〈国立〉（中），第 65 页。

63．采访 Harold Roser。

64．访谈 81。

65．〈说工读兼营〉，收入潘光旦《自由之路》，第 207-220 页。

66．*LDBN*，第 179 页。

67．*QH*，第 179-180 页。

68．陈达，第 202-204 页。

69．教育部对社会学的规定载部编《大学科目表》，第 94-98 页。蒙李激扬提供此表，特此致谢。

70．采访李树青；*LDBN*，第 186 页、175 页。

71．费孝通致费慰梅（WilmaC. Fairbank）函，1944 年 4 月 29 日，转引自大卫 • 阿古什，《费孝通与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学》（中译本《费孝通传》）（*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第 139 页。

第九章 战争与学术

1．李树青，〈「民主的堡垒」〉，*Rem2*，第 39 页；采访金岳霖。

2．李约瑟，〈西南中国的科学 II：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第 37 页。

3．李约瑟，〈西南中国的科学 I：物理学和化学〉，第 10 页。

4．任之恭’〈我在西南联合大学〉，*Rem2*，第 206 页。

5．沈琨、沈靖，〈舅舅给我们讲西南联大和联大人〉，*YNWS*，第 228 页。

6．戴世光，〈怀念抗战中的西南联大〉，*Rem2*，第 228 页。

7．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ZJWX* 39.2：74〔198〗年 8 月）。

8．《文史杂志》4:1-2，转引自 *QH*，第 332 页。

9．冯友兰，《三松堂》，第 229 页。

10．同上，第 228 页。

11．《民国名人传记辞典》4：426。

12．白英致费正清函，1944 年 4 月（？），费正清文件。

13．*QH*，第 329-340 页。

14．*QH*，第 328 页。

15．熊德基，〈联大的回忆与思考〉，*Rem2*，第 50-51 页。

16．《北京大学六十年》，第 110 页；参见许芥昱，《闻一多》，各处，及施耐德（Laurence Schneider），《楚狂人》（A Madman of Ch'u），各处。

17．张正东，〈吴泽霖教授二三事〉，及 *Rem2*，第 177-178 页。

18．阿古什，《费孝通与革命中国的社会学》，第 97-103 页。根据费孝通的战时田野工作完成的其它著作，同上，第 328-331 页，第 341-346 页。

19．见李树青，〈悼念业师潘光旦先生〉，*Rem2*，第 161 页。

20．*QH*，第 303 页。

21．下面的材料来自邢公畹，〈抗战时期的南开边疆人文研究室〉，*Rem2*，第 156-180 页。〔*Rem2* 应为 *Rem1* 之误。〕

22．见白英致费正清函，1944 年 4 月（？），寻求项目基金；费正清文件。

23．胡嘉，〈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 208 页。

24．采访孙毓棠，1982 年 8 月 3 日。

25．遇春，〈介绍蔡枢衡先生〉，第 1 页。

第十章 理学院

1．吴大猷，《回忆》，第 29 页。

2．狄斯黛（W. E. Tisdale），〈中国科学机构访问记〉（“Report on Visit to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in China”），1933 年 9-12 月，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第 21 页，第 47-48 页。感谢詹姆斯·雷德-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允许我使用该档案。

3．*QH*，第 336-337 页。

4．张沁，〈补述联大的育乐衣食住行〉，*QHXYTX* 77：11（1981 年 10 月 1 日）。

5．*LDBN*，第 171-172 页。

6．*LDBN*，第 189 页。

7．张春风，《国立各院校投考手册》，第 73 页；*QH*，第 341 页；

《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各处。

8．*QH*，34 页；陈省身，〈我在联大的六年〉，*Rem2*，第 190-191 页。

9．华罗庚的故事根据斯蒂芬·萨拉夫（Stephen Salaff），〈华罗庚传〉（“A Biography of Hua Lo-keng ”）Isis 63.217:143-148（1972 年 6 月）；柯塔拉（Gina Bari Kotala），〈华罗庚与中国数学的成型〉，《科学》210.4468：413-414（1980 年 10 月 24 日）；张起钧，〈熊庆来发掘华罗庚〉，《儒林逸话》，第 76-78 页；《民国名人传记辞典》2：185；访谈 42（受访者是华的同乡，金坛人）。

10．访谈 89。

11．陈斯恺，〈三十年后忆清华〉，《清华十级毕业三十年纪念特刊》，第 69 页。

12．《联大青年》2：29（1941 年 10 月 16 日）。

13. 萨拉夫，第 148 页；顾迈南，〈华罗庚教授在西南联大〉，*Rem2*，第 192-195 页（节选自顾着《华罗庚传》）。

14．吴大猷，第 47-48 页；郭沂曾，〈忆西南联大物理系〉，*Rem2*，第 225 页。

15．李约瑟，〈科学 I〉，第 9 页。

16．*YNSD*，第 90 页，可能是根据 *QH*，第 345 页。经过更详尽的检查，发现联大物理学家在 1939 年到 1946 年共出版了 42 本著作，但并没有打破「理论」与「实验」的分类。参见郭沂曾，第 229 页。

17．*QH*，第 344-345 页。

18．李约瑟，〈科学 I〉，第 9 页；*QH*，第 345 页。参见虞福春，〈深切怀念饶毓泰老师〉，*Rem2*，第 202-204 页。

19. 燕卜荪，〈一所中国大学〉（“A Chinese University”），第 239-241 页。

20．《清华大学五十年纪实（1911-1960）》，第 22-23 页。

21．访谈 39，由笔者和施耐德共同采访。

22．访谈 38，由笔者和施耐德共同采访。

23．张义存（音），〈中国的化学〉，李熙谋编，《中华民国科学志》，

第9-10页。

24．裘立群致笔者函，1989年7月21日。

25．采访钱思亮。

26．燕卜荪，第242页。

27．国立北京大学，〈北大研究院研究所概况〉，*GDJYJK* 1.2：153（1941年6月1日）。

28．采访钱思亮。

29．梅贻琦，〈复员后〉，第3页。

30．豪斯（Ernest O. Hauser），〈穷学校〉（“Poverty Campus”），第92页。

31．李约瑟，〈科学I〉，第9页。

32．*QH*，第377页。

33．采访钱思亮。

34．*QH*，第346-347页；*YNSD*，第41页。

35．田曰灵，〈回亿西南联大化学系〉，*Rem2*，第250页。

36．*QH*，第347页。

37．同上，第346页；*YNSD*，第219-220页。

38．申泮文’〈怀念严师杨石先教授〉，*Rem2*，第184-189页。参见王文俊，〈万里寻故地一一记杨石先教授重访昆明〉，*YNWS*，第97-99页。

39．李熙谋编，第5页；《大公报》，1946年11月26日；*XHRB*，1944年8月18日，*LDBN*，第173-174页；张沁，*QHXYTX* 11：12（1981年10月31日）；裘立群致笔者函，1989年7月26日。

40．访谈12。

41．采访钱思亮。

42．访谈64。

43．李钟湘，〈国立〉，第63页；田曰灵，第252页；*YNSD*，第83页。

44．《滇康道上》（1943年）和《大凉山彝区考察记》（1945、1947年）。

45．裘立群致笔者函，1989 年 7 月 26 日。裘是参加考察的三位学生之一。

46.《大凉山彝区考察记。》

47．见王治浩和邢润川的〈知名学者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所列的书目，《化学通报》，1980 年，第 9 期，第 54-55 页。

48．*LDBN*，第 173-174 页。

49．李熙谋编，第 11 页。

50．孙敦恒，〈记著名动物学家陈桢教授〉，*YNWS*，第 223 页。

51．李建武，〈李继侗教授在西南联大〉，*Rem2*，第 268-270 页。

52．*QH*，第 349 页。

53．同上。

54．国立北京大学，〈北大研究院〉，第 153 页。

55．*QH*，第 349 页。

56．李约瑟，〈科学〉，第 36-37 页，重刊于李约瑟、鲁桂珍编，《科学前沿》（Science Outpost）第 88-90 页。

57．李约瑟，〈科学 II〉，第 36 页。

58．同上，李约瑟、鲁桂珍编，《科学前沿》，第 389 页；阿道夫（William H. Adolph），〈战时中国的生理学研究〉（“Phys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科学月刊》（Scientific Monthly）61.1：153-154（1945 年 8 月）；国立清华大学，〈清华研究院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汉口工程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概况〉，*GDJYJK* 1.2：157-158（1941 年 6 月 1 日）。

59．国立清华大学，〈清华研究院〉，第 154-156 页。

60．同上，第 154-160 页。

61．梅贻琦，〈复员后〉，第 4 页。

62．*QH*，第 35 页。

63．梅贻琦，〈复员后〉，第 4 页。

64．同上。

65．李约瑟，〈科学 I〉，第 10 页；梅贻琦，〈复员后〉，第 4 页。

66．采访彼德・米士。

67．梅贻琦，〈复员后〉，第 4 页。

68．*LDBN*，第 192 页。

69．同上，第 169-170 页。

70．同上。

71．关于米士的主要数据包括：毕氏（音）（假名），〈记彼得•米士教授〉，《生活导报》，1943 年 2 月 16 日；*LDBN*，第 191 页；张源潜，〈大一（1942-1943）生活杂忆〉，*YNWS*，第 169-170 页；采访米士；米士致笔者函，1982 年 7 月 8、9、13、27 日。

72．毕氏，〈记彼得•米士教授〉。

第十一章 工学院

1．*QH*，第 331 页。（应为第 231 页。）

2．沈元、徐华舫、曹传钧、赵震炎，〈回忆联大航空工程系〉，*Rem2*，第 304 页。

3．*QH*，第 366-367 页；梅贻琦，〈复员后〉，第 8 页。

4．*QH*，第 359 页注三，第 361 页，第 303 页，363 页；梅贻琦，〈复员后〉，第 7 页。

5．庞瑞、杨玉玮，〈结构学权威蔡方荫老师二三事〉，*Rem2*，第 212 页。

6．董树屏，〈忆德高望重的刘仙洲教授〉，*Rem2*，第 280 页。

7．贺联奎，〈在联大工学院的天地里〉，*YNWS*，第 398-408 页。

8．傅乐炘，〈西南联大机械系 1945 级「炔社」杂忆〉，*YNWS*，第 522 页。

9．贺联奎，405 页；赵访熊，〈联大工学院的数学教学〉，*Rem2*，第 310-311 页。

10．唐统一，〈西南联大电机系片断〉，*YNWS*，第 239 页。

11．*QH*，第 229-230 页。

12．贺联奎，〈严师的教益〉，*Rem1*，第 197-198 页。

13．贺联奎，〈在〉，第 403 页。

14．张闻博，〈忆联大机械系 1944 级「梭」社的老师和同窗〉，

YNWS，第 520 页（应为第 511 页）；*LDBN*，第 200 页；贺联奎，〈严师〉，第 202 页。

15．张闻博，第 511 页，第 512 页；*LDBN*，第 200 页。

16．除非特别说明，关于李辑祥的材料来自于马芳礼、郭世康，〈怀念李辑祥老师〉，*Rem2*，第 282-285 页。

17．*LDBN*，第 200 页。

18．庞瑞、杨玉玮，第 273 页。

19．贺联奎，〈严师〉，第 203-204 页。

20．陶葆楷，〈西南联大的特点〉，*LDBN*，第 29 页。

21．胡兆炘，〈闲话十九、二十两级〉（一），*QHXYTX* 26/27：13（1969 年 1 月 3 日）。

22．*QH*，第 229-231 页。（未查到所引用的内容。）

23．傅乐炘，第 519 页。

24．同上。

25．光德正，〈联大工学院生活追忆〉，*QHXYTX* 52：29-30（1975 年 5 月 15 日），重刊于，第 312-313 页。

26．傅乐炘，第 521 页。

27．许京骐、刘楷：〈联大工学院的引擎社〉，*Rem1* 第 337-341 页。

28．陈炎创等，〈回忆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Rem2*，第 277 页；方复，〈忆工学院铁马体育会〉，*YNWS*，第 498-501 页。

29．贺联奎，〈在〉，第 408 页；许华舫，〈望苍前院的生活〉，*Rem2*，第 380 页；访谈 29。

30．光德正，第 30 页；*Rem2*，第 312-313 页。

31．*QH*，第 228-229 页。

32．陈南平、张远东，〈西南联大机械系回顾〉，*Rem2*，第 290 页。

33．*QH*，第 303 页，第 361 页。

34．同上，第 360 页，第 362 页，第 367 页；梅贻琦，〈复员后〉，第 8 页。

35．王先冲，〈忆钟泉周烈士二三事〉，*YNWS*，第 297 页。

36．除非另有说明，这一部分的资料来自 *QH*，第 363-366 页。

37．陈炎创等，第 277 页。

38．*QH*，第 360 页，第 362 页，第 366-367 页；梅贻琦，〈复员后〉，第 8 页。

39．下文所述数据来自贺联奎，〈联大的清华服务社〉，*Rem2*，第 360-366 页，并根据 1987 年 9 月对联大教授孟广喆的采访。

第十二章 师范学院

1．*YNSD*，第 22 页；《教务杂志》，1939 年 5 月，第 272-273 页。

2．黄钰生，〈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Rem2*，第 314-315 页。

3．*YNSD*，第 23 页。

4．黄钰生，〈回忆〉，第 315 页。

5．*YNWS*，第 33 页，第 59-66 页。

6．*YNSD*，第 26-27 页；黄钰生，〈回忆〉，第 314 页。

7．黄钰生，〈回忆〉，第 318 页。

8．同上，第 317-318 页；*YNSD*，第 31-32 页。

9．*ZYRB*，1939 年 6 月 7 日。

10．沈劲冬，〈传播光明〉，*QHXYTX* 44：40-41（1973 年 4 月 29 日）。

11．*ZYRB*，1941 年 4 月 13 日。

12．〈青年的道德问题〉，《正义报》，1941 年 4 月 24 日。

13．见黄钰生，〈再论青年的志气的思想〉，*ZYRB*，1941 年 4 月 24 日。

14．匿名日记，1938 年 2 月 13-14 日；访谈 11。

15．访谈 54；孙毓棠致笔者稿，华盛顿特区，1982 年 8 月。

16．*LDBN*，第 195-196 页；采访匿名联大教授。

17．采访黄钰生。

18．黄钰生，〈回忆〉，第 319-321 页。

19．同上。

20．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YNWS*，364页。

21．《国民党领导传记》（Biographies of Kuomintang Leaders）「陈雪屏」条。

22．采访孙毓棠，1982 年 8 月 3 日。

23．陈雪屏致信笔者谈他对本章初稿的意见，台北，1985 年。陈雪屏否认了密友孙毓棠的说法——蒋梦麟让陈氏选择担任北大院长或三青团主席。参采访孙毓棠，1982 年 6 月 10 日。

24．采访裴存藩。

25．*LDBN*，第 194-195 页。

26．孙毓棠致笔者稿，华盛顿特区，1982 年 8 月。

27．黄钰生，〈回忆〉，第 318 页。

28．熊德基，〈我在联大〉，第 364 页。

29．同上，第 374-375 页。

30．曹学源，〈西南联大的第一所民众夜校〉，*YNWS*，第 442-443页。

31．黄钰生，〈回忆〉，第 317 页。

32．*YNSD*，第 33 页。

33．同上，第 80 页，第 103-104 页；林毓杉，〈西南联大对云南教育事业的贡献〉，*YNWS*，第 89-90 页；马曜，〈珍视西南联合大学留给云南的遗产〉，*YNWS*，第 83-84 页。

34．*YNSD*，第 77-80 页；林毓杉，第 89 页。

35．张映庚，〈为了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简介联大师院国文月刊社出版的《国文月刊》〉，*YNWS*，第 126-133 页，各处。

36．*YNSD*，第 108 页。

37．同上，第 109-110 页。

38．同上，第 107-108 页，第 111 页。

第十三章 希望的岁月：1938-1941 年

1．访谈 9。

2．《教务杂志》1939 年 8 月，第 457 页。

3．*LDBN*，第 44 页。

4．〈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战时知识》12：17（1938 年 12 月 25 日）。

5．*LDBN*，《大公报》（上海），1946 年 11 月 27 日；查良铮，〈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抗战以来》，第 2 页；韩非（音），〈西南联大的学生活动〉，*XHRB*，1941 年 1 月 5 日，译文未署作者名，载《中国研究通讯》，（*China Institute Bulletin*）1941 年 3 月，第 49-51 页；石横，〈抗战中战胜的西南联合大学〉，《战时各大学鸟瞰》，第 112 页。

6. 张沁的〈梦游昆明〉是最惹人遐思的远行，载 *XFJW*，第 139-141 页。

7．李秦阳（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生活〉，*CWR* 93.12：430（1940 年 8 月 17 日）。

8．采访黄中孚。

9．*XHRB*，1943 年 10 月 23 日。

10．张源潜，〈大一生活杂记〉，未刊稿，第 7 页。

11．翟国瑾，〈联大伊始〉，*XFJW*，第 325-326 页。

12．采访黄中孚。

13．李秦阳，第 431 页。

14．*ZYRB*，1941 年 3 月 21 日。

15．谢冠群，〈初进联大时的一些记忆〉，*XFJW*，第 208 页。

16．〈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第 18 页。

17．走幸田，〈我生活在新校舍〉，译文载《中国教育》（*Chinese Education*）1988 年夏季号，原载于 *LDBN*，第 78 页；光远，〈片断的回忆〉，*LDBN*，第 67 页；姚秀彦，〈永远怀念西南联大〉，*XFJW*，第 305 页。

18．访谈 44、89。

19．〈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第 18 页。

20．访谈 62。

21．〈八年来同学的生活与学习〉，*LDBN*，第 44 页。

22．〈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第 18 页。

23．访谈 27。

24．访谈 40；祝仁民致笔者函，1980 年 5 月 14 日。

25．《正义报》，1944 年 9 月 23 日。

26．《观察报》，19 衫年 3 月 16 日。

27．访谈 18。

28．胡兆炘，〈闲话十九、二十两级〉，*QHXYTX* 26/27：13（1969 年 1 月 3 日），重刊于 *XFJW*，第 285 页。

29．访谈 40。

30．下文据程应镠，〈树勋巷五号〉，*YNWS*，第 417-419 页。

31．《中国研究通讯》，1941 年 3 月，第 51 页。

32．同上。

33．司徒京华，〈说西南联大〉，《战时知识》1940 年 9 月 1 日，第 18 页。

34．访谈 27。

35. 这段叙述来自施载宣（萧荻），〈从群声歌咏队到联大歌咏团〉，*Rem1*，第 331-336 页。

36．长期以来，创办群社的缘起鲜为人知，邢福津（后以刑方群为名）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见他的〈回忆群社〉，*Rem1*，第 309-310 页。邢文记录了群社与中共的关系，深入描写了群社的活动。在发表之前，邢根据十三位元老社员的评论，对文稿作了修改。

37．《北京大学六十年》，第 100 页；熊德基，〈我在联大〉，第 366 页。关于群社与农民、工人的活动，见李凌，〈记昆明的一个职工读书会〉，*Rem1*，第 280-281 页。

38．韩非，〈西南联大的学生活动〉，*XHRB*，1941 年 1 月 5 日，译文未署作者名，载《中国研究通讯》，1941 年 3 月，第 5 页。

39．司徒京华，第 18 页；*LDBN*，第 132 页。

40．〈联大的团体生活〉，*LDBN*，第 132 页。

41．访谈 57。

42．这段叙述主要根据张维亚，〈两次兵役宣传活动〉，*YNWS*，第 439-441 页。关于三青团南针社的活动，袁春潮（音）先生把他关于南针社的笔记寄给了笔者，台北，1985 年 7 月。参见李凌，〈记昆明〉，第 280-281 页。

43．对联大早期学生会政治活动研究最深入的是邢福津的〈记西南联合大学前期的学生自治会〉，*YNWS*，第 420-425 页。邢是共产党学生活跃分子。关于国民党学生积极分子看法，见访谈 29。

44．萧荻，〈承先启后的战友集体——忆联大剧艺社〉，*Rem1*，第 389 页。

45．翟国瑾，〈野玫瑰演出前后〉（一），《中外杂志》34.2：103（1983 年 8 月）。

46．同上，第 104 页。

47．张定华，〈回忆联大剧团〉，*Rem1*，第 342 页，参见萧荻，〈承先启后〉，第 389 页。

48．张定华，第 342-345 页。

49．同上，第 348-349 页。

50．同上，第 344-345 页。

51．同上，第 350 页；黄辉实，〈联大戏剧研究社和《阿 Q 正传》的演出〉，*Rem1*，第 354 页。

52．张定华，第 350 页。

53．黄辉实，第 359 页。

54．〈八年来的民主运动〉，第 41 页；行型，〈由学生看「党」「团」〉，*LDBN*，第 136-137 页。1988 年，三青团一位老团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据我自己回忆，那出戏是联大剧艺社排演的。在舞台上讲话的学生是高小文。他说群社的一个社员把电切断了。所以，张校长十分恼怒。我就坐在第二排。张校长起身走向舞台时，我用手电筒为他照路。他谴责了肇事者。直到今天我仍记忆犹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是国民党学生切断了电路。国民党员没有理由干这种奇怪的事，因

为当晚舞台上的大部分男女演员都是支持国民党的学生。」翟国瑾致笔者函，1988 年 3 月 10 日。

55．黄辉实，第 351 页，第 356 页，第 359 页；翟国瑾，〈野玫瑰演出前后〉（一），第 106 页。

56．黄辉实，第 359-360 页，说参加的学生有两百多名，但龚普生自己说只有「一百五十多人」，这个数字有演出说明书为证。见龚普生，〈昆明学生用自我援助计划应对困难：群社舞台表现「大获成功」〉（“Kunming Students Meet Hard Times with Self-Aid Projects: Group Blazes Way in 'Hit' Stage Show”），*CWR*，1940 年 12 月 21 日；参见《阿 Q 正传》演出说明书，萧荻提供，特此致谢。

57．这段叙述是根据翟国瑾一篇分两次连载的文章，〈野玫瑰演出前后〉,《中外杂志》34.2：103-109（1983 年 8 月）和 34.2：第 116-121 页（1983 年 9 月），以〈一次多灾多难的话剧演出〉为题重刊于 *XFJW*，260-283 页，及 *YNWS*，第 479-495 页。

58.《中外杂志》，1983 年 9 月，第 121 页。

59．残年，〈群社〉，第 131 页。

60．黄辉实，第 358-359 页。

61．见《阿 Q 正传》演出说明书。

62．黄辉实，第 360 页，〈编者附记〉。

63．翟国瑾致笔者函，1988 年 3 月 10 日。

64. 查良铮，第 1-2 页；李连城，〈毕业三十年自述〉，*QHXYTX* 36:36（1971 年 4 月 20 日）。（查 QHXYTX 第 36 期第 36 页，为张启新〈41 级经济系同学简介〉一文的内容，文中提到「当时联大学生四人被炸身亡」。）

65．陈纳德，《战士之路》，第 87 页。

66．查良铮，第 2 页。

67．李约瑟，〈科学 I〉，第 9 页。

68．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ZJWX* 39.4：86（1981 年 10 月）。

69．访谈 70。

70．上文资料来自费孝通，〈疏散〉，*LDBN*，第 55-60 页。

71.见梅贻琦的报告，*QHXYTX* 6.10/11.12：5（1940 年 12 月）。参见牧师项泽文（音，Tze-ven Hsiang），〈学生危机〉（“Student Crisis”）*CWR* 94.9：281（940 年 11 月 2 日），及《联邦新闻服务》（*Federation News Service*），1941 年 1 月，第 2 页。

72．*GDJYJK* 1.1（1941 年 3 月）。

73．《教育杂志》31.1：2（1941 年 1 月）。

74．同上。

75. 除非另有说明，关于叙永学生生活的描述来源于下面的材料，尤其是前两篇文章：周明道，〈叙永忆往〉，*XFJW*，第 112-128 页；秦泥，〈联大叙永分校纪实〉，*Rem1*，第 231-240 页；周明道，〈叙永忆往补〉，*QHXYTX* 49：9（1974 年 8 月）；张沁，〈叙永分校的一年〉，*XFJW*，第 135-138 页；张瑞年，〈多采多姿的一九四四级〉，*XFJW*，第 211-212 页，原载 *QHXYTX* 48：17（1974 年 4 月）；张之良，〈我的大学生活〉，*Rem1*，第 253-255 页。

76．见张沁，第 135-138 页。

77．秦泥，〈联大叙永〉，第 235 页。关于叙永壁报的更多材料，见黄法煦、周锦荪、张信达、何扬、秦泥，〈七月《流火》和《布谷》催春〉，*Rem1*，第 361-364 页。

78．弗兰克·陶（Frank Tao），〈战时中国的学生生活〉，第 496 页。

79．许芥昱致笔者函，1980 年 5 月。

80．周明道，〈令人难忘的叙永生活〉，*Rem2*，第 373 页。

81．*GLXNLHDX*，第 66-67 页。

82．秦泥，〈联大叙永〉，第 235-238 页。

83．钱端升「时评」，*JRPL* 1.2：2（1939 年 1 月 8 日）。

84．*JRPL* 2.2：18-19（1939 年 7 月 2 日）、1.10：3（1939 年 3 月 5 日）、3.12：178（1940 年 3 月 24 日）。

85．*JRPL* 2.14：211（1939 年 9 月 29 日）。

86．*JRPL* 3.11：162-173（1940 年 3 月 17 日）。

87．燕树棠，〈国际现局与我国抗战〉，*JRPL* 2.21：324-329（1939年11月12日）。

88．潘光旦，〈出勤在乌托邦中〉，*JRPL* 3.3：40-43（1940年1月21日）。

89．关于抓救命稻草的例子，见*JRPL*「时评」，1.1：1（1939年1月1日），及唐士（叶企孙），〈河北省内的抗战情况〉，同上，第10-12页。对这篇文章的进一步讨论，见汪永铨、沈克琦、孙佶，〈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QHXYTX*:B 16：90（1987年10月）。

90．见「平」（陈雪屏）「时评」，*JRPL* 1.3：1（939年1月15日）、1.5：2（1939年1月29日）。

91．钱端升，〈抗战致胜的途径〉，*JRPL* 1.11：3-5（1939年3月12日）。

92．邵循恪，〈最近欧洲疆界问题〉，*JRPL* 1.17：3-7（1939年4月23日）。

93．*JRPL* 2.12：2（1939年9月10日）。

94．罗隆基，〈欧战与民主主义的前途〉，*JRPL* 4.1：10-13（1940年7月7日）。

95．*JRPL* 1.4：2-3（1939年1月22日）。

96．钱端升，〈中日战争与美国今后的行动〉，*JRPL* 3.11：167-169（1940年3月17日）。

97．钱端升，〈罗斯福当选与今后的美国〉，*JRPL* 4.19：292-294（1940年11月10日）。

98．钱端升，〈统一与一致〉，*JRPL* 1.1：3-5（1939年1月1日）。

99．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企望〉，*JRPL* 1.3：4-6（1939年1月15日）。

100．钱端升，〈几件战时的不急政事〉，*JRPL* 1.17：7-8（1939年4月23日）。

101．见王赣愚，〈法治民治与统一〉，*JRPL* 1.16：6-8（1939年4月16日〉，及张佛泉，〈论政治之制度化〉，*JRPL* 1.19：4-5（1939年5月7日）。

102．夏西（Anthony J. Shaheen），〈1937-1947 年的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政治〉（“The Chinese Democratic and Chinese Politics，1937-1947”〉，第 15 页。

103．钱端升，《中国政府与政治》（*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第 307-308 页。参见徐乃力（Lawrence K. Shyu），〈战时中国的国会〉（“China's Wartime Parliament”），薛光前编，《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第 297-301 页。

104．罗隆基，〈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JRPL* 4.24：376-379（1940 年 12 月 15 日）及 4.25：392-397（1940 年 12 月 22 日）。

105．罗辛格（Lawrence K. Rosinger），《1937-1944 年中国的战时政治》（*China's Wartime Politics ，1937-1944*），第 60 页；弗雷德里克・斯帕（Frederick Spaar），〈1928-1958 年中国政治中的自由派反对者〉（Liberal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Chinese Politics，1928-1958”〉，布朗大学博士论文，1980 年，第 87 页。

106．见王赣愚，〈说人事〉，*JRPL* 3.6：87-89（1940 年 2 月 11 日），及他的「时评」，*JRPL* 3.13：195（1940 年 3 月 31 日）、3.15：225（1940 年 4 月 14 日）。

107．罗隆基，〈论公开政权〉，*JRPL* 3.21：323-326（1940 年 5 月 26 日）。

108．王赣愚，〈养士与政治〉，*JRPL* 3.13：194-195（1940 年 3 月 31 日）。（〈加紧团结〉作者署名为「山」。）

109．予（王赣愚），〈今年的青年节〉，*JRPL* 3.18：274-275（1940 年 5 月 5 日）。

110．《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482 页。

111．戈德利（MichealR.Godley），〈历史中的政治：雷海宗与战国策派〉（“Politics from History: Lei Haizong and the Zhanguo Ce Clique”），第 104 页。

112．同上，第 113-114 页。

113．陈铨，〈论新文学〉，*JRPL* 4.12 ：189（1940 年 9 月 22 日）。关于陈铨的更多描述，见第七章。

114. 欧阳采薇，〈论所谓新文学与新理想〉，*JRPL* 4.19：299（1940年 11 月 10 日）。

115. 戈德利，第 106 页。

116. 钱瑞升，〈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JRPL* 4.15：228-230（1940年 10 月 13 日）。

117. 钱端升，〈一党与多党〉，*JRPL* 4.16：246（1940 年 10 月 20日）。

118. 钱端升，〈论党务〉，*JRPL* 5.14（1941 年 4 月 14 日）。

119. 王赣愚，〈欧战的思想背景〉，*JRPL* 4.20：310-312（1940年 11 月 10 日）。

120. 罗隆基，〈中国与民意政治〉，*JRPL* 4.21：329-331（1940年 11 月 24 日）。

121. 钱端升，〈大学往何处去〉，*JRPL* 3.24：377-379（1940 年 6月 16 日）。

122. 钱端升，〈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JRPL* 4.21：328-329（1940年 11 月 24 日）。

123. 见丁佶「时评」，*JRPL* 2.25：387（1939 年 12 月 10 日）。

124. 潘光旦，〈说工读兼营〉，《自由之路》，第 211-220 页。

125.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JRPL* 1.1：4-5（1939 年 1 月 22日）。

126. 弋（假名），〈推行兵役〉，*JRPL* 1.10：2（1939 年 3 月 5 日）。

127. 元（假名），〈整饬官常〉，*JRPL* 3.17 ：259（1940 年 4 月 28日）。

128. 冯友兰，〈中国毕竟还是中国〉，*JRPL* 1.14：7-8（1939 年 4月 2 日）。

129. 见费侠莉编，《变化的极限》（*Limits of Change*），各处。

130. 贺麟，〈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JRPL* 3.1：6-9（1940 年 1 月 7 日）。

131. 陈序经，〈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JRPL* 5.3：35-41（1941年 1 月 26 日）。冯友兰对此的响应，见其〈答陈序经先生〉，*JRPL* 5.6：

83-85（1941 年 2 月 16 日）。参见林元，〈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Rem2*，第 144-149 页。

132.伍启元，〈什么是中国文化底出路〉，*JRPL* 3.25：　390-393（1940 年 6 月 23 日）。

133．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第 230-236 页。

第十四章 坚忍的岁月：1941-1943 年

1．采访查良钊。

2．同上；李声庭，〈南针社及南针壁报〉，*QHXYTX* 48：24（1974 年 4 月）。

3．李声庭，第 24 页。参见袁春潮（音）关于南针社的笔记。

4．关于康泽的访问，见萧荻，〈大草坪及其它〉，译文载《中国教育》（*Chinese Education*）21.2：65（1988 年夏），原载于 *Rem1*，第 502-503 页。

5．访谈，33。

6．殷福生，〈三位一体论〉，《民主思想》1.2：15-20（1941 年 3 月 23 日）；李定一，〈寄语中立者〉，同上，第 20-25 页。1949 年以后，殷、李成为国立台湾大学的同事，是台北温州街的邻居。李仍是激烈的独立派的保守主义者，而殷后来以殷海光闻名，成为率尔直言的《自由中国》杂志的主编，台湾最著名的牛虻式知识分子。

7．关于洋狗与华人的比较，见冯友兰，《新世论》，第 33 页。

8．1974 年春，在夏洛特斯韦尔，与时任维吉尼亚大学英语系客座教授的项美丽女士交谈。

9．访谈 41。

10．见陈雪屏，〈谈谣言〉，*JRPL* 1.8：8-10（1939 年 2 月 19 日）。

11．邹文靖，〈国家之败，多由官邪〉，*YNWS*，第 450 页。

12．访谈 74；采访陈雪屏。

13．王世堂，〈一场遭遇战〉，*Rem1*，第 246-250 页；访谈 74；王先冲，〈忆钟泉周烈士二三事〉，*YNWS*，第 279 页。

14.。采访裴存藩。

15．邹文靖，第 455-456 页。

16．访谈 74。

17．同上。

18．王世堂，第 248-249 页。

19．*LDBN*，第 45 页。

20．林元，〈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YNWS*，第 469 页。

21．钱端升致费正清函，1941 年 7 月 31 日，费正清文件。

22．《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 550 页。

23．汤用彤致胡适函，1943 年 1 月 19 日；同上，第 553 页。

24．《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 565-566 页。

25．手稿以〈〔1943 年〕5 月 4 日——昆明城外龙头村〉为题，第 3 页，费正清文件。

26．同上，第 2 页。

27．冯友兰，《三松堂》，第 100 页。

28．陈立夫，〈中国的战争与教育〉，《中国论坛》（*China Forum*），1939 年 8 月 5 日，第 161 页。

29．赵浦侠（音，Pu-hsia Frederick Chao），〈民主中国所需的教育〉（“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第 167-168 页。

30．〈教育消息〉，《教育通讯》2.43：2（1939 年 11 月 4 日）。

31．吴玉致 CWR 函，1939 年 8 月 26 日，第 39 页。

32．威廉·费恩（William P. Fenn），《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The Effects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第 33-34 页。

33．慕文俊，〈联大在今日〉，第 380 页。

34．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1939-1950 年在中国的经历》（*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第 35-36 页，第 98 页。

35．杨彤，〈穷苦的大学生〉，《宇宙风》（桂林），1940 年 4 月 16 日，第 289 页。

36．访谈 9。

37．杨彤，第565-566页。

38．*LDBN*，44页；李梅，〈联大小记〉，*XHRB*，1944年4月8日。

39．张春风，〈国立〉，第118页。

40．欧元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第14页。

41．*ZYRB*，1941年3月17日。

42．*ZYRB*，1941年3月18日。

43．郎常浩，〈闲谈「工读」〉，《联大青年》1.2：22-23（1941年10月16日）。

44．朱仁民致笔者函。

45．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未刊稿，第10页，蒙萧荻提供，特此致谢。正式发表的文字（*YNWS*，第155-174页）删去了这部分内容。

46．〈学生建立血库〉，《战争中的中国》（*China at War*）13.5：80〔1944年11月）。

47．〈笔记与新闻〉，《中国书目提要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复刊，3.3/4：37（1943年9-12月）；弗兰克•陶，〈战时中国的学生生活〉，第495页。

48．*XHRB*，1944年1月7日。

49．与一位（法律系）校友交谈，北京，1985年。

50．欧元怀，4页。

51．江文汉（音）的报导，刊载于《联邦新闻服务》，1944年5月。几乎完全相同的数字被*XHRB*（1943年10月23日）引用。

52．*XHRB*，1944年4月8日。

53．*XHRB*，1944年1月7日。

54．特此向潘和西（工学院1943级）致谢。

55．*XHRB*，1944年7月11日。

56．〈移民、财政与教堂〉（“Immigration, Finance, and the Church”），《教务杂志》，1940年10月，685页。

57．张嘉璈，第99页。

58.〈学生过着清苦的生活〉，《战争中的中国》4.2：61-62（1940年3月），*XHRB*，1940年2月11日。

59. *ZYRB*，1944年4月14日，第三版；《正义报》，1945年3月31日。

60.《正义报》，1945年3月31日。

61. 永年，〈师院生活〉，*LDBN*，第87-88页。

6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15页。

63. 豪斯，〈穷学校〉，第92页。

64. 同上，第19页。

65. *XHRB*，1943年10月23日。

66. 余瑞麟，〈往事如烟〉，*XFJW*，第138页；*XHRB*，1944年1月7日。

67. 访谈43。

68. *XHRB*，1942年10月19日。

69. 豪斯，第92页。

70. 朱仁民致笔者函。

71.《学府风光》。

72. 同上。

73. 走幸田，〈我住在新校舍〉，译文载《中国教育》，1988年夏季号，28-29页，原载于*LDBN*，第70-71页。

74. 马英，〈南院，我们的家〉，*LDBN*，第83页。

75. 郑以纯，〈联大风光〉，《宇宙风乙刊》28：44-45（1940年9月1日）。

76. 采访曾戴维（音，David Tseng）。

77. 访谈65。

78. 郑以纯，第44页。

79. 江文汉的报导。

80. *XHRB*，1943年10月23日。

81. 丁东，〈昆明大学生是怎样生活的？〉，《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与文化》，第117页，重刊于*XHRB*，1940年7月2日。

82．慕文俊，第 181 页。

83．*XHRB*，1944 年 1 月 7 日。

84．丁东，第 116 页。

85. 吉尔伯特 •贝克,《中国正在变化的景象》(*The Changing Scene in China*)，第 51 页。

86．周明道，〈联大生活拾零〉，*XFJW*，第 315 页；慕文俊，第 379 页。

87．与李定一交谈，台北，1985 年 8 月 6 日。

88．鹿桥，《未央歌》，第 100-106 页。

89．访谈 85。

90．何期明，〈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战时知识》12：17（1938 年 12 月 15 日）。

91．石横，〈抗战中战胜的西南联合大学〉，王觉源编，《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第 111-112 页。

92．访谈 42。

93．访谈 55。

94．张搏云，〈山城话旧〉，*HFJW*，第 204 页。

95．走幸田，第 31 页，原载于 *LDBN*，第 72-73 页。

96．丁东，第 116-117 页。

97．走幸田，第 32 页，原载于 *LDBN*，第 72-73 页。

98．孟南，〈昆明忆语〉，第 16 页。

99．豪斯，第 91 页。

100．访谈 65、58。

101．访谈 43。

102．与一位校友交谈，Charlottesville' Va.，1987 年 9 月 2 日。

103．访谈 45 ；郭作青，〈从昆明到美国杂记〉，*QHXYTX* 44：38-39(1973 年 4 月 29 日)；张搏云，〈山城话旧〉，*XFJW*，第 202 页；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第 46 页；《学府风光》；贝克，《中国正在变化的景象》，第 51 页。

104．永年，《教务杂志》88 页。

105．〈战时的中国〉（“China in Wartime”），《教务杂志》，1939年8月，第258页。

106．吉尔伯特·贝克，〈昆明的学生教堂〉，同上，1940年2月，第88页。

107．〈教育消息〉，同上，1939年8月，第258页。

108．吴玉函。

109．〈读者来信〉，《教务杂志》，1940年2月，第46页。

110．费正清，〈〔1943年〕5月4日——昆明城外龙头村〉，费正清文件。

111．*XHRB*，1944年1月7日。

112．江文汉的报导。

113．豪斯，第92页。

114．《观察报》，1944年12月21日。

115．关于照明方面的材料，包括〈学生过着清苦的生活〉，第62页；光远，〈片断的回忆〉，*LDBN*，第67页；各种校友访谈，关于图书馆的材料来自校友访谈。

116．几乎所有关于联大的回忆，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或多或少都会提到茶馆。其中描写较为详细的是郑临川，〈怀念中的西南联大〉，《中国青年》8.6：26-27（1943年6月15日）；慕文俊，第380页。汪曾祺的〈跑警报〉极为生动，译文载《中国教育》，1988年夏季号，第41-52页。

117．关于〈茶馆小调〉，见《老同学歌咏队》，油印件，北京，1985年10月8日。

118．许芥昱，〈在硝烟和尤加利树林之间：1937-1945年昆明的诗歌〉，载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resistance coutre le Japon (de 1937 à 1945)，第308页。

119．同上，第305页。

120．下面的叙述根据林元，〈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YNWS*，469-478页。

121．同上，第475页。

122．拾荒，第 112 页。

123．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未刊稿，第 18-24 页。

124．浦薛凤，〈金碧弦歌〉，*XFJW*，第 150 页。

125．*ZYRB*，1940 年 4 月 24 日。

126．吴晓铃，〈天南旅痕〉（7），《春城晚报》，1985 年 2 月 9 日。

127．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未刊稿，第 3-7 页。

128．关于当时带有偏见的叙述，*XHRB*，1944 年 1 月 7 日。关于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回顾，分别见曹思义，〈黎明前后〉，*XFJW*，第 251 页，和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未刊稿，第 18 页。

129．采访吉尔伯特·贝克，1978 年 6 月 21 日。

130．赵紫宸，〈昆明的教堂工作〉，《教务杂志》，1940 年 1 月，第 47 页。

131．同上，第 49 页。

132．采访霍华德·海曼（(Howard Hyman)。

133．光远，第 67 页。

134．先声等编，〈兼差在联大〉，译文载《中国教育》21.2 ：53（1988 年夏季号），转引自 *Rem1*，第 286 页；原载于 *LDBN*，第 96 页。

135．冯友兰，《三松堂》，第 99 页。

136．李钟湘，〈忆联大——昆明的灵魂〉，*QHXYTX* 8：21-22（1964 年 4 月 15 日）。

137．访谈 70。

138．访谈 65。

139．吴厦源，〈毕业三十年回忆〉，*QHXYTX* 44：34（1973 年 4 月 29 日）。

140．刘维，〈我们的兼差生活〉，*LDBN*，第 97 页。

141．木水工，〈不必要的忙碌〉，*LDBN*，第 97-99 页，译文载《中国教育》，1988 年夏季号，第 55-56 页。

142．*XHRB*，1945 年 11 月 1 日、15 日。

143．姚秀彦，〈永久怀念西南联大〉，*XFJW*，第 301 页。

144．采访钱端升，1980 年 3 月 26 日、27 日。

第十五章 考验的岁月：1943-1945 年

1．采访白英（Robert Payne)。

2．「亲爱的朋友」的来信，1943 年 11 月 9 日，蒙吉尔伯特·贝克惠助，特此致谢。

3．陈纳德，《战士之路》，第 281 页。

4．冷眉，〈我是联大一年级生〉，*LDBN*，第 89-90 页。

5．陈纳德自称，1941 年 12 月击败日本空军后，昆明一直没有遇到空袭，直到 1943 年 4 月 29 日「他们知道我在华盛顿」。见陈纳德，第 130 页，第 219 页。另一次空袭发生于 5 月 15 日，在陈纳德返回之前。同上，第 227 页。

6．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QHXYTX*，1945 年 4 月，第 1 页。

7．访谈 62。

8．访谈 48。

9．摘自杜运燮，《诗四十首》，1946 年，英译见许芥昱编，《20 世纪中国诗选》，第 234 页。

10．访谈 59。

11．王康，《闻一多传》，第 297-298 页。

12．王念平，〈回忆联大生活片断〉，*QHXYTX* ：B 16：116（1987 年 10 月）。

13．同上，117 页。

14．*XHRB*，1944 年 11 月 1 日。

15．采访查良钊和其它校友。

16．*XHRB*，1943 年 11 月 17 日。

17．*XHRB*，1943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17 日。

18．*XHRB*，1943 年 10 月 24 日。

19．生活壁报，〈我们的级会〉，*LDBN*，第 143-144 页。

20．张源潜，〈回忆联大文艺社〉，*Rem1*，第 365-366 页。并参见

文艺社，〈关于联大文艺社〉，*LDBN*，第 139-142 页。

21．八年的联大壁报〉，*LDBN*，第 48-49 页。

22．〈联大八年〉，《大公报》，1946 年 11 月 28 日。

23．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 123 页。

24．费正清，《中国缘》（*Chinabound*）（中译本《费正清自传》），第 252 页。

25．豪斯，〈穷学校〉，第 93-94 页。

26．陈达，《浪迹十年》，第 192-193 页。

27．*GLXNLHDX*，第 78-79 页。

28．*XHRB*，1944 年 1 月 7 日。

29．同上。

30．张瑞年，〈多采多姿的一九四四级〉，*XFJW*，第 212-213 页；*GLXNLHDX*，第 79 页。

31．查尔斯 •罗曼纳斯（Charles Romanus）、莱利 •桑德兰德（Riley Sunderland），《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军队：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檔》（*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ime Runs Out in CBI*），第 247-249 页

32．冯友兰，《三松堂》，第 326 页。

33．同上，第 350 页。

34．同上；王康，《闻一多传》，第 349 页。（应为第 308 页。）

35．冯友兰，《三松堂》，第 327 页。

36．王康，《闻一多传》，第 309 页。

37．《正义报》，1944 年 12 月 6 日，第三版；最近的研究称联大有「200 多名」学生参军，见 *GLXNLHDX*，第 82 页。

38．《正义报》，1944 年 12 月 6 日，第三版。

39．关于昆明和重坠之间因译员培训问题产生的紧张关系，见兰登（Langdon）致高思（Gauss）函’昆明，1944 年 7 月 13 日，载 1944 年《美国的对外关系》第六卷，《中国卷》，第 126 页。

40．〈反对国民党政府〉，昆明，1945 年 2 月 24 日，OSS RG 226，檔 L54229，战略情报局档。

41．〈鼓的感动〉，*XHRB*，1943 年 11 月 16 日。

42．同上。

43．*XHRB*，1944 年 1 月 7 日。

44．1944 年 2 月 17 日，893.00/15292，SD。

45．〈八教授颂〉，未刊稿，蒙一位校友帮忙复印，特此致谢。

46．费正清，《中国缘》，第 259-260 页。

41．曹思义，〈黎明前后〉，*XFJW*，第 258 页。

48．《正义报》，1944 年 5 月 5 日。

49．王康，《闻一多传》，第 287-288 页。

50．同上，第 291 页。

51．关于上文对 1944 年 5 月 4 日前后事情的叙述，有下列材料：访谈 90；《正义报》，1944 年 5 月 5 日；〈联大八年〉，《大公报》，1946 年 11 月 28 日；〈八年来的民主运动〉，*LDBN*，第 42 页；王康，《闻一多传》，第 184-188 页；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 124 页；张源潜，〈回忆联大〉，第 367-371 页。

52．威廉·兰登（William Langdon）致美国国务卿函，1944 年 7 月 11 日，80893.00/7-1144。

53．斯朋赛上尉（Capt. J. E. Spenser）致威廉·朗格博士（Dr. William L. Langer）函，昆明，1944 年 6 月 26 日，OSS RG 226，XL823，战略情报局档。

54．布鲁姆（John Morton Blum）编，《亨利·华莱士日记》（*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第 354 页。关于华莱士访问的其它材料有：王康，《闻一多传》，第 301 页；*XHRB*，1944 年 7 月 11 日；《正义报》，1944 年 6 月 30 日；保罗·瓦格（Paul Varg），《大门的关闭》（*The Closing of the Door*），第 81 页；采访李树青。

55．王康，《闻一多传》，第 305 页。上文关于会见的描述来自于：同上，第 302-305 页；苏双碧、王宏志，第 125 页。

56．王康，《闻一多传》，第 311 页。

57．同上，第 321 页。

58．王一，〈闻一多与吴晗〉，《光明日报》，1979 年 3 月 27 日，

转引自苏双碧、王宏志，第 127 页。

59．王康，《闻一多传》，第 318-319 页；苏双碧、王宏志，第 131 页。

60．夏西（Shaheen），〈中国民主同盟〉，第 174 页。

61．对昆明、桂林与重庆、成都的对比，同上，第 119 页。

62．李文宣，〈在云南民盟内的工作回忆〉，《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7：30（1982 年 2 月）。

63．美国驻昆明领事，致美国国务卿函，1944 月 7 月 14 日，SD 893.00/7-1444；重印于《美亚文件》（Amerasia Papers），1：656-662；其中部分载 1944 年《美国对外关系》第六卷，《中国卷》，第 475-477 页。

64．1944 年《美国对外关系》第六卷，《中国卷》，第 710 页。

65．高思致美国国务卿函，编号 3104，1944 年 10 月 31 日，SD 893.00/10-3144，第 2 页；转引自夏西，第 191 页。

66．参见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敌与友》（*Enemies and Friends*），第 183 页，该数据后来被夏西引用，第 206 页 n.94。

67．王康，《闻一多传》，317 页；苏双碧、王宏志，第 128-129 页；〈昆明市民的证明〉（“Manifesto of Citizen of Kunming”），1945 年 1 月 3 日，OSS RG 226，档 108398，战略情报局档。

68．苏双碧、王宏志，第 130 页。

69．同上；王康，《闻一多传》，第 330 页。

70．《正义报》，1945 年 1 月 7 日。

71．李秀（音），〈一位不朽的作家：李广田〉，《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981 年 6 月，第 84-85 页。

72．苏双碧、王法志，第 127 页。

73．孙毓棠致笔者函，1981 年 12 月 12 日。

74．同上；采访孙毓棠，1982 年 7 月 13 日；与十一学会的另一位成员书面交流，1986 年 5 月。

75．采访伍启元。

76．李文宣，第 32-33 页。

77．苏双碧、王宏志，第 131-132 页。

78．马识途，〈谈谈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4：45（1981 年 4 月）。

79．同上；李文宜，第 32-33 页。

80．范力沛，第 181 页；夏西，第 219 页。

81．马识途，第 45-46 页。

82．张定华，〈回忆联大剧坛〉，第 351 页。

83．萧荻，〈承先启后〉，第 388-396 页

84．同上，第 397-398 页。

85．鬼斗，〈剧艺社〉，*LDBN*，第 153-154 页。（应为：同上，第 398-399 页。）

86．〈西南联大种种〉，《青年生活》，1939 年 4 月 16 日，重刊于《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与文化》，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第 109-110 页。

87．*QH*，第 309 页；黄坚立，《中华民国时期去政治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第 161-164 页。

88．《中央日报》，1940 年 2 月 1 日和 10 日。

89．袁守盛（音）致黄中孚函，1975 年 10 月 12 日。

90．程法伋，〈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Rem2*，第 442 页。

91．*XHRB*，1943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24 日。

92．程法伋，第 445 页。

93．同上，第 446-447 页。

94．同上，第 448-449 页。

95．同上，第 448 页。

96．关于下文的资料有：同上，第 450-453 页；王康’《闻一多传》，第 345-348 页；苏双碧、王宏志，第 138-139 页；布林（音），〈追记昆明万人大游行〉，《周报》，1945.14：14（1945 年 12 月 8 日）。

97．王康，《闻一多传》，第 346 页。

98．程法伋，第 451 页。

99．同上。

100．关于电影票事件的资料有：同上；布林，第 14-15 页。

101．布林，第 14-15 页。

102．王康，《闻一多传》，第 346-347 页。

103．同上，第 348 页。

104．苏双碧、王宏志，第 138 页。

105．《正义报》，1945 年 5 月 5 日。

第十六章 完成使命：1945-1946 年

1．冯友兰，《三松堂》，第 113 页。

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 62 页。

3．《观察报》，1945 年 8 月 15 日。据报导，早在 8 月 10 日的胜利庆典上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4．同上，1945 年 8 月 15 日，28 日。

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 62-65 页。

6．采访菲利普·斯普劳斯（Philip Sprouse）。

7．奥勃斯特（Better Heath Oberst)）致笔者函，1978 年 2 月 26 日。

8．《观察报》，1945 年 3 月 16 日，20 日。

9．关于这次会议的节目，蒙黄中孚先生惠助，特此致谢

10．对阎振兴和其它几位校友的采访；*QHXYTX*：Bp，1947 年 4 月 25 日，第 5 页；费正清，《中国缘》，第 231-232 页。

11．见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W. Barnett），《彷徨的骑士》（*Wandering Knights*），各处。

12．霍华德·海曼（Howard Hyman），〈一等兵海曼（No. 703980）会见主席〉（“PHC Hyman, No. 703980 Meets the Chairman”），《新中国》（*New China*），1977 年春季号，12-14 页；采访海曼。

13．关于联大共产党的历史，见袁永熙，〈回忆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11：24-42（1982 年 9 月）；马识途，〈谈谈西南〉，第 39-45 页；李明，〈「三勤」及「一·二一」点滴情况〉，《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4：51-54〔1981 年 4 月〉。

14. 附美国领事威廉·兰登，昆明，no.85，致美国大使馆，重庆，1945 年 8 月 31 日，SD。

15.《一二·一惨案特辑》，第 32 页。

16.〈胜利以后联大的民主运动〉，*LDBN*，第 52 页。

17. 胡麟，〈一二·一的回忆〉，第 2-3 页。

18. 关于中文历史编纂学的批评性综述，见易社强，〈第五个烈士：对一二·一运动的思考〉，第 997-1024 页。后来的出版物有《一二·一运动论文集》，成实、卫平、丁永编。

19. 庄焜明，〈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之研究〉，第 172-173 页。

20.《民意日报》，1946 年 4 月 26 日。关于北上复员的完整叙述，见 *GLXNLHDX*，第 83-91 页。

21. 冯友兰，〈云南今后的学术事业与高等教育〉，《民意日报》，1946 年 4 月 7 日。

22. 同上。

23.《正义报》，1946 年 4 月 28 日。

24. 访谈 83。

25.《民意日报》，1946 年 4 月 26 日。

26. 同上。

27.《正义报》，1946 年 5 月 2 日。

28. 同上，1946 年 5 月 5 日；《民意日报》，1946 年 5 月 5 日。

第十七章 结语

1. 心田，〈我是联大一年级生〉，*LDBN*，93 页。

2. 查良钊，〈昆明湖畔〉，*ZJWX* 1.2：30（1962 年 1 月）。

3. 黄裳，〈怀昆明〉，《周报》1945.18：16（1946 年 8 月 3 日）。

4. 见 *QH*，部分译文，载《中国教育》，1982-1983 年秋冬号；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南开大学六十年》。张尚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阅读西方哲学著作〉，《云南日报》，1982 年 5 月 7 日，第 4 版。

参考文献

阿道夫,〈战时中国之生理学研究〉,《科学月刊》。Adolph, William H. "Phys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Scientific Monthly 61.2:153-154 (August 1945).

匿名，参加从长沙到昆明步行的学生日记，1938 年 2 月 13 日至 4 月 29 日。Anon. Diary of a student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march from Changsha to Kunming, February 13-April 29, 1938.

阿古什,《费孝通与革命中国的社会学》(中译本《费孝通传》)。Arkush, David.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吉尔伯特·贝克，《中国正在变化的景象》。Baker, Gilbert. The Changing Scene in China. London: S. C. M. Press, 1946.

巴内特,《彷徨的骑士:回忆和现实中的中国遗产》。Barnett, Robert Warren. *Wandering Knights: Chinese Legacies Lived and Recalled*.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0.

《北京大学六十年》，北京大学校史编撰委员会编，北京：内部数据，1958。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1948？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鲍华德编。*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 Howard Boorman. 5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9..

《国民党领导人传记》，哈佛大学国际和区域研究委员会，油印件。*Biographies of Kuomindang Leaders*. Ed. Harvard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Mimeo. Cambridge, Mass, 1948.

毕胜，《日本在华》。Bission, T. A. *Japan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布鲁姆编，《华莱士日记》。Blum, John Morton, ed. *The Dairy of Henry A. Walla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布列尔，《中国哲学五十年（1898-1950）》。

Brière, O.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98-1950. New Youk: Praeger, 1965.

长诚（戚长诚），〈抗战中的西南〉，汉口版《大公报》，偶尔连载，1938 年 3 月 8 日至 5 月 14 日。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Chang Kia-a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 New York: John Wiley, 1958.

赵浦侠（音），〈民主中国所需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论文。Chao, Pu-hsia Frederic. "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Ed. D. dis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46.

陈达，《浪迹十年》’重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陈康，《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台北：文学出版社，1979。

陈立夫，《战时中国教育（1937-1942）》，重庆，教育部，1943。Chen Li-fu. *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the War(1937-42)*. Chongq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43.

〈中国的战争与教育〉，《中国论坛》。"Wa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 Forum 4.6:161. (Aug. 5, 1939).

《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陈述元《两间庐诗》，长沙：风华杂志社，1946。

陈纳德，《战士之路：陈纳德回忆录》。Chennault, ClaireLee. *Way of a Fighter: 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 ed. Robert B. Hotz. New York: Putman, 1949.

蒋梦麟，《西潮》。Chiang Monlin. *Tides from the West: A Chinese Autobiograph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蒋永珍（音），〈中国的社会工程和社会科学（1896-1949）〉，哈佛大学博士论文。Chiang Yung-chen [Jiang Yongzhen].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86-1949."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6.

钱端升，《中国政府与政治》。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金岳霖，〈当代中国的教育〉，载麦克尼尔编，《来自中国未沦陷区的声音》。Chin Yueh-lin.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ed. *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战争中的中国》，重庆。*China at War.* Chongqing, 1938-45.

《中国研究通讯》，纽约。*China Institute Bulletin*. New York, 1937-46.

《教务杂志》，上海。*The Chinese Recorder*. Shanghai, 1937-46.

《中国年鉴》（1938-1939），国际事务委员会编，重庆。The Chinese Yearbook. 1938-1939. Ed,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ung-king, 1939.

《大公报》，重庆，1938-1946。

《大公报》，汉口，1938。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燕卜荪，《一所中国大学》，《今日的生活与书信》。Empson, William. "A Chinese University." Life and Letters Today 25.34:239-45 (June 1940).

爱泼斯坦，《人民战争》。Epstein, Israel. *The Peoples War.*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1939.

费正清，《中国缘》（中译本《费正清自传》）。Fairbank, John K. *China bound*.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82.

文件，弗兰克林，新罕布什尔。Papers. Franklin, N.H.

冯保罗，〈步行千里上学堂〉，《中国新闻界周末杂志》。Feng, Paul. "Walking 1,000 Miles to School." *China Press Sunday Magazine*, Jan. 15, 1939, pp. 1-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新事论》，香港：时代书店，无出版日期。

威廉，费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Fenn, William P.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 Kowloon: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大卫・芬克斯坦、贝弗利・胡柏，〈在华五十七年〉，《亚洲》。Finkelstein, David, and Beverley Hooper. "57 Years Inside China." Asia 2.5:10-11, 46 (January-February 1980).

《美国对外关系》，华盛顿特区。*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1937-46.

休伯 •福雷，《战时中国教育》。Freyn, Hubert.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War.*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40.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费侠莉编，《变化的极限》。Furth, Charlotte,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加内特，《都市中国的社会改革者：1865-1926 年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Garrett, Shirley S.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戈德利，〈历史中的政治：雷海宗与战国策派〉。Godley, Micheal R. "Politics from History: Lei Haizong and the Zhanguo Ce Clique."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Canberra) 40:95-122 (September 1989).

顾一樵，《顾一樵全集》，三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

《观察报》，昆明，1945。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昆明：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项美丽，《中国之于我》。Hahn, Emily. *China to Me: A Partial Autobiograph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ran, 1944.

霍尔，《1927-1937 年云南省的帮派》。Hall, J. C. S. *The Yunnan Provincial Faction, 1927-1937*.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1976.

豪斯，〈穷学校〉，《周六晚报》。I Hauser, Ernest O. "Poverty Campus." Saturday Evening Post 216.19: 91-94 (Nov. 6, 1943).

何廉，〈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学项目。Ho, Franklin. "Memoirs."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ject.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78。

萧公权，〈教学相长（二），清华五年〉，《历史上的中国研究》。Hsiao Kung-ch'uan. "Teacher and Students Growing together, Part 2: Five Years at Tsinghua."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4:3-18 (fall 1980).

许芥昱，〈在硝烟和尤加利树林之间：1937-1945 年昆明的诗歌〉。Hsu, Kai-yu. "Between Eucalyptus and Gunsmoke: The Kunming-Based Poetry of 1937-1945." In *La Litterature chinois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resistance coutre le Japon* (de 1937 à 1945), ed.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 Paris: Editions de 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 1982.

《二十世纪中国诗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闻一多》。*Wen I-to*. Boston: Twayne, 1980.

胡晶清，《作家写作家》，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

胡麟，《一二·一的回忆》，香港：海鸿，194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胡适秘藏书信选》（第一卷），梁锡华编，台北：远景，1982。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另一个中国》。Hu Shih. "Chang Po-ling: Educator." *In There Is Another China: Essays and Articles for Chang*

Poling ofNankai.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8.

黄坚力，《中华民国时期去政治化的政治》。Huang Jianli.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s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Peter Lang, 1996.

《火线下三日刊》，长沙，1937-1938。

霍华德·海曼，〈一等兵海曼（703980 号）会见主席〉。Hyman, Howard. "PFC Hyman, No. 703980, Meets the Chairman." New China 3.1: 12-14 (spring 1977).

易社强，〈第五个烈士：对一二，一运动四十周年的思考〉，《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下），台北。Israel, John. "The Fifth Martyr: Thoughts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cember First Movement."

〈西南联大：以保持为至上价值〉，薛光前编，《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ervation as an Ultimate Value." I*n Sih,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q. v.).

易社强、科雷，《反叛者与官僚：中国的一二·九运动参加者》。Israel, John, and Donald W. Klein. *Rebels and Bureaucrats: China's December 9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笳吹弦诵在春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昆明、北京：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教育部编，《大学科目表》，重庆：正中书局，1940。

《教育杂志》。

金岳霖，〈中国哲学〉，《中国的社会科学》。Jin Yuelin, "Chinese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1: 89-93 (March 1980).

《今日评论》。

约翰，〈社会主义花园中的思想野草：以钱端升为例〉，《中国季刊》。John, Chalmers. "An Intellectual Weed in the Socialist Garden: The Case of Ch' ien Tuan-sheng." *China Quarterly* 6.33: 29-52 (April-June 1961).

《抗战以来之高等教育》，查良铮等编，香港：龙门书局，1966。重刊于《教育杂志》特刊，1941.31：1（1941 年 1 月 10 日）。

《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与文化》，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延安），1940；再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46。

江文汉（音），〈中国学生难民救济〉，长沙，1938 年 1 月 18 日，未刊稿，存于基督教青年会档案，纽约。Kiang Wen-han [Jiang Wenhan]. "Emergency Student Relief in China." Changsha, January 18,1938. Ms. in YMC A Archives, New York.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Kuhn, Philip A.,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李文宜，〈在云南民盟的工作回忆〉，《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第 7 辑，第 84-95 页（1982 年 2 月）。

李秀，〈一位不朽的作家：李广田〉，《中国文学》。Li Xiu. "A Preserving Writer: Li Guangtian." *Chinese Literature*. June 1981.

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YNWS*，第 74 页。

《联大八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以《抗战中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名再版，香港：神州图书公司，

1964。

《联大青年》，昆明，1941。

林登，〈中国的政治与高等教育：国民党与大学社群〉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Linden, Allen Berard. "Politic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Kuomintang and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9.

林德赛，《无名之战：1937-1945 年的华北》。Lindsay, Michael.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London: Bergstorm & Boley, 1975.

刘兆吉编，《西南采风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从长沙到昆明的长征〉。"The Long March from Changsha to Kunming." *ISS Bulletin* 15.1: 14-15 (October 1938).

鹿桥（吴讷孙），《未央歌》，第八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

罗滋，《1850-1950 年的中国与基督教大学》。Lutz, Jessie G.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 1850-1950.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马识途，〈谈谈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云南历史研究所编，第 4 辑，第 39 页〔1981 年 4 月〕。

麦克尼尔编，《来自未沦陷中国的声音》。MacNair, Harley Farnsworth, ed. *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44].

乔纳森 • 马歇尔，〈1927-1945 年国民党中国的鸦片与匪徒政治〉，《关心亚洲学者通讯》。Marshall, Jonathan. "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7-1945."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8.3: 9-38 (July-September, 1976).

梅秀棠（音），〈民盟与中国知识分子〉，《重建中国》。Mei Xiutang. "The Democratic League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China Reconstructs, February 1980, pp. 6-8.

孟南，〈昆明忆语〉，《春秋杂志》31.11：16-20.1972 年 12 月 16 日。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Metzger, Thomas A.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弗朗兹 •麦克尔，〈长征途中的大学〉，《亚洲》。Michael, Franz. "A University on the March." Asia 39.1: 33-35 (January 1939).

《民意日报》，昆明，1946。

《南开大学六十年》，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天津：南开大学印刷厂，1979。

李约瑟，〈西南中国的科学 I：物理学和化学〉，《自然》。Needham, Joseph. "Science in Southwest China, I : The Physical-Chemical Sciences." *Nature* 152.3844: 9-10 (July 3, 1943).

〈西南中国的科学 II：生物学和社会科学〉，《自然》1943 年 7 月 10 日。"Science in Southwest China, II: The Bi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Nature* 152.3845: 36-37 (July 10,1943).

李约瑟、鲁桂珍主编，《科学前沿》。Needham, Joseph, and Dorothy Needham, eds. *Science Outpost: Papers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 (British Council Scientific Office in China), 1942-1946*. London: Pilot Press, 1948.

战略情报局，文件，国家档案馆，华盛顿特区。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Paper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吴俊升，〈战时中国的教育〉，薛光前编，《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Ou Tsuin-chen. "Education in Wartime China." In Sih,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q. v.).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1.1：13-140947 年 6 月 5 日）。

潘光旦，《自由之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白英，《目击：动荡十年之个人纪录（1937-1946）》。Payne, Robert. *Eyewitness: A Personal Account of a Tumultuous Decade, 1937-1946.*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2.

《毛泽东》。*Mao Tse-tung*. New York: Weybright & Tally, 1969.

格雷哈姆 •帕克，《穿过中国之墙》。Peck, Graham. T*hrough China's Wal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0.

QH：《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中华书局，1981。

QHXYTX：《清华校友通讯》，新竹：台湾，1962-。

QHXYTX：B《清华校友通讯》，北京：1980-。

QHXYTX：Bp《清华校友通讯》，北平，1947-1948。

QHXYTX：C《清华校友通讯》，重庆，1939-1941。

QHXYTX：K《清华校友通讯》，昆明，1941-1946。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长沙：商务书店，1939。

《清华大学五十年简史（1911-1960）》，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北京，1961）。

《清华十级毕业三十年纪念特刊》，台北，1968。

《中国书目季刊提要》。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查尔斯·罗曼纳斯、莱利·桑德兰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军队：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档》。Romanus, Charles, and Riley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9.

罗辛格，《1937-1944 年中国的战时政治》。Rosinger, Lawrence K. *China's Wartime Politics, 1937-1944*.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斯蒂芬 •萨拉夫，〈华罗庚传〉。Salaff, Stephen. "A Biography ofHua Lo-keng." Isis 63.217:143-83 (June 1972).

施耐德，《楚狂人：忠诚与异议的中国神话》。Schneider, Laurence A. *A Madman of Ch 'u: A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 1919 年五四运动的遗产》。Schwar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是说出真相的时候了：张申府访谈录》。*Times for Telling the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谢伟思，《美亚文件：美中关系史的一些问题》。Service, John S. *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7,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1.

夏西，〈1943-1947 年的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政治〉，密西根大学

博士论文。Shaheen, Anthony J. "The Chinese Democratic League and Chinese Politics, 1943-1947."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7.

《生活导报》，昆明，1942-1943。

史靖（王康），《闻一多的道路》，上海：生活书店，1947。

徐乃力，〈战时中国的国会〉，薛光前编，《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Shyu, Lawrence K. "China's Wartime Parliament." In Sih,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q. v.).

薛光前编，《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Sih, Paul K. T.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Hicksville, N.Y.: Exposition Press, 1977.

斯塔基编，《现代人的教育》。Starkey, Margaret M., ed. The *Education of Modern Man*. New York: Pitman, 1966.

萧超然、周承恩、沙健孙、梁柱，《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孙邦正，《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台北：正中书局，1971。

孙敦恒，《闻一多集外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弗兰克•陶，〈战时中国的学生生活〉。Tao, Frank. "Student Life in Wartime China." *Asia and the Americas* 44.11:493-96 (November 1944).

唐德刚、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Tong Te-kong and Li Tsung-jen.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9.

范力沛，《敌与友：中共党史上的统一战线》。Van Slyke, Lyman P.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保罗 •瓦格,《大门的关闭：1936-1946 年的中美关系》。Varg, Paul. *The Closing of The do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36-1946.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王觉源编，《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重庆：正中书店，1941。

王康，《闻一多传》，汉口：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王治浩、刑润川，〈知名学者、化学家曾昭抡教授〉,《化学通报》，1980 年，第 9 期，第 47-55 页。

王佐良，〈中国现代派诗歌：一个反思〉,《中国文学》。Wang Zuoliang. "Modernist Poetry in China: A reconsider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1984.1:213-33 (spring 1984).

《闻一多全集》，朱自清主编，两卷，上海：开明书店，1948。

伍启元，《国际价格理论纲要》。Wu Chi-yuan. *An Outline of International Pride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1939.

吴大猷，《回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

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

吴晓铃，《天南履痕》,《春城晚报》，共 14 部分，1984 年 12 月至 1985 年 8 月。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

《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

《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明章主编，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

《一二 • 一惨案特辑》，昆明？1946 年？

《一二 • 一运动论文集》，成宝、卫平、丁永编，昆明：云南人

民出版社，1987。

余秉权：〈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期刊札记〉，《亚洲研究杂志》。Yu, Ping-kuen. "A Note on Historical Periodical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4：585 (August 1964).

袁永熙，〈回忆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 11 辑，第 24-42 页〔1982 年 9 月〕。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1988。

《云南文史数据选辑》第 34 辑「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昆明校友会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宇宙风》，上海，广州，桂林，1937-1941。

《宇宙风乙刊》，上海，1939-41。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上海：读书出版社，1947。

《滇康道上》，桂林：文友书店，1943。

翟国瑾，〈野玫瑰演出前后〉（一），《中外杂志》34.2：103-109（1983 年 8 月）和 34.3：116-121（1983 年 9 月）。

张春风，《国立各校投考手册》，香港：学灯出版社，1941。

张起钧，《儒林逸话》，台北：学海出版社，1982。

张其昀，《中华民国大学志》，两卷，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张尚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阅读西方哲学著作》，《云南日报》，1982 年 5 月 7 日。英译载 FBIS-CHI-82-112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China, June 10, 1982)，第 2-3 版。

《战国策》。

《战国知识》，昆明，1938-1941。

赵赓扬，《梅贻琦传稿》，台北：邦新文化信息出版社，1976。

《正义报》，昆明，1945。

《中国大学图鉴》，中国学生社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

《中华民国科学志》，李熙谋编，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

《中央日报》，昆明。《周报》，上海，1945-1946。

朱自清，《蒙自杂记》，《新云南》，1939.3：28-290939 年 4 月 31 日）。

庄焜明，《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之研究》，博士论文，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1979。

作者简介：

易社强（John Israel），西南联大荣誉校友。早年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现为维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著有《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1927-1937 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等。

译者简介：

饶佳荣，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与师友合译《档案中的虚构》（纳塔莉·泽蒙· 戴维斯著，即出）、《文化贸易》（包筠雅著，即出）。译义赐教：rjrrobert@gmaiI.com